

· 旧籍新刊 ·

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

岳麓书社

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

124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32146



岳麓书社

1032146

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

责任编辑：刘 柯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8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00,000 印张：8.75 印数：1—2,100
统一书号：11285·52 定价：1.75元

出版说明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他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大量吸取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新思想、新学说，用“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的文章，影响过一代青年。今天重读他的著作，仍有一定的意义。

这里所录梁启超的四种史学论著，其中《新史学》作于1902年，时间较早，见于各本《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成于1920年，《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于1921年，过去均印有单行本；《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系为《申报》创刊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最近之五十年》而作。一九三二年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时，此四种著作均被收入。我们在汇集重印时，除标点符号有所更动外，其余尽量保持原貌，容有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目 录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一	(3)
二	(4)
三	(6)
四	(9)
五	(11)

清代学术概论

蒋序	(15)
自序	(17)
第二自序	(19)
一	(20)
二	(22)
三	(25)
四	(27)
五	(30)
六	(32)
七	(35)
八	(37)
九	(40)
十	(42)
十一	(45)

十二	(51)
十三	(54)
十四	(56)
十五	(60)
十六	(62)
十七	(65)
十八	(67)
十九	(69)
二十	(71)
二十一	(73)
二十二	(75)
二十三	(77)
二十四	(80)
二十五	(82)
二十六	(84)
二十七	(88)
二十八	(91)
二十九	(92)
三十	(94)
三十一	(96)
三十二	(98)
三十三	(99)

中国历史研究法

自序	(105)
第一章 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107)
第二章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114)

第三章	史之改造	(136)
第四章	说史料	(145)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172)
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	(210)
新史学		
	中国之旧史	(241)
	史学之界说	(247)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252)
	论正统	(260)
	论书法	(267)
	论纪年	(271)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申报》馆里的朋友，替他们“馆翁申老先生”做五十整寿，出了许多题目找人做寿文，把这个题目派给我。呵呵！恰好我和这位“申老先生”是同庚，只怕我还是忝长几天的老哥哥哩！所以我对于这篇寿文，倒有点特别兴味。

却是一件，我们做文章的人，最怕人出题目叫我做。因为别人标的题，不见得和我所要说的话内容一致，我到底该做他的题呀，还是该说我的话呢？即如这个题目，头一桩受窘的是范围太广阔，若要做一篇名副其实的文章，恐怕非几十万字不可。再不然，我可以说一句“请看本书第二第三两篇里头那几十篇大文”，我便交白卷完事。第二桩受窘的是目的太窄酷，题目是五十年的进化，许我说他的退化不呢？即是庆寿文章，逼着要带几分“善颂善祷”的应制体裁，那末，可是更难着笔了。既已硬派我在这个题目底下做文章，我却有两段话须得先声明：

第一，我所说的不能涉及中国全部事项，因为对于逐件事情观察批评，我没有这种学力。我若是将某件某件如何进步说个大概，我这篇文章，一定变成肤廓滥套的墨卷。我劝诸君，不如看下边那几十篇大文好多着哩。诸君别要误认我这篇是下边几十篇的总括，我不过将我下笔时候所感触的几件事随便写下来，绝无组织，绝无体例。老实说，我这篇只算是“杂感”，不配说是“概论”。

第二，题目标的是“进化”，我自然不能不在进化范围内说，

但要我替中国瞎吹，我却不能。我对于我们所亲爱的国家，固然想“隐恶而扬善”，但是他老人家有什么毛病，我们也不应该“讳疾忌医”，还是直说出来大家想法子补救补救才好。所以我虽说他进化，那不进化的地方，也常常提及。

这样说来，简直是“文不对题”了。好吗，就把不对题的文胡乱写出来。

二

有一件大事，是我们五千年来祖宗继续努力，从没有间断过的，近五十年，依然猛烈进行，而且很有成绩。是件什么事呢？我起他一个名，叫做“中华民族之扩大”。原来我们中华民族，起初不过小小几个部落，在山东、河南等处地方得些根据地。几千年间慢慢地长……长……长成一个硕大无朋的巨族，建设这泱泱雄风的大国。他长的方法有两途：第一是把境内境外无数的异族叫他同化于我。第二是本族的人年年向边境移殖，把领土扩大了。五千年来的历史，都是向这条路线进行，我也不必搬多少故事来作证了。近五十年，对于这件事，有几方面成功很大，待我说来：

一，洪杨乱后，跟着西南地方有苗乱，蔓延很广，费了十几年工夫才平定下来。这一次平定，却带几分根本解决性质，从此以后，我敢保中国再不会有“苗匪”这名词了。原来我族对苗族，乃是黄帝尧舜以来一桩大公案，闹了几千年，还没有完全解决。在这五十年内，才把黄帝伐蚩尤那篇文章做完，最末的一段，确是历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一件事。

二，辛亥革命，满清逊位，在政治上含有很大意义，下文再说。专就民族扩大一方面看来，那价值也真不小。原来东胡民族，

和我们捣乱捣了一千七八百年，五胡南北朝时代的鲜卑，甚么慕容燕、拓跋魏、宇文周，唐宋以后，契丹跑进来叫做辽，女真跑进来叫做金，满洲跑进来叫做清，这些都是东胡族，我们吃他们的亏真算吃够了。却是跑进来过后，一代一代的都被我们同化。最后来的这帮满洲人，盘据是盘据得最久，同化也同化得最透。满洲算是东胡民族的大总汇，也算是东胡民族的大结束。近五十年来，满人的汉化，以全速率进行，到了革命后个个满人头上都戴上一个汉姓，从此世界上可真不会有满洲人了。这便是把二千年来东胡民族，全数融纳进来，变了中华民族的成分，这是中华民族扩大的一段落。

三，内地人民向东北西北两方面发展，也是近五十年一大事业。东三省这块地方，从前满洲人预备拿来作退归的老巢，很用这封锁手段，阻止内地人移殖。自从经过中日、日俄几场战争，这块地方变成四战之区，交通机关大开，经济现状激变。一方面虽然许多利权落在别人手上，一方面关内外人民关系之密度，确比从前增加好些，东三省人和山东、直隶人渐渐打成一片了。再看西北方面，自从左宗棠开府甘陕，内地的势力，日日往那边膨胀。光绪间新疆改建行省，于是两汉以来始终和我们若即若离的西域三十六国，算是完全编入中国版图，和内地一样了。这种民族扩大的势力，现在还日日向各方面进行，外蒙古、阿尔泰、青海、川边等处，都是在进步活动中。

四，海外殖民事业，也在五十年间很有发展。从前南洋一带，自明代以来，闽粤人已经大行移殖，近来跟着欧人商权的发达，我们侨民的经济势力，也确立得些基础。还有美洲、澳洲等处，从前和我们不相闻问，如今华侨移住，却成了世界问题了。这都是近五十年的事，都是我们民族扩大的一种表征。

民族扩大，是最可庆幸的一件事，因此可以证明我们民族正在青春时代，还未成年，还天天在那里长哩。这五十年里头，确能将几千年未了的事业了他几桩，不能不说是国民努力的好结果。最可惜的，有几方面完全失败了。第一是台湾，第二是朝鲜，第三是安南。台湾在这五十年内的前半期，很成了发展的目的地，和新疆一样，到后半期被人抢去了。朝鲜和安南，都是祖宗屡得屡失的基业，到我们手上完全送掉。海外殖民，也到处被人迎头痛击。须知我们民族会往前进，别的民族也会往前进。今后我们若是没有新努力，恐怕只有兜截转来，再没有机会能继续扩大了。

三

学问和思想的方面；我们不能不认为已经有多少进步，而且确已替将来开出一条大进步的路径。这里头最大关键，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科举制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真算得深根固蒂。他那最大的毛病，在把全国读书人的心理都变成虚伪的因袭的笼统的，把学问思想发展的源泉都堵住了。废科举的运动，在这五十年内的初期，已经开始，郭嵩焘、冯桂芬等辈，都略略发表这种意见。到“戊戌维新”前后，当时所谓新党如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对于科举制度施行总攻击。前后约十年间，经了好几次波折，到底算把这件文化障碍物打破了。如今过去的陈迹，很象平常，但是用历史家的眼光看来，不能不算是五十年间一件大事。

这五十年时间我们有什么学问可以拿出来见人呢？记得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噫哟！

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曾几何时，到如今“新文化运动”这句话，成了一般读书社会的口头禅，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争席，易卜生差不多要推倒屈原。这种心理对不对，另一问题，总之这四十几年间思想的剧变，确为从前四千几年所未尝梦见。比方从前思想界是一个死水的池塘，虽然许多浮萍荇藻掩映在面上，却是整年价动也不动，如今居然有了“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的气象了。虽然他流动的方向和结果，现在还没有十分看得出来，单论他由静而动的那点机势，谁也不能不说他是进化。

古语说得好：“学然后知不足”。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但这一期内，思想界受的影响很少，其中最可纪念的，是制造局里头译出几部科学书。这些书现在看起来虽然很陈旧很肤浅，但那群翻译的人，有几位颇忠实于学问，他们在那个时代，能够有这样的作品，其实是亏他。因为那时读书人都不会说外国话，说外国话的都不读书，所以这几部译本书，实在是替那第二期“不懂外国话的西学家”开出一条血路了。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象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

启超一班人。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样学法”，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这些话虽然象是囫圇，在当时却发生很大的效力。他们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失败，只剩下前文说的废科举那件事，算是成功了。这件事的确能够替后来打开一个新局面，国内许多学堂，国外许多留学生，在这期内蓬蓬勃勃发生，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期播殖下来。这一期学问上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算是把十九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可惜国里的人能够领略的太少了。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州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了一个新时期来了。

这三期间思想的进步，试把前后期的人物做个尺度来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第一期，如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辈，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到第二期时，嵩焘、佩纶辈已死去，之洞却还在。之洞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风气的一人，到了后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第三

时期，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躺一躺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流转得很快，可以证明思想界的体气，实已渐趋康强。

拿过去若干个五十年和这个五十年来比，这五十年诚然是进化了；拿我们这五十年和别人家的五十年来比，我们可是惭愧无地。试看这五十年美国何如？这五十年日本何如？这五十年德国何如？这五十年俄国何如？他们政治上虽然成败不同苦乐不等，至于学问思想界，真都算得一日千里。就是英、法等老国，又哪一个不是往前飞跑？我们闹新学闹了几十年，试问科学界可曾有一两件算得世界的发明？艺术家可曾有一两种供得世界的赏玩？出版界可曾有一两部充得世界的著述？哎，只好等第三期以后看怎么样罢。

四

“五十年里头，别的事都还可以勉强说是进化，独有政治，怕完全是退化吧？”这句话，几几乎万口同声都是这样说，连我也很难得反对。虽然，从骨子里看来，也可以说这五十年中国，最进化的便是政治。

原来政治是民意所造成，不独“德谟克拉西”政治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即独裁政治寡头政治，也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无论何种政治，总要有多数人积极的拥护——最少亦要有多数人消极的默认，才能存在。所以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这五十年来中国具体的政治，诚然可以说只有退化并无进化，但从国民自觉的这方面看来，那意识确是一日比一日鲜明，而且一日比一日扩大。自觉，觉些什么呢？

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这两种精神，从前并不是没有，但那意识常在睡眠状态之中，朦朦胧胧的，到近五十年——实则是近三十年——却很鲜明的表现出来了。我敢说，自从满洲退位以后，若再有别个民族想抄袭五胡元魏辽金元清那套旧文章再来“入主中国”，那可是海枯石烂不会出来的事。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不会卸下。任凭你象尧、舜那么贤圣，象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象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这种事实，你别要看轻他了，别要说他只有空名并无实际。古语说得好：“名者实之宾”，凡事能够在社会上占得个“正名定分”，那么，第二步的“循名责实”，自然会跟着来。总之在最近三十年间我们国民所做的事业，第一件，是将五胡乱华以来一千多年外族统治的政治根本铲除。第二件，是将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君主专制的政治永远消灭。而且这两宗事业，并非无意识的偶然凑会，的确是由人民一种根本觉悟经了很大的努力，方才做成。就这一点看来，真配得上进化这两个字了。

民国成立这十年来，政治现象，诚然令人呕气，但我以为不必失望。因为这是从两个特别原因造成，然而这些原因都快要消灭了。第一件，革命时候，因为人民自身力量尚未充足，不能不借重固有势力来做应援。这种势力，本来是旧时代的游魂。旧时代是有二千多年历史的，他那游魂，也算得“取精用宏”，一二十年的猖獗，势所难免。如今他的时运，也过去大半了，不久定要完全消灭。经过一番之后，政治上的新时代，自然会产生出来（不是委心任命的话，其实事理应该如此）。第二件，社会上的事物，

一张一弛，乃其常态。从甲午戊戌到辛亥，多少仁人志士，实在是闹得筋疲力倦，中间自然会发生一时的惰力。尤为可惜的，是许多为主义而奋斗的人物，都做了时代的牺牲死去了，后起的人，一时接不上气来。所以中间这一段，倒变成了黯然无色。但我想这时代也过去了。从前的指导人物，象是已经喘过一口气，从新觉悟，从新奋斗。后方的战斗力，更是一天比一天加厚。在这种形势之下，当然有一番新气象出来。

要而言之，我对于中国政治前途，完全是乐观的，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象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哪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对于人人认为退化的政治，觉得他进化的可能性却是最大哩。

五

此外社会上各种进化状况，实在不少，可惜我学力太薄，加以时日仓卒，不能多举了。好在还有各位专门名家的论著，可以发挥光大。我姑且把我个人的“随感”，胡乱写出来，并且表示我愿意和我们老同年“申老先生”继续努力。

清代学术概论

8412801

蒋 序

方震编《欧洲文艺复兴史》既竣，乃征序于新会。而新会之序，量与原书埒，则别为《清学概论》，而复征序于震。震惟由复古而得解放，由主观之演绎进而为客观之归纳，清学之精神，与欧洲之文艺复兴，实有同调者焉。虽然，物质之进步，迟迟至今日虽当士夫大声以倡科学，而迄今乃未有成者，何也？且吾于清学发达之历史中亦有数疑问：

一、耶稣会挟其科学东来，适当明清之际，其注意尤在君主及上流人，明之后，清之帝皆是也。清祖康熙，尤喜其算，测地量天，浸浸乎用之实地矣。循是以发达，则欧学自能逐渐输入，顾何以康熙以后，截然中辍，仅余天算，以维残垒？

二、致用之学，自亭林以迄颜、李，当时几成学者风尚。夫致用云者，实际于民生有利之谓也。循是以往，亦物质发达之门，顾何以方向转入于经典考据者则大盛，而其余独不发达，至高者勉为附庸而已？

三、东原理欲之说震古砾今，此真文艺复兴时代个人享乐之精神也。“遏欲之害，甚于防川。”兹言而在中国，岂非奇创。顾此说独为当时所略视，不惟无赞成者，且并反对之声而不扬，又何故？

四、迨至近世，震于船坚炮利，乃设制造局，译西书，送学生，振振乎有发达之势矣。顾今文学之运动，距制造局之创设，后二十余年，何以通西文者，无一人能参加此运动。而变法、维

新、立宪、革命之说起，则天下翕然从之，夺格致化学之席，而纯正科学卒不扬？

此其原因有原于政治之趋势者。清以异族入主中夏，致用之学，必遭时忌，故藉朴学以自保，此其一也。康熙末年，诸王相竞，耶稣会党太子，喇嘛党雍正（此言夏穗卿先生为我言之），既失败于外，又遭谗于罗马，而传教一事乃竟为西学输入之一障碍，此其二也。有原于社会之风尚者。民族富于调和性，故欧洲之复古为冲突的，而清代之复古，虽抨击宋学，而凭圣经以自保，则一变为继承的，而转入于调和，轮廓不明瞭，此科学之大障也，此其三。民族尚谈玄。艺术一途，社会上等诸匠人，而谈空说有者，转足以自尊，此其四。今时局机运稍稍变矣，天下方竟言文化事业，而社会之风尚犹有足以为学术之大障者，则受外界经济之影响，实利主义兴，多金为上，位尊次之，而对于学者之态度则含有迂远不适用之意味，而一方谈玄之风犹未变，民治也，社会也，与变法维新、立宪革命等是一名词耳，有以异乎？无以异乎？此则愿当世君子有以力矫之矣。

民国十年正月二日

蒋方震

自序

(一) 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

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

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逐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

(二) 余于十八年前，尝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其第八篇论清代学术，章末结论云：

“此二百余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

又云：

“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

又云：

“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突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继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此现象谁造之？曰：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

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

今视昔似较为精密。

且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故今全行
改作，采旧文者什一二而已。

(三) 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故本篇所记述，以此两潮流为主，其他则附庸耳。

(四) “今文学”之运动，鄙人实为其一员，不容不叙及。本篇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其批评正当与否，吾不敢知，吾惟对于史料上之梁启超力求忠实，亦如对于史料上之他人之力求忠实而已矣。

(五) 篇中对于平生所极崇拜之先辈，与夫极尊敬之师友，皆直书其名，不用别号，从质家言，冀省读者脑力而已。

(六) 自属稿至脱稿，费十五日。稿成即以寄《改造杂志》应期出版，更无余裕复勘，舛漏当甚多，惟读者教之。

民国九年十月十四日

启超识

第二自序

(一) 此书成后，友人中先读其原稿者数辈；而蒋方震、林志钧、胡适三君，各有所是正，乃采其说增加三节，改正数十处。三君之说，不复具引，非敢掠美，为行文避枝蔓而已。丁敬礼所谓“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谨记此以志谢三君。

(二) 久抱著《中国学术史》之志，迁延未成。此书既脱稿，诸友好益相督责，谓当将清代以前学术一并论述，庶可为向学之士省精力，亦可唤起学问上兴味也。于是决意为之，分为五部，其一、先秦学术；其二、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其三、隋唐佛学；其四、宋明理学；其五、则清学也。今所从事者则佛学之部，名曰《中国佛学史》，草创正半，欲以一年内成此五部，能否未敢知，勉自策厉而已。故此书遂题为《中国学术史第五种》。

(三) 本书属稿之始，本为他书作序，非独立著一书也，故其体例不自惬者甚多。既已成编，即复怠于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学术史》而名曰《清代学术概论》，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简陋也。五部完成后，当更改之耳。

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启超记

一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寢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传捍卫为己任，常以极纯洁之牺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权威渐立，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共公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今成语，则曰“风气”。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一思潮扩为风

气，则其成熟之时也。

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尽有所未遑。所谓未遑者，非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此启蒙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生”相。于是进为全盛期：破坏事业已告终，旧思潮屏息慑伏，不复能抗颜行，更无须攻击防卫以糜精力。而经前期酝酿培灌之结果，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鬻冗者犹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此全盛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住”相。更进则入于蜕分期：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取得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时之环境，必有以异乎前。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骎骎乎夺其席。此蜕化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异”相。过此以往，则衰落期至焉。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

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拮据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运命，当佛说所谓“灭”相。

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而有清三百年，则其最切著之例证也。

二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其盛衰之迹，恰如前节所论之四期。其启蒙期运动之代表人物，则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也。其时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而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渭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同时对于明学之反动，尚有数种方向：其一，颜元、李塨一派谓：“学问固不当求诸冥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而刘献廷以孤往之姿，其得力处亦略近于此派。其二，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顾炎武所学，本亦具此精神，而黄万辈规模之大不逮顾，故专向此一方面发展。同时顾祖禹之学，亦大略同一径路。

其后则衍为全祖望、章学诚等，于清学为别派。其三，王锡阐、梅文鼎一派专治天算，开自然科学之端绪焉。此诸派者，其研究学问之方法，皆与明儒根本差异。除颜、李一派中绝外，其余皆有传于后，而顾、阎、胡“尤为正统派”不祧之大宗。其犹为旧学（理学）坚守残垒效死勿去者，则有孙奇逢、李中孚、陆世仪等，而其学风已由明而渐返于宋。即诸新学家，其思想中留宋人之痕迹犹不少。故此期之复古，可谓由明以复于宋，且渐复于汉唐。

其全盛运动之代表人物，则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统派。试举启蒙派与正统派相异之点：一，启蒙派对于宋学，一部分猛烈攻击，而仍因袭其一部分。正统派则自固壁垒，将宋学置之不议不论之列。二，启蒙派通经致用之观念，故喜言成败得失经世之务。正统派则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正统派之中坚，在皖与吴。开吴者惠，开皖者戴。惠栋受学于其父士其。其弟子有江声、余萧客，而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等皆汲其流。戴震受学于江永，亦事栋以先辈礼。震之在乡里，衍其学者，有金榜、程瑶田、凌廷堪、三胡——匡衷、培翬、春乔——等。其教于京师，弟子之显者，有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念孙以授其子引之。玉裁、念孙、引之最能光大震学，世称戴段二王焉。其实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也。惠、戴齐名，而惠尊闻好博，戴深刻断制。惠仅“述者”而戴则“作者”也。受其学者，成就之大小亦因以异。故正统派之盟主必推戴。当时学者承流向风，各有建树者，不可数计。而纪昀、王昶、毕沅、阮元辈，皆处贵要，倾心宗向，隐若护法，于是兹派称全盛焉。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

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论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当斯时也，学风殆统于一。启蒙期之宋学残绪，亦莫能续。仅有所谓古文家者，假“因文见道”之名，欲承其祧，时与汉学为难。然志力两薄，不足以张其军。

其蜕分期运动之代表人物，则康有为、梁启超也。当正统派全盛时，学者以专经为尚，于是有庄存与始治《春秋公羊传》有心得，而刘逢禄、龚自珍最能传其学。《公羊传》者，“今文学”也。东汉时，本有今文、古文之争甚烈。《诗》之《毛传》，《春秋》之《左传》，及《周官》，皆晚出，称古文，学者不信之。至汉末而古文学乃盛。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得胜，渐开学者疑经之风。于是刘逢禄大疑《春秋左氏传》，魏源大疑《诗毛氏传》，若《周官》则宋以来固多疑之矣。康有为乃综集诸家说，严画今古文分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正统派所最尊崇之许、郑，皆在所排击。则所谓复古者，由东汉以复于西汉。有为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实极大胆之论，对于数千年经籍谋一突飞的大解放，以开自由研究之门。其弟子最著者，陈千秋、梁启超。千秋早卒，启超以教授著述大弘其学。然启超与正统派因缘较深，时时不嫌于其师之武断，故末流多有异同。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

清学之蜕分期，同时即其衰落期也。顾、阎、胡、惠、戴、段、二王诸先辈，非特学识渊粹卓绝，即行谊亦至狷洁。及其学既盛，举国希声附和，浮华之士亦竟趋焉，固已渐为社会所厌。

且兹学萃萃诸大端，为前人发挥略尽，后起者率因袭补苴，无复创作精神。即有发明亦皆末节，汉人所谓碎义逃难也。而其人犹自倨贵，俨成一种“学阀”之观。今古文之争起，互相诋议，缺点益暴露。海通以还，外学输入，学子憬然于竺旧之非计，相率吐弃之，其运命自不能以复久延。然在此期中，犹有一二大师焉，为正统派死守最后之壁垒：曰俞樾，曰孙诒让，皆得统于高邮王氏。樾著书惟二三种独精绝，余乃类无行之袁枚，亦衰落期之一征也。诒让则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矣。樾弟子有章炳麟，智过其师，然亦以好谈政治，稍荒厥业。而绩谿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着着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今清学固衰落矣，“四时之运，成功者退。”其衰落乃势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无所容其痛惜留恋。惟能将此研究精神转用于他方向，则清学亡而不亡也矣。

略论既竟，今当分说各期。

三

吾言“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夫宋、明理学何为招反动耶？学派上之“主智”与“主意”、“唯物”与“唯心”、“实验”与“冥证”，每迭为循环。大抵甲派至全盛时必有流

弊，有流弊斯有反动，而乙派与之代兴。乙派之由盛而弊，而反动亦然。然每经一度之反动再兴，则其派之内容，必革新焉而有以异乎其前。人类德慧智术之所以进化，胥恃此也。此在欧洲三千年学术史中，其大势最著明，我国亦不能违此公例。而明、清之交，则其嬗代之迹之尤易见者也。

唐代佛学极昌之后，宋儒采之，以建设一种“儒表佛里”的新哲学，至明而全盛。此派新哲学，在历史上有极大之价值，自无待言。顾吾辈所最不嫌者，其一，既采取佛说而损益之，何可讳其所自出，而反加以丑诋；其二，所创新派既并非孔、孟本来面目，何必附其名而淆其实。是故吾于宋、明之学，认其独到且有益之处确不少，但对于其建设表示之形式，不能曲恕。谓其既诬孔，且诬佛，而并以自诬也。明王守仁为兹派晚出之杰，而其中此习气也亦更甚。即如彼所作《朱子晚年定论》，强指不同之朱、陆为同，实则自附于朱，且诬朱从我。此种习气，为思想界之障碍者有二：一曰遏抑创造。一学派既为我所自创，何必依附古人以为重？必依附古人，岂非谓生古人后者便不应有所创造耶？二曰奖励虚伪。古人之说诚如是，则宗述之可也。并非如是，而以我之所指者实之，此无异指鹿为马，于学问为不忠实。宋、明学之根本缺点在于是。

进而考其思想之本质，则所研究之对象，乃纯在绍绍灵灵不可捉摸之一物。少数俊拔笃摯之士，曷尝不循此道而求得身心安宅，然效之及于世者已鲜，而浮伪之辈，摭拾虚辞以相夸煽，乃甚易易。故晚明“狂禅”一派，至于“满街皆是圣人”、“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道德且堕落极矣。重以制科帖括，笼罩天下，学者但习此种影响因袭之谈，便足以取富贵弋名誉。举国靡然化之，则相率于不学，且无所用心。故晚明理学之弊，恰如欧洲中世黑

暗时代之景教。其极也，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消蚀达于零度。夫人类之有“学问欲”，其天性也，“学问饥饿”至于此极，则反动其安得不起。

四

当此反动期而从事于“黎明运动”者，则昆山顾炎武其第一人也。炎武对于晚明学风，首施猛烈之攻击，而归罪于王守仁，其言曰：

“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亭林文集·答友人论学书》）

又曰：

“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日知录·十八》）

又曰：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同上）

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炎武之排斥晚明学风，其锋芒峻露，大率类是。自兹以后，王学遂衰熄。清代犹有袭理学以为名高者，则皆自托于程、朱之徒也。虽曰王学末流极敝，使人心厌倦，本有不摧自破之势，然大声疾呼以促思潮之转捩，则炎武最有力

焉。

炎武未尝直攻程、朱，根本不承认理学之能独立。其言曰：

“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引》）

“经学即理学”一语，则炎武所创学派之新旗帜也。其正当与否，且勿深论——以吾侪今日眼光观之，此语有两病：其一，以经学代理学，是推翻一偶像而别供一偶像；其二，理学即哲学也，实应离经学而为一独立学科——虽然，有清一代学术，确在此旗帜之下而获一新生命。昔有非笑六朝经师者，谓“宁说周、孔误，不言郑、服非。”宋、元、明以来之谈理学者亦然，宁得罪孔、孟，不敢议周、程、张、邵、朱、陆、王。有议之者，几如在专制君主治下犯大不敬律也。而所谓理学家者，盖俨然成一最尊贵之学阀而奴视群学。自炎武此说出，而此学阀之神圣，忽为革命军所粉碎。此实四五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解放也。

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顾炎武之在“清学派”，即其人也。炎武著述，其有统系的组织而手定成书者，惟《音学五书》耳。其《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造端宏大，仅有长编，未为定稿，《日知录》为生平精力所集注，则又笔记备忘之类耳。自余遗书尚十数种，皆明单义，并非巨裁。

然则炎武所以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者何在？则在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而已。约举有三：

一曰贵创。炎武之言曰：“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日知录·十八》）其论著书之难，曰：“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日知录·十九》）其《日知录·自序》云：“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

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故凡炎武所著书，可决其无一语踏袭古人。其论文也亦然，曰：“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日知录·十九》）又曰：“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亭林文集·与人书十七》）观此知摹仿依傍，炎武所最恶也。

二曰博证。《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云：“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此语最能传炎武治学法门。全祖望云：“凡先生之游，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相合，即发书而对勘之。”（《鮑琦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盖炎武研学之要诀在是：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其自述治音韵之学也，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音论》）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则固炎武所自创也。

三曰致用。炎武之言曰：“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二》）彼诚能践其言，其终身所撰著，盖不越此范围。其所谓“用”者果真为有用与否，此属别问题。要之其标“实用主义”以为鹄，务使学问与社会之关系，增加密度，此实对于晚明之帖括派、清谈派施一大针砭。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于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

五

汪中尝拟为《国朝六儒颂》，其人则昆山顾炎武、德清胡渭、宣城梅文鼎、太原阎若璩、元和惠栋、休宁戴震也。“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凌廷堪《校礼堂集·汪容甫墓志铭》）其所推挹盖甚当，六君者洵清儒之魁也。然语于思想界影响之巨，则吾于顾、戴之外，独推阎、胡。

阎若璩之所以伟大，在其《尚书古文疏证》也。胡渭之所以伟大，在其《易图明辨》也。汪中则既言之矣。夫此两书所研究者，皆不过局部问题，曷为能影向于思想界之全部？且其书又不免漏略芜杂，为后人所纠者不少——阮元辑《学海堂经解》，两书皆摈不录——曷为推尊之如是其至？吾固有说。

《尚书古文疏证》，专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十六篇及同时出现之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书也。此书之伪，自宋朱熹、元吴澄以来，既有疑之者。顾虽积疑，然有所惮而莫敢断。自若璩此书出而讫乃定。夫辨十数篇之伪书，则何关轻重？殊不知此伪书者，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七八岁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历代帝王，经筵日讲，临轩发策，咸所依据尊尚。毅然悍然辞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自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以来，国人之对于六经，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韩愈所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若对于经文之一字一句稍涉拟议，便自觉陷于“非圣无法”，蹙然不自安于其良心，非特畏法纲惮清议而已。凡事物之含有宗教性者，例不

许作为学问上研究之问题。一作为问题，其神圣之地位固已摇动矣。今不唯成为问题而已，而研究之结果，乃知畴昔所共奉为神圣者，其中一部分实粪土也，则人心之受刺激起警愕而生变化，宜何如者！盖自兹以往，而一切经文，皆可以成为研究之问题矣。再进一步，而一切经义，皆可以成为研究之问题矣。以旧学家眼光观之，直可指为人心世道之忧——当时毛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以难阉，自比于抑洪水驱猛兽。光绪间有洪良品者，犹著书数十万言，欲翻阉案，意亦同此——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观之，则诚思想界之一大解放。后此今古文经对待研究，成为问题。六经诸子对待研究，成为问题。中国经典与外国宗教哲学诸书对待研究，成为问题。其最初之动机，实发于此。

胡渭之《易图明辨》，大旨辨宋以来所谓《河图》《洛书》者，传自邵雍，雍受诸李之才，之才受诸道士陈抟。非羲、文、周、孔所有，与《易》义无关。此似更属一局部之小问题，吾辈何故认为与阉书有同等之价值耶？须知所谓“无极”“太极”，所谓《河图》《洛书》，实组织“宋学”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无不从此衍出。周敦颐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程、朱辈祖述之，谓为道统所攸寄。于是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儿与经典相埒。渭之此书，以《易》还诸羲、文、周、孔，以《图》还诸陈、邵，并不为过情之抨击，而宋学已受“致命伤”。自此，学者乃知宋学自宋学，孔学自孔学，离之双美，合之两伤（此胡氏自序中语）。自此，学者乃知欲求孔子所谓真理，舍宋人所用方法外，尚别有其途。不宁唯是，我国人好以“阴阳五行”说经说理，不自宋始，盖汉以来已然。一切惑世、诬民、汨灵、窒智之邪说、邪术，皆缘附而起。胡氏此书，乃将此异说之来历，和盘托出，使其不复能依附经训以自重，此实思想之一大

革命也。

欧洲十九世纪中叶，英人达尔文之《种源论》，法人雷能之《耶稣基督传》，先后两年出版，而全欧思想界为之大摇，基督教所受影响尤剧。夫达尔文自发表其生物学上之见解，于教宗何与？然而被其影响者，教义之立脚点破也。雷能之《传》，极推挹基督，然反损其信仰者，基督从来不成为学问上之问题，自此遂成问题也。明乎此间消息，则阎、胡两君之书，在中国学术史上之价值，可以推见矣。

若论清学界最初之革命者，尚有毛奇龄其人。其所著《河图原舛篇》、《太极图说遗议》等，皆在胡渭前。后此清儒所治诸学，彼亦多引其绪。但其言古音则诋顾炎武，言《尚书》则诋阎若璩，故汉学家祧之不宗焉。全祖望为《毛西河别传》，谓：“其所著书，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尚袭其误而不知者，有信口臆说者，有不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有改古书以就已者。”祖望于此诸项，每项举一条为例，更著有《萧山毛氏纠缪》十卷。平心论之，毛氏在启蒙期，不失为一冲锋陷阵之猛将，但于“学者的道德”缺焉，后儒不宗之宜耳。

同时有姚际恒者，其怀疑精神极炽烈，疑《古文尚书》，疑《周礼》，疑《诗序》，乃至疑《孝经》疑《易传·十翼》。其所著《诸经通论》未之见，但其《古今伪书考》，列举经史子部疑似之书共数十种，中固多精凿之论也。

六

吾于清初大师，最尊顾、黄、王、颜，皆明学反动所产也。

顾为正统派所自出，前既论列，今当继述三子者。

余姚黄宗羲，少受学于刘宗周，纯然明学也，中年以后，方向一变。其言曰：“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滋流弊，故学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清史·黄宗羲传》）又曰：“读书不多，无以证明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全祖望《鮑琦亭集·黄梨洲先生神道碑》）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又好治天算，著书八种，全祖望谓“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惊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宗羲实开之。”其《律吕新义》，开乐律研究之绪；其《易学象数论》，与胡渭《易图明辨》互相发明；其《授书随笔》，则答阎若璩问也。故阎、胡之学，皆受宗羲影响，其他学亦称是。

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也。宗羲以史学为根柢，故言之尤辩。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其言曰：

“后之为君者，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有君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为寇讎，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不当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窥伺。”（《原君》）

又曰：“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而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

害天下也。……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原法》)

此等论调，由今日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故顾炎武见之而欢，谓“三代之治可复。”而后此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清代史学极盛于浙，鄞县万斯同最称首出。斯同则宗羲弟子也。唐以后之史，皆官家设局分修，斯同最非之，谓：“官修之史，仓猝成于众人，犹招市人与谋室中之事。”（钱大昕《潜研堂集·万季野先生传》）以独力成《明史稿》，论者谓迁、固以后一人而已。其后斯同同县有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会稽有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学识在刘知几、郑樵上。

衡阳王夫之，生于南荒，学无所师承，且国变后遁迹深山，与一时士夫不相接，故当时无称之者，然亦因是戛戛独有所造。其攻王学甚力，尝曰：“侮圣人之言，小人之大恶也。……姚江之学，横拈圣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为要妙，窜入其禅宗，尤为无忌惮之至。”（《俟解》）又曰：“数传之后，愈徇迹而忘其真，或以钩考文句，分支配拟为穷经之能，仅资场屋射覆之用，其偏者以臆测度，趋入荒杳。”（《中庸补传衍》）遗书中此论甚多，皆感于明学之极蔽而生反动，欲挽明以返诸宋，而于张载之《正蒙》，特推崇焉。其治学方法，已渐开科学研究的精神。尝曰：

“天下之物理无穷，已精而又有其精者，随时以变，而皆不失于正；但信诸己而即执之，云何得当；况其所为信诸己者，又或因习气或守一先生之言，而渐渍以为己心乎！”（《俟解》）

夫之著书极多，同治间金陵刻本二百八十八卷，犹未逮其半，皆不落“习气”，不“守一先生之言。”其《读通鉴论》、《宋论》，往

往有新解，为近代学子所喜诵习。尤能为深沈之思以掸绎名理。其《张子正蒙注》、《老子衍》、《庄子解》，皆覃精之作，盖欲自创一派哲学而未成也。其言：“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正蒙注》）可谓发宋元以来所未发，后此戴震学说，实由兹衍出。故刘献廷极推服之，谓：“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广阳杂记二》）其乡后学谭嗣同之思想，受其影响最多。尝曰：“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仁学》卷上）尤可注意者，《遗书》目录中，有《相宗络索》及《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二书（未刻），在彼时以儒者而知治“唯识宗”，可不谓豪杰之士耶？

七

顾、黄、王、颜，同一“王学”之反动也，而其反动所趋之方向各不同。黄氏始终不非王学，但是正其末流之空疏而已。顾、王两氏黜明存宋，而顾尊考证，王好名理。若颜氏者，则明目张胆以排程、朱、陆、王，而亦菲薄传注考证之学，故所谓“宋学”“汉学”者，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而其学卒不显于清世。

博野颜元，生于穷乡，育于异姓，饱更忧患，坚苦卓绝，其学有类罗马之“斯多噶派”，其对于旧思想之解放，最为彻底。尝曰：“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竟不必附和雷同也。”（钟铨著《颜习斋言行录·学问篇》）其尊重自己良心，确乎不可拔也如此，其对于宋学，为绝无闪缩之正面攻击。其言曰：“予昔尚有将就程、朱附之圣门

支派之意，自一南游，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对敌，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与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李璘著《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然则元之学之所以异于宋儒者何在耶？其最要之旨曰：“习行于身者多，劳枯于心者少”。（《年谱》卷下）彼引申其义曰：“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读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上少一分。”（《存学编·论讲学》）又曰：“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观一处又观一处，自喜为通天下路程，人亦以晓路称之，其实一步未行，一处未到。”（《年谱》卷下）又曰：“诸儒之论，在身乎，在世乎，徒纸笔耳，则言之悖于孔、孟者坠也，言之不悖于孔、孟者亦坠也。”（《习斋记余未坠集序》）又曰：“譬之于医，有妄人者，止务览医书千万卷，熟读详说，以为予国手矣，视诊脉制药针灸为粗不足学。书日博，识日精，一人倡之，举世效之，歧黄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存学编·学辩一》）又曰：“为爱静空谈之学久，必至厌事。厌事必至废事，遇事则茫然，故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学也。”（《年谱》卷下）又曰：“书本上见，心头上思，可无所不及。曰最易自欺欺世，不特无能，其实一无知也。”（《言行录》卷下）其论学宗旨大率类此。

由此观之，元不独不认宋学为学，并不认汉学为学，明矣。元之意盖谓：学问绝不能向书本上或讲堂上求之，惟当于社会日常行事中求之。故其言曰：“人之认读书为学者，固非孔子之学，以读书之学解书，并非孔子之书。”（《言行录》卷下）又曰：“后儒将博学改为博读博著。”（《年谱》卷下）其学揭橥以为学者，曰：周礼大司徒之“乡三物”——一、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其所实行者尤在六艺。故躬耕，习医，学技击，

学兵法，习礼，习乐。其教门人必使之各执一艺。“劳作神圣”之义，元之所最信仰也。其言曰：“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言行录》卷上）曰：“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年谱》卷下），质易言之，为做事故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此元之根本主义也。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与最近教育新思潮最相合。但其所谓实，所谓动，所谓活者，究竟能免于虚、静与死否耶？此则时代为之，未可以今日社会情状绳古人矣。

元弟子最著者，曰李燾，曰王源，皆能实践其教。然元道太刻苦，类墨氏，传者卒稀，非久遂中绝。

八

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经学者多兼通之。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杭世骏谓：“自明万历中利玛窦入中国，制器作图颇精密，……学者张皇过甚，无暇深考中算源流，辄以世传浅术，谓古九章尽此，于是薄古法为不足观，而或者株守旧闻，遽斥西人为异学，两家遂成隔阂。鼎集其书而为之说，稍变从我法，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可该，特为表出，古法方程，亦非西法所有，则专著论以明古人精意”（杭世骏《道古堂集·梅定九征君传》）文鼎著书八十余种，其精神大率类是，知学问无国界，故无主奴之见。其所创获甚多，自言：“吾为此学，皆历最艰苦之后而后得简易。……惟求此理大显，绝学不致无传，则死且不憾。”（同上）盖粹然学者态度也。

清代地理学亦极盛。然乾嘉以后，率偏于考古，且其发明多属于局部的。以云体大思精，至今盖尚无出无锡顾祖禹《读史方

與紀要》上者。魏禧評之曰：“《職方》、《廣輿》諸書，襲訛踵謬，名實乖錯，悉據正史考訂折衷之，此數千百年所絕無僅有之書也。……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其深思遠識，在語言文字之外。”

（魏禧《叔子集·讀史方輿紀要叙》）祖禹為此書，年二十九始屬稿，五十乃成，無一日中輟。自言：“舟車所經，必覽城郭，按山川，稽里道，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核異同。”（《讀史方輿紀要自叙》）蓋純然現代科學精神也。

清初有一大學者而其學無傳於後者，曰大興劉猷廷。王源表其墓曰：“……脫身遍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傑，觀其土俗，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聞見，而質證其學。……討論天地陰陽之變，霸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方域要害。……于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火攻器制，旁通博考，浩浩無涯矣。”（王源《居業堂集·劉處士墓表》）而全祖望述其遺著有《新韻譜》者，最為精奇。全氏曰：

“繼莊（猷廷字）自謂于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腊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又證之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第一人。繼莊則曰，是其于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繼莊之法，先立鼻音二，以為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即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齒唇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為諸韻之宗，而後知腊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為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優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為東北韻宗，一為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于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

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余不尽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计三十音为韵父，而韵历二十二位为韵母，横转各有五子，而万有不齐之声摄于此矣。又欲谱四方土音，以穷宇宙元音之变，乃取《新韵谱》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全祖望《鮚埼亭集·刘继庄传》）

盖自唐释守温始谋为中国创立新字母，直至民国七年教育部颁行注音字母，垂阅千年，而斯业乃成，而中间最能覃思而具其条理者，则献廷也。使其书而传于后，则此问题或早已解决，而近三十年来学者，或可省许多研究之精力。然犹幸而有全氏传其厓略，以资近代学者之取材，今“注音字母”，采其成法不少，则固受赐多矣。全氏又述献廷关于地理、关于史学、关于宗法之意见，而总论之曰：“凡继庄所撰著，其运量皆非一人一时所能成，故虽言之甚殷，而难于毕业。”斯实然也。然学问之道，固未有成之于一人一时者，在后入能否善袭遗产以光大之而已。彼献廷之《新韵谱》，岂非阅三百年而竟成也哉？献廷尝言曰：“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利济天下，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能谓之人。”

（王源《墓表》引）其学问大本可概见，惜乎当时莫能传其绪也。献廷书今存者惟一《广阳杂记》，实涉笔漫录之作，殆不足以见献廷。

同时有太原傅山者，以任侠闻于鼎革之交，国变后冯铨、魏象枢尝强荐之，几以身殉，遂易服为道士。有问学者，则告之曰：“老夫学庄列者也，于此间诸仁义事，实羞道之。”（全祖望《鮚埼亭集·傅青主事略》）然史家谓：“其学大河以北莫能及者。”（吴翔凤《人史》）

九

综上所述，可知启蒙期之思想界，极复杂而极绚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有四：

第一，承明学极空疏之后，人心厌倦，相率返于沈实。

第二，经大乱后，社会比较的安宁，故人得有余裕以自厉于学。

第三，异族入主中夏，有志节者耻立乎其朝，故刊落声华，专集精力以治朴学。

第四，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研究之精神特盛。

其研究精神，因环境之冲动，所趋之方向亦有四：

第一，因矫晚明不学之弊，乃读古书，愈读而愈觉求真解之不易，则先求诸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等等，于是考证一派出。

第二，当时诸大师，皆遗老也，其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

第三，自明之末叶，利玛窦等输入当时所谓西学者于中国，而学问研究方法上，生一种外来的变化。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后则渐应用于他学。

第四，学风既由空返实，于是有从书上求实者，有从事上求实者。南人明敏多条理，故向著作方面发展；北人朴慤坚卓，故向力行方面发展。

此启蒙期思想发展途径之大概也。

然则第二期之全盛时代，独所谓正统派者（考证学）充量发

达，余派则不盛，或全然中绝，其故何耶？以吾所思，原因亦有四：

一，颜、李之力行派，陈义甚高，然未免如庄子评墨子所云：“其道大觳，恐天下不堪。”（《天下》篇）此等苦行，惟有宗教的信仰者能践之，然已不能责望之于人。颜元之教，既绝无“来生的”“他界的”观念，在此现实界而惟恃极单纯极严冷的道德义务观念，教人牺牲一切享乐，本不能成为天下之达道。元之学所以一时尚能光大者，因其弟子直接受彼之人格的感化。一再传后，感化力递减，其渐归衰灭，乃自然之理。况其所谓实用之“艺”，因社会变迁，非皆能周于用。而彼所最重者在“礼”。所谓“礼者”，二千年前一种形式，万非今日所能一一实践。既不能，则实者乃反为虚矣。此与当时求实之思潮，亦不相吻合。其不能成为风气也固宜。

二，吾尝言当时“经世学派”之昌，由于诸大师之志存匡复。诸大师始终不为清廷所用，固已大受猜忌，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又所谓经世之务者，固当与时消息，过时焉则不适用。治此学者既未能立见推行，则藏诸名山，终不免成为一种空论。等是空论，则浮薄之士，何尝不可剿说以自附？附者众则乱真而见厌矣。故乾、嘉以降，此派衰熄。即治史学、地理学者，亦全趋于考证方面，无复以议论行之矣。

三，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清代考证学，顾、阎、胡、惠、戴诸师，实辟出一新途径，俾人人共循。贤者识大，不贤识小，皆可勉焉。中国积数千年文

明，其古籍实有研究之大价值，如金之蕴于矿石至丰也，而又非研究之后，加以整理，则不能享其用，如在矿之金，非开采磨治焉不得也。故研究法一开，学者既感其有味，又感其必要，遂靡然向风焉。愈析而愈密，愈浚而愈深，盖此学派在当时饶有开拓之余地，凡加入派中者，苟能忠实从事，不拘大小，而总可以有所成，所以能拔异于诸派而独光大也。

四，清学之研究法，既近于“科学的”，则其趋向似宜向科学方面发展，今专用之于考古，除算学、天文外，一切自然科学皆不发达，何也？凡一学术之兴，一面须有相当之历史，一面又乘特殊之机运。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而当时又无特别动机，使学者精力转一方向。且当考证新学派初兴，可开拓之殖民地太多，才智之士正趋焉，自不能分力于他途。天算者，经史中所固有也，故能以附庸之资格，连带发达，而他无闻焉。其实欧洲之科学，亦直至近代而始昌明，在彼之“文艺复兴”时，其学风亦偏于考古，盖学术进化必经之极，应如是矣。

右述启蒙期竟，次及全盛期。

十

启蒙期之考证学，不过居一部分势力，全盛期则占领全学界，故治全盛期学史者，考证学以外，殆不必置论。启蒙期之考证学，不过粗引端绪，其研究法之漏略者，不一而足——例如阎若璩之《尚书古文疏证》，中多阑入日记信札之类，体例极芜杂；胡渭之《禹贡锥指》，多经济谈，且汉、宋杂糅，家法不严——苟无全盛期诸贤，则考证学能否成一宗派，盖未可知。夫无考证学则是无

清学也。故言清学必以此时期为中坚。

在此期中，此学派已成为“群众化”，派中有力人物甚多，皆互相师友，其学业亦极“单调的”，无甚派别之可特纪。故吾欲专叙一二人，以代表其余。当时巨子，其推惠栋、戴震，而戴学之精深，实过于惠。今略述二人之著述言论及其传授之绪，资比较焉。

元和惠栋，世传经学。祖父周惕，父士奇，咸有著述，称儒宗焉。栋受家学，益弘其业。所著有《九经古义》、《易汉学》、《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后汉书补注》诸书。其弟子则沈彤、江声、余萧客最著。萧客弟子江藩，著《汉学师承记》，推栋为斯学正统。实则栋未能完全代表一代之学术，不过门户壁垒，由彼而立耳。惠氏之学，以博闻强记为入门，以尊古守家法为究竟。士奇于九经、四史、《国语》、《国策》、《楚辞》之文，皆能暗诵，尝对座客诵《史记·封禅书》，终篇不失一字。（钱大昕《潜研堂集·惠天牧先生传》）栋受其教，记诵益赅洽。士奇之言曰：

“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贾公彦于郑注……之类皆不能疏。……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之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礼说》）

此可见惠氏家学，专以“古今”为“是非”之标准。栋之学，其根本精神即在是。其言曰：

“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因述家学作《九经古义》一书……”（《九经古义首述》）

惠派治学方法，吾得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其言“汉经师说与经并行”，意盖欲尊之使侪于经矣。王引之尝曰：“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焦氏丛书》卷首，《王伯申手札》）可谓知言。栋以善《易》名，其治《易》也，于郑玄之所谓“爻辰”，虞翻之所谓“纳甲”，荀诤之所谓“升降”，京房之所谓“世应”“飞伏”，与夫“六日七分”“世轨”诸说，一一为之疏通证明，汪中所谓“千余年不传之绝学”者也。以吾观之，此其矫诬，与陈抟之《河图》《洛书》有何差别？然彼则因其宋人所诵习也而排之，此则因其为汉人所倡道也而信之，可谓大惑不解。然而当时之人蔽焉，辄以此相尚。江藩者，惠派嫡传之法嗣也，其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末附有《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一篇，其言曰：

“黄宗羲之《易学象数论》，虽辟陈抟、康节之学，而以纳甲动爻为伪象，又称王辅嗣注简当无浮义。黄宗炎之《图书辨惑》，力辟宋人，然不专宗汉学，非笃信之士。……胡朏明（渭）《洪范正论》，虽力攻《图书》之谬，而辟汉学五行灾异之说，是不知夏侯始昌之《洪范五行传》亦出伏生也，是以黜之。”

此种论调，最足以代表惠派宗旨。盖谓凡学说出于汉儒者，皆当遵守，其有敢指斥者，则目为信道不笃也。其后阮元辑《学海堂经解》，即以此为标准，故顾、黄、阎、胡诸名著，多见摈焉，谓其不醇也。平心论之，此派在清代学术界，功罪参半。笃守家法，令所谓“汉学”者壁垒森固，旗帜鲜明，此其功也。胶固，盲从，偏狭，好排斥异己，以致启蒙时代之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几天阉焉，此其罪也。清代学术，论者多称为“汉学”，其实前此顾、黄、王、颜诸家所治，并非“汉学”，后此戴、段二王诸家所治，亦并非“汉学”，其“纯粹的汉学”，则惠氏一派，

洵足当之矣。夫不问“真不真”，惟问“汉不汉”，以此治学，安能通方？况汉儒经说，派别正繁，其两说绝对不相容者甚多，欲盲从其一，则不得不驳斥其他。栋固以尊汉为标帜者也，其释“箕子明夷”之义，因欲扬孟喜说而抑施雠、梁邱贺说，乃云：“谬传流传，肇于西汉。”（《周易述》卷五）致方东树摭之以反唇相稽（《汉学商兑》卷下）。然则所谓“凡汉皆好”之旗帜，亦终见其不贯彻而已。故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

十一

休宁戴震受学江永，其与惠栋亦在师友之间。震十岁就傅，受《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其塾师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又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又问：“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据王昶《述庵文钞·戴东原墓志铭》）

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说明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而震以童年具此本能，其能为一代学派完成建设之业固宜。

震之言曰：“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掎击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贤以附骥尾。……私智穿凿者，或非尽掎击以自表暴，积

非成是而无从知，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或非尽依傍以附骥尾，无鄙陋之心而失与之等。”（《东原文集·答郑用牧书》）

“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二语，实震一生最得力处。盖学问之难也，粗涉其途未有不为人蔽者，及其稍深入力求自脱于人蔽，而已旋自蔽矣。非廓然卓然，鉴空衡平，不失于彼，必失于此。震之破“人蔽”也，曰：

“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以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源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自以为于心无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谁之咎，不知者且以实践躬行之儒归焉。”（《东原集·与某书》）

其破“己蔽”也，曰：

“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汶于后世也。然寻求而有获十分之见者，有未至十分之见者。所谓十分之见，必征诸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后知孰为十分之见，孰为未至十分之见。如绳绳木，昔以为直者，其曲于是可见也；如水准地，昔以为平者，其坳于是可见也。夫然后传其信，不传其疑，疑则阙，庶几治经不害。”（《东原集·与姚姬传书》）

读第一段，则知目震所治者为“汉学”，实未当也。震之所期，

在“空诸依傍”，晋、宋学风，固在所诋斥矣。即汉人亦仅称其有家法，而未尝教人以盲从。钱大昕谓其“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潜研堂集·戴震传》）余廷灿谓其“有一字不准六书，一字解不通贯群经，即无稽者不信，不信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传注重围。”（余氏撰《戴东原先生事略》见《国朝耆献类征》百三十一）此最能传写其思想解放之精神。读第二段，其所谓十分之见与未至十分之见者，即科学家定理与假说之分也。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级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借之以为研究之点，几经试验之结果，寢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遂自废弃之也。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震之此论，实从甘苦阅历得来。所谓“昔以为直而今见其曲，昔以为平而今见其坳”，实科学研究法一定之历程，而其毅然割舍，传信不传疑，又学者社会最主要之道德矣。震又言曰：

“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三者仆诚不足以与于其间，其私自持及为书之大概，端在乎是。前人之博闻强识，如郑渔仲、杨用修诸君子，著书满家，淹博有之，精审未也。”

戴学所以异于惠学者，惠仅淹博，而戴则识断且精审也。章炳麟曰：“戴学分析条理，参密严瓌；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检论·清儒篇》）可谓知言。

凌廷堪为戴作《事略状》而系以论曰：“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也；吾所谓非，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

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校礼堂集》）此其言绝似实证哲学派之口吻，而戴震之精神见焉，清学派之精神见焉。惜乎此精神仅应用于考古，而未能应用于自然科学界，则时代为之也。

震常言：“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段玉裁《经韵楼集·娱亲雅言序》引）故其学虽淹博而不泛滥，其最专精者，曰小学，曰历算，曰水地。小学之书，有《声韵考》四卷、《声类表》十卷、《方言疏证》十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历算之书，有《原象》一卷、《历问》二卷、《古历考》二卷、《勾股割圆记》三卷、《续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水地之书，有《水地记》一卷、《校水经注》四十卷、《直隶河渠书》六十四卷。其他著述不备举。《四库全书》天算类《提要》全出其手，他部亦多参与焉。而其晚年最得意之作，曰《孟子字义疏证》。

《孟子字义疏证》，盖轶出考证学范围以外，欲建设一“戴氏哲学”矣。震尝言曰：

“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大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駸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东原文集》卷八《与某书》）

又曰：“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而执之曰‘理’，以祸斯民，更淆以‘无欲’之说，于得理益远，于执其意见益坚，而祸斯民益烈。岂理祸斯民哉，不自知为意见也。”（《戴氏遗书》九附录《答彭进士书》）

又曰：“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谈老、释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

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譬犹子孙未睹其祖父之貌者，误图他人之貌为其貌而事之。所事固己之祖父也，貌则非矣。”（同上）

震欲祛“以释混儒”“舍欲言理”之两蔽，故晚作《原善》三篇，复为《孟子字义疏证》。《疏证》之精语曰：

“……《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人知老、庄、释氏异于圣人。闻其无欲之说，犹未之信也。于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视古圣贤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又曰：“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明乎欲之不可无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乎无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不仁也。不仁实始于欲遂其生之心。使其无此欲，必无不仁矣。然使其无欲，则于天下之人生道穷蹙，亦将漠然视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无是情也。”

又曰：“朱子屡言‘人欲所蔽’。凡‘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欲’之失，为‘私’，不为‘蔽’。自以为得理，而所执实谬，乃‘蔽’。人之大患，‘私’与‘蔽’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

又曰：“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

道义。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绝情去智，充塞仁义。”

又曰：“古圣贤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而后儒以为如有别物焉，湊泊附著以为性，由杂乎老、释，终昧于孔、孟之言故也。”

又曰：“问：宋儒之言……也，求之六经中无其文，故借……之语以饰其说以取信学者欤？曰：舍圣人立言之本指，而以己说为圣人所言，是诬圣；借其语以饰吾之说以求取信，是欺学者也。诬圣欺学者，程、朱之贤不为，盖其学借阶于老、释，是故失之。凡习于先入之言，往往受其蔽而不自觉。”

《疏证》一书，字字精粹，右所录者未尽其什一也。综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盖当时人心，为基督教绝对禁欲主义所束缚，痛苦无艺，既反乎人理而又不肯违，乃相与作伪，而道德反扫地以尽。文艺复兴之运动，乃采久阙室之“希腊的情感主义”以药之。一旦解放，文化转一新方向以进行，则蓬勃而莫能御。戴震盖确有见于此，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震亦极以此自负，尝曰：“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戴东原集》卷首段玉裁《序》引）虽然，戴氏学派虽披靡一世，独此书影响极小。据江藩所记，谓：“当时读《疏证》者莫能通其义，惟洪榜好焉。榜为震行状，载《与彭尺木书》（按此书即与《孟子字义疏证》相发明者），朱珪见之，谓：‘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是。’榜贻珪书

力争不得。震子中立，卒将此书删去。”（《汉学师承记》卷六）可见当时戴门诸子之对于此书，已持异同。唐鉴谓：“先生本训诂家，欲讳其不知义理，特著《孟子字义疏证》以诋程朱。”（《国朝学案小识》）鉴非能知戴学者，其言诚不足轻重，然可以代表当时多数人之心理也。

当时宗戴之人，于此书既鲜诵习发明，其反驳者亦仅一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上）然搔不著痒处。此书盖百余年未生反响之书也。岂其反响当在今日以后耶？然而论清学正统派之运动，遂不得不将此书除外。吾常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此其收获所以不逮“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丰大也欤？

十二

戴门后学，名家甚众。而最能光大其业者，莫如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及念孙子引之，故世称戴段二王焉。玉裁所著书，最著者曰《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念孙所著书，最著者曰《读书杂志》、《广雅疏证》。引之所著书，最著者曰《经义述闻》、《经传释词》。戴、段、二王之学，其所以特异于惠派者，惠派之治经也，如不通欧语之人读欧书，视译人为神圣，汉儒则其译人也，故信凭之不敢有所出入。戴派不然，对于译人不轻信焉，必求原文之正确然后即安。惠派所得，则断章零句，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以爻辰纳甲说《易》，以五行灾异说《书》，以五际六情说《诗》，其他诸经义，无不杂引讖纬，此汉儒通习也。戴派之清学，则芟汰此等，不稍涉其藩，惟于训诂

名物制度注全力焉。戴派之言训诂名物，虽常博引汉人之说，然并不墨守之。例如《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全书皆纠正旧注旧疏之失误。所谓旧注者，则毛、郑、马、贾、服、杜也；旧疏者，则陆、孔、贾也。宋以后之说，则其所不屑是正矣。是故如高邮父子者，实毛、郑、贾、马、服、杜之诤臣，非其将顺之臣也。夫岂惟不将顺古人，虽其父师，亦不苟同。段之尊戴，可谓至矣，试读其《说文注》，则“先生之言非也”、“先生之说非是”诸文，到处皆是。即王引之《经义述闻》，与其父念孙之说相出入者，且不少也。彼等不惟于旧注旧疏之舛误丝毫不假借而已，而且敢于改经文。此与宋明儒者之好改故书，迹相类而实大殊。彼纯凭主观的臆断，而此则出于客观的钩稽参验也。段玉裁曰：

“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经韵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

此论最能说明考证学在学术界之位置及价值。盖吾辈不治一学则已，既治一学，则第一步须先将此学之真相，了解明确。第二步乃批评其是非得失。譬如今日，欲批评欧人某家之学说，若仅凭拙劣伪谬之译本，相与辩争讨论，实则所驳斥者乃并非原著，如此岂不可怜可笑？研究中国古书，虽不至差违如此其甚，然以语法古今之不同，与写刻传袭之讹错，读之而不能通其文句者则甚多矣。对于未通文句之书，而批评其义理之是非，则批评必多枉用，此无可逃避也。清代之考证学家，则对于此第一步工夫而非常努力，且其所努力皆不虚，确能使我辈生其后者，得省却无限精力，而用之以从事于第二步。清代学之成绩，全在此点，而

戴、段、二王之著述，则其代表也。

阮元之序《经义述闻》也，曰：“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

此其言洵非溢美。吾侪今日读王氏父子之书，只觉其条条皆犁然有当于吾心，前此之误解，乃一旦涣然冰释也。虽以方东树之力排“汉学”，犹云“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俯首，汉唐以来，未有其比。”（《汉学商兑》卷中之下）亦可见公论之不可磨灭矣。

然则诸公曷为能有此成绩耶？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学的研究法而已。试细读王氏父子之著述，最能表现此等精神。

吾尝研察其治学方法，第一曰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如自有天地以来，苹果落地不知凡几，惟奈端能注意及之。家家日日皆有沸水，惟瓦特能注意及之。《经义述闻》所厘正之各经文，吾辈自童时即诵习如流，惟王氏能注意及之。凡学问上能有发明者，其第一步工夫必恃此也。第二曰虚己。注意观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如此则所得之“间”，行将失去。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其心，绝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第三曰立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立一假定之说以为标准焉。第四曰搜证。既立一说，绝不遽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诸同类之事实而皆合。如动植物学家之日日搜集标本，如物理化学家之日日化验也。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经数番归纳研究之后，则可以得正确之断案矣。既得断案，则可以推论于同类之事项而无阙也。

王引之《经传释词》自序云：

“……始取《尚书》二十八篇细绎之，见其词之发句助句者，昔人以实义释之，往往诘籀为病，窃尝私为之说而未敢定也。及闻大人（指其父念孙）论《毛诗》‘终风且暴’……诸条，发明意旨，涣若冰释。……乃遂引而伸之，尽其义类，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为《经传释词》十卷。”

又云：“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凡其散见于经传者，皆可比例而知触类长之。”

此自言其治学次第及应用之法颇详明，虽仅叙一书著述始末，然他书可以类推，他家之书亦可以类推矣。此清学所以异于前代，而永足为我辈程式者也。

十三

正统派之学风，其特色可指者略如下：

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铄，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十、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

当时学者，以此种学风相矜尚，自命曰“朴学”。其学问之中坚，则经学也。经学之附庸则小学，以次及于史学、天算学、地理学、音韵学、律吕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等。一皆以此种研究精神治之。质言之，则举凡自汉以来书册上之学问，皆加以一番琢磨，施以一种组织。其直接之效果：一、吾辈向觉难读难解之古书，自此可以读可以解。二、许多伪书及书中窜乱芜秽者，吾辈可以知所别择，不复虚糜精力。三、有久坠之哲学，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学，自此皆卓然成一专门学科，使吾辈学问之内容，日益丰富。其间接之效果：一、读诸大师之传记及著述，见其“为学问而学问”，治一业终身以之，铢积寸累，先难后获，无形中受一种人格的观感，使吾辈奋兴向学。二、用此种研究法以治学，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

正统派所治之学，为有用耶？为无用耶？此甚难言。试持以与现代世界诸学科比较，则其大部分属于无用，此无可讳言也。虽然，有用无用云者，不过相对的名词。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此言乎以无用为用也。循斯义也，则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夫用之云者，以所用为目的，学问则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也；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庄子称：“不龟手之药，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絖。”此言乎为用不为用，存乎其人也。循斯义也，则同是

一学，在某时某地某人治之为极无用者，易时易地易人治之，可变为极有用，是故难言也。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夫清学派固能成为学者也，其在我国文化史上有价值者以此。

十四

清学自当以经学为中坚，其最有功于经学者，则诸经殆皆有新疏也。其在《易》，则有惠栋之《周易述》，张惠言之《周易虞氏义》，姚配中之《周易姚氏学》。其在《书》，则有江声之《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之《尚书今古文注疏》，段玉裁之《古文尚书撰异》，王鸣盛之《尚书后案》。其在《诗》，则有陈奂之《诗毛氏传疏》，马瑞辰之《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之《毛诗后笺》。其在《周官》，有孙诒让之《周礼正义》。其在《仪礼》，有胡承珙之《仪礼今古文疏义》，胡培翬之《仪礼正义》。其在《左传》，有刘文淇之《春秋左传正义》。其在《公羊传》，有孔广森之《公羊通义》，陈立之《公羊义疏》。其在《论语》，有刘宝楠之《论语正义》。其在《孝经》，有皮锡瑞之《孝经郑注疏》。其在《尔雅》，有邵晋涵之《尔雅正义》，郝懿行之《尔雅义疏》。其在《孟子》，有焦循之《孟子正义》。以上诸书，惟马、胡之于《诗》，非全释经传文，不能直谓之新疏。《易》诸家穿凿汉儒说，非训诂家言。清儒最善言《易》者，惟一焦循，其所著《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皆洁净精微，但非新疏体例耳。《书》则段、王二家稍粗滥。《公羊》则孔著不通家法。自余则皆博通精粹，前无古人。尤有吾乡简朝亮，著《尚书集注述疏》、《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志在沟通汉、宋，非正统派家法，然精核

处极多。十三经除《礼记》、《谷梁》外，余皆有新疏一种或数种，而《大戴礼记》则有孔广森《补注》，王聘珍《解诂》焉。此诸新疏者，类皆撷取一代经说之菁华，加以别择结撰，殆可谓集大成。其余为部分的研究之书，最著者则惠士奇之《礼说》，胡渭之《禹贡锥指》，惠栋之《易汉学》、《古文尚书考》、《明堂大道录》，焦循之《周易郑氏义》、《荀氏九家义》、《易义别录》，陈寿祺之《三家诗遗说考》，江永之《周礼疑义举要》，戴震之《考工记图》，段玉裁之《周礼仪礼汉读考》，张惠言之《仪礼图》，凌廷堪之《礼经释例》，金榜之《礼笺》，孔广森之《礼学卮言》，武亿之《三礼义证》，金鹗之《求古录礼说》，黄以周之《礼书通故》，王引之之《春秋名字解诂》，侯康之《谷梁礼证》，江永之《乡党图考》，王引之之《经义述闻》，陈寿祺之《左海经辨》，程瑶田之《通艺录》，焦循之《群经宫室图》等，其精粹者不下数百种。

清儒以小学为治经之途径，嗜之甚笃，附庸遂蔚为大国。其在《说文》，则有段玉裁之《说文注》，桂馥之《说文义证》，王筠之《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朱骏声之《说文通训定声》。其在《说文》以外之古字书，则有戴震之《方言疏证》，江声之《释名疏证》，宋翔凤之《小尔雅训纂》，胡承珙之《小尔雅义证》，王念孙之《广雅疏证》；此与《尔雅》之邵、郝二疏略同体例，得此而六朝以前之字书，差无疑滞矣。而以极严正之训诂家法贯穴群书而会其通者，则王引之之《经传释词》、俞樾之《古书疑义举例》最精凿；近世则章炳麟之《小学答问》，益多新理解，而马建忠学之以著《文通》，严复学之以著《英文汉诂》，为“文典学”之椎轮焉。而梁启超著《国文语原解》，又往往以证社会学。

音韵学又小学之附庸也，而清代特盛。自顾炎武始著《音论》、《古音表》、《唐韵正》，而江永有《音学辨微》、《古韵标准》，戴震

有《声韵考》、《声类表》，段玉裁有《六书音韵表》，姚文田有《说文声系》，苗夔有《说文声读表》，严可均有《说文声类》，陈澧有《切韵考》。而章炳麟《国故论衡》中论音韵诸篇，皆精绝。此学也，其动机本起于考证古音，而愈推愈密，遂能穷极人类发音官能之构造，推出声音变化之公例。刘献廷著《新韵谱》，创字母，其书不传。近世治此学者，积多数人之讨论折衷，遂有“注音字母”之颁定。

典章制度一科，在清代亦为绝学。其动机起于治三礼，后遂泛滥益广。惠栋著《明堂大道录》，对于古制度专考一事泐成专书者始此。徐乾学编《读礼通考》，秦蕙田编《五礼通考》，多出一时名人之手。其后则胡匡衷有《仪礼释官》，戴震有《考工记图》，沈彤有《周官禄田考》，王鸣盛有《周礼军赋说》，洪颐煊有《礼经宫室答问》，任大椿有《弁服释例深衣释例》，皆专注《礼》；而焦循有《群经宫室图》，程瑶田有《通艺录》，贯通诸经焉。晚清则有黄以周之《礼经通故》，最博赡精审，盖清代礼学之后劲矣。而乐律一门，亦几蔚为大国。毛奇龄始著《竟山乐录》，次则江永著《律吕新论》、《律吕阐微》，江藩著《乐县考》，凌廷堪著《燕乐考原》，而陈澧之《声律通考》，晚出最精善，此皆足为将来著中国音乐史最好之资料也。焦循著《剧说》，专考今乐沿革，尤为切近有用矣。

清初诸师皆治史学，欲以为经世之用，王夫之长于史论，其《读通鉴论》、《宋论》皆有特识，而后之史学家不循斯轨。黄宗羲、万斯同以一代文献自任，实为史学嫡派。康熙间，清廷方开明史馆，欲藉以网罗遗逸。诸师既抱所学，且藉以寄故国之思，虽多不受职，而皆间接参与其事，相与讨论体例，别择事实，故唐以后官修诸史，独《明史》称完善焉。乾隆以后，传此派者，全祖望

最著。顾炎武治史，于典章制度风俗，多论列得失，然亦好为考证。乾嘉以还，考证学统一学界，其洪波自不得不及于史，则有赵翼之《廿二史札记》，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之《二十二史考异》，洪颐煊之《诸史考异》，皆汲其流。四书体例略同，其职志皆在考证史迹，订讹正谬，惟赵书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此其特长也。其专考证一史者，则有惠栋之《后汉书补注》，梁玉绳之《史记志疑》、《汉书人表考》，钱大昕之《汉书辨疑》、《后汉书辨疑》、《续汉书辨疑》、梁章钜之《三国志旁证》，周寿昌之《汉书注校补》、《后汉书注补正》，杭世骏之《三国志补注》其尤著也。自万斯同力言表志之重要，自著《历代史表》，此后表志专书，可观者多，顾栋高有《春秋大事表》，钱大昭有《后汉书补表》，周嘉猷有《南北史表》、《三国纪年表》、《五代纪年表》，洪飴孙有《三国职官表》，钱大昕有《元史氏族表》，齐召南有《历代帝王年表》。林春溥著《竹柏山房十五种》，皆考证古史，其中《战国纪年》、《孔孟年表》诸篇最精审。而官书亦有《历代职官表》。洪亮吉有《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洪飴孙有《补梁疆域志》，钱仪吉有《补晋兵志》，侯康有《补三国艺文志》，倪灿有《宋史艺文志补》、《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顾怀三有《补五代史艺文志》，钱大昕有《补元史艺文志》，郝懿行有《补宋书刑法志食货志》，皆称善本焉。而对于古代别史杂史，亦多考证笺注，则有陈逢衡之《逸周书补注》，朱右曾之《周书集训校释》，丁宗洛之《逸周书管笺》，洪亮吉之《国语注疏》，顾广圻之《国语札记》、《战国策札记》，程恩泽之《国策地名考》，郝懿行之《山海经笺疏》，陈逢衡之《竹书纪年集证》。降及晚清，研究元史，忽成为一时风尚，则有何秋涛之《元圣武亲征录校正》，李文田之《元秘史注》。凡此皆以经学考

证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谓之考证学，殆不可谓之史学。其专研究史法者，独有章学诚之《文史通义》，其价值可比刘知几《史通》。

自唐以后，罕能以私人独力著史，惟万斯同之《明史稿》，最称巨制，而魏源亦独立改著《元史》，柯劭忞之《新元史》，则近出之巨制也。源又有《圣武记》，记清一代大事，有条贯。而毕源《续资治通鉴》亦称善本。

黄宗羲始著《明儒学案》为学史之祖，其《宋元学案》则其子百家与全祖望先后续成之，皆清代史学之光也。

史之缩本，则地志也。清之盛时，各省、府、州、县皆以修志相尚，其志多出硕学之手。其在省志，《浙江通志》、《广东通志》、《云南通志》之总纂，则阮元也；《广西通志》，则谢启昆也；《湖北通志》，则章学诚原稿也。其在府县志，则《汾州府志》出戴震，《泾县志》、《淳化县志》出洪亮吉，《三水县志》出孙星衍，《朝邑县志》出钱坫，《偃师志》、《安阳志》出武亿，《富顺县志》出段玉裁，《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县志》、《天门县志》出章学诚，《凤台县志》出李兆洛，《长沙志》出章佑诚，《遵义府志》出郑珍、莫友芝。凡作者皆一时之选，其书有别裁有断制，其讨论体例见于各家文集者甚周备，欲知清代史学家之特色，当于此求之。

十五

顾炎武、刘献廷皆酷嗜地理学，所著书皆未成；而顾祖禹之《读史方輿纪要》，言形势厄塞略尽，后人莫能尚，于是中清之地理学，亦偏于考古一途。自戴震著《水地记》、《校水经注》，而《水经》为一时研究之中心。孔广森有《水经释地》，全祖望有《新校水

经注》，赵一清有《水经注释》，张匡学有《水经注释地》，而近人杨守敬为《水经注疏》，尤集斯学大成（未刻，刻者仅《注疏要删》）。而齐召南著《水道提纲》，则循水道治今地理也。洪颐煊有《汉志水道疏证》，陈澧有《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亦以水道治汉地理。阎若璩著《四书释地》，徐善著《春秋地名考略》，江永著《春秋地名考实》，焦循著《毛诗地理释》，程恩泽著《国策地名考》，皆考证先秦地理。其考证各史地理者，则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最精博。其通考历代者，有陈芳绩之《历代地理沿革表》，李兆洛之《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皆便检阅，而杨守敬之《历代疆域志》、《历代地理沿革图》，极综核，惜制图术未精，难言正确矣。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而徐松、张穆、何秋涛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识略》，穆有《蒙古游牧记》，秋涛有《朔方备乘》，渐引起研究《元史》的兴味，至晚清尤盛。外国地理，自徐继畲著《瀛环志略》，魏源著《海国图志》，开始端绪，而其后竟不光大。近人丁谦于各史外夷传及《穆天子传》、《佛国记》、《大唐西域记》诸古籍，皆博加考证，成书二十余种（无总名，最近浙江图书馆校刻），颇精赡。要之，清代地理学偏于考古，故活学变为死学。惟据全祖望著《刘献廷传》，知献廷有意治“人文地理”，惜其业不竟，而后亦无继也。

自明徐光启以后，士大夫渐好治天文、算学，清初则王锡阐、梅文鼎最专精，而大师黄宗羲、江永辈皆提倡之。清圣祖尤笃嗜，召西士南怀仁等供奉内廷。风声所被，向慕尤众。圣祖著有《数理精蕴》、《历象考成》，锡阐有《晓庵新法》，文鼎有《勿庵历算全书》二十九种，江永有《慎修数学》九种，戴震校《周髀》以后迄六朝、唐人算书十种，命曰《算经》。自尔而后，经学家什九兼治天

算。尤专门者：李锐、董祐诚、焦循、罗士琳、张作楠、刘衡、徐有壬、邹伯奇、丁取忠、李善兰、华蘅芳。锐有《李氏遗书》，祐诚有《董方立遗书》，循有《里堂学算记》，作楠有《翠微山房数学》，衡有《六九轩算书》，有壬有《务民义斋算学》，伯奇有《邹征君遗书》，取忠有《白芙堂算学丛书》，善兰有《则古昔斋算学》。而曾国藩设江南制造局于上海，颇译泰西科学书，其算学名著，多出善兰、蘅芳手，自是所谓“西学”者渐兴矣。阮元著《畴人传》，罗士琳续补之，清代斯学变迁略具焉。兹学中国发源甚古，而光大之实在清代，学者精研虚受，各有创获，其于西来法，食而能化，足觐民族器量焉。

十六

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自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实为斯学滥觞。继此有钱大昕之《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武亿之《金石三跋》，洪颐暄之《平津馆读碑记》，严可均之《铁桥金石跋》，陈介祺之《金石文字释》，皆考证精彻，而王昶之《金石萃编》，荟录众说，颇似类书。其专举目录者，则孙星衍、邢澍之《寰宇访碑录》。其后碑版出土日多，故《萃编》、《访碑录》等再三续补而不能尽。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同时有黄宗羲一派，从此中研究文史义例。宗羲著《金石要例》，其后梁玉绳、王芑孙、郭麟、刘宝楠、李富孙、冯登府等皆赓续有作。别有翁方纲、黄易一派，专讲鉴别，则其考证非以助经史矣。包世臣一派专讲书势，则美术的研究也；而叶昌炽著《语石》，颇集诸派之长，此皆石学也。其“金文学”则考证商、周铜器。初，此等古物，惟集于内府，则有《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等官书，然其文字

皆摹写取姿媚，失原形，又无释文，有亦臆舛。自阮元、吴荣光以封疆大吏，嗜古而力足以副之，于是收藏浸富，遂有著录。阮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有《筠清馆金石文字》，研究金文之端开矣。道咸以后日益盛，名家者有刘喜海、吴式芬、陈介祺、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澂、罗振玉。式芬有《攷古录金文》，祖荫有《攀古楼彝器款识》，大澂有《濠斋集古录》，皆称精博；其所考证，多一时师友互相赏析所得，非必著者一人私言也。自金文学兴而小学起一革命。前此尊《说文》若六经，附孔子以许慎，至是援古文、籀文以难许者纷作，若庄述祖之《说文古籀疏证》，孙诒让之《古籀拾遗》，其著也。诸器文字既可读，其事迹出古经以外者甚多，因此增无数史料；而其花文雕镂之研究，亦为美术史上可宝之资，惜今尚未有从事者耳。最近复有龟甲文之学。龟甲文者，光绪己亥在河南汤阴县出土，殆数万片，而文字不可识，共不审为何时物，后罗振玉考定为殷文，著《贞卜文字》、《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待问篇》，而孙诒让著《名原》亦多根据甲文。近更有人言其物质非龟甲乃竹简云。惜文至简，足供史材者希，然文字变迁异同之迹可稽焉。

清儒之有功于古学者，更一端焉，则校勘也。古书传习愈希者，其传钞踵刻，伪谬愈甚，驯至不可读，而其书以废。清儒则博征善本以校讎之，校勘遂成一专门学。其成绩可纪者，若汪中、毕沅之校《大戴礼记》，周廷采、赵怀玉之校《韩诗外传》，卢文弨之校《逸周书》，汪中、毕沅、孙诒让之校《墨子》，谢墉之校《荀子》，孙星衍之校《孙子》、《吴子》，汪继培、任大椿、秦恩复之校《列子》，顾广圻之校《国语》、《战国策》、《韩非子》，毕沅、梁玉绳之校《吕氏春秋》，严可均之校《慎子》、《商君书》，毕沅之校《山海经》，洪颐孙之校《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丁谦之校《穆天子

传》，戴震、卢文韶之校《春秋繁露》，汪中之校《贾谊新书》，戴震之校《算经十书》，戴震、全祖望之校《水经注》，顾广圻之校《华阳国志》。诸所校者，或遵善本，或据他书所征引，或以本文上下互证，或是正其文字，或厘定其句读，或疏证其义训。往往有前此不可索解之语句，一旦昭若发蒙。其功尤巨者，则所校多属先秦诸子，因此引起研究诸子学之兴味。盖自汉武罢黜百家以后，直至清之中叶，诸子学可谓全废，若荀若墨，以得罪孟子之故，几莫敢齿及。及考证学兴，引据惟古是尚，学者始思及六经以外，尚有如许可珍之籍。故王念孙《读书杂志》，已推勘及于诸子。其后俞樾亦著《诸子平议》，与《群经平议》并列，而汪、戴、卢、孙、毕诸贤，乃遍取古籍而校之。夫校其文必寻其义，寻其义则新理解出矣。故汪中之《荀卿子通论》、《墨子序》、《墨子后序》（并见《述学》），孙星衍之《墨子序》（经训堂丛书本《墨子》），我辈今日读之，诚觉甚平易，然在当日，固发人所未发，且言人所不敢言也。后此洪颐煊著《管子义证》，孙诒让著《墨子间诂》，王先慎著《韩非子集释》，则跻诸经而为之注矣，及今而稍明达之学者，皆以子与经并重。思想蜕变之枢机，有揆于彼而辟于此者，此类是已。

吾辈尤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书籍经久必渐散亡，取各史《艺文》、《经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见也；肤芜之作，存亡固无足轻重；名著失坠，则国民之遗产损焉。乾隆中修《四库全书》，其书之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此后兹业日昌，自周、秦诸子，汉人经注，魏、晋、六朝逸史、逸集，苟有片语留存，无不收罗撮录。其取材则唐、宋间数种大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最多，而诸经注疏及他书，凡可搜者无不遍。当时学者从事此业者甚多，不备举。而马国翰之《玉函山房辑佚书》，分经、史、子三部，集所辑至数百种，他可

推矣。遂使《汉志》诸书，《隋唐志》久称已佚者，今乃累累现于吾辈之藏书目录中，虽复片鳞碎羽，而受赐则既多矣。

十七

呜呼，自吾之生，而乾嘉学者，已零落略尽，然十三岁肄业于广州之学海堂，堂则前总督阮元所创，以朴学教于吾乡者也，其规模矩矱，一循百年之旧。十六七岁游京师，亦获交当时耆宿数人，守先辈遗风不替者。中间涉览诸大师著述，参以所闻见，盖当时“学者”社会之状况，可仿佛一二焉。

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盖清学祖顾炎武，而炎武精神传于后者在其《日知录》。其自述曰：“所著《日知录》三十余种，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亭林文集·与友人论门人书》）又曰：“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觅，仅得十余条。”（同与人书十）其成之难而视之重也如此。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然清儒最戒轻率著书，非得有极满意之资料，不肯泐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于预备资料中者。又当时第一流学者所著书，恒不欲有一字余于己所心得之外。著专书或专篇，其范围必较广泛，则不免于所心得外摭拾冗词以相凑附，此非诸师所乐，故宁以札记体存之而已。夫吾固屡言之矣：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

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而清考证家之每立一说，亦必循此步骤也。既已如此，则试思每一步骤进行中，所需资料几何，精力几何，非用极绵密之札记安能致者？训诂学之模范的名著，共推王引之《经传释词》、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苟一察其内容，即可知其先有数千条之札记，后乃组织而成书。又不惟专书为然耳，即在札记本身中，其精到者，亦必先之以初稿之札记——例如钱大昕发明古书轻唇音，试读《十驾斋养新录》本条，即知其必先有百数十条之初稿札记，乃能产出——故顾氏谓一年仅能得十余条，非虚言也。由此观之，则札记实为治此学者所最必要；而欲知清儒治学次第及其得力处，固当于此求之。札记之书则夥矣，其最可观者，《日知录》外，则有阎若璩之《潜邱札记》，钱大昕之《十驾斋养新录》，臧琳之《经义杂记》，卢文弨之《钟山札记》、《龙城札记》，孙志祖之《读书脞录》，王鸣盛之《蛾术编》，汪中之《知新记》，洪亮吉之《晓读书斋四录》，赵翼之《陔余丛考》，王念孙之《读书杂志》，王引之之《经义述闻》，何焯之《义门读书记》，臧庸之《拜经日记》，梁玉绳之《瞥记》，俞正燮之《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宋翔凤之《过庭录》，陈澧之《东塾读书记》等，其他不可殫举。各家札记，精粗之程度不同，即同一书中，每条价值亦有差别。有纯属原料性质者（对于一事项初下注意的观察者），有渐成为粗制品者（胪列比较而附以自己意见者），有已成精制品者（意见经反复引证后认为定说者），而原料与粗制品，皆足为后人精制所取资，此其所以可贵也。要之，当时学者喜用札记，实一种困知勉行工夫，其所以能绵密深入而有创获者颇恃此，而今亡矣。

清儒既不喜效宋、明人聚徒讲学，又非如今之欧、美有种种学会学校为聚集讲习之所，则其交换智识之机会，自不免缺乏，

其赖以补之者，则函札也。后辈之谒先辈，率以问学书为贄（有著述者则贄以著述），先辈视其可教者，必报书，释其疑滞而奖进之。平辈亦然，每得一义，辄驰书其共学之友相商榷，答者未尝不尽其词。凡著一书成，必经挚友数辈严勘得失，乃以问世。而其勘也，皆以函札。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此种风气，他时代亦间有之，而清为独盛。其为文也朴实说理，言无枝叶，而旨壹归于雅正。语录文体，所不喜也，而亦不以奇古为尚。顾炎武之论文曰：“孔子言：‘其旨远其辞文’，又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今讲学先生从语录入者，多不善修辞。”又曰：“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今之不能为二《汉》，犹二《汉》之不能为《尚书》、《左氏》。乃剿取《史》、《汉》中文法以为古，甚者猎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为不称。……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日知录》十九）清学皆宗炎武，文亦宗之，其所奉为信条者，一曰不俗，二曰不古，三曰不枝。盖此种文体于学术上之说明，最为宜矣，然因此与当时所谓“古文家”者每不相容。美文，清儒所最不擅长也。诸经师中，殆无一人能为诗者——集中多皆有诗，然真无足观——其能为词者，仅一张惠言；能为骈体文者，有孔广森，汪中，凌廷堪，洪亮吉，孙星衍，董祐诚，其文仍力洗浮艳，如其学风。

十八

兹学盛时，凡名家者，比较的多耿介恬退之士。时方以科举笼罩天下，学者自宜什九从兹途出。大抵后辈志学之士未得第者，或新得第而俸入薄者，恒有先辈延主其家为课子弟。此先辈亦以

子弟畜之，常奖诱增益其学。此先辈家有藏书，足供其研索；所交游率当代学者，常得陪末座以广其闻见；于是所学渐成矣。官之迁皆以年资，人无干进之心，即干亦无幸获。得第早而享年永者，则驯跻卿相，否则以词馆郎署老。俗既俭朴，事畜易周，而寒士素惯淡泊，故得与世无竞，而终其身于学。京官簿书期会至简，惟日夕闭户亲书卷，得间与同气相过从，则互出所学相质。琉璃厂书贾，渐染风气，大可人意，每过一肆，可以永日，不啻为京朝士夫作一公共图书馆——凌廷堪佣于书坊以成学——学者滋便焉。其有外任学差或疆吏者，辄妙选名流充幕选，所至则网罗遗逸，汲引后进，而从之游者，既得以稍裕生计，亦自增其学。其学成名著而厌仕宦者，亦到处有逢迎，或书院山长，或各省府州县修志，或大族姓修谱，或有力者刻书请鉴定，皆其职业也。凡此皆有相当之报酬，又有益于学业，故学者常乐就之。吾常言：欲一国文化进展，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然后能有余裕以从事于更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焉。近世欧洲学问多在此种环境之下培养出来，而前清乾、嘉时代，则亦庶几矣。

欧洲文艺复兴，固由时代环境所酝酿，与二三豪俊所浚发，然尚有立乎其后以翼而辅之者：若罗马教皇尼古拉第五，佛罗棱萨之麦地奇家父子，拿波里王阿尔芬梭，以及其他意大利自由市府之豪商阀族，皆沾染一时风尚，为之先后疏附；直接间接提倡奖借者不少，故其业益昌。清学之在全盛期也亦然。清高宗席祖父之业，承平殷阜，以右文之主自命，开《四库》馆，修《一统志》，纂《续三通》、《皇朝三通》，修《会典》，修《通礼》，日不暇给。其事皆有待于学者，内外大僚承风宏奖者甚众。嘉庆间，毕沅、阮元之流，本以经师致身通显，任封疆，有力养士，所至提倡，隐

然兹学之护法神也。淮南盐商，既穷极奢欲，亦趋时尚，思自附于风雅，竞蓄书画图器，邀名士鉴定，洁亭舍丰馆谷以待。其时刻书之风甚盛，若黄丕烈、鲍廷博辈固自能别择雠校，其余则多有力者欲假此自显，聘名流董其事，乃至贩鸦片起家之伍崇曜，亦有《粤雅堂丛书》之刻，而其书且以精审闻，他可推矣。夫此类之人，则何与于学问？然固不能谓其于兹学之发达无助力，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也。吾乃知时代思潮之为物，当运动热度最高时，可以举全社会各部分之人人，悉参加于此运动。其在中国，则晚明之心学，盛清之考证，皆其例也。

十九

以上诸节所论，皆为全盛期之正统派。此派远发源于顺、康之交，直至光、宣，而流风余韵，虽替未沫，直可谓与前清朝运相终始；而中间乾、嘉、道百余年间，其气象更掩袭一世，实更无他派足与抗颜行。若强求其一焉，则固有在此统一的权威之下而常怀反侧者，即所谓“古文家”者是已。

宋明理学极敝，然后清学兴。清学既兴，治理学者渐不复能成军。其在启蒙期，犹为程、朱、陆、王守残垒者，有孙奇逢、李中孚、刁包、张履祥、张尔歧、陆陇其、陆世仪诸人，皆尚名节厉实行，粹然纯儒，然皆矜矜自守，所学遂不克光大。同时有汤斌、李光地、魏象枢、魏裔介辈，亦治宋学，颇嬖嬖投时主好以跻通显。时清学壁垒未立，诸大师著述谈说，往往出入汉、宋，则亦相忘于道术而已。乾隆之初，惠、戴崛起，汉帜大张，畴昔以宋学鸣者，颇无颜色。时则有方苞者，名位略似斌、光地等，尊宋学，笃谨能躬行，而又好为文。苞桐城人也，与同里姚范、

刘大櫟共学文，诵法曾巩、归有光，造立所谓古文义法，号曰“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范从子鼐，欲从学戴震，震固不好为人师，谢之。震之规古文家也，曰：“诸君子之为之也，曰：是道也，非艺也；夫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诸君子之文，亦恶睹其非艺欤？”（《东原集·与方希原书》）钱大昕亦曰：“方氏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法且不知，义更何有？……若方氏乃真不读书之甚者，吾兄特以其波澜意度近于古而喜之。……”（《潜研堂集》三十三《与友人书》）由是诸方诸姚颇不平。鼐屡为文诋汉学破碎，而方东树著《汉学商兑》，遍诋阎、胡、惠、戴所学，不遗余力，自是两派始交恶。其后阳湖恽敬、陆继辂自“桐城”受义法而稍变其体，张惠言、李兆洛皆治考证学，而亦好为文，与恽、陆同气，号“阳湖派”。戴、段派之考证学，虽披靡一世，然规律太严整，且亦声希味淡，不能悉投众嗜，故诵习两派古文家者卒不衰，然才力薄，罕能张其军者。咸、同间，曾国藩善为文而极尊“桐城”，尝为《圣哲画像赞》，至跻姚鼐与周公、孔子并列。国藩功业既焜耀一世，“桐城”亦缘以增重，至今犹有挟之以媚权贵欺流俗者。平心论之，“桐城”开派诸人，本狷洁自好，当“汉学”全盛时而奋然与抗，亦可谓有勇，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罪于作始。然此派者，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阙创获，无益于社会。且其在清代学界，始终未尝占重要位置，今后亦断不复能自存，置之不论焉可耳。

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其书为宋学辨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

其病，就中指斥言“汉易”者之矫诬，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为知言。后此治汉学者颇欲调和汉、宋，如阮元著《性命古训》，陈澧著《汉儒通义》，谓汉儒亦言理学，其《东塾读书记》中有《朱子》一卷，谓朱子亦言考证，盖颇受此书之反响云。

在全盛期与蜕分期之间，有一重要人物，曰会稽章学诚。学诚不屑屑于考证之学，与正统派异；其言“六经皆史”，且极尊刘歆《七略》，与今文家异。然其所著《文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其言“贤智学于圣人，圣人学于百姓。”“集大成者乃周公而非孔子。”（《原道篇》）言“六经皆史，而诸子又皆出于六经。”（《易教》、《诗教》、《经解》诸篇）言“战国以前无著述。”（《诗教篇》）言“古人之言，所以为公，未尝私据为已有。”（《言公篇》）言“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说林篇》）言“后人之学胜于前人，乃后起之智虑所应尔。”（《朱陆篇》）言“学术与一时风尚不必求适合。”（《感遇篇》）言“文不能彼此相易，不可舍己之所求以摩古人之形似。”（《文理篇》）言“学贵自成一家。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为愧。”（《博约篇》）书中创见类此者不可悉数，实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家之杰而已。

二十

道、咸以后，清学曷为而分裂耶？其原因，有发于本学派之自身者，有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者。

所谓发于本学派自身者何耶？其一，考证学之研究方法虽甚精善，其研究范围却甚拘迂。就中成绩最高者，惟训诂一科；然经数大师发明略尽，所余者不过糟粕。其名物一科，考明堂，考燕寝，考弁服，考车制，原物今既不存，聚讼终未由决。典章制

度一科，言丧服，言褹衿，言封建，言井田，在古代本世有损益变迁，即群书亦未由折衷通会。夫清学所以能夺明学之席而与之代兴者，毋亦曰彼空而我实也；今纷纭于不可究诘之名物制度，则其为空也，与言心、言性者相去几何？甚至言《易》者摈《河图》《洛书》而代以“卦气爻辰”，其矫诬正相类，诸如此类者尚多，殊不足以服人。要之，清学以提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固其所矣。其二，凡一有机体发育至一定限度，则凝滞不复进，因凝滞而腐败，而衰谢，此物理之恒也，政制之蜕变也亦然，学派之蜕变也亦然。清学之兴，对于明之“学阀”而行革命也；乃至乾、嘉以降，而清学已自成为炙手可热之一“学阀”。即如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其意气排轧之处固甚多，而切中当时流弊者抑亦不少，然正统派诸贤，莫之能受，其驹卒之依附末光者，且盛气以临之，于是思想界成一“汉学专制”之局。学派自身，既有缺点，而复行以专制，此破灭之兆矣。其三，清学家既教人以尊古，又教人以善疑。既尊古矣，则有更古焉者，固在所当尊；既善疑矣，则当时诸人所共信者，吾曷为不可疑之？盖清学经乾、嘉全盛以后，恰如欧洲近世史初期，各国内部略奠定，不能不有如科仑布其人者别求新陆。故在本派中有异军突起，而本派之命运，遂根本摇动，则亦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矣。

所谓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者何耶？其一，清初“经世致用”之一学派所以中绝者，固由学风正趋于归纳的研究法，厌其空泛；抑亦因避触时忌，聊以自藏。嘉、道以还，积威日弛，人心已渐获解放，而当文恬武嬉之既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原，归咎于学非所用，则最尊严之学阀，自不得不首当其冲。其二，清学之发祥地及根据地，本在江、浙。咸、同之乱，江、浙受祸最烈，文献荡然。后起者转徙流离，更无余裕以自振其业，

而一时英拔之士，奋志事功，更不复以学问为重。凡学术之赓续发展，非比较的承平时代则不能，咸、同间之百学中落，固其宜矣。其三，“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愿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灿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智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帜，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此则清学分裂之主要原因也。

二十一

清学分裂之导火线，则经学今古文之争也。何谓今古文？初，秦始皇焚书，六经绝焉。汉兴，诸儒始渐以其学教授，而亦有派别。《易》则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而同出田何。《书》则有欧阳（生）、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三家，而同出伏胜。《诗》则有齐、鲁、韩三家，《鲁诗》出申公，《齐诗》出轅固，《韩诗》出韩婴。《春秋》则惟《公羊传》，有严（彭祖）、颜（安乐）两家，同出胡毋生、董仲舒。《礼》则惟《仪礼》，有大戴（德）、小戴（圣）、庆（普）三家，而同出高堂生。此十四家者，皆汉武帝、宣帝时立于学官，置博士教授，其写本皆用秦、汉时通行篆书，谓之今文。《史记·儒林传》所述经学传授止此，所谓十四博士是也。逮西汉之末，则有所谓古文经传出焉。《易》则有费氏，谓东莱人费直所传。《书》则有孔氏，谓孔子裔孙安国发其壁藏所献。《诗》则有毛

氏，谓河间献王博士毛公所传。《春秋》则《左氏传》，谓张苍曾以教授。《礼》则有《逸礼》三十九篇，谓鲁共王得自孔子坏宅中。又有《周官》，谓河间献王所得。此诸经传者，皆以科斗文字写，故谓之古文。两汉经师，多不信古文，刘歆屡求以立学官，不得。歆《移书让太常博士》，谓其“专己、守残、党同、妒真”者也。王莽擅汉，歆挟莽力立之。光武复废之。东京初叶，信者殊稀。至东汉末，大师服虔、马融、郑玄皆尊习古文，古文学遂大昌。而其时争论焦点，则在《春秋公羊传》。今文大家何休著《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公羊墨守》。古文大家郑玄则著《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以驳之。玄既淹博，遍注群经，其后晋杜预、王肃皆衍其绪，今文学遂衰。此两汉时今古文哄争之一大公案也。

南北朝以降，经说学派，只争郑(玄)、王(肃)，今古文之争遂熄。唐陆德明著《释文》，孔颖达著《正义》，皆杂宗郑、王。今所传《十三经注疏》者，《易》用王(弼)注，《书》用伪孔(安国)传，《诗》用毛传郑笺，《周礼》、《仪礼》、《礼记》皆用郑注。《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其余诸经，皆汲晚汉古文家之流。西汉所谓十四博士者，其学说皆亡，仅存者惟《春秋公羊传》之何(休)注而已。自宋以后，程、朱等亦遍注诸经，而汉唐注疏废。入清代则节节复古。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于六朝、唐。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申郑，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

二十二

今文学之中心在《公羊》，而“公羊家”言，则真所谓“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何休《公羊传注·自序》）。自魏晋以还，莫敢道焉。今《十三经注疏》本，《公羊传》虽用何注，而唐徐彦为之疏，于何义一无发明，《公羊》之成为绝学，垂二千年矣。清儒既遍治古经，戴震弟子孔广森始著《公羊通义》，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学者不宗之，今文学启蒙大师，则武进庄存与也。存与著《春秋正辞》，刊落训诂名物之末，专求其所谓“微言大义”者，与戴、段一派所取途径，全然不同。其同县后进刘逢禄继之，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其书亦用科学的归纳研究法，有条贯，有断制，在清人著述中，实最有价值之创作。段玉裁外孙龚自珍，既受训诂学于段，而好今文，说经宗庄、刘。自珍性佚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骚，喜为要眇之思，其文辞俶诡连犽，当时之人弗善也。而自珍益以此自烹，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晚岁亦耽佛学，好谈名理。综自珍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又为瑰丽之辞所掩，意不豁达。虽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夏曾佑赠梁启超诗云：“瓠人（龚）申受（刘）出方耕（庄），孤绪微茫接董生（仲舒）。”此言“今文学”之渊源最分明。拟诸“正统派”，庄可比顾，龚、刘则阎、胡也。

“今文学”之初期，则专言《公羊》而已，未及他经。然因此知

汉代经师家法，今古两派，截然不同，知贾、马、许、郑，殊不足以尽汉学。时辑佚之学正极盛，古经说片语只字，搜集不遗余力，于是研究今文遗说者渐多。冯登府有《三家诗异文疏证》，陈寿祺有《三家诗遗说考》，陈乔枏有《今文尚书经说考》、《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三家诗遗说考》、《齐诗翼氏学疏证》，迮鹤寿有《齐诗翼氏学》，然皆不过言家法同异而已，未及真伪问题。道光末，魏源著《诗古微》，始大攻《毛传》及《大小序》，谓为晚出伪作，其言博辨，比于阎氏之《书疏证》，且亦时有新理解。其论诗不为美刺而作，谓“美刺固毛诗一家之例，……作诗者自道其情，情达而止……岂有欢愉哀乐，专为无病代呻者耶？”（《诗古微·齐鲁韩毛异同论中》）此深合“为文艺而作文艺”之旨，直破二千年来文家之束缚。又论诗乐合一，谓“古者乐以诗为体，孔子正乐即正诗。”（同，《夫子正乐论上》）皆能自创新见，使古书顿带活气。源又著《书古微》，谓不惟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即阎氏所攻者）为伪也，东汉马、郑之古文说，亦非孔安国之旧。同时邵懿辰亦著《礼经通论》，谓《仪礼》十七篇为足本，所谓古文《逸礼》三十九篇者，出刘歆伪造。而刘逢禄故有《左氏春秋考证》，谓此书本名《左氏春秋》，不名《春秋左氏传》，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同性质，乃记事之书，非解经之书，其解经者，皆刘歆所窜入，《左氏传》之名，亦歆所伪创。盖自刘书出而《左传》真伪成问题；自魏书出而《毛诗》真伪成问题；自邵书出而《逸礼》真伪成问题；若《周礼》真伪，则自宋以来成问题久矣。初时诸家不过各取一书为局部的研究而已，既而寻其系统，则此诸书者，同为西汉末出现，其传授端绪，俱不可深考，同为刘歆所主持争立。质言之，则所谓古文诸经传者，皆有连带关系，真则俱真，伪则俱伪。于是将两汉今古文之全案，重提复勘，则康有为其人也。

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考证之学，本非其所好也，而因众所共习，则亦能之，能之而颇欲用以别辟国土；故虽言经学，而其精神与正统派之为经学而治经学者则既有以异。自珍、源皆好作经济谈，而最注意边事。自珍作《西域置行省议》，至光绪间实行，则今新疆也；又著《蒙古图志》，研究蒙古政俗而附以论议（未刻）。源有《元史》，有《海国图志》，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

二十三

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廖平者，王闿运弟子。闿运以治《公羊》闻于时，然故文人耳，经学所造甚浅。其所著《公羊笺》，尚不逮孔广森。平受其学，著《四益馆经学丛书》十数种，颇知守今文家法；晚年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其人固不足道，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有为最初所著书曰《新学伪经考》，“伪经”者，谓《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凡西汉末刘歆所力争立博士者。“新学”者，谓新莽之学。时清儒诵法许、郑者，自号曰“汉学”。有为以为此新代之学，非汉代之学，故更其名焉。《新学伪经考》之要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

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臆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诸所主张，是否悉当且勿论，要之此说一出，而所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有为弟子有陈千秋、梁启超者，并夙治考证学，陈尤精治，闻有为说，则尽弃其学而学焉。《伪经考》之著，二人者多所参与，亦时时病其师之武断，然卒莫能夺也。实则此书大体皆精当，其可议处乃在小节目，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臆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辨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读《新学伪经考》而可见也。《新学伪经考》出甫一年，遭清廷之忌，毁其板，传习颇稀。其后有崔适者，著《史记探原》、《春秋复始》二书，皆引申有为之说，益加精密，今文派之后劲也。

有为第二部著述，曰《孔子改制考》。其第三部著述，曰《大同书》。若以《新学伪经考》比飓风，则此二书者，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有为之治《公羊》也，不断断于其书法义例之小节，专求其微言大义，即何休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者，定《春秋》为孔子改制创作之书，谓文字不过其符号，如电报之密码，如乐谱之音符，非口授不能明。又不惟《春秋》而已，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孔子盖自立一宗旨而凭之以进退

古人，去取古籍。孔子改制，恒托于古。尧舜者，孔子所托也，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至寻常，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业，皆孔子理想上所构成也。又不惟孔子而已，周秦诸子罔不改制，罔不托古。老子之托黄帝，墨子之托大禹，许行之托神农，是也。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刘逢禄、龚自珍、陈立辈，皆言改制，而有为之说，实与彼异。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有为谓孔子之改制，上掩百世，下掩百世，故尊之为教主。误认欧洲之尊景教为治强之本，故恒欲侪孔子于基督，乃杂引讖纬之言以实之。于是有为心目中的孔子，又带有“神秘性”矣。《孔子改制考》之内容，大略如此。其所及于思想界之影响，可得言焉：

一，教人读古书，不当求诸章句训诂名物制度之末，当求其义理。所谓义理者，又非言心言性，乃在古人创法立制之精意。于是汉学、宋学，皆所吐弃，为学界别辟一新殖民地。

二，语孔子之所以为大，在于建设新学派(创教)，鼓舞人创作精神。

三，《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造，《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

四，虽极力推挹孔子，然既谓孔子之创学派与诸子之创学派，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则已夷孔子于诸子之列。所谓“别黑白定一尊”之观念，全然解放，导人以比较的研究。

二十四

右两书皆有为整理旧学之作，其自身所创作，则《大同书》也。初，有为既从学于朱次琦毕业，退而独居西樵山者两年，专为深沉之思，穷极天人之故，欲自创一学派，而归于经世之用。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礼运》之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此一段者，以今语释之，则民治主义存焉（天下……与能），国际联合主义存焉（讲信修睦），儿童公育主义存焉（故人不……其子），老病保险主义存焉（使老有……有所养），共产主义存焉（货恶……藏诸己），劳作神圣主义存焉（力恶……为己）。有为谓此为孔子之理想的社会制度，谓《春秋》所谓“太平世”者即此。乃衍其条理为书，略如左：

- 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 二，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
- 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 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 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 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 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 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

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

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大同书》之条理略如是。全书数十万言，于人生苦乐之根原，善恶之标准，言之极详辩，然后说明其立法之理由。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有为谓佛法出家，求脱苦也，不如使其无家可出；谓私有财产为争乱之源，无家族则谁复乐有私产；若夫国家，则又随家族而消灭者也。有为悬此鹄为人类进化之极轨，至其当由何道乃能致此，则未尝言。其第一眼目所谓男女同栖当立期限者，是否适于人生，则亦未甚能自圆其说。虽然，有为著此书时，固一无依傍，一无剿袭，在三十年前，而其理想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者多合符契，而陈义之高且过之，呼鸣，真可谓豪杰之士也已。

有为虽著此书，然秘不以示人，亦从不以此义教学者。谓今方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其弟子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为。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而有为始终谓当以小康义救今世，对于政治问题，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皆以维持旧状为职志。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且竭尽全力以抗之遏之，人类秉性之奇诡，度无以过是者。有为当中日战役后，纠合

青年学子数千人上书言时事，所谓“公车上书”者是也。中国之有“群众的政治运动”实自此始。然有为既欲实行其小康主义的政治，不能无所求于人，终莫之能用，屡遭窜逐，而后辈多不喜其所为，相与诋诃之。有为亦果于自信，而轻视后辈，益为顽固之态以相角。今老矣，殆不复与世相闻问，遂使国中有一大思想家，而国人不蒙其泽，悲夫！启超屡请印布其《大同书》，久不许，卒乃印诸《不忍杂志》中，仅三之一，杂志停版，竟不继印。

二十五

对于“今文学派”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则新会梁启超也。启超年十三，与其友陈千秋同学于学海堂，治戴、段、王之学，千秋所以辅益之者良厚。越三年，而康有为以布衣上书被放归，举国目为怪。千秋、启超好奇，相将谒之，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共请康开馆讲学，则所谓万木草堂是也。二人者学数月，则以其所闻昌言于学海堂，大诋诃旧学，与长老侪辈辩诘无虚日。有为不轻以所学授人，草堂常课，除《公羊传》外，则点读《资治通鉴》、《宋元学案》、《朱子语类》等，又时时习古礼，千秋、启超弗嗜也，则相与治周秦诸子及佛典，亦涉猎清儒经济书及译本西籍，皆就有为决疑滞。居一年，乃闻所谓“大同义”者，喜欲狂，锐意谋宣传，有为谓非其时，然不能禁也。又二年，而千秋卒（年二十二），启超益独力自任。启超治《伪经考》，时复不嫌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启超谓孔门之学，后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说）。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

于是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引《孟子》中诛责“民贼”“独夫”，“善战服上刑”，“授田制产”诸义，谓为大同精意所寄，日倡道之。又好《墨子》，诵说其“兼爱”“非攻”诸论。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其后启超亡命日本，曾佑赠以诗，中有句曰：“冥冥兰陵（荀卿）门，万鬼头如蚁。质多（魔鬼）举只手，阳乌为之死。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此可想见当时彼辈“排荀”运动，实有一种元气淋漓景象。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详次节）。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

其后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启超创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敝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但微引其绪，未敢昌言。已而嗣同与黄遵宪、熊希龄等，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聘启超主讲席，唐才常等为助教。启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掎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先是嗣同、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设《湘报》（日刊）、《湘学报》（旬刊），所言虽不如学堂中激烈，实阴相策应。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叶德辉著《翼教丛编》数十万

言，将康有为所著书、启超所批学生札记，及《时务报》、《湘报》、《湘学报》诸论文，逐条痛斥；而张之洞亦著《劝学篇》，旨趣略同。戊戌政变前，某御史劾举札记批语数十条指斥清室鼓吹民权者具摺揭参，卒兴大狱。嗣同死焉，启超亡命，才常等被逐，学堂解散。盖学术之争，延为政争矣。

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弃家从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积年余，举事于汉口，十一人者先后归，从才常死者六人焉。启超亦自美洲驰归，及上海而事已败。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竟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二十六

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启超亦不嫌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齏，持论稍变矣。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然矣。

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国中附和

不乏，启超亦不谓然，屡起而驳之。其言曰：

“我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而思想一窒。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而思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教二千余年于兹矣，而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寢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寢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寢假而孔子变为韩退之、欧阳永叔矣，寢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寢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寢假而孔子变为顾亭林、戴东原矣，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猿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姬得一钱，诟詈以相夺，情状抑何可怜！……此二千年来保教党所生之结果也。”（壬寅年《新民丛报》）

又曰：“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学新理而缘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孔子所曾言也。……然则非以此新学新理厘然有当于吾心而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从之耳。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万一遍索诸《四书》、《六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为真理而亦不敢从矣。万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弃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终不能饬遗我国民也。故吾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同上）

又曰：“摭古书片词单语以傅会今义，最易发生两种流弊：一，倘所印证之义，其表里适相吻合，善已；若稍有牵合附会，则最易导国民以不正确之观念，而缘‘郢书燕说’以滋弊。例如，畴昔谈立宪、谈共和者，偶见经典中某字某句与立宪共和等字义略相近，辄摭拾以沾沾自喜，谓此制为我所固有。其实今世共和、立

宪制度之为物，即泰西亦不过起于近百年，求诸彼古代之希腊、罗马且不可得，遑论我国。而比附之言，传播既广，则能使多数人之眼光之思想，见局见缚于所比附之文句，以为所谓立宪、共和者不过如是，而不复追求其真义之所存。……此等结习，最易为国民研究实学之魔障。二，劝人行此制，告之曰，吾先哲所尝行也；劝人治此学，告之曰，吾先哲所尝治也。其势较易入，固也，然频以此相诏，则人于先哲未尝行之制，辄疑其不可行；于先哲未尝治之学，辄疑其不当治。无形之中，恒足以增其故见自满之习，而障其择善服从之明。……吾雅不愿采擷隔墙桃李之繁葩，缀结于吾家杉松之老干，而沾沾自鸣得意。吾诚爱桃李也，惟当思所以移植之，而何必使与杉松淆其名实者。”（乙卯年《国风报》）

此诸论者，虽专为一问题而发，然启超对于我国旧思想之总批判，及其所认为今后新思想发展应遵之途径，皆略见焉。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常称佛说，谓“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故其生平著作极多，皆随有所见，随即发表。彼尝言：“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

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修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

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彼尝有诗题其女令娴《艺术馆日记》云：“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可谓有自知之明。启超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间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当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

二十七

晚清思想界有一彗星，曰浏阳谭嗣同。嗣同幼好为骈体文，缘是以窥“今文学”。其诗有“汪(中)魏(源)龚(自珍)王(闾运)始是才”之语，可见其向往所自。又好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自从杨文会闻佛法，其学又一变。尝自哀其少作诗文刻之，题曰《东海蹇冥氏三十以前旧学》，示此后不复事此矣。其所谓“新学”之著作，则有《仁学》，亦题曰《台湾人所著书》。盖中多讥切清廷，假台人抒愤也。书成，自藏其稿，而写一副本畀其友梁启超。启超在日本印布之，始传于世。《仁学·自叙》曰：

“吾将哀号流涕，强聒不舍，以速其冲决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冲决全球群学群教之网罗，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天之网罗。……然既可冲决，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

《仁学》内容之精神，大略如是。英奈端倡“打破偶像”之论，遂启近代科学。嗣同之“冲决网罗”，正其义也。

《仁学》之作，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真可谓极大胆极辽远之一种计划。此计划，吾不敢谓终无成立之望，然以现在全世界学术进步之大势观之，则似为期尚早，况在嗣同当时之中国耶？嗣同幼治算学，颇深造，亦尝尽读所谓“格致”类之译书，将当时所能有之科学智识，尽量应用。又治佛教之“唯识宗”、“华严宗”，用以为思想之基础，而通之以科学。又用今文学家“太平”“大同”之义，以为“世法”之极轨，而通之于佛教。嗣同之书，盖取资于此三部分，而组织之

以立己之意见。其驳杂幼稚之论甚多，固无庸讳；其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

嗣同根本的排斥尊古观念，尝曰：“古而可好，则何必为今之人哉！”（《仁学》卷上）对于中国历史，下一总批评曰：“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仁学》卷下）当时谭、梁、夏一派之论调，大约以此为基本，而嗣同尤为悍勇，其《仁学》所谓冲决罗网者，全书皆是也，不可悉举，姑举数条为例。

嗣同明目张胆以诋名教，其言曰：

“俗学陋行，动言名教，……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下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三纲五常’之惨祸酷毒由此矣。……如曰‘仁’，则其名也；君父以责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于钳制之术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节’一切分别等衰之名。……忠孝既为臣子之专名，则终不能以此反之，虽或他有所据，意欲诘诉，而终不敌忠孝之名为名教之所尚。……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

嗣同对于善恶，有特别见解，谓：“天地间无所谓恶，恶者名耳，非实也”。谓：“俗儒以天理为善，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安得有天理？”彼欲申其“恶由名起”说，乃有极诡僻之论，曰：

“恶莫大淫杀。……男女构精名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来沿习既久，名之不改，习谓为恶。向使生民之始，即相习以淫为朝聘宴飨之巨典，行诸朝庙，行诸都市，行诸稠人广众，如中国之长揖拜跪，西国之抱腰接吻，则熟知为恶者？戕害生命名杀。此杀名也。然杀为恶，则凡杀皆当为恶。人不当杀，则凡虎狼牛马鸡豚，又何当杀者，何以不并名恶也？或曰，人与人同类

耳；然则虎狼于人不同类也；虎狼杀人，则名虎狼为恶，人杀虎狼，何以不名人为恶也？……”

此等论调，近于诡辩矣，然其怀疑之精神，解放之勇气，正可察见。

《仁学》下篇，多政治谈，其篇首论国家起原及民治主义（文不具引），实当时谭、梁一派之根本信条，以殉教的精神力图传播者也。由今观之，其论亦至平庸，至疏阔。然彼辈当时，并卢骚《民约论》之名亦未梦见，而理想多与暗合，盖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其鼓吹排满革命也，词锋锐不可当。曰：

“天下为君主私产，不始今日，……然而有知辽、金、元、清之罪，浮于前此君主者乎？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臃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其俗则彘俗也。逞其凶残淫杀，攫取中原子女玉帛；……犹以为未贖，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其心思，挫其气节，……方命曰：此食毛践土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

又曰：“吾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暗杀），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此等言论，著诸竹帛，距后此“同盟会”“光复会”等之起，盖十五六年矣。

《仁学》之政论，归于“世界主义”。其言曰：“春秋大一统之义，天地间不当有国也。”又曰：“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不可自言为某国人，当平视万国，皆其国，皆其民。”篇中此类之论，不一而足，皆当时今文学派所日倡道者。其后梁启超居东，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偏狭的国家主义，惭其死友矣。

嗣同遇害，年仅三十三。使假以年，则其学将不能测其所至。

仅留此区区一卷，吐万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京焉，吾故比诸彗星。

二十八

在此清学蜕分与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炳麟少受学于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大究心明、清间掌故，排满之信念日烈。炳麟本一条理缜密之人，乃其早岁所作政谈，专提倡单调的“种族革命论”，使众易喻，故鼓吹之力綦大。中年以后，究心佛典，治“俱舍”、“唯识”，有所入。既亡命日本，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日益闳肆。其治小学，以音韵为骨干，谓文字先有声然后有形，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著《文始》及《国故论衡》中论文字音韵诸篇，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其《蕤微言》，深造语极多。其余《国故论衡》、《检论》、《文录》诸篇，纯驳互见。尝自述治学进化之迹，曰：

“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字器数之间，虽尝博观诸子，略识微言，亦随顺旧义耳。……继阅佛藏，涉猎《华严》、《法华》、《涅槃》诸经，义解渐深，卒未窥其究竟。及囚系上海，专修慈氏、世亲之书，此一术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

“……讲说《许书》，一旦解寤，的然见语言文字本原，于是初为《文始》；……由是所见与笺疏琐碎者殊矣。……”

“为诸生说《庄子》，旦夕比度，遂有所得，端居深观而释《齐物》，乃与《瑜伽》、《华严》相会。……”

“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
(《薊汉微言》卷末)

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盖炳麟中岁以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其影响于近年来学界者亦至巨。虽然，炳麟谨守家法之结习甚深，故门户之见，时不能免。如治小学排斥钟鼎文、龟甲文，治经学排斥“今文派”，其言常不免过当。而对于思想解放之勇决，炳麟或不逮今文家也。

二十九

自明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前清学术，颇蒙其影响，而范围亦限于天算。“鸦片战役”以后，渐怵于外患。洪杨之役，借外力平内难，益震于西人之“船坚炮利”，于是上海有制造局之设，附以广方言馆，京师亦设同文馆，又有派学生留美之举。而目的专在养成通译人才，其学生之志量，亦莫或逾此，故数十年中，思想界无丝毫变化。惟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柢，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而教会之在中国者，亦颇有译书。光绪间所为“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盖“学问饥饿”，至是而极矣。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

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觥，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亦有林纾者，译小说百数十种，颇风行于时，然所译本率皆欧洲第二三流作者。纾治桐城派古文，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于新思想无与焉。

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就此点论，则畴昔之西洋留学生，深有

负于国家也。

而一切所谓“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更有一总根源，曰：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时主方以利禄饵诱天下，学校一变名之科举，而新学亦一变质之八股。学子之求学者，其什中八九，动机已不纯洁，用为“敲门砖”，过时则抛之而已。此其劣下者，可勿论。其高秀者，则亦以“致用”为信条，谓必出所学举而措之，乃为无负。殊不知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晚清之新学家，欲求其如盛清先辈具有“为经学而治经学”之精神者，渺不可得。其不能有所成就，亦何足怪。故光、宣之交，只能谓为清学衰落期，并新思想启蒙之名，亦未敢轻许也。

三十

晚清思想界有一伏流，曰佛学。前清佛学极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于思想界无关系。其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颇治相宗，然非其专好。至乾隆时，则有彭绍升、罗有高，笃志信仰。绍升尝与戴震往复辨难（《东原集》）。其后龚自珍受佛学于绍升（《定庵文集》有《知归子赞》，知归子即绍升），晚受菩萨戒。魏源亦然，晚受菩萨戒，易名承贯，著《无量寿经会译》等书。龚、魏为“今文学家”所推奖，故“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石埭杨文会少曾佐曾国藩幕府，复随曾纪泽使英，夙栖心内典，学问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为事，至宣统三年武汉革命之前一日圆寂。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

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经典流通既广，求习较易，故研究者日众。就中亦分两派，则哲学的研究与宗教的信仰也。西洋哲学既输入，则对于印度哲学，自然引起连带的兴味。而我国人历史上与此系之哲学因缘极深，研究自较易；且亦对于全世界文化应负此种天职，有志者颇思自任焉。然其人极稀，其事业尚无可称述。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懣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遁逃而入于佛。佛教本非厌世，本非消极，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

学佛既成为一种时代流行，则依附以为名高者出矣。往往有夙昔稔恶或今方在热中奔竞中者，而亦自托于学佛。今日听经打坐，明日黥货陷人。“净宗”他力横超之教，本有“带业往生”一义，稔恶之辈，断章取义，日日勇于为恶，恃一声“阿弥陀佛”，谓可湔拔无余，直等于“罗马旧教”极敝时，忏悔与犯罪，并行不悖。又中国人中迷信之毒本甚深，及佛教流行，而种种邪魔外道惑世诬民之术，亦随而复活。乩坛盈城，图讖累牍。佛弟子曾不知其为佛法所诃，为之推波助澜。甚至以二十年前新学之巨子，犹津津乐道之。率此不变，则佛学将为思想界一大障，虽以吾辈夙尊佛法之人，亦结舌不敢复道矣。

蒋方震曰：“欧洲近世史之曙光，发自两大潮流：其一，希腊思想复活，则‘文艺复兴’也；其二，原始基督教复活，则‘宗教改革’也。我国今后之新机运，亦当从两途开拓：一为情感的方

面，则新文学、新美术也；一为理性的方面，则新佛教也。”（《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自序》）吾深韪其言。中国之有佛教，虽深恶之者终不能遏绝之，其必常为社会思想之重要成分，无可疑也。其益社会耶，害社会耶，则视新佛教徒能否出现而已。

更有当附论者，曰基督教。基督教本与吾国民性不近，故其影响甚微。其最初传来者，则旧教之“耶稣会”一派也。明士大夫徐光启辈，一时信奉，入清转衰；重以教案屡起，益滋人厌。新教初来，亦受其影响。其后国人渐相安，而教力在欧洲已日杀矣。各派教会在国内事业颇多，尤注意教育。然皆竺旧，乏精神，对于数次新思想之运动，毫未参加，而间接反有阻力焉。基督教之在清代，可谓无咎无誉，今后不改此度，则亦归于淘汰而已。

三十一

前清一代学风，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相类甚多。其最相异之一点，则美术文学不发达也。清之美术（画），虽不能谓甚劣于前代，然绝未尝向新方面有所发展，今不深论。其文学，以言夫诗，真可谓衰落已极。吴伟业之靡曼，王士禛之脆薄，号为开国宗匠。乾隆全盛时，所谓袁（枚）、蒋（士铨）、赵（翼）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向迩。诸经师及诸古文家，集中多亦有诗，则极拙劣之砌韵文耳。嘉、道间，龚自珍、王昙、舒位，号称新体，则粗犷浅薄。咸、同后，竞宗宋诗，只益生硬，更无余味。其稍可观者，反在生长僻壤之黎简、郑珍辈，而中原更无闻焉。直至末叶，始有金和、黄遵宪、康有为，无气淋漓，卓然称大家。以言夫词，清代固有作者，驾元、明而上，若纳兰性德、郭麟、张惠言、项鸿祚、谭献、郑文焯、王鹏运、朱祖谋，皆名其家，然词固所共指为小

道者也。以言夫曲，孔尚任《桃花扇》、洪升《长生殿》外，无足称者。李渔、蒋士铨之流，浅薄寡味矣。以言夫小说，《红楼梦》只立千古，余皆无足齿数。以言夫散文，经师家朴实说理，毫不带文学臭味；桐城派则以文为“司空城旦”矣。其初期，魏禧、王源较可观。末期，则魏源、曾国藩、康有为。清人颇自夸其骈文，其实极工者仅一汪中，次则龚自珍、谭嗣同。其最著名之胡天游、邵齐焘、洪亮吉辈，已堆垛柔曼无生气，余子更不足道。要而论之，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价值极大；清代文艺美术，在中国文艺史、美术史上，价值极微，此吾所敢昌言也。

清代何故与欧洲之“文艺复兴”异其方向耶？所谓“文艺复兴”者，一言以蔽之，曰：返于希腊。希腊文明，本以美术为根干，无美术则无希腊，盖南方岛国景物妍丽而多变化之民所特产也。而意大利之位置，亦适与相类。希腊主要美术在雕刻，而其实物多传于后，故维那神像（雕刻裸体女神）之发掘，为文艺复兴最初之动机。研究学问上古典，则其后起耳。故其方向特趋重于美术，宜也。我国文明，发源于北部大平原。平原雄伟旷荡而少变化，不宜于发育美术。所谓复古者，使古代平原文明之精神复活，其美术的要素极贫乏，则亦宜也。

然则曷为并文学亦不发达耶？欧洲文字衍声，故古今之差变剧。中国文字衍形，故古今之差变微。文艺复兴时之欧人，虽竞相与研究希腊，或迳以希腊文作诗歌及其他著述，要之欲使希腊学普及，必须将希腊语译为拉丁或当时各国通行语，否则人不能读。因此，而所谓新文体（国语新文学）者，自然发生。如六朝、隋、唐译佛经，产出一种新文体，今代译西籍，亦产出一种新文体，相因之势然也。我国不然，字体变迁不剧，研究古籍，无待译。夫《论语》、《孟子》，稍通文义之人尽能读也；其不能读《论

语》、《孟子》者，则并《水浒》、《红楼》亦不能读也。故治古学者无须变其文与语，既不变其文与语，故学问之实质虽变化，而传述此学问之文体语体无变化；此清代文无特色之主要原因也。重以当时诸大师方以崇实黜华相标榜，顾炎武曰：“一自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日知录》二十）所谓“纯文艺”之文，极所轻蔑。高才之士，皆集于“科学的考证”之一途；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者，皆第二流以下人物，此所以不能张其军也。

三十二

问曰：吾子屡言清代研究学术，饶有科学精神，何故自然科学，于此时代并不发达耶？答曰：是亦有故。文化之所以进展，恒由后人承袭前人智识之遗产，继长增高。凡袭有遗产之国民，必先将其遗产整理一番，再图向上，此乃一定步骤。欧洲文艺复兴之价值，即在此。故当其时，科学亦并未发达也，不过引其机以待将来。清代学者，刻意将三千年遗产，用科学的方法大加整理，且亦确已能整理其一部分。凡一国民在一时期内，只能集中精力以完成一事业，且必须如此，然后事业可以确实成就。清人集精力于此一点，其贡献于我文化者已不少，实不能更责以其他。且其趋势，亦确向切近的方面进行。例如言古音者，初惟求诸《诗经》、《易经》之韵，进而考历代之变迁，更进而考古今各地方音，遂达于人类发音官能构造之研究，此即由博古的考证引起自然科学的考证之明验也。故清儒所遵之途径，实为科学发达之先驱，其未能一蹴即几者，时代使然耳。

复次，凡一学术之发达，必须为公开的且趣味的研究，又必须其研究资料，比较的丰富。我国人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

之旧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不能为讳也。科学上之发明，亦何代无之，然皆带秘密的性质，故终不能光大，或不旋踵而绝。即如医学上证治与药剂，其因秘而失传者，盖不少矣。凡发明之业，往往出于偶然。发明者或并不能言其所以然，或言之而非其真。及以其发明之结果公之于世，多数人用各种方法向各方面研究之，然后偶然之事实，变为必然之法则。此其事非赖有种种公开研究机关——若学校，若学会、若报馆者，则不足以收互助之效，而光大其业也。夫在清代则安能如是，此又科学不能发生之一原因也。

然而语一时代学术之兴替，实不必问其研究之种类，而惟当问其研究之精神。研究精神不谬者，则施诸此种类而可成就，施诸他种类而亦可以成就也。清学正统派之精神，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虽不无矫枉过正之处，而治学之正轨存焉。其晚出别派（今文学家）能为大胆的怀疑解放，斯亦创作之先驱也。此清学之所为有价值也欤？

三十三

读吾书者，若认其所采材料尚正确，所批评亦不甚纰缪，则其应起之感想，有数种如下：

其一，可见我国国民确富有“学问的本能”，我国文化史确有研究价值，即一代而已见其概。故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

其二，对于先辈之“学者的人格”，可以生一种观感。所谓“学者的人格”者，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专壹。虽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

展，必赖有此等人。

其三，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所谓研究精神者，归著于此点。不问其所疑、所求、所创者在何部分，亦不问其所得之巨细，要之经一番研究，即有一番贡献，必如是始能谓之增加遗产。对于本国之遗产当有然，对于全世界人类之遗产亦当有然。

其四，将现在学风与前辈学风相比照，令吾曹可以发现自己种种缺点。知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于学问社会以外。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鉴前代得失以自策厉。

吾著此书之宗旨，大略如是。而吾对于我国学术界之前途，实抱非常乐观。盖吾稽诸历史，征诸时势，按诸我国国民性，而信其于最近之将来，必能演出数种潮流，各为充量之发展。吾今试为预言于此，吾祝吾观察之不谬，而希望之不虚也。

一、自经清代考证学派二百余年之训练，成为一种遗传，我国学子之头脑，渐趋于冷静缜密。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根本要素。我国对于“形”的科学(数理的)，渊源本远，根柢本厚。对于“质”的科学(物理的)，因机缘未熟，暂不发展。今后欧美科学，日日输入，我国民用其遗传上极优粹之科学的头脑，凭藉此等丰富之资料，瘁精研究，将来必可成为全世界第一等之“科学国民”。

二、佛教哲学，本为我先民最珍贵之一遗产，特因发展太过，末流滋弊，故清代学者，对于彼而生剧烈之反动。及清学发达太过，末流亦敝，则还元的反动又起焉。适值全世界学风，亦同有此等倾向，物质文明烂熟，而“精神上之饥饿”益不胜其苦痛，

佛教哲学，盖应于此时代要求之一良药也。我国民性，对于此种学问，本有特长，前此所以能发达者在此。今后此特性必将复活。虽然，隋唐之佛教，非复印度之佛教，而今后复活之佛教亦必非复隋唐之佛教。质言之，则“佛教上之宗教改革”而已。

三、所谓“经世致用”之一学派，其根本观念，传自孔孟，历代多倡道之，而清代之启蒙派、晚出派，益扩张其范围。此派所揭橥之旗帜，谓学问所当讲求者，在改良社会增其幸福，其通行语所谓“国计民生”者是也。故其论点，不期而趋集于生计问题。而我国人对于生计问题之见地，自先秦诸大哲，其理想皆近于今世所谓“社会主义”。二千年来生计社会之组织，亦蒙此种理想之赐，颇称均平健实。今此问题为全世界人类之公共问题，各国学者之头脑，皆为所恼。吾敢言我国之生计社会，实为将来新学说最好之试验场，而我国学者对于此问题，实有最大之发言权，且尤当自觉悟其对此问题应负最大之任务。

四、我国文学美术，根柢极深厚，气象皆雄伟，特以其为“平原文明”所产育，故变化较少。然其中徐徐进化之迹，历然可寻。且每与外来之宗派接触，恒能吸受以自广。清代第一流人物，精力不用诸此方面，故一时若甚衰落，然反动之征已见。今后西洋之文学美术，行将尽量输入，我国民于最近之将来，必有多数之天才家出焉，采纳之而傅益以己之遗产，创成新派，与其他之学术相联络呼应，为趣味极丰富之民众的文化运动。

五、社会日复杂，应治之学日多，学者断不能如清儒之专研古典，而固有之遗产，又不可蔑弃，则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使后之学者即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世界人之治“中华国学”者，亦得有藉焉。

以吾所观察所希望，则与清代兴之新时代，最少当有上列之五大潮流，在我学术界中，各为猛烈之运动，而并占重要之位置。若今日者，正其启蒙期矣。吾更愿陈余义以自厉，且厉国人：

一、学问可嗜者至多，吾辈当有所割弃然后有所专精。对于一学，为彻底的忠实研究，不可如刘献廷所谓“只教成半个学者”（《广阳杂记》卷五），力洗晚清笼统、肤浅、凌乱之病。

二、善言政者，必曰“分地自治，分业自治”。学问亦然，当分业发展，分地发展。分业发展之义易明，不赘述。所谓分地发展者，吾以为我国幅员，广埒全欧，气候兼三带，各省或在平原，或在海滨，或在山谷，三者之民，各有其特性，自应发育三个体系以上之文明。我国将来政治上各省自治基础确立后，应各就其特性，于学术上择一二种为主干。例如某省人最宜于科学，某省人最宜于文学美术，皆特别注重，求为充量之发展。必如是然后能为本国文化世界文化作充量之贡献。

三、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求思想统一，如二千年来所谓“表彰某某罢黜某某”者。学问不厌辨难，然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他人所学，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

吾著此篇竟，吾感谢吾先民之餉遗我者至厚。吾觉有极灿烂庄严之将来横于吾前。

中国历史研究法

自序

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殫，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之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全向于此两种方向以行。今虽仅见其进，未见其止，顾所成就则既斐然矣。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

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启超不自揆，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顾不敢自信，迁延不以问诸世。客岁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乃哀理旧业，益以新知，以与同学商榷。一学期终，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卷，凡十万言。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治史所持之器，大略在是。吾发心殫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吾之稿本，将悉以各学校之巡回讲演成之。其第二卷为《五千年史势鸟瞰》，以今春在北京清华学校讲焉。第三卷以下以时代为次，更俟续布也。顾兹事体大，原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力；况学殖浅薄如启超者，重以讲堂匆匆开演，讲义随讲随布，曾未获稍加研勘，则其纰缪舛误矛盾漏略之多，又岂俟论。区区此稿，本宜坚镞之，以俟他日之改定。既而复思吾研究之结果，虽未必有价值；其或者因吾之研究以引起世人之研究焉，因世人之研究以是正吾之研究焉，则其所得不已多耶？故贸然刊布，而字之曰《史稿》。孟子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吾之此书，非敢有以与人也，将以取诸人而已。愿读者鉴兹微尚，痛予别裁，或纠其大端之谬，或绳其小节之疏，或著论箴驳，或通函海责，俾得自知其失而自改之，由稿本蜕变以成定本，则片言之锡，皆吾师也。

十一年一月十八日，启超自述

第一章 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

今宜将此定义分析说明：

一、活动之体相：人类为生存而活动，亦为活动而生存。活动休止，则人道或几乎息矣。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史也者，综合彼参与活动之种种体，与其活动所表现之种种相，而成一有结构的叙述者也。是故非活动的事项——例如天象、地形等，属于自然界现象者，皆非史的范围；反之，凡活动的事项——人类情感理智意志所产生者，皆活动之相，即皆史的范围也。此所谓相者，复可细分为二：一曰活动之产品，二曰活动之情态。产品者，活动之过去相，因活动而得此结果者也；情态者，活动之现在相，结果之所从出也。产品者，譬犹海中生物，经无数个体一期间协合之嬗化，而产出一珊瑚岛，此珊瑚岛实经种种活动情态而始成；而今则既僵矣，情态不复可得见。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也。

二、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不曰“人”之活动，而曰“人类社会”之活动者，一个人或一般人之食息、生殖、争斗、忆念、谈话等等，不得谓非活动也，然未必皆为史迹。史迹也者，无论

为一个人独立所造，或一般人协力所造，要之必以社会为范围，必其活动力之运用贯注，能影响及于全社会——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然后足以当史之成分。质言之，则史也者，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之共业所构成，故其性质非单独的，而社会的也。复次，言活动而必申之以“赅续”者：个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隐然若悬一目的以为指归；此目的地辽远无垠，一时代之人之所进行，譬犹涉途万里者之仅踟一步耳。于是前代之人恒以其未完之业遗诸后代，后代袭其遗产而继长增高焉；如是递遗递袭，积数千年数万年，虽到达尚邈无其期，要之与目的地之距离，必日近一日；含生之所以进化，循斯轨也。史也者，则所以叙累代人相续作业之情状者也。率此以谈，则凡人类活动在空际含孤立性，在时际含偶现性、断灭性者，皆非史的范围；其在空际有周遍性，在时际有连续性者，乃史的范围也。

三、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活动必有成绩，然后可记，不待言也。然成绩云者，非一个人一事业成功失败之谓，实乃簿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总和。质言之，即算总帐也。是故成绩有彰显而易见者，譬犹澍雨降而麦苗茁，烈风过而林木摧；历史上大圣哲大英雄之出现，大战争大革命之经过，是其类也。亦有微细而难见者，譬犹退潮刷江岸而成淤滩，宿茶浸陶壶而留陈渍；虽聪察者，犹不之觉，然其所演生之迹，乃不可磨灭。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不能确指其为何时何人所造，而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皆与有力焉，是其类也。吾所谓总成绩者，即指此两类之总和也。夫成绩者，今所现之果也，然必有昔之成绩以为之因；而今之成绩又自为因，以孕产将来之果；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其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

也。然因果关系，至复蹟而难理；一果或出数因，一因或产数果；或潜伏而易代乃显，或反动而别证始明；故史家以为难焉。

四、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凡作一书，必先问吾书将以供何等人之读，然后其书乃如隰之有畔，不致泛滥失归，且能针对读者以发生相当之效果。例如《资治通鉴》，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扞闕。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今日之史，其读者为何许人耶？既以民治主义立国，人人皆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立于国中，又以人类一分子之资格立于世界；共感于过去的智识之万不可缺，然后史之需求生焉。质言之，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史家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矍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夫如此，然后能将历史纳入现在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夫如此，则史之目的，乃为社会一般人而作，非为某权力阶级或某智识阶级而作，昭昭然也。

今人韦尔思有言：“距今二百年前，世界未有一著述足称为史者。”^①夫中外古今书籍之以史名者亦多矣，何以谓竟无一史？则今世之史的观念，有以异于古所云也。我国二千年来史学，视他国为独昌。虽然，彼其体例，多属千余年前学者之所创；彼时所需要之史，与今不同。彼时学问未分科，凡百智识皆恃史以为之记载；故史之范围，广漠无垠。积年愈久，为书愈多，驯至为一人毕生精力所不能殫读。吾侪居今日而读旧史，正所谓“披沙拣金，往往见宝”。离沙无金，固也，然数斗之沙，得金一颗，为事

既已甚劳，况拣金之术，非尽人而能，苟误其途，则取沙弃金，在所不免。不幸而中国现在历史的教育，乃正类是。吾昔在友家见一八岁学童，其父面试以元明两代帝王世次及在位年数，童对客倏数，一无漏讹；倘此童而以他朝同一之事项质客（我）者，客惟有忸怩结舌而已。吾既叹异此童之慧敏，转念以如此慧敏之脑，而役以此等无价值之劳动，其冤酷乃真无极也。不宁惟是，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不载。试举其例：如巴、蜀、滇、黔诸地，自古本为中华民族文化所未被，其次第同化之迹，治史者所亟欲闻也。而古代史上有两大役，实兹事之关键。其在巴蜀方面，为战国时秦司马错之定蜀；其在滇、黔方面，为三国时蜀诸葛亮之平蛮。然而《史记》之叙述前事，仅得十一字；《三国志》之叙述后事，仅得六十四字；^②其简略不太甚耶？又如隋唐间佛教发达，其结果令全国思想界及社会情状生一大变化，此共见之事实也，然而遍读《隋书》、新旧唐书，此种印象，竟丝毫不能印入吾脑也。如元明间杂剧小说，为我文学界辟一新纪元，亦共见之事实也，然而遍读《元史》、《明史》，此间消息，乃竟未透漏一二也。又如汉之攘匈奴，唐之征突厥，皆间接予西方史迹以莫大之影响；明时欧人之“航海觅地热”，其影响之及于我者亦至巨；此参稽彼我年代事实而可见者。然而遍读唐明诸史，其能导吾以入于此种智识之途径者，乃甚稀也。由此观之，彼旧史者，一方面因范围太滥，卷帙浩繁，使一般学子望洋而叹；一方面又因范围太狭，事实阙略，不能予吾侪以圆满的印象。是故今日而欲得一理想的中国史，以供现代中国人之资鉴者，非经新史家一番努力焉不可也。

今欲成一适合于现代中国人所需要之中国史，其重要项目，

例如：

中华民族是否中国之原住民？抑移住民？

中华民族由几许民族混合而成？其混合醇化之迹何如？

中华民族最初之活动，以中国何部分之地为本据？何时代发展至某部分，何时代又发展至某部分？最近是否仍进行发展，抑已停顿？

外来蛮族——例如匈奴，突厥等，其与我共争此土者凡几？其来历何如？其纷争结果影响于我文化者何如？我文化之影响于彼者又何如？

世界他部分之文化民族——例如印度、欧洲等，其与我接触交通之迹何如？其影响于我文化者何如？我文化之影响于彼者又何如？

中华民族之政治组织——分治合治交迭推移之迹何如？

统治异民族及被统治于异民族，其成败之迹何如？

阶级制度——贵族、平民、奴隶之别，何时发生，何时消灭？其影响于政治者何如？

国内各种团体——例如家族团体、地方团体、宗教团体、职业团体等，其盛衰兴废何如？影响于政治者何如？

民治主义基础之有无？其久不发育之故安在？

法律因革损益之迹何如？其效力之及于社会者何如？

经济基件——衣食住等之状况，自初民时代以迄今日，其进化之大势何如？

农工商业更迭代嬗以占经济之主位，其推移之迹何如？

经济制度——例如货币的使用，所有权之保护，救济政策之施行等等，其变迁何如？其影响于经济状况者何如？

人口增殖移转之状况何如？影响于经济者何如？

与外国交通后所生经济之变动何如？

中国语言文字之特质何在？其变迁何如？其影响于文化者何如？

民族之根本思想何在？其各时代思潮蜕变之迹何如？

宗教信仰之情状及其变迁何如？

文化之继承及传播，其所用教育方式何如？其变迁及得失何如？

哲学、文学、美术、音乐、工艺、科学等，各时代进展之迹何如？其价值何如？

各时代所受外国文化之影响何如？我文化之曾贡献或将贡献于世界者何如？

上所论列，不过略举纲领，未云详尽也。要之，现代之史，必注目于此等事项，校其总成绩以求其因果；然后史之为物，乃与吾侪之生活不生距离，而读史者乃能亲切而有味。举要言之，则中国史之主的如下：

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

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

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

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遵斯轨也，庶可语于史矣。

注释

① 看英人韦尔思(H.G.Wells)所著《史纲》(Outline of History) 初版第二四七叶。

② 《史记》叙秦定蜀事，仅《秦本纪》中有“六年，蜀侯辉反，司马错定之”十一字，《三国志》叙蜀平蛮事，仅《后主传》中有“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凡四十四字。又《诸葛亮》传中有“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凡二十字。此两役可谓史上极重要之事实，然正史所纪乃简略至此。使非有《战国策》、《华阳国志》等稍补其阙，则此西南徼两片大地，何以能与中原民族发生关系，吾侪将懵无所知矣。

第二章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人类曷为而有史耶？曷为惟人类为能有史耶？人类又曷为而贵有史耶？人类所以优胜于其他生物者，以其富于记忆力与模仿性，常能贮藏其先世所遗传之智识与情感，成为一种“业力”，以作自己生活基础。而各人在世生活数十年中，一方面既承袭所遗传之智识情感；一方面又受同时之人之智识情感所熏染；一方面又自浚发其智识情感；于是复成为一种新业力以贻诸后来。如是展转递增，展转递蜕，而世运乃日进而无极。此中关键，则在先辈常以其所经验之事实及所推想之事理指导后辈，后辈则将其所受之指导，应用于实际生活，而经验与推想皆次第扩充而增长。此种方法，在高等动物中，已解用之。如犬如猴……等等，常能以己之动作指导或暗示其幼儿，其幼儿亦不怠于记忆与模仿，此固与人类非大有异也。而人类所以优胜者，乃在记忆模仿之能继续。他种动物之指导暗示，恒及身而止，第一代所指导暗示者，无术以传至第二第三代，故第二第三代之指导暗示，亦无以加乎其旧。人类不然，先代所指导所暗示，常能以记诵或记录的形式传诸后代，历数百年数千年而不失坠。其所以能递增递蜕者皆恃此。此即史之所由起，与史之所以为有用也。

最初之史乌乎起？当人类之渐进而形成一族属或一部落也，其族部之长老，每当游猎斗战之隙暇，或值佳辰令节，辄聚其子姓，三三五五，围炉藉草，纵谈己身或其先代所经之恐怖，所演之武勇……等等，听者则娓娓忘倦，兴会飙举。其间有格外奇特

之情节可歌可泣者，则蟠踞于听众之脑中，湔拔不去，展转作谈料，历数代而未已，其事迹遂取得史的性质，所谓“十口相传为古”也。史迹之起原，罔不由是。今世北欧诸优秀民族如日耳曼人、荷兰人、英人等，每当圣诞节，犹有家族团聚彻夜谈故事之俗，其近代名著如熙礼尔之诗、华克拿之剧，多取材于此等传说，此即初民演史之遗影也。

最初之史，用何种体裁以记述耶？据吾侪所臆推，盖以诗歌。古代文字传写甚不便，或且并文字亦未完具，故其对于过去影事之保存，不恃记录而恃记诵，而最便于记诵者，则韵语也。试观老聃之谈道，孔子之赞《易》，乃至秦汉间人所造之小学书，皆最喜用韵，彼其时文化程度已极高，犹且如此，古代抑可推矣。四《吠陀》中之一部分，印度最古之社会史宗教史也，皆用梵歌。此盖由人类文化渐进之后，其所受之传说日丰日贖，势难悉记，思用简便易诵之法以永其传；一方面则爱美的观念，日益发达，自然有长于文学之人，将传说之深入人心者播诸诗歌，以应社会之需，于是乎有史诗。是故邃古传说，可谓为“不文的”之史；其“成文的”史则自史诗始。我国史之发展，殆亦不能外此公例。古诗或删或佚，不尽传于今日；但以今存之《诗经》三百篇论，其属于纯粹的史诗体裁者尚多篇。例如：

《玄鸟》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长发篇》——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有城方将，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拔，……率履不越。……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武王载旆。有虔秉钺。……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殷武篇》——挾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昔有成

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生民篇》——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履帝武敏歆。……
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公刘篇》——笃公刘，匪民匪康。……乃裹餱粮，于橐于囊，
……干戈戚扬，爰方启行。……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
取厉取锻，止基乃理。……

《六月篇》——六月栖栖，戎车既饬。……狁狁孔炽，我是用
急。……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薄伐
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此等诗篇，殆可指为中国最初之史。《玄鸟》、《生民》等，述
商周开国之迹，半杂神话；《殷武》、《六月》等，铺叙武功，人地
粲然。观其诗之内容，而时代之先后，亦略可推也。此等史诗，
所述之事既饶兴趣，文章复极优美。一般人民咸爱而诵之，则相
与讴思其先烈而笃念其邦家，而所谓“民族心”者，遂于兹播殖
焉。史之最大作用，盖已见端矣。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
惟中国为最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其原因何在，吾未能断
言。然史官建置之早，与职责之崇，或亦其一因也。泰西史官之
建置沿革，吾未深考；中国则起原确甚古。其在邃古，如黄帝之
史官仓颉、沮诵等，虽不必深信，然最迟至殷时必已有史官，则吾
侪从现存金文甲文诸遗迹中可以证明。吾侪又据《尚书》、《国语》、
《左传》诸书所称述，确知周代史职，已有分科，有大史、小史、
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又知不惟王朝有史官，乃至诸
侯之国及卿大夫之家，莫不皆有^①。又知古代史官，实为一社会
之最高学府，其职不徒在作史而已，乃兼为王侯公卿之高等顾问，
每遇疑难，咨以决焉^②。所以者何？盖人类本有恋旧之通性，而

中国人尤甚，故设专司以记录旧闻，认为国家重要政务之一。既职在记述，则凡有关于人事之簿籍，皆归其保存，故史官渐成为智识之中枢^③。又古代官人以世，其累代袭此业者，渐形成国中之学问阶级。例如周任、史佚之徒，几于吐辞为经，先秦第一哲学家老子，其职即周之守藏史也。汉魏以降，世官之制虽革，而史官之华贵不替。所谓“文学侍从之臣”，历代皆妙选人才以充其职。每当易姓之后，修前代之史，则更网罗一时学者，不遗余力，故得人往往称盛焉。三千年来史乘，常以此等史官之著述为中心，虽不无流弊（说详下），然以专才任专职，习惯上、法律上皆认为一种重要事业。故我国史形式上之完备，他国殆莫与京也。

古代史官所作史，盖为文句极简之编年体。晋代从汲冢所得之《竹书纪年》经学者考定为战国时魏史官所记者，即其代表。惜原书今复散佚，不能全睹其真面目。惟孔子所修《春秋》，体裁似悉依鲁史官之旧。吾侪得借此以窥见古代所谓正史者，其内容为何如。《春秋》第一年云：“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赙。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吾侪以今代的史眼读之，不能不大诧异：第一，其文句简短，达于极点。每条最长者不过四十余字（如定四年云：“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最短者乃仅一字，（如隐八年云，“螟。”）第二，一条纪一事，不相联属，绝类村店所用之流水帐簿。每年多则十数条，少则三四条（《竹书纪年》记夏殷事有数十年乃得一条者）；又绝无组织，任意断自某年，皆成起讫。第三，所记仅各国宫廷事，或宫廷间相互之关系，而于社会情形

一无所及。第四，天灾地变等现象，本非历史事项者，反一一注意详记。吾侪因此可推知当时之史的观念及史的范围，非惟与今日不同，即与秦汉后亦大有异。又可见当时之史，只能谓之簿录，不能谓之著述。虽然，世界上正式的年代史，恐不能不推我国史官所记为最古^④。《竹书纪年》起自夏禹，距今既四千年。即《春秋》为孔子断代之书，亦既当西纪前七二二至四八一年，其时欧洲史迹，有年可稽者尚绝稀也。此类之史，当春秋战国间，各国皆有。故孟子称“晋之《乘》，楚之《梲杙》，鲁之《春秋》”。则其时史书之多，略可概见。乃自秦火之后，荡然无存，司马迁著书时，已无由资其参验^⑤。汲冢幸得硕果，旋又坏于宋后之窜乱^⑥。而孔子所修，又藉以寄其微言大义，只能作经读，不能作史读^⑦。于是二千年前烂若繁星之古史，竟无一完璧以传诸今日。吁！可伤也。

同时复有一种近于史类之书。其名曰“书”，或曰“志”，或曰“记”。今六经中之《尚书》即属此类。《汉书·艺文志》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此种严格的分类，是否古代所有，虽属疑问，要之此类记载，必发源甚古。观春秋战国时人语常引夏志、商志、周志，或周书、周记等文，可知也。此等书盖录存古代策命告誓之原文，性质颇似档案，又似文选。但使非出杜撰，自应认为最可贵之史料。盖不惟篇中所记事实，直接有关于史迹，即单词片语之格言，亦有时代思想之背景在其后也。此类书现存者有《尚书》二十八篇^⑧，其年代上起尧舜，下迄春秋之秦穆。然应否全部认为正当史料，尚属疑问。此外尚有《逸周书》若干篇，真贋参半^⑨，然其真之部分，吾侪应认为与《尚书》有同等之价值也。

《春秋》、《尚书》二体，皆可称为古代正史；然此外尚非无史

籍焉。盖文字之用既日广，畴昔十口相传者，渐皆著诸竹帛，其种类非一。例如《左传》所称《三坟》、《五典》、《人索》、《九丘》，《庄子》所称《金版》、《六弢》，《孟子》所云“于《传》有之”，其书今虽皆不传，然可悬想其中所记，皆前言往行之属也。汲冢所得古书，有《琐语》，有《杂书》，有《穆天子传》；其《杂书》中，有《周食田法》，有《美人盛姬死事》（《穆天子传》及《美人盛姬死事》今存，《琐语》亦有辑佚本）。凡此皆正史以外之记录，即后世别史杂史之滥觞。计先秦以前此类书当不少，大抵皆经秦火而已。《汉书·艺文志》中各书目，或有一部分属此类，惜今并此不得见矣。

右三类者，或为形式的官书，或为备忘的随笔，皆未足以言著述。史学界最初有组织的名著，则春秋战国间得二书焉，一曰左丘之《国语》，二曰不知撰人之《世本》。左丘或称左丘明，今本《左传》，共称为彼所撰。然据《史记》所称述，则彼固名丘不名丘明，仅撰《国语》而未撰《左传》，或谓今本《左传》乃汉人割裂《国语》以伪撰，其说当否且勿深论，但《国语》若既经割裂，则亦必须与《左传》合读，然后左氏之面目得具见也。左氏书之特色，第一，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将当时数个主要的文化国，平均叙述。盖自《春秋》以降，我族已渐为地方的发展，非从各方面综合研究，不能得其全相。当时史官之作，大抵皆偏重王室或偏重于其本国（例如《春秋》以鲁为中心。《竹书纪年》自周东迁后，以晋为中心；三家分晋后，以魏为中心）。左氏反是，能平均注意于全部。其《国语》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分篇叙述，无所偏畸。《左传》是否原文，虽未敢断，即以今本论之，其溥遍的精神，固可见也。第二，其叙述不局于政治，常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左氏对于一时之典章与大事，固多详叙，而所谓“琐语”之一类，亦采择不遗，故能写出当时社会之活态，予吾侪以颇明了之印象。

第三，其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彼“帐簿式”之《春秋》，“文选式”之《尚书》，虽极庄严典重，而读者寡味矣。左氏之书，其断片的叙事，虽亦不少，然对于重大问题，时复溯原竟委，前后照应，能使读者相悦以解。此三特色者，皆以前史家所无。刘知几云：“左氏为书，不遵古法。……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史通·载言篇》），诚哉然也。故左丘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左丘旧云孔子弟子，但细读其书，颇有似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以后所追述者。苟非经后人窜乱，则此公著书，应在战国初年，恐不逮事孔子矣。希腊大史家希罗多德生于纪前四八四年，即孔子卒前六年，恰与左氏并世。不朽大业，东西同揆，亦人类史中一佳话也。

《世本》一书，宋时已佚。然其书为《史记》之蓝本，则司马迁尝自言之。今据诸书所征引，知其内容篇目，有《帝系》，有《世家》，有《传》，有《谱》，有《氏姓篇》，有《居篇》，有《作篇》。《帝系》、《世家》及《氏姓篇》叙王侯及各贵族之系牒也；《传》者，记名人事状也；《谱》者，年表之属，史注所谓旁行斜上之《周谱》也；《居篇》则汇纪王侯国邑之宅都焉；《作篇》则纪各事物之起原焉^⑩。吾侪但观其篇目，即可知其书与前史大异者两点。其一，开后此分析的的综合的研究之端绪。彼能将史料纵切横断，分别部居，俾读者得所比较以资推论也。其二，特注重于社会的事项。前史纯以政治为中心，彼乃详及姓氏、居、作等事，已颇具文化史的性质也。惜著述者不得其名，原书且久随灰烬；而不然者，当与左氏同受吾侪尸祝也。

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迁之年代，后左丘约四百年。此四百年间之中国社会，譬之于水，其犹经百川竞流波澜壮阔以后，

乃汇为湖泊，恬波不扬。民族则由分展而趋统一；政治则革闾族而归独裁；学术则倦贡新而思竺旧。而迁之《史记》则作于其间。迁之先，既世为周史官，迁袭父谈业，为汉太史，其学盖有所受。迁之自言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太史公自序》）然而又曰：“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盖迁实欲建设一历史哲学，而借事实以为发明。故又引孔子之言以自况，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自序》）旧史官纪事实而无目的，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其怀抱深远之目的，而又忠勤于事实者，惟迁为兼之。迁书取材于《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其十表稽牒作谱，即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诸体虽非皆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此足征迁组织力之强，而文章技术之妙也。班固述刘向、杨雄之言，谓“迁有良史之才，善序事理。”（《汉书》本传赞）郑樵谓“自《春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通志·总序》）谅矣。其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故其书厕诸世界著作之林，其价值乃颇类布尔达克之《英雄传》。其年代略相先后（布尔达克后司马迁约二百年），其文章之佳妙同，其影响所被之广且远，亦略同也。后人或能讥弹迁书，然迁书固已皋牢百代，二千年来所谓正史者，莫能越其范围。岂后人创作力不逮古耶？抑迁有自其不朽者存也。

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也。《汉书·艺文志》以史书附于六艺略之春秋家，著录者仅四百二十五篇（其在迁前者，仅百九十

一篇)。及《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乃骤至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五卷，数百年间，加增四十倍。此迁以后史学开放之明效也。古者惟史官为能作史。私人作史，自孔子始，然孔子非史家，吾既言之矣。司马迁虽身为史官，而其书实为私撰。观其传授渊源，出自其外孙杨恽，斯可证也（看《汉书》恽传）。迁书出后，续者蜂起，见于本书者有褚少孙，见于《七略》者有冯商，见于《后汉书·班彪传注》及《史通》者，有刘向等十六人，见于《通志》者有贾逵。其人大率皆非史官也。班固虽尝为兰台令史，然其著《汉书》，实非以史官资格，故当时犹以私改史记构罪系狱焉（看《后汉书》本传）。至如鱼豢、孙益、王铨、王隐、习凿齿、华峤、陈寿、袁宏、范曄、何法盛、臧荣绪辈，则皆非史官（看《史通·正史篇》）。曷为古代必史官乃能作史，而汉以后则否耶？世官之制，至汉已革，前此史官专有之智识，今已渐为社会所公有，此其一也。文化工具日新，著写传钞收藏之法皆加便，史料容易搜集，此其二也。迁书既美善，引起学者研究兴味，社会靡然向风，此其三也。自兹以还，蔚为大国。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著。读《隋书·经籍志》及清丁国钧之《补晋书艺文志》可见也。故吾常谓晋代玄学之外，惟有史学，而我国史学界，亦以晋为全盛时代。

断代为史，始于班固。刘知几极推尊此体，谓“其包举一代，撰成一书，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史通·六家篇》）郑樵则极诋之，谓“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固为彪之子，不能传其业。……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格。……会通之道，自此失矣。”（《通志·总序》）此两种反对之批评，吾侪盖祖郑樵。樵从编纂义例上论断代之失，其言既已博深切明（看原文）。

然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夫史之为状，如流水然，抽刀断之，不可得断。今之治史者，强分为古代、中世、近世，犹苦不能得正当标准；而况可以一朝代之兴亡为之划分耶？史名而冠以朝代，是明告人以我之此书为某朝代之主人而作也。是故南朝不得不谓北为索虏，北朝不得不谓南为岛夷，王陵、诸葛诞、母丘俭之徒，著晋史者势不能不称为贼；而虽以私淑孔子自命维持名教之欧阳修，其《新五代史》开宗明义第一句，亦不能不对于积年剧盗朱温其人者，大书特书称为“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也。断代史之根本谬误在此，而今者官书二十四部，咸率循而莫敢立异，则班固作俑之力，其亦伟矣。

章学诚曰：“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后世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取。”又曰：“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矢。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文史通义·书教篇》）此言班书以下，作者皆陈陈相因，无复创作精神。其论至痛切矣。然今所谓二十四史者，其品之良秽亦至不齐。同在一体裁中，而价值自固有高下。前人比较评鹭之论既甚多，所评当否，当由读者自悬一标准以衡审之，故今不具论。惟有一明显之分野最当注意者：则唐以前书皆私撰而成于一人之手，唐以后书皆官撰而成于多人之手也。最有名之马、班、范、陈四史，皆出私撰，前已具陈。即沈约、萧子显、魏收之流，虽身为史官，奉敕编述，然其书什九独力所成。自唐太宗以后，而此风一变。太宗既以雄才大略削平天下，又以“右文”自命，思与学者争席。因欲自作陆

机、王羲之两传赞，乃命史臣别修《晋书》，书成而旧著十八家俱废，（看《史通·正史篇》）同时又敕撰梁、陈、齐、周、隋五书，皆大开史局，置员猥多，而以贵官领其事。自兹以往，习为成例。于是著作之业，等于奉公；编述之人，名实乖迕。例如房乔、魏征、刘昫、托克托、宋濂、张廷玉等，尸名为某史撰人，而实则于其书无与也。盖自唐以后，除李延寿《南史》、《北史》，欧阳修《新五代史》之外，其余诸史，皆在此种条件之下而成立者也。此种官撰、合撰之史，其最大流弊，则在著者无责任心。刘知几伤之曰：“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汗青无日。”又曰：“史官记注，取禀监修。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史通·忤时篇》）既无从负责，则群相率于不负责，此自然之数矣。坐此之故，则著者之个性湮灭，而其书无复精神。司马迁忍辱发愤，其目的乃在“成一家之言”。班、范诸贤，亦同斯志，故读其书而著者之思想品格皆见焉。欧阳修《新五代史》，其价值如何，虽评者异辞，要之固修之面目也。若隋、唐、宋、元、明诸史，则如聚群匠共画一壁，非复艺术，不过一绝无生命之粉本而已。坐此之故，并史家之技术亦无所得施。史料之别裁，史笔之运用，虽有名手，亦往往被牵掣而不能行其志，故愈晚出之史，卷帙愈增，而芜累亦愈甚也（《明史》不在此例）。万斯同有言：“治史者，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廛溷焉，继而知其蓄产礼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无不习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也。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耳。”（方苞撰《万季野墓表》）此言可谓博深切明。盖我国古代史学，因置史官而极发达，其近代史学，亦因置史官而渐衰敝。则史官之性质，今有以异于古所云也。

与纪传体并峙者为编年体。帐簿式之旧编年体，起原最古，

既如前述。其内容丰富而有组织之新编年体，旧说以为起于《左传》。虽然，以近世学者所考订，则左氏书原来之组织殆非如是。故论此体鼻祖，与其谓祖左氏，毋宁谓祖陆贾之《楚汉春秋》。惜贾书今佚，其真面目如何，不得确知也。汉献帝以《汉书》繁博难读，诏荀悦要删之；悦乃撰为《汉纪》三十卷，此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也。悦自述谓：“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以副本书。”又谓：“省约易习，无妨本书。”语其著作动机，不过节钞旧书耳。然结构既新，遂成创作。盖纪传体之长处，在内容繁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以纳入；其短处在事迹分隶凌乱，其年代又重复，势不可避刘知几所谓“同为一事，分为数篇，继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故贾谊与屈原同列，曹沫与荆轲并编。”（《史通·二体篇》）此皆其弊也。《汉纪》之作，以年系事，易人物本位为时际本位，学者便焉。悦之后，则有张璠、袁宏之《后汉纪》，孙盛之《魏春秋》，习凿齿之《汉晋春秋》，干宝、徐广之《晋纪》，裴子野之《宋略》，吴均之《齐春秋》，何之元之《梁典》……等。（现存者仅荀、袁二家）盖自班固以后，纪传体既断代为书，故自荀悦以后，编年体亦循其则。每易一姓，纪传家既为作一书，编年家复为作一纪，而皆系以朝代之名，断代施诸纪传，识者犹讥之，编年效颦，其益可以已矣。宋司马光毅然矫之，作《资治通鉴》以续《左传》。上纪战国，下终五代（西纪前四〇三至后九五九），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大事，按年纪载，一气衔接。光本邃于掌故（观所著《涑水纪闻》可见），其别裁之力又甚强（《通鉴考异》可见），其书断制有法度。胡三省注而序之曰：“温公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撻幽隐，荟萃为书。而修书分属，汉则刘歆，三国迄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皆天下选也，历十九年而成。”其所经纬规制，确为中古以降一大创作。

故至今传习之盛，与《史》、《汉》埒。后此朱熹因其书稍加点窜，作《通鉴纲目》，窃比孔氏之《春秋》，然终莫能夺也。光书既讫五代，后人纷纷踵而续之，卒未有能及光者。故吾国史界，称前后两司马焉。

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汉纪》而后，又见之于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编年体以年为经，以事为纬，使读者能了然于史迹之时际的关系，此其所长也。然史迹固有连续性，一事或亘数年或亘百数十年。编年体之纪述，无论若何巧妙，其本质总不能离帐簿式。读本年所纪之事，其原因在若干年前者，或已忘其来历；其结果在若干年后者，苦不能得其究竟。非直翻拾为劳，抑亦寡味矣。枢钞《通鉴》，以事为起讫；千六百余年之书，约之为二百三十有九事。其始亦不过感翻拾之苦痛，为自己研究此书谋一方便耳。及其既成，则于斯界别辟一蹊径焉。杨万里叙之曰：“肇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章学诚曰：“‘本末’之为体，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语此。……但即其成法，沈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文史通义·书教篇》）其论当矣。枢所述仅局于政治，其于社会他部分之事项多付阙如。其分目又仍涉琐碎，未极贯通之能事。然彼本以钞《通鉴》为职志，所述不容出《通鉴》外，则著书体例宜然。即提要钩元之功，亦愈后起而愈易致力，未可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苛责古人也。枢书出后，

明、清两代踵作颇多。然谨严精粹，亦未有能及枢者。

纪传体中有书志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然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既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追叙前代，则源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阙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其书“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李翰序文）此实史志著作之一进化也。其后元马端临仿之作《文献通考》，虽篇目较繁备，征引较杂博；然无别识，无通裁（章学诚《文史通义》评彼书语）仅便翻检而已。

有《通鉴》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正史断代之不便，矫正过半矣；然犹未尽也。梁武帝敕吴均等作《通史》，上自汉之太初，下终齐室。意欲破除朝代界限，直接迁书，厥意甚盛。但其书久佚，无从批评。刘知几讥其芜累，谓“使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史通·六家篇》）想或然也。宋郑樵生左、马千岁之后，奋高掌，迈远蹠，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其《自序》抨击班固以下断代之弊，语语皆中窍要。清章学诚益助樵张目，尝曰：“《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又曰：“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诸子之意，寓于史裁。”（《文史通义·释通篇》）其所以推奖者至矣。吾侪固深赞郑、章之论，认《通史》之修为不可以已，其于樵之别

裁精鉴，亦所心折。虽然，吾侪读《通志》一书，除《二十略》外，竟不能发见其有何等价值。意者仍所谓“宁习本书息窥新录”者耶？樵虽抱宏愿，然终是向司马迁圈中讨生活。松柏之下，其草不植，樵之失败，宜也。然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慧星焉。

右所述为旧目录家所指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之四体，皆于创作之人加以评鹭，而踵效者略焉。二千年来斯学进化轨迹，略可见矣。自余史部之书，《隋书·经籍志》分为杂史、霸史、起居注、故事、职官、杂传、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凡十一门。《史通·杂述篇》胪举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凡十种。此后累代著录，门类皆小异而大同。以吾观之，可中分为两大类：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第一类，并未尝经锤炼组织，不过为照例的或一时的之记录，备后世作者之搜采。其在官书，则如起居注、实录、谕旨、方略之类；如仪注、通礼、律例、会典之类。其在私著，则或专纪一地方，如赵歧《三辅决录》、潘岳《关中记》等；或在一地方中复专纪一事类，如陆机《建康宫殿记》、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杨孚《交州异物志》等；或专纪一时代，如陆贾《楚汉春秋》、王度《二石伪治时事》等；或在一时代中专纪一事，如《晋修复山陵故事》、《晋八王故事》等；有专纪一类人物者，如刘向《列女传》、皇甫谧《高士传》等；有纪人物复限于一地方或一年代者，如陈寿《益部耆旧传》，谢承《会稽先贤传》；袁敬仲《正始名士传》等；有专为一家或一人作传者，如江统之《江氏家传》、范汪之《范氏家传》、慧立之《慈恩法师传》等；或记载游历见闻，如郭象《述征记》、法显《佛国记》等；或采录异闻，作半小说体，如《山海经》、《穆天子传》、《飞燕外传》等；或拾遗

识小，聊供谈噱，如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等。凡此皆未尝以述作自居，惟取供述作者之资料而已（右所举例，皆取诸隋、唐两志，其书今存者希）。

其第二类，则搜集许多资料，经一番组织之后，确成一著述之体裁。但所叙者专属于某种事状，其性质为局部的，而与正史编年等含有普遍性质者殊科焉。此类之书，发达最早者为地方史，常璩之《华阳国志》，其标本也；其流衍为各省、府、州、县之方志。次则法制史，如《历代职官表》、《历代盐法志》等类。次则宗教或学术史，如《佛祖历代通载》、《明儒学案》等类。其余专明一义，如律历、金石、目录……等等，所在多有；然裒然可观者实稀。盖我国此类著述，发达尚幼稚也。

史籍既多，则注释考证，自然踵起。注释有二：一曰注训诂，如裴骃、徐野民等之于《史记》，应劭、如淳等之于《汉书》。二曰注事实，如裴松之之于《三国志》。前者于史迹无甚关系，后者则与本书相辅矣。考证者，所以审定史料之是否正确，实为史家求征信之要具。《隋书·经籍志》有刘宝之《汉书驳议》，姚察之《定汉书疑》，盖此类书之最古者。司马光既写定《通鉴》，即自为《考异》三十卷，亦著述家之好模范也。大抵考证之业，宋儒始引其绪，刘攽、洪迈辈之书，稍有可观。至清而大盛，其最著者如钱大昕之《廿二史考异》，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赵翼之《廿二史札记》。其他关于一书一篇一事之考证，往往析入毫芒，其作者不可倭指焉。

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史评有二：一，批评史迹者；二，批评史书者。批评史迹者，对于历史上所发生之事项而加以评论。盖《左传》、《史记》已发其端，后此各正史及通鉴皆因之。亦有泐为专篇者，如贾谊《过秦论》、陆机《辨亡论》之类是也。

宋、明以后，益尚浮议；于是有史论专书，如吕祖谦之《东莱博议》，张溥之《历代史论》等。其末流只以供帖括剿说之资，于史学无与焉。其较有价值者，为王夫之之《读通鉴论》、《宋论》。虽然，此类书无论若何警拔，总易导读者入于奋臆空谈一路，故善学者弗尚焉。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讎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知几之自述曰：“《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揆人伦。……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善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史通·自叙》）樵之自述曰：“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之言。……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之儒所不得而闻也。”又曰：“夫学术造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通志·总序》）学诚自述曰：“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志隅·自序》）又曰：“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与汪辉祖书》）又曰：“吾于史学，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家书》二）读此诸文，可以知三子者之所以自信为何如；又可知彼辈卓识，不见容于并时之流俗也。窃常论之，刘氏

事理缜密，识力锐敏。其勇于怀疑，勤于综核，王充以来，一人而已。其书中《疑古》、《惑经》诸篇，虽于孔子亦不曲徇，可谓最严正的批评态度也。章氏谓其所议仅及馆局纂修，斯固然也，然鉴别史料之法，刘氏言之最精，非郑、章所能逮也。郑氏之学，前段已略致评。章氏评之谓：“其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于诸史之规矩。”（《文史通义·释通篇》）又谓：“《通志》例有余，而质不足以副。”（《与邵二云书》）皆可谓知言。然刘、章惟有论史学之书，而未尝自著成一史；郑氏则既出所学以与吾人共见，而确信彼自有其不朽者存矣。章氏生刘、郑之后，较其短长以自出机杼，自更易为功。而彼于学术大原，实自有一种融会贯通之特别见地。故所论与近代西方之史家言多有冥契。惜其所躬自撰述者，仅限于方志数种，未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耳。要之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至其持论多有为吾侪所不敢苟同者，则时代使然，环境使然，未可以居今日而轻谤前辈也。

吾草此章将竟，对于与吾侪最接近之清代史学界，更当置数言：前清为一切学术复兴之时代，独于史界之著作，最为寂寥。唐、宋去今如彼其远，其文集杂著中所遗史迹，尚累累盈望。清则舍官书及谀墓文外，殆无余物可以相饷。史料之涸乏，未有如清者也。此其故不难察焉：试一检康、雍、乾三朝诸文字之狱，则知其所以箝吾先民之口而夺之气者，其凶悍为何如。其敢于有所论列而幸免于文网者，吾见全祖望一人而已。（看《鲒埼亭集》）窃位者壹意摧残文献以谋自固。今位则成闰矣，而已湮已乱之文献，终不可复，哀哉耗矣。虽然，士大夫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故压于此者伸于彼。史学之在清代，亦非无成绩之可言。

章学诚之卓犖千古，前既论之矣。此外关于史界，尚有数种部分的创作：其一，如顾祖禹之《谈史方輿纪要》，其书有组织，有断制，全书百三十卷一气呵成为一篇文字，以地理形势为经，而纬之以史迹，其善于驾驭史料盖前人所莫能逮。故魏禧称为“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也。其二，如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将全部《左传》拆碎，而自立门类以排比之。善用其法，则于一时代之史迹能深入而显出矣。其三，如黄宗羲之《明儒学案》，实为中国有学史之始。其书有宗旨，有条贯，异乎钞撮驳杂者。其四，如赵翼之《廿二史札记》，此书虽与钱大昕、王鸣盛之作齐名（见前），然性质有绝异处。钱、王皆为狭义的考证，赵则教吾侪以搜求抽象的史料之法。昔人言“属辞比事，《春秋》之教”，赵书盖最善于比事也。此法自宋洪迈《容斋随笔》渐解应用，至赵而其技益进焉。此四家者，皆卓然有所建树，足以自附于述作之林者也。其他又尚有数类书，在清代极为发达：一、表志之补续。自万斯同著《历代史表》后，继者接踵，各史表志之缺，殆已补缀无遗，且所补常有突过前作者。二、史文之考证。考证本为清代朴学家专门之业，初则仅用以治经，继乃并用以治史，此类之书有价值者毋虑百数十种。对于古籍，订讹纠缪，经此一番整理，为吾侪省无限精力。三、方志之重修。各省、府、州、县志，什九皆有新修本，董其事者皆一时名士，乃至如章学诚辈之所怀抱，皆借此小试焉。故地方史蔚然可观，为前代所无。四、年谱之流行。清儒为古代名人作年谱者甚多，大率皆精诣之作。章学诚所谓“一人之史而可以与家史国史一代之史相取证”者也。五、外史之研究。自魏源、徐松等喜谈边徼形事，渐引起研究蒙古史迹之兴味。洪钧之《元史释文证补》，知取材于域外，自此史家范围益扩大，渐含有世界性矣。凡此皆清代史学之成绩也。虽然，清儒所得自效于史

学界者而仅如是，固已为史学界之不幸矣。

我国史学根柢之深厚既如彼，故史部书之多亦实可惊。今刺取累代所著录之部数卷数如下：

《汉书·艺文志》	一一部	四二五篇
《隋书·经籍志》	八一七部	一三二六四卷
《旧唐书·经籍志》	八八四部	一七九四六卷
《宋史·艺文志》	二一四七部	四三一〇九卷
《通志·艺文略》	二三〇一部	三七六一三卷(图谱在外)
《文献通考·经籍考》	一〇三六部	二四〇九六卷
《明史·艺文志》	一三一六部	三〇〇五一卷(限于明代人著作)

人著作)

《清四库书目》 二一七四部 三七〇四九卷(存目合计)

右所著录者代代散佚。例如《隋志》之万三千余卷，今存者不过十之一二；《明志》之三万余卷，采入四库者亦不过十之一二，而现存之四库未收书及四库编定后续出之书，尚无虑数万卷。要而言之，自左丘、司马迁以后，史部书曾著竹帛者，最少亦应在十万卷以外。其质之良否如何，暂且勿问，至于其量之丰富，实足令吾侪拮据舌矣。此二千年来史学经过之大凡也。

注释

① 殷周史官人名见于古书者，如夏太史终古，殷内史向挚，见《吕览·先识》。周史佚，见《周书·世俘》、《左·僖十五》、《周语上》。史肩，见《文选注》引《六韬》。太史辛甲，见《左·襄四》、《晋语》、《韩非·说林》。太史周任，见《论语》、《左·隐六》。左史戎夫，见《周书》、《史记》。史角，见《吕览·当染》。史伯见《郑语》。内史过，见《左·庄三十二》、《周语上》。内史叔兴，见《左·僖十六、二十八》、《周语上》。内史叔服，见《左·文元》。太史儋，见《史记·老子传》。史大骏，见《庄子·则阳》。右吾杂举所记忆者如此，尚未备也。

各国史官可考者，鲁有太史，见《左·昭二》。郑有太史，见《左·昭元》。齐有太史、

南史，见《左·襄二十五》。楚有左史，见《左·昭十二》、《楚语上》。秦赵皆有御史，见《史记·廉蔺传》。薛有传史，见《史记·孟尝传》。其人名可考者，如魏有史嚭，见《晋语二》。晋有史赵、董狐，见《左·襄三十》。楚有倚相，见《左·昭十二》；有史皇，见《左·定四》。赵有史墨，见《左·昭二十九》。右亦杂举所记，恐尚有遗漏。

② 右所举史官诸名，大半皆应当时公卿之顾问，而古书述其语者。

③ 卫宏《汉仪注》云：“汉法，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其言信否，虽未敢断，然古制恐是如此，盖史官为保管文籍一重要机关也。

④ 埃及及米梭必达迷亚诸国古史迹，多由后人从各种遗物及杂记录中推寻而得，并非有正式一史书也。

⑤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六国表》云：“秦焚书，诸侯史记尤甚。”可知当时各国之史，受祸最烈。故汉兴后诗书百家语多存，而诸史则无一也。

⑥ 《竹书纪年》来历，别见第三章注十八。但今所传者非原书，盖出宋以后人杂糅窜补。清朱右曾别辑《汲冢纪年存真》二卷，今人王国维因之，更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卷，稍复本来面目。然所辑仅得四百二十八条，以较《晋书·束皙传》所云十三篇、《隋书·经籍志》所云十二卷，知其所散失者多矣。

⑦ 看今人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

⑧ 据汉人所传说，谓古代《书》有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纂之为百篇，遭秦而亡焉。汉兴，由伏生传出二十八篇，共三十三卷，即所谓《今文尚书》也。其后孔安国所传，复多十六篇，即所谓《古文尚书》也。《古文尚书》，出而复佚焉。此事为二千年学界一大公案。是否百篇外尚有书？孔子所删定是否确为百篇？孔安国之《古文尚书》为真为伪？皆属未决之问题。惟有一事则已决定者，今四库所收之《尚书》五十八卷，其中有二十五卷为东晋人所伪造，并非孔安国原本，此则经清儒阎若璩、惠栋辈所考证，久已定讞者也。今将真本二十八篇篇目列举如下（其在此目以外诸篇，万不容误认为史料而征引之也）：

尧典第一（今本舜典乃割原本尧典下半而成），皋陶谟第二（今本益稷乃割原本皋陶谟下半而成），禹贡第三，甘誓第四，汤誓第五，盘庚第六，高宗彤日第七，西伯戡黎第八，微子第九，牧誓第十，洪范第十一，金縢第十二，大诰第十三，康诰第十四，酒诰第十五，梓材第十六，召诰第十七，洛诰第十八，多士第十九，毋逸第二十，君奭第二十一，多方第二十二，立政第二十三，顾命第二十四（今本康王之诰乃割原本顾命下半而成），费誓第二十五，吕刑第二十六，文侯之命第二十七，秦誓第二十八。

⑨ 《汉书·艺文志》载《周书》七十一篇，原注云：“周史记”。颜师古注云：“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今四库所收有《逸周书》，七十一篇之目具在，文则佚其十篇，现存者为六十一篇，反多于唐时颜氏所见本矣。以吾度之，今最少应有十一篇为伪造者。其余诸篇，亦多窜乱；但某篇为真某篇为伪，未能确指，俟他日当为考证。然此书中

一大部分为古代极有价值之史料，则可断言也。

⑩ 《汉书·艺文志》著录《世本》十五篇。原注云：“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汉书·司马迁传》、《后汉书·班彪传》皆言“司马迁删据《世本》等书作《史记》”。今据《世本》篇目以校迁书，可以知其渊源所自矣。原书宋郑樵、王应麟尚及见，其佚当在宋元之交。清钱大昭、孙冯翼、洪怡孙、秦嘉谟、茆泮林、张澍各有辑本，茆、张二家较精审。

第三章 史之改造

吾生平有屡受窘者一事，每遇青年学子叩吾以治国史宜读何书，辄沈吟久之而卒不能对。试思吾舍“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等书外，更何术以应此问？然在今日百学待治之世界，而读此浩瀚古籍，是否为青年男女日力之所许，姑且勿论。尤当问费此莫大之日力，其所得者究能几？吾侪欲知吾祖宗所作事业，是否求之于此而已足？岂惟仅此不足，恐虽遍读隋、唐《志》、《明史》……等所著录之十数万卷，犹之不足也。夫旧史既不可得遍读，即遍读之亦不能养吾欲而给吾求，则惟有相率于不读而已。信如是也，吾恐不及十年而中国史学将完全被驱出于学问圈外。夫使一国国民而可以无需国史的智识，夫复何言。而不然者，则史之改造，真目前至急迫之一问题矣。

吾前尝言，著书须问将以供何等人之读，今请申言此义：古代之史，是否以供人读，盖属疑问。观孔子欲得诸国史，求之甚艰，而魏史乃瘞诸汲冢中，虽不敢谓其必禁传读，要之其目的在珍袭于秘府，而不在广布于公众，殆可断言。后世每朝之史，必易代而始布，故吾侪在今日，尚无清史可读，此尤旧史半带秘密性之一证也。私家之史，自是为供读而作，然其心目中之读者，各各不同，“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盖以供当时贵族中为人臣子者之读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其主目的以供帝王之读，其副目的以供大小臣僚之读，则吾既言之矣。司马迁《史记》，自言“藏诸名山，传与其人”，盖将以供后世少数学者之读也。自

余诸史目的略同，大率其读者皆求诸禄仕之家与好古绩学专门之士。夫著作家必针对读者以求获其所希望之效果，故缘读者不同，而书之精神及其内容组织亦随而不同，理固然也。读者在禄仕之家，则其书宜为专制帝王养成忠顺之臣民；读者在绩学专门之士，则其书不妨浩瀚杂博奥衍，以待彼之徐整理而自索解。而在此两种读者中，其对于人生日用饮食之常识的史迹，殊非其所渴需；而一般民众自发自进的事业，或反为其所厌忌。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此类之史，在前代或为其所甚需要。非此无以保社会之结合均衡，而吾族或早已溃灭。虽然，此种需要，在今日早已过去，而保存之则惟增其毒。在今日惟个性圆满发达之民，自进而为种族上、地域上、职业上之团结互助，夫然后可以生存于世界而求其所贡献。而历史其物，即以养成人类此种性习为职志。今之史家，常常念吾书之读者与彼迁《记》、光《鉴》之读者绝不同伦，而矢忠覃精以善为之地焉，其庶可以告无罪于天下也。

复次，历史为死人——古人而作耶？为生人——今人或后人而作耶？据吾侪所见，此盖不成问题，得直答曰为生人耳。然而旧史家殊不尔尔。彼盖什九为死人作也！史官之初起，实由古代人主欲纪其盛德大业以昭示子孙，故纪事以宫廷为中心，而主旨在隐恶扬善。观《春秋》所因鲁史之文而可知也。其有良史，则善恶毕书，于是褒贬成为史家特权。然无论为褒为贬，而立言皆以对死人则一也。后世奖厉虚荣之途术益多，墓志、家传之类，汗牛充栋，其目的不外为子孙者欲表扬其已死之祖父，而最后荣辱，一系于史。驯至帝者以此为驾驭臣僚之一利器。试观明、清以来

饰终之典，以“宣付史馆立传”为莫大恩荣，至今犹然，则史之作用可推矣。故如魏收市佳传以骄侪辈，袁枢谢曲笔以忤乡人（看《北史》收传，《宋史》枢传）。贤否虽殊，而壹皆以陈死人为鹄。后人评史良秽，亦大率以其书对于死人之态度是否公明以为断。乃至如各史及各省、府、县志，对于忠义节孝之搜访，惟恐不备。凡此皆求有以对死者也。此类观念，其在国民道德上有何等关系，自属别问题。若就史言史，费天地间无限缣素，乃为千百年前已朽之骨校短量长，果何为者？夫史迹为人类所造，吾侪诚不能于人外求史。然所谓“历史的人格者”，别自有其意义与其条件（此意义与条件，当于第七章说明之）。史家之职，惟在认取此“人格者”与其周遭情状之相互因果关系而加以说明。若夫一个个过去之古人，其位置不过与一幅之画，一座之建筑物相等。只能以彼供史之利用，而不容以史供其利用，抑甚明矣。是故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

复次，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也。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精密，前此本为某学附庸，而今则蔚然成一独立科学者，比比然矣。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各科次第析出，例如天文、历法、官制、典礼、乐律、刑法等，畴昔认为史中重要部分，其后则渐渐与史分离矣。今之旧史，实以年代记及人物传之两种原素糅合而成。然衡以严格的理论，则此两种者实应别为两小专科，曰“年代学”，曰“人谱学”——即“人名辞典学”，而皆可谓在史学范围以外。若是乎，则前表所列若干万卷之史部书，乃无一部得复称为史。若是乎，畴昔史学硕大无朋之领土，至是乃如一老大帝国，逐渐瓦解而无复余。故近代学者，或昌言史学无独立成一科学之资格，论虽过当，不为无见也。虽然，今之史学，

则既已获有新领土。而此所谓新领土，实乃在旧领土上而行使新主权。例如天文，自《史记·天官书》迄《明史·天文志》，皆以星座躔度等记载，充满篇幅。此属于天文学范围，不宜以入历史固也。虽然，就他方面言之，我国人何时发明中星，何时发明置闰，何时发明岁差，乃至恒星行星之辨别，盖天、浑天之论争，黄道、赤道之推步，……等等，此正吾国民继续努力之结果，其活动状态之表示，则历史范围以内之事也。是故天文学为一事，天文学史又为一事。例如音乐，各史《律历志》及《乐书》、《乐志》详述五声十二律之度数，郊祀、饒歌之曲辞，此当委诸音乐家之专门研究者也。至于汉、晋间古雅乐之如何传授，如何废绝，六朝南部俚乐之如何兴起，隋、唐间羌、胡之乐谱、乐器如何输入，来自何处，元、明间之近代的剧曲如何发展，此正乃历史范围以内之事也。是故音乐学为一事，音乐史又为一事。推诸百科，莫不皆然。研究中国哲学之内容组织，哲学家所有事也；述哲学思想之渊源及其相互影响，递代变迁，与夫所产之结果，史家所有事也。研究中国之药剂证治，医家所有事也；述各时代医学之发明及进步，史家所有事也。对于一战争，研究其地形、厄塞、机谋、进止，以察其胜负之由，兵家所有事也；综合古今战役而观兵器、战术之改良进步，对于关系重大之诸役，寻其起因，而推论其及于社会之影响，史家所有事也。各列传中，记各人之籍贯、门第、传统等等，谱牒家所有事也；其嘉言懿行，摭之以资矜式，教育家所有事也；观一时代多数人活动之总趋向，与夫该时代代表的人物之事业动机及其反响，史家所有事也。由此言之，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乃至前此亘古未入版图之事项——例如吾前章

所举隋唐佛教、元明小说等，悉吞纳焉以扩吾疆宇，无所让也。旧史家惟不明此区别，故所记述往往侵入各专门科学之界限，对于该学，终亦语焉不详，而史文已繁重芜杂而不可殚读。不宁惟是，驰骛于此等史外的记述，则将本范围内应负之职责而遗却之，徒使学者读破万卷，而所欲得之智识，仍茫如捕风。今之作史者，先明乎此，庶可以量精力于史之外，而善用之于史之内矣。

复次，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而俱伤。惟史不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孔子所修《春秋》，今日传世最古之史书也。宋儒谓其“寓褒贬，别善恶”；汉儒谓其“微言大义，拨乱反正”，两说孰当，且勿深论，要之，孔子作《春秋》，别有目的，而所记史事，不过借作手段，此无可疑也。坐是之故，《春秋》在他方面有何等价值，此属别问题，若作史而宗之，则乖莫甚焉。例如二百四十年中，鲁君之见弑者四（隐公、闵公、子般、子恶），见逐者一（昭公），见戕于外者一（桓公），而《春秋》不见其文，孔子之徒，犹云“鲁之君臣未尝相弑”（《礼记》明堂位文）。又如狄灭卫，此何等大事，因掩齐桓公之耻，则削而不书（看闵二年《谷梁传》“狄灭卫”条下）。晋侯传见周天子，此何等大变，因不愿暴晋文公之恶，则书而变其文（看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条下《左传》及《公羊传》）。诸如此类，徒以有“为亲贤讳”之一主

观的目的，遂不惜颠倒事实以就之。又如《春秋》记杞伯姬事前后凡十余条，以全部不满万七千字之书，安能为一妇人去分尔许篇幅，则亦曰借以奖厉贞节而已。其他记载之不实、不尽、不均，类此者尚难悉数。故汉代今文经师谓《春秋》乃经而非史，吾侪不得不宗信之。盖《春秋》而果为史者，则岂惟如王安石所讥“断烂朝报”，恐其秽乃不减魏收矣。顾最不可解者，孔叟既有尔许微言大义，何妨别著一书，而必淆乱历史上事实以惑后人，而其义亦随之而晦也。自尔以后，陈陈相因，其宗法孔子愈笃者，其毒亦愈甚，致令吾侪常有“信书不如无书”之叹。如欧阳修之《新五代史》，朱熹之《通鉴纲目》，其代表也。郑樵之言曰：“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章，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通志·总序》）此言可谓痛切。夫史之性质，与其他学术有异，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当如格林威尔所云“画我须是我”。当如医者之解剖，奏刀砉砉，而无所谓恻隐之念扰我心曲也。乃至对本民族偏好溢美之辞，亦当力戒。良史固所以促国民之自觉，然真自觉者决不自欺，欲以自觉觉人者，尤不宜相蒙。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

复次，吾前言人类活动相而注重其情态。夫摹体尚易，描态实难。态也者，从时间方面论，则过而不留，后刹那之态方呈，前刹那之态已失。从空间方面论，则凡人作一态，实其全身心理、

生理的各部分协同动作之结果，且又与环境为缘；若仅为局部的观察，睹其一而遗其他，则真态终未由见。试任取一人而描其一日之态，犹觉甚难，而况史也者，积千万年间千千万万生死相续之人，欲观其继续不断之全体协同动作，兹事抑谈何容易！史迹既非可由冥想虚构，则不能不取资于旧史，然旧史所能为吾资者，乃如儿童用残之旧课本，原本已编辑不精，讹夺满纸，而复东缺一页，西缺数行，油污墨渍，存字无几。又如电影破片，若干段已完全失却，前后不相衔接，其存者亦罅漏模糊，不甚可辨。昔顾炎武论春秋、战国两时代风尚之剧变，而深致叹息于中间百三十三年史文之阙佚（《日知录》卷十三）。夫史文阙佚，虽仅此百三十三年，而史迹之湮亡，则其数量云胡可算？盖一切史迹，大半藉旧史而获传，然旧史著作之目的，与吾侪今日所需求者多不相应。吾侪所认为极可宝贵之史料，其为旧史所摈弃而遂湮没以终古者，实不知凡几。吾侪今日，乃如欲研究一燹余之芜城废殿，从瓦砾堆中搜集断椽破甍，东拼西补，以推测其本来规制之为何若。此种事业，备极艰辛，犹且仅一部分有成功希望，一部分或竟无成功希望。又不惟残缺之部分为然耳，即向来公认为完全美备之史料——例如正史——试以科学的眼光严密审查，则其中误者、伪者又不知凡几。吾侪今日对于此等史迹，殆有一大部分须为之重新估价，而不然者，则吾史乃立于虚幻的基础之上，而一切研索推论，皆为枉费。此种事业，其艰辛亦与前等，而所得或且更微末。以上两种劳作，一曰搜补的劳作，二曰考证的劳作，皆可谓极不经济的——劳多而获少的。虽然，当知近百年来欧洲史学所以革新，纯由此等劳作导其先路。吾国史苟不经过此一番爬剔洗炼，则完善之作，终不可期。今宜专有人焉胼手胝足，以耕以耨，以待后人之获。一部分人出莫大之劳费以为代价，然后

他部分人之劳费乃可以永节省，此吾侪今日应有之觉悟也。此两种劳作之下手方法，皆于第五章专论之，今不先赘。

复次，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单辞，不相联属。恰如下等动物，寸寸断之，各自成体。此固由当时文字传写困难，不得不然，抑亦思想简单，未加组织之明证也。此例求诸古籍中，如《老子》，如《论语》，如《易传》，如《墨经》，莫不皆然。其在史部，则《春秋》、《世本》、《竹书纪年》，皆其类也。厥后《左传》、《史记》等书，常有长篇记载，篇中首尾完具，视昔大进矣。然而以全书论，仍不过百数十篇之文章汇成一帙而已。《汉书》以下各史，踵效《史记》，《汉纪》、《通鉴》等踵效《左传》，或以一人为起讫，或以一事为起讫，要之不免将史迹纵切横断。“纪事本末体”稍矫此弊，然亦仅以一事为起讫，事与事之间不生联络，且社会活动状态，原不仅在区区数件大事，纪事纵极精善，犹是得肉遗血，得骨遗髓也。吾不尝言历史为过去人类活动之再现耶？夫活动而过去，则动物久已消灭。曷为能使之再现，非极巧妙之技术不为功也。故真史当如电影片，其本质为无数单片，人物逼真，配景完整，而复前张后张紧密衔接，成为一轴；然后射以电光，显其活态。夫舍单张外固无轴也，然轴之为物，却自成一有组织的个体，而单张不过为其成分。若任意抽取数片，全没却其相互之动相，木然只影，粘著布端，观者将却走矣。惟史亦然，人类活动状态，其性质为整个的，为成套的，为有生命的，为有机能的，为有方向的，故事实之叙录与考证，不过以树史之躯干，而非能尽史之神理。善为史者之取事实也，横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与其交光，然后甲事实与乙事实之关系明，而成套的不至变为断幅。是故不能仅以叙述毕乃事，必也有说明焉，有推论焉。所叙事项虽千差万别，而各有其凑筭之处。书虽累百万言，而筋摇脉注，如一结

构精悍之短札也。夫如是，庶可以语于今日之史矣。而惜久求诸我国旧史界，竟不可得，即欧美近代著作之林，亦不数数觐也。

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此种事业，与其责望诸史学家，毋宁责望诸各该专门学者。而凡治各专门学之人，亦须有两种觉悟：其一，当思人类无论何种文明，皆须求根抵于历史。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未由明了。其二，当知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工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之专门家分担责任。此吾对于专门史前途之希望也。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而整个的文化，始得而理会也。是故此种事业，又当与各种专门学异其范围，而由史学专门家任之。昔自刘知几以迄万斯同，皆极言众手修史之弊，郑樵、章学诚尤矢志向上，以“成一家之言”为鹄；是皆然矣。虽然，生今日极复杂之社会，而欲恃一手一足之烈，供给国人以历史的全部智识，虽才什左、马，识佰郑、章，而其事终不可以致。然则当如之何？曰，惟有联合国内有史学兴味之学者，各因其性之所嗜与力之所及，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悬一公趋之目的与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如是，则数年之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或可望出现。善乎黄宗羲之言曰：“此非末学一人之事也。”（《明儒学案·发凡》语）

第四章 说史料

治玄学者与治神学者或无须资料，因其所致力者在冥想，在直觉，在信仰，不必以客观公认之事实为重也。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其研究对象。而其资料愈简单愈固定者，则其科学之成立也愈易，愈反是则愈难。天文学所研究之对象，其与吾侪距离可谓最远，然而斯学之成为科学最早，且已决定之问题最多者，何也？其对象之为物较简单，且以吾侪渺小短促之生命与彼相衡，则彼殆可指为恒存而不坏。治此学者，第一无资料挂漏之患，第二无资料散失之患，故成功最易焉。次如地质学、地文学等，其资料虽趋复杂，然比较的含固定性质，研究亦较易。次如生物学等，蕃变之态益甚，资料之选择与保存渐难矣。又如心理学等，其资料虽俯拾即是，无所谓散失与不散失，然而无具体的物象可指，且其态稍纵即逝，非有极强敏之观察力不能提取，故学者以为难焉。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极易。固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即随而湮沉。而证据散失之途径甚多：或由有意隐匿，例如清廷之自改实录（详第五章）。或由有意蹂躏，例如秦之烧列国史记。或由一新著作出，而所据之旧资料

遂为淹没，例如唐修《晋书》成，而旧史十八家俱废。或经一次丧乱，而大部分史籍悉沦没，如牛弘所论“书有五厄”也。或孤本孤证散在人间，偶不注意，即便散亡，斯则为例甚多，不可确举矣。要而言之，往古来今之史料，殆如江浪淘沙，滔滔代逝。盖幸存至今者，殆不逮吾侪所需求之百一也。其幸而存者，又散在各种遗器、遗籍中，东鳞西爪，不易寻觅；即偶寻得一二，而孤证不足以成说，非荟萃而比观不可，则或费莫大之勤劳而无所获。其普通公认之史料，又或误或伪，非经别裁审定，不堪引用。又斯学所函范围太广，各种观察点不同，虽有极佳良现存之史料，苟求之不以其道，或竟熟视无睹也。合以上诸种原因，故史学较诸他种科学，其搜集资料与选择资料，实最劳而最难。史学成就独晚，职此之由。

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识所同认也。虽然，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例如中日甲午战役，去今三十年也。然吾侪欲求一满意之史料，求诸记载而不可得，求诸耆献而不可得，作史者欲为一翔实透辟之叙述，如《通鉴》中赤壁、淝水两役之比，抑已非易易。例如二十年前，“制钱”为国家唯一之法币。“山西票号”管握全国之金融，今则此两名辞久已逸出吾侪记忆线以外，举国人能道其陈迹者，殆不多觐也。一二事如此，他事则亦皆然；现代且然，而远古更无论矣。

孔子有言：“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不治史学，不知文献之可贵，与夫文献散失之可为痛惜也。距今约七十年前，美国人有彭加罗夫（H. H. Bancroft）者，欲著一《加里佛尼省志》，竭毕生之力，倾其极富之家资，誓将一切有关系之史料搜辑完备，然后从事。凡一切文件，自官府公牒，下至各公司各家

庭之案卷帐簿，愿售者不惜重价购之，不愿售者展转借钞之。复分队派员询问故老，搜其口碑传说。其书中人物有尚生存者，彼用种种方法巧取其谈话及其经历。如是者若干年，所丛集之资料盈十室。彼乃随时将其所得者为科学分类，先制成“长编式”之史稿，最后乃进而从事于真著述。若以严格的史学论，则采集史料之法，必如此方为合理。虽然，欲作一旧邦之史，安能以新造之加里佛尼省为比例？且此种“美国风”的搜集法，原亦非他方人所能学步。故吾侪今日之于史料，只能以抱残守缺自甘。惟既矢志忠实于史，则在此残缺范围内，当竭吾力所能逮，以求备求确，斯今日史学之出发点也。吾故于此章探索史料之所在，且言其求得之之途径，资省览焉。

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

（一）在文字记录以外者：此项史料之性质，可略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实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

（甲）现存之实迹及口碑：此所谓实迹，指其全部现存者，质言之，则现代史迹——现在日日所发生之事实，其中有构成史料价值者之一部分也。吾侪居常慨叹于过去史料之散亡，当知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吾侪今日不能将其耳闻目见之史实，搜辑保存，得毋反欲以现代之信史，责望诸吾子孙耶？所谓现在日日发生之事实，有构成史料之价值者何耶？例如本年之事，若粤桂川湘鄂之战争，若山东问题日本之提出交涉与我之拒绝，若各省议会选举之丑态，若京津间中交银行挤兑风潮，若上海商教联合会之活动，……等。凡此等事，皆有其来因去果，将来在史上确能占有相当之篇幅，其资料皆琅琅在吾目前，吾辈不速为收拾以贻诸方来，而徒日日歔歔，望古遥集，奚为也？其渐渐已成陈迹者，

例如三年前学界之五四运动，如四年前之张勋复辟，如六年前洪宪盗国，如十年前之辛亥革命，如二十年前之戊戌政变、拳匪构难，如二十五年前之甲午战役，……等等，躬亲其役或目睹其事之人，犹有存者。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司马迁作史，多用此法。如云：“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淮阴侯列传赞》）如云：“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无足采者。”（《游侠列传赞》）凡此皆用现存之实迹或口碑为史料之例也。

（乙）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前项所论，为实迹之全部，盖并其能活动之人与所活动之相皆具焉。本条所谓实迹者，其人与相皆不可得见矣；所留者，仅活动制成品之一种委蜕而已。求诸西洋，例如埃及之金字塔及塔中所藏物，得此而五六千年前之情状，略可见焉；如意大利之三四名都，文艺复兴时代遗物，触目皆是，此普遍实迹之传留者也。例如入埃汾河之索士比亚遗宅，则此诗圣之环境及其性行，宛然在望。登费城之议事堂，则美十三州制宪情状凑会心目。此局部实迹之传留者也。凡此者苟有一焉，皆为史家鸿宝。我国人保存古物之念甚薄，故此类实迹能全者日稀，然亦非绝无。试略举其例：如万里长城一部分为秦时遗物，众所共见也。如始皇所开驰道，参合诸书，尚能察其路线，而二千年来官驿之一部分，多因其旧。如汉通西域之南北两道，虽中间一段沦于沙漠，而其沿袭至今者十尚六七。凡此之类，殆皆非人力所能湮废，而史家永世之宝也。又如今之北京城，其大部分为明永乐四年至十八年（西一四〇六至一四二〇）间所造，诸城堞宫殿乃至天坛、社稷坛等，皆其遗构。十五世纪之都会，其规模如此其宏壮，而又大段完整以传至今者，全世界实无此比。此外各地方之城市，年代更古者尚多焉。又如北京彰仪门外之天宁寺塔，实隋开皇时物，观此可以知六世纪末吾国之建筑术为何如。如山

西大同云冈石窟之佛像，为北魏太安迄太和间所造，（西四五五至四九九）种类繁多，雕镂精绝。观此可以知五世纪时中国雕刻美术之成绩，及其与印度希腊艺术之关系。以之与龙门诸造像对照，当时佛教信仰之状况，亦略可概见^①。如北京旧钦天监之元代观象仪器及地图等，观之可以见十六世纪中国科学之一斑也^②。昔司马迁作《孔子世家》，自言：“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焉。”作史者能多求根据于此等目睹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其实此等史料，俯拾即是。吾不必侈语远者大者，请举吾乡一小事为例：吾乡一古屋，明中叶吾祖初迁时所建，累蟻壳为墙，墙厚二尺余，结构致密，乃胜砖甃，至今族之宗嫡居焉。即此亦可见十五六世纪时南部濒海乡村之建筑，与其聚族袭产之规则。此宁非一绝好史料耶？夫国中实迹存留若此类者何限！惜旧史家除朝廷典章制度及其圣贤豪杰言论行事外不认为史，则此等史料，弃置不顾，宜也。今之治史者，能一改其眼光，知此类遗迹之可贵，而分类调查搜积之，然后用比较统计的方法编成抽象的史料，则史之面目一新矣。

（丙）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此为可遇而不可求之事，苟获其一，则裨益于史乃无量。其最显著之例，如六十年前意大利拿波里附近所发见之邦津古城，盖罗马共和时代为火山流焰所盖者，距今垂二千年矣。自此城发现后，意人发掘热骤盛，罗马城中续得之遗迹，相继不绝，而罗马古史乃起一革命，旧史谬误，匡正什九。此种意外史料，他国罕闻。惟我国当民国八年，曾在直隶巨鹿县发见一古城，实宋大观二年（西一一〇八）被黄河淹没者，距今垂九百年矣。惜乎国无政，而民无学，一任遗迹散失破坏以尽，所留以资益吾侪者甚希。苟其能全部保存，而加以科学的整理，则吾侪最少可以对于宋代生活状况得一明确印象，

宁非快事^③？然吾因此忽涉遐想，以为数千年来河患如彼其剧，沿旧河两岸城邑，如巨鹿之罹厄者或不只一次，不止一处，颇冀他日再有发现焉。若果尔者，望国人稍加注意，毋任其如今度之狼藉也。

(丁)原物之宝存或再现者：古器物为史料之一部分，尽人所能知也。器物之性质，有能再现者，有不能再现者。其不能再现者，例如绘画、绣织及一般衣服器具等，非继续珍重收藏，不能保存。在古代未有公众博物院时，大抵宫廷享祚久长贵族阅阅不替之国，恒能护传此等故物之一部分。若如中国之惯经革命且绝无故家遗族者，虽有存焉寡矣。今存画最古者极于唐，然已无一帧焉能确辨其真贋。壁画如岱庙所涂，号称唐制，实难征信。惟最近发见之高昌一壁，称绝调矣^④。纸绢之画及刻丝画，上溯七八百年前之宋代而止。至衣服及其他寻常用具，则清乾嘉遗物，已极希见，更无论远昔也。故此类史料，在我国可谓极贫乏焉。其能再现者，则如金石陶甌之属，可以经数千年瘞土中，复出而供吾侪之研索。试举其类：一、曰殷周间礼器：汉许慎《说文·序》言“郡国往往于山川间得鼎彝”，是当时学者中，已有重视之者，而搜集研究，曾无闻焉。至宋代始启端绪，寻亦中绝^⑤。至清中叶以后而极盛。据诸家所有文字款识之器，宋代著录者六百四十三，清代著录者二千六百三十五，而内府所藏尚不与焉^⑥。此类之器，除所镌文字足补史缺者甚多，当于次条别论外，吾侪观其数量之多，可以想见当时社会崇尚此物之程度；观其种类之异，可以想见当时他种器物之配置；观其质相之纯固，可以想见当时铸冶术之精良；观其花纹之复杂优美，图案之新奇渊雅，可以想见当时审美观念之发达。凡此皆大有造于史学者也。二、曰兵器：最古者如殷周时之瑯戈矢鏃等，最近者如汉、晋间弩机等。三、

曰度量衡器：如秦权、秦量、汉建初尺、新莽始建国尺、晋前尺、汉量、汉钟、汉钁、汉斛等，制度之沿革可考焉。四、曰符玺：上自秦虎符，下迄唐、宋鱼符，又秦、汉间玺印封泥之属，出土者千数，于研究当时兵制官制，多所补助。五、曰镜属：自秦、汉至元、明，比其年代，观其款识，可以寻美术思想发展之迹。六、曰货币：上溯周末列国，下迄晚清，条贯而絜校之，盖与各时代之经济状况息息相关也。此六者皆铜器之属，此外铜制杂器存者尚多，不备举。铜在诸金属中，比较的能耐久，而冶铸之起原亦较古，故此类史料之供给，称丰富焉。然金属器一毁即亡，故失亦甚易，观宋器今存者百不一二，可推知也。清潘祖荫谓古代金属器，在秦、后汉、隋、后周、宋、金，曾经六厄，而随时沈霾毁弃，盗铸改为者，尚不与焉^⑦。晚近交通大开，国内既无专院以事搜藏，而胡贾恒以大力负之以走，凡百古物，皆次第大去其国。昔之丰富者，今转涸竭，又不独铜器为然矣。七、曰玉石：古玉镌文字者少，故难考其年代，然汉以前物传至今者确不乏，以难毁故也。吾侪研究古玉，亦可以起种种联想：例如观其雕纹之美，可知其攻玉之必有利器；观其流行之盛，可推见古代与产玉区域交通之密。此皆足资史料者也。至石刻研究，则久已成专门之学。自歧阳石鼓，李斯刻石，以迄近代，聚其搨片，可汗百牛。其文字内容之足裨史料者几何，下条论之，兹不先赘。至如观所刻儒佛两教所刻之石经，可以想见古人气力之雄伟，且可比较两教在社会上所凭藉焉^⑧。又如观汉代各种石刻画像，循溯而下，以至魏齐造像、唐昭陵石马、宋灵岩罗汉、明碧云刻楠、清圆明雕柱等，比较研究，不啻一部美术变迁史矣^⑨。又如桥柱井栏石阙地剝等类，或可以睹异制，或可以窥殊俗，无一非史家取材之资也。八、曰陶瓷：吾国以制瓷擅天下，外人至以吾国名

名斯物。今存器孔多，派别尤众，治者别有专家，不复具论。陶器比来出土愈富，间有碎片，范以极奇古之文字，流传当出三代上。综此两物，以观其递嬗趋良之迹，亦我民族艺术的活动之一表征也。九、曰瓦砖：我族以宅居大平原之故，石材缺乏，则以人造之砖瓦为建筑主要品，故斯物发达最早，且呈种种之进步。今之瓦当砖甃，殆成考古一专科矣。十、曰地层中之石器：兹事在中国旧骨董家，曾未留意，晚近地质学渐昌，始稍有从事者。他日研究进步，则有史以前之生活状态，可以推见也^⑩。器物本人类活动结果中之一小部分，且其性质已纯为固定的，而古代子遗之物，又不过此小部分之断片耳，故以上所举各项，在史料中不过占次等位置。或对于其价值故为夸大，吾无取焉。虽然，善为史者，固可以举其所闻所见无一而非史料，岂其于此可宝之故物而遗之？惟史学家所以与骨董家异者，骨董家之研究，贵分析的而深入乎该物之中；史学家之研究，贵概括的而横通乎该物之外。吾前所论列，已略示其端倪。若循此而进焉，例如当其研究铜器也，则思古代之中国人何以特精范铜，而不能如希腊人之琢石；当其研究瓷器也，则思中古之中国人何以能独擅窑窰，而不能如南欧人之制玻璃。凡此之类，在在归纳诸国民活动状况中，悉心以察其因果，则一切死资料皆变为活资料矣。凡百皆然，而古物其一端耳。

（戊）实物之模型及图影：实物之以原形原质传留至今者，最上也。然而非可多观。有取其形范以图之，而图范获传于今，抑其次也。例如汉、晋之屋舍、灶醴、杵臼，唐人之服装、髻形、乐器及戏剧面具，今日何由得见？然而有殉葬之陶制明器，殊形诡类至夥，若能得一标准以定其年代，则其时社会状况，仿佛可见也。又如唐画中之屋宇服装器物及画中之仪态，必为唐时现

状或更古于唐者，宋画必为宋时现状或更古于宋者，吾侪无论得见其本或摹本，苟能用特殊的观察，恒必有若干稀奇史料可以发见。则亦等于间接的目睹矣。夫著作家无论若何淹博，安能尽见其所欲见之物？从影印本中间接复间接以观其概，亦慰情胜无也已。

(二)文字记录的史料：前项所论记录以外的史料，时间空间皆受限制。欲作数千年之史，而记述又亘于社会之全部，其必不能不乞灵于记录明矣。然记录之种类亦甚繁，今当分别论列之。

(甲)旧史：旧史专以记载史事为职志，吾侪应认为正当之史料，自无待言。虽然，等是旧史也，因著作年代、著作者之性格学识、所著书之宗旨体例等种种差别，而其所含史料之价值亦随而不同。例如《晋书》所以不脛人望者，以其修史年代与本史相隔太远，而又官局公修，无人负责也。《魏书》所以不脛人望者，以魏收之人格太恶劣，常以曲笔乱事实也。《元史》所以不脛人望者，以纂修太草率，而董其事者又不通蒙古语言文字也。《新五代史》自负甚高，而识者轻之，以其本属文人弄笔，而又附加以“因文见道”之目的，而史迹乃反非其所甚厝意也。此仅举正史数部以为例，其余编年、别史、杂史等皆然，持此义以评衡诸史，则价值标准，其亦什得四五矣。

人物本位之史，既非吾侪所尚，然则诸史中列传之价值不锐减耶？是又不然。列传之价值，不在其为史而在其为史料。苟史中而非有“各色人等”之列传者，则吾侪读史者将惟见各时代中常有若干半人半兽之武夫出没起伏，聚众相斫，中间点缀以若干篇涂民耳目之诏令奏议，史之为史，如是而已。所谓社会，所谓文化，何丝毫之能睹？旧史之作列传，其本意固非欲以纪社会纪文化也，然人总不能不生活于社会环境之中，既叙人则不能不涉

笔以叙及其环境，而吾侪所最渴需之史料，求诸其正笔而不得者，求诸其涉笔而往往得之。此列传之所以为可贵也。

既如是也，则对于旧事之评价，又当一变。即以前所评四书言之：例如《晋书》，自刘知几以下共讥其杂采小说，体例不纯。吾侪视之，则何伤者？使各史而皆如陈寿之《三国志》，字字精严，笔笔锤炼，则苟无裴松之之注，吾侪将失去许多史料矣。例如《魏书》，其秽固也。虽然，一个古人之贞邪贪廉等，虽纪载失实，于我辈何与，于史又何与？只求魏收能将当时社会上大小情态多附其书以传，则吾所责望于彼者已足，他可勿问也。例如《元史》，猥杂极矣，其中半录官牒，鄙俚一仍原文，然以较《北周书》之“行文必《尚书》，出语皆《左传》”，孰为真面目，孰为可据之史料？则吾毋宁取《元史》也。是故吾侪若以旧史作史读，则马、班犹不敢妄许，遑论余子？若作史料读，则二十四史各有短长，略等夷耳。若作史读，惟患其不简严；简严乃能壹吾趋向，节吾精力。若作史料读，惟患其不杂博，杂博乃能扩吾范围，恣吾别择。昔万斯同作《明史稿》，尝自言曰：“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而吾所述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清国史馆《斯同传》）吾辈于旧史，皆作史稿读，故如斯同书之繁博，乃所最欢迎也。既如是也，则所谓别史、杂史、杂传、杂记之属，其价值实与正史无异，而时复过之。试举其例：吾侪读《尚书》、《史记》，但觉周武王伐罪吊民之师，其文明程度殆为“超人的”，倘非有《逸周书·克殷·世俘》诸篇，谁复能识“血流漂杵”四字之作何解？且吾不尝言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亮南征事仅得二十字耶？然常璩《华阳国志》，则有七百余字，吾侪所以得知兹役始末者，赖璩书也。至如元顺帝系出瀛国公，清多尔袞烝其太

后，此等在旧史中，不得不谓为极大之事，然正史曷尝一语道及？欲明真相，非求诸野史焉不可也。是故以旧史作史料读，不惟陈寿与魏收可以等夷，视司马迁、班固与一不知谁何之人所作半通不通之笔记，亦可作等夷视也。

(乙)关系史迹之文件：此等文件，在爱惜文献之国民，搜辑宝存，惟力是视。例如英之《大宪章》，法之《人权宣言》，美之《十三州宪法》，其原稿今皆珍袭，且以供公众阅览。其余各时代公私大小之文件稍有价值者，靡不罗而度之。试入各地之图书馆、博物馆，橱中琅琅盈望皆是也。炯眼之史家，得此则新发明日出焉。中国既无公众收藏之所，私家所蓄，为数有限，又复散布不能稽其迹，湮灭抑甚易。且所宝惟在艺术品，其有裨史迹者至微末。今各家著录墨迹，大率断自宋代，再上则唐人写经之类，然皆以供骨董摩挲而已。故吾国此类史料，其真属有用者，恐不过上溯三四百年前物极矣^①。此等史料，收罗当自近代始。其最大宗者，则档案与函牒也。历代官署档案，汗牛充栋，其有关史迹者，千百中仅一二，而此一二或竟为他处所绝不能得。档案性质，本极可厌，在平时固已束诸高阁，听其蠹朽，每经丧乱，辄荡无复存。旧史记、志两门，取材什九出档案。档案被采入者，则附其书以传，其被摈汰者，则永永消灭，而去取得当与否，则视乎其人之史识。其极贵重之史料，被史家轻轻一抹而宣告死刑以终古者，殆不知凡几也。二千年间，史料之罹此冤酷者，计复何限。往者不可追矣，其现存者之运命，亦危若朝露。吾三十年前在京师，曾从先辈借观总理衙门旧档钞本千余册，其中关于鸦片战役者便四五十册，他案称是。虽中多极可笑之语，然一部分之事实含在焉，不可诬也。其中尤有清康熙间与俄、法往复文件甚多，其时法之元首则路易十四，俄之元首则大彼得也。试思此等文件，在

史料上之价值当居何等？今外交部是否尚有全案，此钞本尚能否存在，而将来所谓“清史”者，能否传其要领于百一，举在不可知之数。此可见档案之当设法简择保存，所关如是其重也。至于函牒之属，例如明张居正《太岳集》及晚清胡、曾、左、李诸集所载，其与当时史迹关系之重大，又尽人所知矣。善为史者，于此等资料，断不肯轻易放过，盖无论其为旧史家所已见所未见，而各人眼光不同，彼之所弃，未必不为我之所取也。

私家之行状、家传、墓文等类，旧史家认为极重要之史料，吾侪亦未尝不认之。虽然，其价值不宜夸张太过。盖一个人之所谓丰功伟烈，嘉言懿行，在吾理想的新史中，本已不足轻重，况此等虚荣溢美之文，又半非史实耶？故据吾所立标准以衡量史料，则任昉集中潘皇庄重之《竟陵文宣王行状》，其价值不如彼叙述米盐琐屑之《奏弹刘整》；而在汉人文中，蔡邕极有名之十馀篇碑诔，其价值乃不敌王褒之一篇游戏滑稽的《僮约》^⑫。此非好为惊人之论，盖前者专以表彰一个人为目的，且其要点多已采入旧史中，后者乃描述当时社会一部分之实况，而求诸并时之著作，竟无一篇足与为偶也。持此以衡，其孰轻孰重，不已较然可见耶？

（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以旧史作史读，则现存数万卷之史部书，皆可谓为非史；以旧史作史料读，则岂惟此数万卷者皆史料，举凡以文字形诸记录者，盖无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试举其例：

群经之中如《尚书》，如《左传》，全部分殆皆史料。《诗经》中之含有史诗性质者亦皆属纯粹的史料，前既言之矣。余如《易经》之卦辞爻辞，即殷周之际绝好史料。如《诗经》之全部分，如《仪礼》，即周代春秋以前之绝好史料。因彼时史迹太缺乏，片纸只字，皆为环宝，抽象的消极的史料，总可以向彼中求得若干也。

以此递推，则《论语》、《孟子》，可认为孔、孟时代之史料；《周礼》中一部分，可认为战国史料；二戴《礼记》，可认为周末汉初史料。至如小学类之《尔雅》、《说文》等书，因其名物训诂以推察古社会之情状，其史料乃益无尽藏也。在此等书中搜觅史料之方法，当于次章杂举其例。至原书中关于前代事迹之记载，当然为史料的性质，不必更论列也。

子部之书，其属于哲学部分——如儒、道、墨诸家书，为哲学史或思想史之主要史料；其属于科学部分——如医术、天算等类书，为各该科学史之主要史料，此众所共知矣。书中有述及前代事迹者，当然以充史料，又众所共知矣。然除此以外，抽象的史料可以搜集者盖甚多。大率其书愈古，其料愈可宝也。若夫唐、宋以后笔记类之书，汗牛充栋，其间一无价值之书固甚多，然绝可宝之史料往往出其间，在治史者能炯眼拨识之而已。

集部之书，其专纪史迹之文，当然为重要史料之一部，不待言矣。“纯文学的”之文——如诗词歌赋等，除供文学史之主要史料外，似与其他方面无甚关系，其实亦不然。例如屈原《天问》，即治古代史者极要之史料。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即研究汉代掌故极要之史料。至如杜甫、白居易诸诗，专记述其所身历之事变，描写其所目睹之社会情状者，其为价值最高之史料，又无待言。章学诚云：“文集者，一人之史也。”（《韩柳年谱书后》），可谓知言。

非惟诗古文辞为然也，即小说亦然。《山海经》今四库以入小说，其书虽多荒诞不可究诘，然所纪多为半神话半历史的性质，确有若干极贵重之史料出乎群经诸子以外者，不可诬也。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

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遁逃藪，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小说且然，他更何论。善治史者能以此种眼光搜捕史料，则古今之书，无所逃匿也。

又岂惟书籍而已，在寻常百姓家故纸堆中往往可以得极珍贵之史料。试举其例：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积年流水帐簿，以常识论之，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倘将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数家自开店迄今之帐簿，及城间乡间贫富旧家之帐簿各数种，用科学方法一为研究整理，则其为环宝，宁复可量？盖百年来物价变迁，可从此以得确实资料，而社会生活状况之大概情形，亦历历若睹也。又如各家之族谱家谱，又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苟得其详瞻者百数十种种，为比较的研究，则最少当能于人口出生死亡率及其平均寿数，得一稍近真之统计。舍此而外，欲求此类资料，胡可得也？由此言之，史料之为物，真所谓“牛溲马勃，具用无遗”，在学者之善用而已。

（丁）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书累代散亡，百不存一，观牛弘“五厄”之论，可为浩叹^⑧。他项书勿论，即如《隋书·经籍志》中之史部书，倘其中有十之六七能与《华阳国志》、《水经注》、《高僧传》等同其运命，原本流传以迄今日者，吾侪宁不大乐？然终已不可得。其稍弥此缺憾者，惟恃类书。类书者，将当时所有之书分类钞撮而成，其本身原无甚价值，但阅世以后，彼时代之书多失，而其一部分附类书以幸存，类书乃可贵矣。古籍中近于类书体者，

为《吕氏春秋》，而三代遗文，赖以传者已不少。现存类书，自唐之《艺文类聚》，宋之《太平御览》，明之《永乐大典》，以迄清之《图书集成》等，皆卷帙浩瀚，收容丰富，大抵其书愈古，则其在学问上之价值愈高，其价值非以体例之良窳而定，实以所收录古书存佚之多寡而定也^⑭。类书既分类，于学者之检查滋便，故向此中求史料，所得往往独多也。

自清乾隆间编四库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逸书多种，尔后辑佚之风大盛。如《世本》、《竹书纪年》及魏、晋间人所著史，吾辈犹得稍窥其面目者，食先辈搜辑之赐也。

（戊）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欧洲近代学者之研究埃及史、巴比伦史，皆恃发掘所得之古文籍。盖前此臆测之词，忽别获新证而改其面目者，比比然矣。中国自晋以后，此等再发现之古书，见于史传者凡三事：其一在西晋时，其二在南齐时，其三在北宋时，皆记录于竹木简上之文字也^⑮。原物皆非久旋佚，齐、宋所得，并文字目录皆无传。其在学界发生反响者，惟东晋所得，即前所述汲冢竹书是也。汲冢书凡数十车，其整理写定者犹七十五卷，当时盖为学界一大问题，学者之从事研究者，有束皙、王接、卫恒、王庭坚、荀勖、和峤、续咸、挚虞、谢衡、潘滔、杜预等，其讨论概略，尚见史籍中^⑯。其原书完整传至今者，惟一《穆天子传》耳。其最著名之《竹书纪年》，则已为贗本所夺。尤有《名》及《周食田法》等书，想为极佳之史料，今不可见矣。而《纪年》中载伯益、伊尹、季历等事，乃与儒家传说极相反，昔人所引为诟病者，吾侪今乃藉睹历史之真相也^⑰。《穆传》所述，多与《山海经》相应，为现代持华种西来说者所假借。此次发见之影响，不为不巨矣。

最近则有从甘肃、新疆发见之简书数百片，其年代则自西汉

迄六朝，约七百年间物也。虽皆零缣断简，然一经科学的考证，其裨于史料者乃无量。例如简、缣、纸三物代兴之次第，隶、草、楷字体迁移之趋势，乃至汉、晋间烽埃地段，屯戍状况，皆可见焉。吾侪因此，转对于晋、齐、宋之三度虚此发见，不能无遗憾也^⑩。

最近古籍之再现，其大宗者则为甘肃之敦煌石室。中以唐人写佛经为最多，最古者乃上逮苻秦（四世纪中叶）。其上乘之品，今什九在巴黎矣，而我教育部图书馆拾其余沥，犹得七千余轴，私人所分弄亦千数，此实世界典籍之大发见也。其间古经史写本足供校勘者，与夫佛经在今大藏外者皆甚多，不可枚举。其他久佚之著作，亦往往而有。以吾所知，如慧超《往五天竺传》，唐末已亡，忽于此间得其残卷，与法显、玄奘之名著鼎足而三，宁非快事？惜其他诸书性质，以传抄旧籍为主，裨助新知稍希，然吾确信苟有人能为统括的整理研究，其陆续供给史界之新资料必不乏也^⑪。

（己）金石及其他镂文：金石为最可宝之史料，无俟喋陈。例如有含摩拉比（Hammurabi）之古柱，而巴比伦之法典略明；有阿育王之丰碑，而印度佛教传播之迹大显。西方古代史迹，半取资于此途矣。惜我国现存金石，其关于典章文物之大者颇少。以吾侪所闻诸史乘者，如春秋时郑有刑书，晋有刑鼎，其目的盖欲将法律条文镂金以传不朽，然三代彝器出土不乏，而此类之鸿宝阙如，实我学界一大不幸也。

金石之学，逮晚清而极盛。其发达先石刻，次金文，最后则为异军突起之甲骨文。今顺次以论其对于史料上之价值。

自来谈石刻者，每盛称其大有造于考史。虽然，吾不敢遽为此夸大之词也。中国石刻，除规模宏大之石经外，造象经幢居十

之五，铭墓文居十之四。造象经幢中文字，无关考史，不待问也。铭墓文之价值，其有以愈于彼者又几何？金石家每刺取某碑志中述某人爵里年代及其他小事迹与史中本传相出入者，诧为环宝，殊不知此等薄物细故，在史传中已嫌其赘，今更补苴罅漏，为“点鬼簿”作“校勘记”，吾侪光阴，恐不应如是其贱。是故从石刻中求史料，吾认为所得甚微。其中确有价值者，例如唐建中二年（西七八一）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基督教初入中国唯一之掌故，且下段附有叙里亚文，尤为全世界所罕见^{②0}。如元至正八年刻于居庸关之佛经，书以蒙古、畏兀、女真、梵、汉五体，祥符大相国寺中，有元至元三年圣旨碑，书以蒙古、畏兀、汉字三体，元至正八年之《莫高窟造像记》，其首行有书六体，异族文字，得借此以永其传^{②1}。如唐长庆间（八二一至八二四）之《唐蕃会盟碑》，将盟约原文，刻两国文字，可以见当时条约格式及其他史实^{②2}。如开封挑筋教人所立寺，有明正德六年（一五一—）佚碑，可证犹太人及犹太教入中国之久^{②3}。诸如此类，良可珍贵。大抵碑版之在四裔者，其有助于考史最宏。如东部之《丸都纪功刻石》（魏正始间），《新罗真兴王定界碑》（陈光大二年），《平百济碑》（唐显庆三年），《刘仁愿纪功碑》（唐麟德龙翔间）等；西部之《裘岑纪功刻石》（汉永和二年），《沙南侯获刻石》（汉永和五年），《刘平国作关城颂》（无年月），《姜行本纪功颂》（唐贞观十四年），《索勋纪德碑》（唐景德元年）等；北部之《苾伽可汗碑》（唐开元二十三年），《阙特勤碑》（唐开元二十年），《九姓回鹘可汗碑》（无年月，亦唐刻）等；南部之《爨宝子碑》（晋大亨四年），《爨龙颜碑》（刘宋大明二年），《平蛮颂》（唐大历十二年），《大理石城碑》（宋开宝五年）等，皆迹存片石，价重连城^{②4}。何则？边裔之事，关于我族与他族之交涉者甚巨，然旧史语焉不详，非借助石刻，而此种史料遂湮也。

至如内地一般铭冢之文，苟冢中人而无足重轻者，吾何必知其事迹？其人如为历史上重要人物，则史既已有传，而碑志辞多溢美，或反不足信，是故其裨于史料者乃甚希也。研究普通碑版，与其从长篇墓铭中考证事迹，毋宁注意于常人所认为无足重轻之文，与夫文中无足重轻之字句。例如观西汉之《赵王上寿》、《鲁王泮池》两刻石之年号，而知当时诸侯王在所封国内各自纪年²⁵。观汉碑阴所纪捐钱数，而略推当时之工价物价²⁶。此所谓无足重轻之字句也。例如观各种买地券，可察社会之迷信、滑稽的心理²⁷。观元代诸圣旨碑，可见当时奇异之文体及公文格式²⁸。此所谓无足重轻之文也。

吾从石刻中搜史料，乃与昔之金石学家异其方向。吾最喜为大量的比较观察，求得其总括的概象，而推寻其所以然。试举其例：吾尝从事于石画的研究，见汉石有画无数，魏晋以后则渐少，以至于绝，此何故者？石画惟山东最多，次则四川，他省殆无有，此又何故者？吾尝从事于佛教石刻的研究，见造象惟六朝时最多，前乎此者无有，后乎此者则渐少，此何故者？同是六朝也，惟北朝之魏、齐独多，南朝及北周则极少，此又何故者？河南之龙门造象千余龕，魏、齐物什而七八，隋刻仅三耳，而山东之千佛、云门、玉函诸山，殆皆隋刻，直隶之宣雾山、南响堂山，又殆皆唐刻，此又何故者？自隋而经幢代造象以兴，迄唐而极盛，此又何故者？宋以后而此类关系佛教之小石刻，殆皆灭绝，此又何故者？历代佛教徒所刻佛经，或磨崖，或藏洞，或建幢，所至皆是，而儒经、道经则甚希，此又何故者？吾尝从事于墓文的研究，见北魏以后，墓志如鲫，两汉则有碑而无志，此何故者？南朝之东晋、宋、齐、梁、陈，墓文极稀，不逮并时北朝百分之二三，此又何故者？此不过随举数例，若采用吾法，则其可以综析研究之

事项更甚多，固无待言。吾之此法，先求得其概象，然后寻其原因，前文所谓“何故何故”，吾有略能解答者，有全未能解答者。然无论何项，其原因皆甚复杂，而与社会他部分之事实有种种联带关系，则可断言也。此种搜集史料方法，或疑其琐碎无用，实乃不然。即如佛教石刻一项，吾统观而概想之，则当时四五百年间社会迷信之状况，能活现吾前；其迷信之地方的分野与时代的蜕变，亦大略可睹；舍此以外，欲从旧史中得如此明确之印象，盖甚难也。吾前所言抽象的史料，即属此种。凡百皆然，而石刻之研究亦其一例耳。

金文之研究以商、周彝器为主。吾前已曾言其美术方面之价值矣，今更从文字款识上有所论列。金文证史之功，过于石刻，盖以年代愈远，史料愈湮，片鳞残甲，罔不可宝也。例如周宣王伐玁狁之役，实我民族上古时代对外一大事，其迹仅见《诗经》，而简略不可理，及小孟鼎、虢季子白盘、不墾敦、梁伯戈诸器出世，经学者悉心考释，然后兹役之年月、战线、战略、兵数皆历历可推^{②9}。又如西周时民间债权交易准折之状况，及民事案件之裁判，古书中一无可考，自召鼎出，推释之即略见其概。^{③0}余如克鼎、大孟鼎、毛公鼎等，字数抵一篇《尚书》，典章制度之藉以传者盖多矣。又如秦《诅楚文》，于当时宗教信仰情状，两国交恶始末，皆有关系。虽原器已佚，而摹本犹为环宝也^{③1}。若衡以吾所谓抽象的史料者，则吾曾将金文中之古国名，试一搜集，竟得九十余国，其国在春秋时已亡者，盖什而八九矣。若将此法应用于各方面，其所得必当不乏也。至如文字变迁之迹，赖此大明，而众所共知，无劳喋述矣。

距今十五六年前，在河南安阳县治西五里之小屯，得骨甲文无数，所称“殷虚书契”者是也。初出时，世莫识其文，且莫能

名其为何物。十年来经多数学者苦心钻索，始定其为龟甲兽骨之属，其发见之地为殷故都，其所契为殷时文字，字之可识者略已过千，文亦寔可读，于是为治古代史者莫大之助。盖吾侪所知殷代史迹，除《尚书》中七篇，及《史记》之《殷本纪》、《三代世表》外，一无所有，得此乃忽若辟一新殖民地也。此项甲文中所含史料，当于叙述殷代史时引用之，今不先举。要之此次之发见，不独在文字源流学上开一新生面，而其效果可及于古代史之全体，吾不惮昌言也，金石证史之价值，此其最高矣^⑳。

（庚）外国人著述：泰西各国，交通夙开，彼此文化，亦相匹敌，故甲国史料，恒与乙国有关系；即甲国人专著书以言乙国事者亦不少。我国与西亚及欧非诸文化国既穹隔，亘古不相闻问。其在西北徼，与我接触之民族虽甚多，然率皆蒙昧，或并文字而无之，遑论著述。印度文化至高，与我国交通亦早，然其人耽悦冥想，厌贱世务，历史观念，低至零度。故我国犹有法显、玄奘、义净所著书，为今世治印度史者之宝笈^㉑。然而印度硕学曾游中国者百计，梵书记中国事者无闻焉。若日本，则自文化系统上论，五十年前，尚纯为我附庸，其著述之能匡裨我者甚希也。故我国史迹，除我先民躬自记录外，未尝有他族能为我稍分其劳。唐时有阿拉伯人侨商中国者所作游记，内有述黄巢陷广东情状者，真可谓凤毛麟角。其欧人空前述作，则惟马哥波罗一游记，欧人治东学者至今宝之^㉒。次则拉施特之《元史》，所述皆蒙古人征服世界事，而于中国部分未之及，仅足供西北徼沿革兴废之参考而已^㉓。五六十年以前欧人之陋于东学，一如吾华人之陋于西学。其著述之关于中国之记载及批评者，多可发噤。最近则改观矣，其于中国古物，其于佛教，其于中国与外国之交涉，皆往往有精诣之书，为吾侪所万不可不读^㉔。盖彼辈能应用科学方法以治史，

善搜集史料而善驾驭之，故新发明往往而有也。虽然，仅能为窄而深之局部的研究，而未闻有从事于中国通史者。盖兹事艰巨，原不能以责望于异国人矣。日本以欧化治东学，亦颇有所启发，然其业未成^⑦。其坊间之《东洋史》、《支那史》等书累累充架，率皆鹵莽灭裂，不值一盼。而现今我国学校通用之国史教科书，乃率皆裨贩译之以充数，真国民莫大之耻也。

以上所列举，虽未云备，然史料所自出之处，已略可见。循此例以旁通之，真所谓“取诸左右逢其原”矣。吾草此章竟，吾忽起无限感慨：则中国公共收藏机关之缺乏，为学术不能进步之极大原因也。欧洲各国，自中古以还，即以教会及王室为保存文献之中枢，其所藏者，大抵历千年未尝失坠，代代继长增高。其藏书画器物之地，又大率带半公开的性质，市民以相当的条件，得恣观览。近世以还，则此种机关，纯变为国有或市有。人民既感其便利，又信其管理保存之得法，多举私家所珍惜者，发而献之，则其所积日益富。学者欲研究历史上某种事项，入某图书馆或某博物馆之某室，则其所欲得之资料灿然矣。中国则除器物方面绝未注意保存者不计外，其文籍方面，向亦以“天禄、石渠典籍之府”为最富。然此等书号为“中秘”，绝非一般市民所能望也。而以中国之野蛮革命，赓续频动，每经丧乱，旧藏荡焉。例如董卓之乱，汉献西迁，兰台石室之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梁元帝败没于江陵，取天府藏书绕身焚之，叹曰：“文武之道，尽今日矣。”此类惨剧，每阅数十百年，例演一次。读《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等所记述，未尝不泫然流涕也。其私家弄藏，或以子孙不能守其业，或以丧乱，恒阅时而灰烬荡佚。天一之阁，绛云之楼，百宋之廛……今何在矣？直至今日，交通大开，国于世界者，各以文化相见；而我自首善以至各省都会，乃竟无一图书馆，

无一博物馆，无一画苑。此其为国民之奇耻大诟且勿论，而学者欲治文献，复何所凭藉？即如吾本章所举各种史料，试问以私人之力，如何克致？吾津津然道之，则亦等于贫子说金而已。即勉强以私力集得若干，亦不过供彼一人之研索，而社会上同嗜者终不获有所霑润。如是而欲各种学术为平民式的发展，其道无由。吾侪既身受种种苦痛，一方面既感文献证迹之易于散亡，宜设法置诸最安全之地；一方面又感一国学问之资料，宜与一国人共之，则所以胥谋焉以应此需求者，宜必有道矣。

注释

① 龙门佛像，虽多而小。云冈诸象，高至六七丈者甚多，其雕成全幅图画者亦不少，实吾国佛教美术精华所聚也。日本松本文三郎之《支那佛教遗物》记载甚详，且能言其与印度、捷陀罗美术之异同。近人蒋希召之《游记第一集》，所纪亦翔实。

② 诸器大抵皆元郭守敬所造，拳祸时为德人所掠，前年遵《威赛条约》还我者，即此物也。

③ 巨鹿古城，即在今城原址，入地二丈许。知为大观二年故墟者，有碑可证也。前年夏秋间，居民掘地，忽睹破屋，且有陶磁等物，持以适市，竟易得钱。渐掘其旁，屋乃栉比。事闻于骨董商，乃麇集而掘遗物，以善价估诸外国人者什而八九。今一小部分为教育部所收得，陈诸午门之历史博物馆，然其细已甚矣。且原有房屋，破坏无余。若政府稍有纪纲，社会稍有智识者，能于初发见时封存之，古屋之构造，悉勿许毁伤，而尽收其遗物设一博物馆于巨鹿，斯亦一“小邦津”矣。惟闻故城大于今城，今已掘两年，犹未及垣，或者更有所获。又闻其地掘井，须二十丈乃得水源，而入地十丈许，往往遇甃瓦之属。则安知非大观二年以前，已经一两度之淹没耶？果尔，则商周间社会生活状态，竟从此得意外之发明？未可知也。姑悬此说，以俟后之治科学者。

④ 周、秦间画壁之风甚盛（吾别有考证），不知后来何以渐替，今全国传留者极少。泰安县岳庙，两壁画《岳帝出巡图》，相传是唐画，然吾不敢信，即尔，亦不知经后人涂抹几次矣。高昌壁画与敦煌石室遗书同时发现，坊间近有影本。

⑤ 宋人专门著录铜器之书，有《宣和博古图》，吕大临《考古图》，无名氏《续考古图》，薛尚功《钟鼎款识》，王厚之《复斋钟鼎款识》，张琯《绍兴内府古器评》等。

⑥ 此所举数，据今人王国维所著《宋金文著录表》、《四朝金文著录表》，但皆兼兵器杂器合计，宋表且兼及秦、汉以后器。惟无文字款识者，不在此数。

⑦ 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自序》云：“古器自周、秦至今，凡有六厄。《史记》曰：‘始皇铸天下兵器为金人’，兵者戈戟之属，器者鼎彝之属，秦政意在尽天下之铜，必尽括诸器可知，此一厄也。《后汉书》：‘董卓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此二厄也。《隋书》：‘开皇九年四月毁平陈所得秦、汉三大钟，越三大鼓，十一年正月以平陈所得古物多为祸变，悉命煨之’，此三厄也。《五代会要》：‘周显德二年九月勅两京诸道州府铜象器物诸色，限五十日内并须毁废送官’，此四厄也。《大金国志》：‘海陵正隆三年诏毁平辽、宋所得古器’，此五厄也。《宋史》：‘绍兴六年敛民间铜器，二十八年出御府铜器千五百事付泉司’，此六厄也。……”观此可想见古器毁坏之一斑。四年前欧战正酣，铜价飞涨，僻邑穷村之铜，悉搜括以输于外，此间又不知毁去史迹几许矣。

⑧ 汉熹平、魏正始、唐开成、宋嘉祐、西蜀孟氏、南宋高宗、清乾隆，皆尝有石经之刻。今惟唐刻存西安府学，清刻存北京国子监。佛教石经至多，最大者为大房山之雷音洞，共二千三百余石，作始于隋，竣事于辽，历七百余年，实人类继续活动中之最伟大者也。自余石经，今人叶昌炽《语石》卷三卷四，记述颇详。

⑨ 汉人石阙石壁，多为平面雕刻的画象。其见于诸家著录者，都凡九十二种三百二十九石，内出河南者三十石，出四川者四十四石，出江苏者二石，出甘肃者一石，其余则皆出山东也。以吾所闻知，此种石画今在日本者十九石，在法国者十二石，在德国者三石，在美国者一石，近一二年来有无再流出不可知矣。能悉集其拓本比较研究，实二千年前我国绘画雕刻之一大观也。

魏、齐、隋、唐造象，不可以数计，仅龙门一处，其可拓者已二千三百余种矣，其中尤有极诡异精工之画。唐昭陵六马，高等原形；灵岩之宋雕四十罗汉，神采飞动。皆吾国石刻不朽之品也。历代石画概略，《论石》卷五论列得要。

⑩ 今人章鸿钊著《石雅》，记国内外地质学者研究所得结果，极可观。

⑪ 罗马教皇图书馆中，有明永历上教皇颂德书，用红缎书方寸字，略如近世之寿屏。此类史料之非佚而再现，直以原迹传至今者，以吾所见，此为最古矣。日本闻有中国隋、唐间原物甚多，惜未得见。

⑫ 任昉两文，皆见《文选》。其《奏弹刘整》一篇，全录当时法庭口供九百余字，皆争产、赖债、盗物、虐使奴婢等琐事，供词半属当时白话。王褒《僮约》见《艺文类聚》三十五。其性质为“纯文学的”，本与具体的史迹无关，然篇中材料，皆当时巴蜀间田野生活也。

⑬ 牛弘论书有五厄，见《隋书》本传，其历代书籍散亡之状况，《文献通考·经籍考序》所记最详。

⑭ 纂辑类书之业，亦文化一种表征。欧洲体裁略备之《百科全书》(Encyclopedia)，盖起自十五世纪以后。我国则自梁武帝时(五〇二—五四九)，盛弘斯业。今见于《隋书·经籍志》者，有《皇览》六百八十卷，《类苑》一百二十卷，《华林遍略》六

百二十卷，《寿光书苑》二百卷，《圣寿堂御览》三百六十卷，《长洲玉镜》二百三十八卷，《书钞》一百七十四卷，其余数十卷者尚多，惜皆已佚。今四库中现存古类书之重要如下：

《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 唐虞世南撰 此书盖成于隋代(约六〇一——六一〇)

《艺文类聚》一百卷 唐欧阳询等奉敕撰 贞观间(六二七——六四九)

《初学记》三十卷 唐徐坚等奉敕撰

《太平御览》一千卷 宋李昉等奉敕撰 太平兴国二年(九七七)

《册府元龟》一千卷 宋王钦若等奉敕撰 景德二年(一〇〇五)

《玉海》二百卷 宋王应麟撰

《永乐大典》二万二千九百卷 明解缙等奉敕编 永乐间(一四〇三——一四二四)

其清代所编诸书不复录。右各书惟《永乐大典》未刻，其写本旧藏清宫。义和拳之乱，为联军所分掠。今欧洲、日本诸图书馆中，每馆或有一二册至十数册不等。

⑮ 西晋时汲冢竹书其来历，已略见本篇第二章注七。今更补述其要点：书藏汲郡之魏安釐王冢。晋太康二年，郡人不准盗发得之，凡数十车。皆竹简素丝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所写出诸书如下：(一)《纪年》十三篇。(二)《易经》一篇。(三)《易繇阴阳卦》二篇。(四)《卦下易经》一篇。(五)《公孙段》二篇。(六)《国语》三篇。(七)《名》三篇。(八)《师春》一篇。(九)《琐语》十一篇。(十)《梁丘藏》一篇。(十一)《缴书》二篇，(十二)《生封》一篇。(十三)《穆天子传》五篇。(十四)《大历》二篇。(十五)《杂书》十九篇，内有《周食田法》、《周穆王盛姬死事》等，凡七十五篇。此《晋书·束皙传》、《荀勗传》所记大概也。

萧齐时(四七九——五〇一)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履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纶，盗以把火自照。后人得十余简，以示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也。事见《南齐书·文惠太子传》。

宋政和间(一一一一——一一一九)发地得竹木简一甕，多汉时物，散乱不可考。独永初二年讨羌符文字尚完，皆章草书。吴思道曾亲见之于梁师成所。其后沦于金以亡。事见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七。此可谓历史上竹简书之三大发见，惜其结果不传至今耳。

⑯ 晋汲冢书发后，学界陡生波澜。荀勗、和峤首奉敕撰次，卫恒加以考证，束皙随疑分释，旨有义证。王庭坚著书难皙，亦有证据。潘滔劝王接别著论解二子之纷，挚虞、谢衡见之，咸以为允。事见《晋书·王接传》。

⑰ 《竹书纪年》最骇人听闻者，如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等，又言夏之年祚较殷为长，此皆与儒家旧说不相容。文见《束皙传》，今伪本削去矣。

⑱ 清光绪三十四年(距今十三年前)，英人斯坦因(A. Stein)在敦煌附近、罗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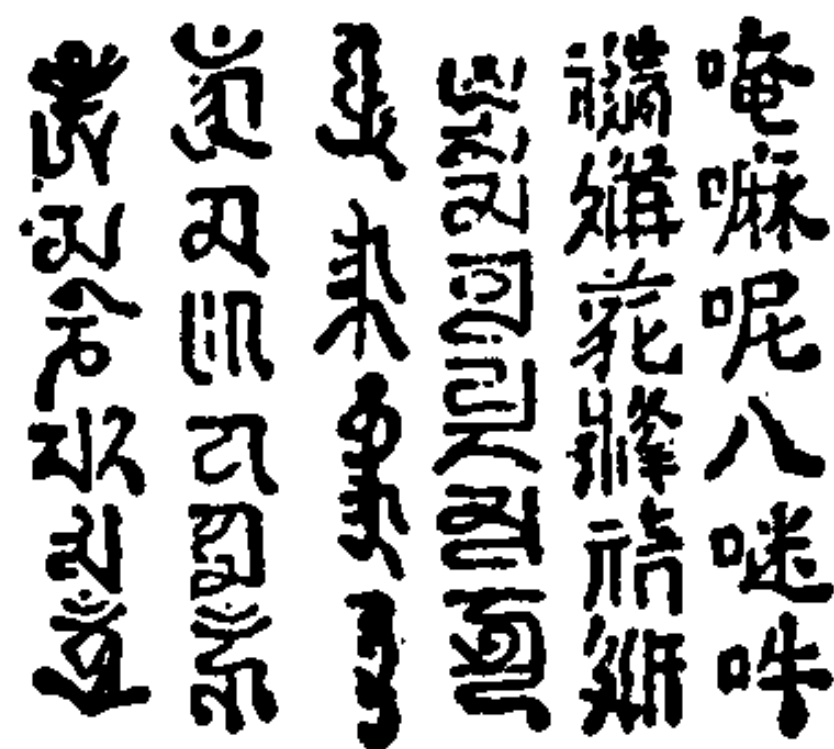
淳尔附近、于阗附近，各得古简牍多种，最古者有汉宣帝元康、神爵、五凤诸年号。大约两汉物居半，余半则晋以后物也。法人沙畹 (Chavannes) 著有考释，吾国则罗振玉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考释》，辨证极详核。

①⑨ 清光绪末，法人白希和游甘肃之敦煌，见土人有蒸故纸而调其灰于水，谓为神符，能疗病者，视之，则唐人所写佛经也。迹之，知得自一石室。即之，则室中乃琳琅无尽藏。考之，知为西夏藏书之府也。白氏择其精者辇以归，其中有摩尼教经典，全世界所无也。古画亦有数轴。白氏尝为余言：吾载十大车而止，过此亦不欲再伤廉矣。其辇去者，今一大部分在巴黎国立图书馆也。白氏归北京，事颇闻于士大夫。良久，学部乃遣人往收其余沥，所得犹将万轴。辇至京，而达官名士，巧取豪夺，其尤精善者多入私家，今存教育部图书馆者约七千轴，又各人选择之余也。然当时学部所收尚未尽，非久有日本人续往访，所得亦千计。其属于儒书一部分，罗振玉影印者已不少。然此中什九皆佛经，现已发现多种为今佛藏中所无者。且经典外之杂件，亦非无之，以吾所见，已有地券信札等数纸，其年代最古者为苻秦时 (忘其年)。以千余年前之古图书馆，一旦发现，不可谓非世界文化一大庆也。惜原物今已散在各国，并一总目录而不能編集也。

②⑩ 《景教碑》今在长安碑林。其原文，自《金石萃编》以下，诸家书多全录。前人或疑为波斯教、回回教等，今则景教确为基督教，已成学界定论。今人钱恂《归潜记》有跋一篇，考证最精确。

②⑪ 居庸关有一地如城门洞者 (行人必经之路)，圆顶及两壁，满雕佛像，槩工精绝。间以佛经，用五体字。学者考定汉字以外，则一蒙古，二畏兀，三女真，四梵也。畏兀亦名畏吾，即唐之回鹘。此刻盖元时物，今完好无损。

莫高窟有六体字，摹录如下。其何体属何族，则吾未能辨也。



②⑫ 《唐蕃会盟碑》，吾未见拓本，今人罗振玉《西陲石刻录》有其全文。碑阳刻汉文，碑阴刻唐古忒文，两文合璧，皆盟约正文也。两侧则刻两国蒞盟人之官衔姓名。此刻石文之最特别者。

②⑬ 开封之挑筋教寺，据钱恂《归潜记》引清同治五年英人某报告，称寺中有两碑，育寺创设于宋隆兴二年 (一一六四)，改筑于明成化四年 (一四六九)。今碑已佚矣。

清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九记此事，犹云“地有犹太碑，碑文附后”，然今洪书无碑，殆刊时失之。此孤微之史料，恐从此湮灭矣。

②④ 各碑录文，多见清王昶《金石萃编》、陆耀遹《金石续编》。惟《丸都纪功》乃新出土者，《苾伽可汗》、《九姓回鹘》、乃俄人以影本送致总理衙门者，诸家皆未著录。

②⑤ 此两石实汉石最古者，录文见《金石萃编》。

②⑥ 汉碑纪此者，有《礼器》、《仓颉庙》、《成阳灵台》、《鲁峻》、《尧庙》、《曹全》、《张迁》等碑。

②⑦ 宋周密《癸辛杂识》言在洛阳见一石刻，其文云：“男杨绍从土公买冢地一丘，……直钱四百万，即日交毕，日月为证，四时为任，太康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对共破薊”。此类券筋之刻，唐以后颇多，今存拓本尚逾十数。见《语石》卷五。

②⑧ 元圣旨碑，现存者如泰安岳庙，襄阳五龙庙，尚十余通。《语石》卷三，曾全录其一，文词之鄙俚怪诞，殊可发噱。《岳庙碑》有云：“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达识蛮每，不拘拣甚么差发，休当者。”文见清顾炎武《山东考古录》。其所云“也里可温”即天主教徒，“先生”即道士，“达识蛮”即回教徒，“每”者，们也。意言释、道、耶、回教徒人等皆蠲免赋役也。此亦可考当时信教自由之制。

②⑨ 今人王国维有《鬼方昆夷獬狁考》及《不娶敦盖铭考释》两篇，考证兹役，甚多新解。

③⑩ 清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释《召鼎》文最好。

③⑪ 《诅楚文》摹本见《绛帖》，《古文苑》有释文。

③⑫ 殷虚书契最初影印本，有刘铁云之《铁云藏龟》。其治此学最精深者为罗振玉，著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考释》、《书契待问编》等。又王襄著有《簠室殷契类纂》。

③⑬ 晋法显、唐玄奘、义净，皆游历印度之高僧。显著有《佛国记》、奘著有《大唐西域记》，净著有《南海寄归传》，此三书英法俄德皆有译本，欧人治印度学必读之书也。

③⑭ 马哥波罗，意大利之威尼斯人。生于一二五一，卒于一三二四。尝仕元世祖，居中国十六年，归而著一游记。今各国皆有译本，近亦有译为华文者矣。研究元代大事及社会情状极有益之参考书也。

③⑮ 拉施特，波斯人。仕元西域宗王合赞，奉命修国史。书成，名曰《蒙古全史》，以波斯文写之。今仅有钞本。俄、德、英、法皆有摘要钞译本。清洪钧使俄，得其书，参以他书，成《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为治元史最精诣之书。但其关于中国本部事迹甚少，盖拉氏身仕宗藩，详略之体宜尔也。

③⑯ 现代欧人关于中国考史的著述，摘举其精到者若干种列下：

(一) 关于古物者：

Münsterberg, *C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Künste*.

B. Laufer, *Jade*.

B. Laufer, *Sino-Iranica*.

B. Laufer, *Numerous Other Scientific Papers*.

Chavannes, *Numerous Books and Scientific Papers*.

Pelliot, *Mission Pellioten Asie Centrale*.

A. Stein, *Ancient Khotan*.

A.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二) 关于佛教者:

Waddell, *Lhasa and its Mysteries*.

Hornle,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Huth, *Geschichte des Buddhismus in der Mongolei*.

Thomas Watters,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三) 关于外国关系者:

Blochet, *Introduction a une Histoire des Mongoles*.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Mookerji, *A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and Maritime Activit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v. Staël-Holstein, *Tocharisch und die Sprache 1*.

V. Staël-Holstein, *Tocharisch und die Sprache 2*.

Chavannes, *Les Tou-kiue Occidentaux*.

O. Franke, *Beiträge aus Chinesischen Quellen zur Kenntniss der Turkvölker und Skythen Zentralasiens*.

③ 日本以研究东洋学名家者，如白鸟库吉、那珂通世之于古史及地理，松本文三郎之于佛教，内藤虎次郎之于目录金石，鸟居龙藏之于古石器，皆有心得。但其意见皆发表于杂志论文，未成专书。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前章列举多数史料，凡以言史料所从出也。然此种史料，散在各处，非用精密明敏的方法以搜集之，则不能得。又真贋错出，非经谨严之抉择，不能甄别适当。此皆更需有相当之技术焉。兹分论之。

第一，搜集史料之法

普通史料之具见于旧史者，或无须特别之搜集；虽然，吾侪今日所要求之史料，非即此而已足。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此如治庭园者，孤植草花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则所资乃无量矣。吾侪之搜集史料，正有类于是。试举吾所曾致力之数端以为例：甲、吾曾欲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乃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汇而录之，得六十余；又从《逸周书》搜录，得九十余；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搜录，得七十余；又从金文款识中搜录，得九十余；其他散见各书者尚三四十。除去重复，其夏、商、周古国名之可考见者，犹将三百国；而大河以南，江淮以北，殆居三之二。其中最稠密之处——如山东、河南、湖北，有今之一县而跨有古三四国之境者。试为图为表以示之，而古代社会结构之迥殊于今日，可见一斑也。乙、吾曾欲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之迹，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之人物。据常人所习知者，则前有法显，后有玄奘，三数辈而已。吾细检诸传记，陆续搜集，乃竟得

百零五人，其名姓失考者尚八十二人，合计百八十有七人。吾初研究时，据慧皎之《高僧传》、义净之《求法传》，得六七十人，已大喜过望；其后每读一书，遇有此者则类而录之，经数月乃得此数。吾因此将此百八十余入者，稽其年代籍贯，学业成绩，经行路线等，为种种之统计；而中、印往昔交通遗迹，与夫隋、唐间学术思想变迁之故，皆可以大明。丙、吾曾欲研究中国人种变迁混合之迹，偶见史中载有某帝某年徙某处之民若干往某处等事，史文单词只句，殊不足动人注意也。既而此类事触于吾目者屡见不一见，吾试汇而抄之，所积已得六七十条；然犹未尽。其中徙置异族之举较多，最古者如尧舜时之分背三苗；徙置本族者亦往往而有，最著者如汉之迁六国豪宗以实关中。吾睹此类史迹，未尝不掩卷太息，嗟彼小民，竟任政府之徙置我如弈棋也。虽然，就他方面观之，所以博掬此数万万人成一民族者，其间接之力，抑亦非细矣。吾又尝向各史传中专调查外国籍贯之人，例如匈奴人之金日磾，突厥人之阿史那忠，于阗人之尉迟敬德，印度人之阿那罗顺等，与夫入主中夏之诸胡之君臣苗裔，统列一表，则种族混合之情形，益可见也。丁、吾又尝研究六朝、唐造像，见初期所造者大率为释迦像，次期则多弥勒像，后期始渐有阿弥陀像、观世音像等，因此可推见各时代信仰对象之异同；即印度教义之变迁，亦略可推见也。戊、吾既因前人考据，知元代有所谓“也里可温”者，即指基督教，此后读《元史》及元代碑版与夫其他杂书，每遇“也里可温”字样辄乙而记之，若荟最成篇，当不下百条，试加以综合分析，则当时基督教传播之区域及情形，当可推得也。以上不过随举数端以为例。要之吾以为吾侪欲得史料，必须多用此等方法。在前清治经学者多已善用之，如《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等书，即其极好模范。唯史学方面，则用者殊少。

如宋洪迈之《容斋随笔》、清赵翼之《二十二史札记》，颇有此精神，惜其应用范围尚狭。此种方法，恒注意于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常人向来不认为史料者，吾侪偏从此间觅出可贵之史料。欲应用此种方法，第一步，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锐敏的感觉。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别观察之兴味。世界上何年何月不有苹果落地，何以奈端独能因此而发明吸力？世界上何年何月不有开水冲壶，何以瓦特独因此发明蒸气？此皆由有锐敏的感觉，施特别的观察而已。第二步，须耐烦。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史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真象不止。须知此研究法，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简。例如吾前文所举甲项，其目的不过求出一断案曰：“春秋前半部落式之国家甚多”云尔；所举乙项，其目的不过求出一断案曰：“六朝、唐时中国人流学印度之风甚盛”云尔。断案区区十数字，而研究者，动费一年数月之精力，毋乃太劳？殊不知凡学问之用科学的研究法者，皆须如是；苟不如是，便非科学的，便不能在今世而称为学问。且宇宙间之科学，何一非积无限辛劳以求得区区数字者？达尔文养鸽蒔果数十年，著书数十万言，结果不过诒吾辈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大字而已。然试思十九世纪学界中，若少却此八个大字，则其情状为何如者？我国史学界，从古以来，未曾经过科学的研究之一阶级，吾侪今日若能以一年研究之结果，博得将来学校历史教科书中一句之采择，吾愿已足，此治学者应有之觉悟也。

尤有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亦甚为重要，某时代有某种现象，谓之消极的史料。试举其例：甲、吾侪读《战国策》，读《孟子》，见屡屡有黄金若干镒等文，知其时确已用金属为货币。但字书中关于财货之字，皆从贝不从金，可见古代交易媒介物，乃用贝而非

用金。再进而研究钟鼎款识，记用贝之事甚多，用金者虽一无有；《诗经》亦然。殷墟所发见古物中，亦有贝币无金币。因此略可推定西周以前，未尝以金属为币。再进而研究《左传》、《国语》、《论语》，亦绝无用金属之痕迹。因此吾侪或竟可以大胆下一断案曰：“春秋以前未有金属货币。”若稍加审慎，最少亦可以下一假说曰：“春秋以前金属货币未通用。”乙、我国未有纸以前，文字皆“著诸竹帛”。然《汉书·艺文志》各书目，记篇数者十之七八，记卷数者仅十之二三，其记卷数者又率属汉中叶以后之著述；因此可推定帛之应用，为时甚晚。又据《史记》、《汉书》所载，当时法令公文私信，十有九皆用竹木简，知当时用竹之广，远过于用帛。再证以最近发现之流沙坠简，其用缣质者皆在新莽以后，其用纸质者皆在两晋以后。因此可以下一假说曰：“战国以前誊写文书，不用缣纸之属；两汉始用而未盛行。”又可以下一假说曰：“魏、晋以后，竹木简牍之用骤废。”丙、吾侪读《历代高僧传》见所记隋、唐以前诸僧之重要事业，大抵云译某经某论若干卷，或云讲某经某论若干遍，或云为某经某论作注疏若干卷。宋以后诸僧传中，此类记事绝不复见，但记其如何洞彻心源，如何机锋警悟而已。因此可以下一断案曰：“宋以后僧侣不讲学问。”丁、吾侪试检前清道、咸以后中外交涉档案，觉其关于教案者十而六七，当时士大夫关于时事之论著，亦认此为一极大问题。至光、宣之交，所谓教案者已日少一日；入民国以来，则几无有。因此可以下一断案曰：“自义和团事件以后，中国民教互仇之现象殆绝。”此皆消极之史料也。此等史料，其重要之程度，殊不让积极史料。盖后代极普通之事象，何故前此竟不能发生，前代极普通之事象，何故逾时乃忽然灭绝，其间往往含有历史上极重大之意义，倘忽不省，则史之真态未可云备也。此等史料，正以无史迹为史迹，恰如度曲者于无

声处寄音节，如作书画者于不着笔墨处传神。但以其须向无处求之，故能注意者鲜矣。

亦有吾侪所渴欲得之史料，而事实上殆不复能得者。例如某时代中国人口有若干，此问题可谓为研究一切史迹重要之基件，吾侪所亟欲知也，不幸而竟无法足以副吾之望。盖吾国素无统计，虽以现时之人口，已无从得其真数，况于古代？各史《食货志》及《文献通考》等书，虽间有记载，然吾侪绝不敢置信。且彼所记亦断断续续，不能各时代俱有，于是乎吾侪搜集之路殆穷。又如各时代物价之比率，又吾侪所亟欲知也。然其记载之缺乏，更甚于人口。且各时代所用为价值标准之货币，种类复杂，而又随时变紊，于是乎吾侪搜集之路益穷。若斯类者，虽谓之无史料焉可矣。虽然，吾侪正不必完全绝望。以人口问题论，吾侪试将各史《本纪》及《食货志》所记者，姑作为假定；益以各地理志中所分记各地方户口之数，再益以方志专书——例如常璩《华阳国志》、范成大《吴郡记》等记述特详者，悉汇录而勘比之；又将各正史杂史笔记中，无论文牒及谈话，凡有涉及人口数目者——例如《左传》记“卫戴公时卫民五千七百三十人”，《战国策》记苏秦说齐宣王言“临淄七万户，户三男子”等，凡涉及此类之文句，一一抄录无遗；又将各时代征兵制度，口算制度，一一研究，而与其时所得兵数所得租税相推算。如虽不敢云正确，然最少总能于一二时代中之一二地方得有较近真之资料。然后据此为基本，以与他时代他地方求相当之比例。若有能从此用力一番，则吾侪对于历史上人口之知识，必有进于今日也。物价问题，虽益复杂，然试用此法以求之，所得当亦不少。是故史料全绝之事项，吾敢信其必无，不过所遗留者或多或寡，搜集之或难或易耳。抑尤当知此类史料，若仅列举其一条两条，则可谓绝无意义绝无价值；其价值之发生，

全赖博搜而比观之耳。

以上所举例，皆吾前此所言抽象的史料也。然即具体的史料，亦可以此法求之。往往有一人之言行，一事之始末，在正史上觉其史料缺乏已极，及用力搜剔，而所获或意外甚丰。例如《史记》关于墨子之记述，仅得二十四字，其文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孟子荀卿列传》）此史料可谓枯竭极矣，而孙诒让生二千年后，能作一极博赡翔实之《墨子传》至数千言。（看《墨子间诂》）例如周宣王伐玁狁之役，《诗经》、《史记》、《竹书纪年》所述，皆仅寥寥数语，而王国维生三千年后，乃能将其将帅、其战线、其战状，详细考出，历历如绘。（看《雪堂丛刻》）此无他谬巧，其所据者皆人人共见之史料，彼其爬罗搜剔之术，操之较熟耳。又如指南针由中国人发明，此西史上所艳称也。然中国人对于此物之来历沿革，罕能言者。美人夏德（F. Hirth）所著《中国古代史》，则考之甚详。其所征引之书，则其一《韩非子》，其二《太平御览》引《鬼谷子》，其三《古今注》，其四《后汉书·张衡传》，其五《宋书·礼志》，其六《南齐书·祖冲之传》，其七《宋书·舆服志》，其八《续高僧传·一行传》，其九《格致镜原》引《本草衍义》，其十《梦溪笔谈》，其十一《朝野僉载》，其十二《萍洲可谈》，其十三《图书集成·车舆部》。以上所考，是否已备，虽未敢断，然吾侪读之，已能将此物之渊源，得一较明确之观念。夫此等资料，明明现存于古籍中，但非经济学者苦心搜辑，则一般人未由察见耳。

亦有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博搜旁证则能得意外之发现者。例如唐末黄巢之乱，曾大惨杀外国侨民，此可谓千年前之义和团也。旧史仅著“焚室庐杀人如刈”之一囫圇语，而他无征焉。九世纪时，阿刺伯人所著《中国见闻录》中一节云：“有

Gonfu者，为商舶荟萃地……纪元二百六十四年，叛贼 Punzo 陷 Gonfu，杀回、耶教徒及犹太、波斯人等十二万。……其后有五朝争立之乱，贸易中绝”等语。欧洲人初译读此录，殊不知所谓 Gonfu 者为何地，所谓 Punzo 者为何人。及经东西学者细加考证，乃知回教纪元二六四年，当景教纪元之八七七——八七八年，即唐僖宗乾符四年至五年也。而其年黄巢实寇广州。广州者，吾粤人至今犹称“广府”，知 Gonfu 即“广府”译音，而 Punzo 必黄巢也。吾侪因此一段记录，而得有极重要之历史上新智识：盖被杀之外国人多至十二万，则其时外人侨寓之多可想。吾侪因此引起应研究之问题有多种。例如：其一、当时中外通商何以能如此繁盛？其二，通商口岸是否仅在广州，抑尚有他处，其发达程度比较如何？其三，吾侪联想及当时有所谓“市舶司”者，其起源在何时，其组织何若，其权限何若？其四，通商结果，影响于全国民生计者何如？其五，关税制度可考见者何如？其六，今所谓领事裁判权制度者，彼时是否存在？其七，当时是否仅有外国人来，抑吾族亦乘此向外发展？其八，既有许多外人侨寓我国，其于吾族混合之关系如何？其九，西人所谓中国三大发明——罗盘针、制纸、火药——之输入欧洲，与此项史迹之关系何若？……吾侪苟能循此途径以致力研究，则因一项史迹之发现，可以引起无数史迹之发现。此类已经遗佚之史迹，虽大半皆可遇而不可求，但吾侪总须随处留心，无孔不入，每有所遇，断不放过。须知此等佚迹，不必外人记载中乃有之，本国故纸堆中，所存实亦不少，在学者之能施特别观察而已。

史料有为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遇此等事，治史者宜别搜索证据以补之或正之。明陈霆考出唐僖宗之崩以马践，宋太宗之崩以箭疮发，二事史册皆秘之不言。霆考证前事据《幸

蜀记》，考证后事据神宗谕滕章敏之言（《两山墨谈》卷十四）。前事在历史上无甚价值，虽佚不足顾惜。后事则太宗伐契丹，为虜所败，负伤遁归，卒以疮发而殁，此实宋代一绝大事，后此澶渊之盟，变法之议，靖康之祸，皆与此有直接间接关系。此迹湮灭，则原因结果之系统紊矣。计各史中类此者盖不乏。又不唯一二事为然耳，乃至全部官书，自行窜乱者，往往而有。《宋神宗实录》，有《目录》及《朱墨本》之两种，因廷臣争党见，各自任意窜改，致同记一事，两本或至相反。（看清蔡凤翔著《王荆公年谱》卷二十四《神宗实录考》）至清代而尤甚。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实录稿今入王氏《东华录》者乃乾隆间改本，与蒋氏《东华录》歧异之处已甚多。然蒋氏所据，亦不过少改一次之本耳，故如太宗后下嫁摄政王，世宗潜谋夺嫡等等宫廷隐慝，讳莫如深，自不待言。即清初所兴之诸大狱，亦掩其迹唯恐不密。例如顺治十八年之“江南奏销案”，一时缙绅被杀者十余人，被逮者四五百人，黜革者万三千余人，摧残士气，为史上未有之奇酷。然官书中并丝毫痕迹不可得见。今人孟森，据数十种文集笔记，钩距参稽，然后全案信史出焉。（见《心史丛刊》第一集）夫史料之偶尔散失者，其搜补也尚较易，故意湮乱者，其治理也益极难。此视学者侦察之能力何如耳。

今日史家之最大责任，乃在搜集本章所言之诸项特别史料。此类史料，在欧洲诸国史，经彼中先辈搜出者已十之七八，故今之史家，贵能善因其成而运独到之史识以批判之耳。中国则未曾经过此阶级，尚无正当充实之资料，何所凭借以行批判？漫然批判，恐开口便错矣。故吾本章所论，特注重此点。至于普通一事迹之本末，则旧籍具在，搜之不难，在治史者之如何去取耳。

第二，鉴别史料之法

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一曰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

有明非史实而举世误认为史实者，任执一人而问之曰，今之万里长城为何时物，其人必不假思索，立答曰秦始皇时。殊不知此答案最少有一大部误谬或竟全部误谬也。秦始皇以前，有燕之长城，赵之长城，齐之长城；秦始皇以后，有北魏之长城，北齐之长城，明之长城；具见各史。其他各时代小小增筑尚多。试一一按其道里细校之，将见秦时城线，所占乃仅一小部分，安能举全城以傅诸秦？况此小部分是否即秦故墟，尚属问题。欲解此问题，其关键在考证秦时筑城是否用砖抑版筑，吾于此事虽未得确证，然终疑用版筑为近。若果尔者，则现存之城，或竟无一尺一寸为秦时遗迹，亦未可知耳。常人每语及道教教祖，辄言是老子。试读老子五千言之著书，与后世道教种种矫诬之说，风马牛岂能相及？汉初君臣若窦后、文帝、曹参辈，著述家若刘安、司马谈辈，皆治老子之道家言，又与后世道教岂有丝毫相似？道教起源，明见各史，如《后汉书·襄楷传》所载楷事及宫崇、于吉等事，《三国志·张鲁传》所载鲁祖陵、父衡及骆曜、张角、张修等事，其妖妄煽播之迹，历历可见，此又与周时作守藏史之老子，岂有丝毫关系？似此等事，本有较详备之史料可作反证，然而流俗每易致误者，此实根于心理上一种幻觉，每语及长城辄联想始皇，每语及道教辄联想老子。此非史料之误，乃吾侪自身之误，而以所误诬史料耳。吾侪若思养成鉴别能力，必须将此种心理结习，痛加涤除，然后能向常人不怀疑之点能试怀疑；能对于素来不成问题之事项而引起问题。夫学问之道，必有怀疑然后有新问题发生，有新问题发生然后有研究，有研究然后有新发明。百学皆然，而治史特其一例耳。

顷所举例，吾命之曰局部之幻觉。此外尤有一般的幻觉焉——凡史迹之传于今者，大率皆经过若干人之口碑或笔述，而识其概者也。各时代人心理不同，观察点亦随之而异，各种史迹，每一度从新时代之人之脑中滤过，则不知不觉间辄微变其质。如一长河之水，自发源以至入海，中间经过之地所受之水，含有种种杂异之矿质，则河水色味，随之而变。故心理上的史迹，脱化原始史迹而丧失其本形者往往而有。例如《左传》中有名之五大战——韩、城濮、鞏、邲、鄢陵，吾脑际至今犹有极深刻之印象，觉此五役者为我国史中规模宏大之战事。其实细按史文，五役者皆一日而毕耳，其战线殆无过百里外者。语其实质，仅得比今闽、粤人两村之械斗。而吾侪动辄以之与后世国际大战争等量齐观者，一方面固由《左传》文章优美，其铺张分析的叙述，能将读者意识放大；一方面则由吾辈生当二千年后，习见近世所谓国家者所谓战争者如彼如彼，动辄以今律古，而不知所拟者全非其伦也。夫在货币交易或信用交易时代而语实物交易时代之史迹，在土地私有时代而语土地公有时代之史迹，在郡县官制或都市自治时代而语封建时代或部落时代之史迹，在平民自由时代而语贵族时代或教权时代之史迹，皆最容易起此类幻觉。幻觉一起，则真象可以全蔽。此治学之最宜戒惧也。

鉴别史料之误者或伪者，其最直捷之方法，则为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例如向来言中国佛教起源者，皆云汉明帝永平七年遣使臣经西域三十六国，入印度求得佛经佛像。但吾侪据《后汉书·西域传》及他书，确知西域诸国自王莽时已与中国绝，凡绝六十五年，至明帝永平十六年始复通，永平七年正西域与匈奴连结入寇之时，安能派使通过其国？又如言上海历史者，每托始于战国时楚春申君黄歇，故共称其地曰申江，曰黄浦，曰歇浦。但近代学

者从各方面研究之结果，确知上海一区，在唐以前尚未成陆地，安得有二千余年春申君之古迹？似此类者，其反证力甚强，但得一而已足。苟非得更强之反证的反证，则其误伪终不能回护。如此人或诬直不疑盗嫂，不疑曰，我乃无兄，倘不能别求得直不疑有兄之确据，则盗嫂问题，已无复讨论之余地也。

然历史上事实，非皆能如此其简单而易决。往往有明知其事极不可信，而苦无明确之反证以折之者。吾侪对于此类史料，第一步，只宜消极的发表怀疑态度，以免为真相之蔽。第二步，遇有旁生的触发，则不妨换一方向从事研究，立假说以待后来之再审定。例如旧史言伏羲、女娲皆人首蛇身，神农牛首人身，言蚩尤铜头铁额。吾辈今日终无从得直截反证，确证诸人之身首头额与吾辈同也；但以情理度之，断言世界决无此类生物而已。又如殷之初祖契，周之初祖后稷，旧史皆谓为帝嚳之子，帝尧之异母弟，同为帝舜之臣。吾辈今日无从得一反证以明其决不然也。虽然，据旧史说，尧在位七十年乃举舜为相，舜相尧又二十八年，尧即位必当在帝嚳崩后。假今契、稷皆嚳遗腹子，至舜即位时亦当皆百岁，安得复任事？且尧有此圣弟而不知，又何以尧？且据《诗经》所载，殷人之颂契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人之颂稷也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彼二诗者皆所以铺张祖德，倘稷、契而系出帝嚳，岂有不引以为重之理？是故吾侪虽无积极的反证，以明稷、契为别一人之子，然最少亦可以消极的认其非嚳子尧弟也。又如旧史称周武王崩后，继立者为成王，成王尚少，周公摄政。吾辈今日亦无直接之反证以明其不然也。但旧史称武王九十三而终，藉令武王七十而生成王，则成王即位时已二十三，不可谓幼。七八十得子，生理上虽非必不可能，然实为稀有，况吾侪据《左传》，确知成王尚有邗、晋、应、韩之四弟，成王居长嫡，下有

诸弟，嗣九十三岁老父之位而犹在冲龄，岂合情理？且犹有极不可解者，《书经·康诰》一篇，为康叔封卫时之策命，其发端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所谓“王”者谁耶？谓武王耶？卫之建国，确非在武王时；谓成王耶？康叔为成王叔父，何得称为弟而呼以小子？然则继武王而践祚者是否为成王，周公是否摄政，抑更有进于摄政，吾侪不能不大疑。

怀疑之结果，而新理解出焉。前段所举第一例——人首蛇身等等，吾侪既推定其必无是理。然则何故有此等传说耶？吾侪可以立一假说，谓伏羲、神农等皆神话的人物，非历史的人物。凡野蛮时代的人，对于幻境与实境之辨，常不明了，故无论何族最初之古史，其人物皆含半神半人的性质。然则吾侪可以假定羲、农诸帝，实古代吾族所祀之神，人首蛇身等，即其幻想中之神象，而缘幻实不分之故，口碑相传，确以为曾有如此形象之人。指为真，固非真，指为伪，亦确非有人故为作伪也。如所举第二例——稷、契决非嚳子，又不能知其为何人之子，汉儒且有“圣人无父，感天而生”之说。然则稷、契果无父耶？吾侪可以立一假说，谓稷、契亦有父亦无父，彼辈皆母系时代人物，非父系时代人物。吾侪闻近代欧美社会学家言，已知社会进化阶级，或先有母系，然后有父系。知古代往往一部落之男子为他部落女子所公有，一部落女子为他部落男子所公有，在彼时代，其人固宜“知有母不知有父”，非不欲知，无以知也。契只知其为简狄之子耳，稷只知其为姜嫄之子耳，父为谁氏，则无稽焉，于是乎“有吞鸟卵而生”，“履大人迹而生”之种种神话。降及后世父系时代，其子孙以无父为可耻，求其父而不得，则借一古帝以自重，此嚳子之说所由起也。亦有既求父不得，即不复求，转而托“感天”以自重。殊不知古代之无父感天者不必圣人，盖尽人莫不然也。如

所举第三例——成王若继武王而立，其年决非幼，无须摄政。卫康叔受封时，其王又确非康叔之侄，而为康叔之兄。吾侪于是可以立一假说，谓继武王而立者乃周公而非成王；其时所行者乃兄终弟及制，非传子立嫡制。吾侪已知殷代诸王，兄弟相及者过半，周初沿袭殷制，亦情理之常。况以《史记·鲁世家》校之，其兄终弟及者亦正不少。然则周公或当然继武王而立，而后此之“复子明辟”，乃其特创之新制，盖未可知耳。以上诸例，原不过姑作假说，殊不敢认为定论，然而不失为一种新理解，则昭然矣。然则吾侪今日能发生种种新理解，而古人不能者，何故耶？古人为幻觉所蔽而已。生息于后世家族整严之社会中，以为知母不知父，惟禽兽为然，稷、契之圣母，安有此事？生息于后世天泽名分之社会中，以夺嫡为篡逆，谓周公大圣，岂容以此相污？是以数千年，非惟无人敢倡此说，并无人敢作此念。其有按诸史迹而矛盾不可通者，宁枉弃事实以迂回傅会之而已。吾侪生当今日，有种种“离经畔道”之社会进化说以变易吾脑识，吾于是乃敢于怀疑，乃敢于立假说。假说既立，经几番归纳的研究之后，而假竟变为定案，亦意中事耳。然则此类之怀疑，此类之研究，在学问上为有用耶？为无用耶？吾敢断言曰有用也。就表面论，以数千年三五陈死人之年龄关系为研究之出发点，刺刺考证，与现代生活风马牛不相及，毋乃玩物丧志？殊不知苟能由此而得一定案，则消极方面，最少可以将多年经学家之傅会的聚讼一扫而空，省却人无限精力；积极方面最少可以将社会学上提出社会组织进化阶级之假说，加一种有力之证明。信能如是，则其贡献于学术界者不已多耶？

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当何所适从耶？论原则，自当以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先者以时代言，谓距史迹发生时愈近者，其

所制成传留之史料愈可信也。近者以地方言，亦以人的关系言，谓据史迹发生地愈近，且其记述之人与本史迹关系愈深者，则其所言愈可信也。例如此次欧战史料，百年后人所记者，不如现时人所记者之详确；现时人所记者，又不如五年前人所记之详确；此先后之说也。同是五年前人，中国人所记，必不如欧洲人；欧洲普通人所记，必不如从军新闻记者；新闻记者所记，必不如在营之军士；同是在营军士，仅听号令之小卒所记，必不如指挥之将校；同是将校，专担任一战线之裨将所记，必不如综览全局之总参谋；此远近之说也。是故凡有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吾侪应认为第一等史料。例如一八七六年之普奥战争，两国事后皆在总参谋部妙选人才编成战史，此第一等史料也。欲知十九世纪末欧洲外交界之内幕，则《俾斯麦日记》其第一等史料也。欲知卢梭、科尔朴特金之事迹及其感想，彼所作《自传》或《忏悔录》其第一等史料也。如司马迁之《自序》，王充之《自纪》，法显、玄奘、义净之游记或自传，此考证各本人之事迹思想或其所游地当时状态之第一等史料也。^①如辛弃疾《南烬纪闻录》、《窃愤录》所采阿计替笔记，此考证宋徽、钦二宗在北庭受辱情状之第一等史料也。^②如李秀成被俘时之供状，此考证洪、杨内部情状之第一等史料也。^③此类史料，无论在何国，皆不易多得，年代愈远，则其流传愈稀。苟有一焉，则史家宜视为瑰宝。彼其本身，饶有陵盖他种史料之权威；他种史料有与彼矛盾者，可据彼以正之也。

前段所论，不过举其概括的原则，以示鉴别之大略标准，但此原则之应用，有时尚须分别观之。试仍借此欧战史料为例：若专以时代接近程度定史料价值之高下，则今日已在战后两三年，其所編集自不如战时出版物之尤为接近，宜若彼优于此；然而实

际上殊不尔。当时所记，不过断片的史迹，全不能觑出其联络关系。凡事物之时间的联络关系，往往非俟时间完全经过之后不能比勘而得。故完美可观之战史，不出在战时而出在战后也。若以事局接近程度定价值之高下，则观战新闻记者所编述，自应不如军人；一般著作家所编述，自应不如观战之新闻记者。然实际上亦未必尽然。盖局中人为剧烈之感情所蔽，极易失其真相；即不尔者，或缠绵于枝叶事项，而对于史迹全体，反不能得要领。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又不特局中者为然也，即在局外者，犹当视其人提掣观察之能力如何，视其人串叙描写之技术如何，而其作品之价值，相去可以悬绝焉。是故以战史论，若得一文学技术极优长之专门大史家而又精通军事学者，在总司令部中为总书记对于一战役始终其事，（最好能兼为两军总司令之总书记）则其所记述者，自然为史料之无上上品。然而具备此条件者则安能得？既已不能，则战场上—寻常军士所记，或不如作壁上观之—有常识的新闻记者；奔走战线仅有常识之—新闻记者，其所记，或不如安坐室中参稽战报之—专门史学家也。

最先最近之史料则最可信，此固原则也。然若过信此原则，有时亦可以陷于大误。试举吾经历之两小事为例：一，明末大探险家大地理学者徐霞客，卒后其挚友某为之作墓志，宜若最可信矣。一日吾与吾友丁文江谈及霞客，吾谓其曾到西藏，友谓否；吾举墓铭文为证，友请检《霞客游记》共读，乃知霞客虽有游藏之志，因病不果，从丽江折归，越年余而逝。吾固悔吾前此读游记之粗心；然为彼铭墓之挚友，粗心乃更过我，则真可异也。二，玄奘者，我国留学生宗匠，而思想界一巨子也，吾因欲研究其一生学业进步之迹，乃发心为之作年谱。吾所凭藉之资料甚富，合

计殆不下二十余种，而其最重要者，一为道宣之《续高僧传》，二为慧立之《慈恩法师传》。二人皆奘之亲受业弟子，为其师作传，正吾所谓第一等史料也。乃吾研究愈进，而愈感困难，两传中矛盾之点甚多，或甲误，或乙误，或甲乙俱误。吾列举若干问题，欲一一悉求其真，有略已解决者，有卒未能解决者。试举吾所认为略已解决之一事，借此以示吾研究之径路：玄奘留学凡十七年，此既定之事实也；其归国在贞观十九年正月，此又既定之事实也。然则其初出游果在何年乎？自两传以及其他有关系之资料，皆云贞观三年八月，咸无异辞。吾则因怀疑而研究，研究之结果，考定为贞观元年。吾曷为忽对于三年说而起怀疑耶？三年至十九年，恰为十七个年头，本无甚可疑也，吾因读《慈恩传》，见奘在于阗所上表中有“贞观三年出游今已十七年”等语，上表年月传虽失载，然循按上下文，确知其在贞观十八年春夏之交，吾忽觉此语有矛盾。此为吾怀疑之出发点。从贞观十八年上溯，所谓十七年者，若作十七个年头解，其出游时可云在贞观二年；若作满十七年解，则应为贞观元年。吾于是姑立元年二年之两种假说以从事研究，吾乃将《慈恩传》中所记行程及各地淹留岁月详细调查，觉奘自初发长安以迄归达于阗，最少亦须满十六年有半之时日，乃敷分配，吾于是渐弃其二年之假说，而倾向于元年之假说。虽然，现存数十种资料皆云三年，仅恃此区区之反证而臆改之，非学者态度所宜出也。然吾不忍弃吾之假说，吾仍努力前进。吾已知奘之出游，为冒禁越境，然冒禁何以能无阻？吾查《续高僧传》本传，见有“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数语，吾因此知奘之出境，乃搀在饥民队中，而其年之饥，实因霜灾。吾乃亟查贞观三年是否有霜灾，取新旧唐书《太宗纪》阅之，确无是事。于是三年说已消极的得一有力之反证。再查元年，则《新

书》云：“八月河南、陇右边州霜。”又云：“十月丁酉，以岁饥减膳。”《旧书》云：“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又云：“是岁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是元年确有饥荒，而成灾又确由霜害，于是吾之元年说，忽积极的得一极有力之正证矣。惟《旧书》于二年复有“八月河南、河北大霜人饥”一语，《新书》则无有，不知为《旧书》误复耶？抑两年连遭霜灾，而《新书》于二年有阙文耶？如是则二年之假说，仍有存立之余地。吾决意再觅证据以决此疑。吾乃研究奘途中所遇之人，其名之可考见者凡三：一曰凉州都督李大亮，二曰高昌王麹文泰，三曰西突厥可汗叶护。吾查《大亮传》及《高昌传》，见二人皆自元年至四年在其位，不成问题。及查《西突厥传》，乃忽有意外之获：两书皆言叶护于贞观初被其叔所弑，其叔僭立，称俟毗可汗，然皆未著其被弑在何年。惟《新书》云：“贞观四年俟毗可汗来请昏，太宗诏曰，突厥方乱，何以昏为？”是叶护被弑，最晚亦当在贞观三年前。再按《慈恩传》所纪奘行程，若果以贞观三年八月发长安者，则当以四年五月初乃抵突厥，其时之可汗，已为俟毗而非叶护矣。于是三年说之不能成立，又得一强有力之反证。吾犹不满足，必欲得叶护被弑确年以为快。吾查《资治通鉴》，得之矣！贞观二年也！吾固知《通鉴》必有所本，然终以不得之于正史，未能踌躇满志。吾发愤取新旧《唐书》诸蛮夷传凡与突厥有关系之国遍翻之，卒乃在《新书·薛延陀传》得一条云：“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弑。”于是叶护弑年无问题矣。玄奘之行，既假霜灾，则无论为元年为二年为三年，皆以八月后首途，盖无可疑；然则非惟三年说不能成立，即二年说亦不能成立。何则？二年八月后首途，必三年五月乃抵突厥，即已不及见叶护也。吾至是乃大乐！自觉吾之怀疑有效，吾之研究不虚，吾所立“玄奘贞观元年首途留学”之假说，殆成铁案矣！

其有小小不可解者，则何以诸书皆同出一辙，竟无歧异？然此亦易解，诸书所采，同一蓝本，蓝本误则悉随之而误矣。再问蓝本何故误？则或因逆溯十七个年头，偶未细思，致有此失；甚至或为传写之讹，亦未可知也。再问十八年玄奘至上之表文何以亦误？则或后人据他书校改，亦在情理中耳。吾为此问题，凡费三日之力，其所得结果如此——吾知读者必生厌矣。此本一极琐末之问题，区区一件事三两年之出入，非惟在全部历史中无关宏旨，即在玄奘本传中亦无关宏旨。吾自治此，已不免玩物丧志之消，乃复缕述千余言以滥占本书之篇幅，吾不能不向读者告罪。虽然，吾著本篇之宗旨，凡务举例以明义而已。吾今详述此一例，将告读者以读书曷为而不可以盲从。虽以第一等史料如慧立、道宣之传玄奘者，其误谬犹且如是也；其劳吾侪以鉴别犹且如是也。又将告读者以治学当如何大无畏，虽以数十种书万口同声所持之说，苟不惬于吾心，不妨持异同。但能得有完证，则绝无凭藉之新说，固自可以成立也。吾又以为善治学者，不应以问题之大小而起差别观。问题有大小，研究一问题之精神无大小。学以求真而已，大固当真，小亦当真。一问题不入吾手则已，一入吾手，必郑重忠实以赴之。夫大小岂有绝对标准？小者轻轻放过，寢假而大者亦轻轻放过，则研究精神替矣。吾又以为学者而诚欲以学饷人，则宜勿徒饷以自己研究所得之结果，而当兼饷以自己何以能研究得此结果之途径及其进行次第，夫然而所饷者乃为有源之水而挹之不竭也。吾诚不敢自信为善于研究，但本篇既以研究法命名，吾窃思宜择一机会，将吾自己研究所历之甘苦，委曲传出，未尝不可以为学者之一助。吾故于此处选此一小问题可以用千余言说明无遗者，详述吾思路所从入，与夫考证所取资，以读读者之清听。吾研究此问题所得结果虽甚微末，然不得不谓为甚良。其所

用研究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亦即近代科学家所应用之归纳研究法也。读者举一反三，则任研究若何大问题，其精神皆若是而已。吾此一段，乃与吾全书行文体例不相应，读者恕我！吾今当循吾故轨，不更为此喋喋矣。

史料可分为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直接的史料者，其史料当该史迹发生时或其稍后时，即已成立。如前所述《慈恩传》、《窃愤录》之类皆是也。此类史料，难得而可贵，吾既言之矣。然欲其多数永存，在势实有所不能。书籍新陈代谢，本属一般公例，而史部书之容易湮废，尤有其特别原因焉：一，所记事实，每易触时主之忌，故秦焚书而“诸侯史记”受祸最烈。试检明、清两朝之禁毁书目，什有九皆史部也。二，此类书真有价值者本不多，或太琐碎，或涉虚诞，因此不为世所重，容易失传。不惟本书间有精要处，因杂糅于粗恶材料中而湮没，而且凡与彼同性质之书，亦往往被同视而俱湮没。三，其书愈精要者，其所叙述愈为局部的。凡局部的致密研究，非专门家无此兴味；一般人对于此类书籍，辄淡漠置之，任其流失。以此种种原因，故此类直接史料，如浪淘沙，滔滔代尽，势不能以多存。就令存者甚多，又岂人生精力所能遍读？于是乎在史学界占最重要位置者，实为间接的史料。间接的史料者，例如左丘以百二十国宝书为资料而作《国语》，司马迁以《国语》、《世本》、《战国策》……等书为资料而作《史记》。《国语》、《史记》之成立，与其书中所叙史迹发生时代之距离，或远至百年千年；彼所述者，皆以其所见之直接史料为蓝本，今则彼所见者吾侪已大半不复得见，故谓之间接。譬诸纺织，直接史料则其原料之棉团，间接史料则其粗制品之纱线也。吾侪无论为读史为作史，其所接触者多属间接史料，故鉴别此种史料方法，为当面最切要之一问题。

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例如研究三代以前史迹，吾侪应信司马迁之《史记》，而不信谯周之《古史考》，皇甫谧之《帝王世纪》，罗泌之《路史》。何则？吾侪推断谯周、皇甫谧、罗泌所见直接史料，不能出司马迁所见者以外，迁所不知者，周等何由知之也？是故彼诸书与《史记》有异同者，吾侪宜引《史记》以驳正诸书。反之，若《竹书纪年》与《史记》有异同，吾侪可以引《纪年》以驳正《史记》。何则？魏史官所见之直接原料，或多为迁之所不及见也。此最简单之鉴别标准也。

虽然，适用此标准，尚应有种种例外焉。有极可贵之史料而晚出或再现者，则其史料遂为后人所及见，而为前人所不及见。何谓晚出者？例如德皇威廉第二与俄皇尼古拉第二来往私函数十通，研究十九世纪末外交史之极好史料也，然一九二〇年以前之人不及见，以后之人乃得见之。例如《元史》修自明初，岂非时代极早？然吾侪宁信任五百年后魏源或柯劭忞之《新元史》，而不信任宋濂等之《旧元史》。何则？吾侪所认为元代重要史料如《元秘史》、《亲征录》……等书，魏、柯辈得见，而明初史馆诸人不得见也。何谓再现者？例如罗马之福林，邦津之古城，埋没土中二千年，近乃发现，故十九世纪末人所著罗马史其可信任之程度，乃过于千年前人所著也。例如殷墟甲文，近乃出土，吾侪因此得知殷代有两古王为《史记·三代世表》所失载者，盖此史料为吾侪所见，而为司马迁所不得见也。

不特此也，又当察其人史德何如，又当察其人史识何如，又当察其人所处地位何如。所谓史德者，著者品格劣下，则其所记载者宜格外慎察。魏收《魏书》，虽时代极近，然吾侪对于彼之信

任，断不能如信任司马迁、班固也。所谓地位者，一事件之真相，有时在近代不能尽情宣布，在远时代乃能之。例如陈寿时代，早于范曄，然记汉、魏易代事，曄反视寿为可信。盖二人所及见之直接史料，本略相等，而寿书所不能昌言者，曄书能昌言也。所谓史识者，同是一直接史料，而去取别择之能力，存乎其人。假使刘知几自著一史，必非李延寿、令狐德棻辈所能及。元人修《宋史》，清人修《明史》，同为在异族之朝编前代之史，然以万斯同史稿作蓝本所成之《明史》，决非脱脱辈监修之《宋史》所能及也。要而论之，吾侪读史作史，既不能不乞灵于间接的史料，则对于某时代某部门之史料，自应先择定一两种价值较高之著述以作研究基本。选择之法，合上列数种标准以衡之，庶无大过。至于书中所叙史实，则任何名著，总不免有一部分不实不尽之处。质言之，则无论何项史料，皆须打几分折头。吾侪宜刻刻用怀疑精神唤起注意，而努力以施忠实之研究，则真相庶可次第呈露也。

右论正误的鉴别法竟。次论辨伪的鉴别法。辨伪法先辨伪书，次辨伪事。

伪书者，其书全部分或一部分纯属后人伪作，而以托诸古人也。例如现存之《本草》号称神农作，《素问内经》号称黄帝作，《周礼》号称周公作，《六韬》、《阴符》号称太公作，《管子》号称管仲作，……假使此诸书而悉真者，则吾国历史便成一怪物。盖社会进化说全不适用，而原因结果之理法亦将破坏也。文字未兴时代之神农，已能作《本草》，是谓无因；《本草》出见后若干千年，而医学、药学上更无他表见，是谓无果。无因无果，是无进化。如是，则吾侪治史学为徒劳。是故苟无鉴别伪书之识力，不惟不能忠实于史迹，必至令自己之思想途径，大起混乱也。

书愈古者，伪品愈多。大抵战国秦汉之交有一大批伪书出现，

《汉书·艺文志》所载三代以前书，伪者殆不少。新莽时复有一大批出现，如《周礼》及其他古文经皆是。晋时复有一大批出现，如晚出《古文尚书》、《孔子家语》、《孔丛子》等。其他各时代零碎伪品亦尚不少，且有伪中出伪者，如今本《鬼谷子》、《鶡冠子》等。莽、晋两期，刘歆、王肃作伪老手，其作伪之动机及所作伪品，前清学者多已言之，今不赘引。战国、秦汉间所以多伪书者，一、因当时学者，本有好“托古”的风气，己所主张，恒引古人以自重。（说详下）本非有意捏造一书，指为古人所作，而后人读之，则几与伪托无异。二、因当时著述家，本未尝标立一定之书名，且亦少泐成定本，展转传钞，或合数种而漫题一名，或因书中多涉及某人，即指为某人所作。三、因经秦焚以后，汉初朝野人士，皆汲汲以求遗书为务。献书者往往剿钞旧籍，托为古代某名人所作以售炫。前两项为战国末多伪书之原因，后一项为汉初多伪书之原因。

伪书有经前人考定已成铁案者，吾侪宜具知之，否则征引考证，徒费精神。例如今本《尚书》有《胤征》一篇，载有夏仲康时日食事，近数十年来，成为欧洲学界一问题，异说纷争，殆将十数，致劳汉学专门家、天文学专门家合著专书以讨论^④。殊不知《胤征》篇纯属东晋晚出之伪古文，经清儒阎若璩、惠栋辈考证，久成定讞。仲康其人之有无，且未可知，遑论其时之史迹？欧人不知此桩公案，至今犹刺刺论难，由吾侪观之，可笑亦可怜也。欲知此类伪书，略翻清《四库书目提要》，便可得梗概，《提要》中指为真者未必遂真，指为伪者大抵必伪，此学者应有之常识也。

然而伪书孔多，现所考定者什仅二三耳，此外古书或全部皆伪或真伪杂糅者，尚不知凡几。吾侪宜拈出若干条鉴别伪书之公例，作自己研究标准焉。

(一)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例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名，虽见《左传》，“晋乘、楚梲杌”之名，虽见《孟子》，然汉、隋、唐《艺文》、《经籍》诸志从未著录，司马迁以下未尝有一人征引，可想见古代或并未尝有此书，即有之，亦必秦火前后早已亡佚。而明人所刻《古逸史》，忽有所谓《三坟记》、《晋史乘》、《楚史梲杌》等书。凡此类书，殆可以不必调查内容，但问名即可知其伪。

(二)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伪。例如最近忽发现明钞本《慎子》一种，与今行之四库本守山阁本全异，与隋唐《志》、《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題》等所记篇数，无一相符，其流传之绪又绝无可考。吾侪乍睹此类书目，便应怀疑，再检阅内容，则可定为明人伪作也^⑤。

(三)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例如汉河内女子所得《泰誓》，晋梅赜所上《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皆因来历暧昧，故后人得怀疑而考定其伪。又如今本《列子》八篇，据张湛序言由数本拼成，而数本皆出湛戚属之家，可证当时社会，绝无此书，则吾辈不能不致疑。

(四)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例如今所称《神农本草》，《汉书·艺文志》无其目，知刘向时决未有此书。再检《隋书·经籍志》以后诸书目，及其他史传，则知此书殆与蔡邕、吴普、陶弘景诸人有甚深之关系，直至宋代然后规模大具。质言之，则此书殆经千年间许多人心力所集成。但其书不惟非出神农，即西汉以前人，参预者尚极少，殆可断言也^⑥。

(五)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左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

则今本必伪。例如古本《竹书纪年》有夏启杀伯益，商太甲杀伊尹等事；又其书不及夏禹以前事。此皆原书初出土时诸人所亲见，信而有征者^⑦。而今本记伯益、伊尹等文，全与彼相反，其年代又托始于黄帝，故知决非汲冢之旧也。

(六)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例如《越绝书》，《隋志》始著录，题子贡撰。然其书既未见《汉志》，且书中叙及汉以后建置沿革，故知其书不惟非子贡撰，且并非汉时所有也。又如《管子》、《商君书》，《汉志》皆著录，题管仲、商鞅撰。然两书各皆记管、商死后之人名与事迹，故知两书决非管、商自撰，即非全伪，最少亦有一部分属乱也。

(七)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例如《史记》为司马迁撰，固毫无疑问，然迁自序明言“讫于麟止”，今本不惟有太初天汉以后事，且有宣、元、成以后事，其必非尽为迁原文甚明。此部分既有窜乱，则他部分又安敢保必无窜乱耶^⑧？

(八)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例如今《道藏》中有刘向撰《列仙传》，其书《隋志》已著录。书中言诸仙之荒诞，固不俟辩，其自序云，“七十四人已见佛经”，佛经至后汉桓、灵时始有译本，上距刘向之没，将二百年，向何从知有佛经耶？即据此一语，而全书之伪，已无遁形。

(九)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例如《涅槃经》佛说云：“从今日始，不听弟子食肉”；《入楞伽经》佛说云：“我于《象腋》、《央掘魔》、《涅槃》、《大云》等一切《修多罗》中，不听食肉。”《涅槃经》共认为佛临灭度前数小时所说，既《象腋》等经有此义，何得云“从今日始”？且《涅槃》既佛最后所说经，

《入楞伽》何得引之？是《涅槃》、《楞伽》，最少必有一伪，或两俱伪也。

以上九例，皆据具体的反证而施鉴别也。尚有可以据抽象的反证而施鉴别者：

（十）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要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例如东晋晚出《古文尚书》，比诸今文之《周诰》、《殷盘》，截然殊体。故知其决非三代以上之文。又如今本《关尹子》中有“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识生，故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等语，此种纯是晋、唐翻译佛经文体，决非秦、汉以前所有，一望即知。

（十一）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例如《汉书·艺文志》农家有《神农》二十篇，自注云：“六国时诸子托诸神农。”此书今虽不传，然《汉书·食货志》称晁错引神农之教云：“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此殆晁错所见《神农书》之原文。然石城、汤池、带甲百万等等情状，决非神农时代所能有，故刘向、班固指为六国人伪托，非武断也。

（十二）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例如今本《管子》，有“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等语，此明是墨翟、宋钲以后之思想，当管仲时，并寝兵、兼爱等学说尚未有，何所用其批评反对者？《素问》、《灵枢》中言阴阳五行，明是邹衍以后之思想，黄帝时安得有此耶⑩？

以上十二例，其于鉴别伪书之法，虽未敢云备，循此以推，

所失不远矣。一面又可以应用各种方法，以证明某书之必真：

（一）例如《诗经》：“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经六朝、唐、元、清诸儒推算，知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确有日食。中外历对照，应为西纪前七七六年，欧洲学者亦考定其年阳历八月二十九日中国北部确见日食。与前所举《胤征篇》日食异说纷纭者正相反。因此可证《诗经》必为真书，其全部史料皆可信。

（二）与此同例者，如《春秋》所记“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食”、“宣公八年秋七月甲子日食”。据欧洲学者所推算，前者当纪前七零九年七月十七日，后者当纪前六零一年九月二十日，今山东兖州府确见日食。因此可证当时鲁史官记事甚正确。而《春秋》一书，除孔子寓意褒贬所用笔法外，其所依鲁史原文，皆极可信。

（三）更有略同样之例，如《尚书·尧典》所记中星，“仲春日中星昴，仲夏日中星火”等，据日本天文学者所研究，西纪前二千四五百年时确是如此。因此可证《尧典》最少应有一部分为尧、舜时代之真书。

（四）书有从一方面可认为伪，从他方面可认为真者。例如现存十三篇之《孙子》，旧题春秋时吴之孙武撰。吾侪据其书之文体及其内容，确不能信其为春秋时书。虽然，若谓出自秦、汉以后，则文体及其内容亦都不类。《汉书·艺文志》兵家本有《吴孙子》、《齐孙子》之两种，“吴孙子”则春秋时之孙武，“齐孙子”则战国时之孙臆也。此书若指为孙武作，则可决其伪；若指为孙臆作，亦可谓之真。此外如《管子》、《商君书》等，性质亦略同。若指定为管仲、商鞅所作则必伪；然其书中大部分要皆出战国人手，

若据以考战国末年思想及社会情状，固绝佳的史料也。乃至《周礼》谓为周公作固伪，若据以考战国、秦、汉间思想制度，亦绝佳的史料也。

（五）有书中某事项，常人共指斥以证其书之伪，吾侪反因此以证其书之真者。例如前所述《竹书纪年》中“启杀益，太甲杀伊尹”两事，后人因习闻《孟子》、《史记》之说，骤睹此则大骇。殊不思孟子不过与魏安僖王时史官同时，而孟子不在史职，闻见本不逮史官之确，司马迁又不及见秦所焚之诸侯史记，其记述不过踵孟子而已，何足据以难《竹书》？而论者或因此疑《竹书》之全伪，殊不知凡作伪者必投合时代心理，经汉、魏儒者鼓吹以后，伯益、伊尹辈早已如神圣不可侵犯，安有晋时作伪书之人乃肯立此等异说以资人集矢者？实则以情理论，伯益、伊尹既非超人的异类，逼位谋篡，何足为奇？启及太甲为自卫计而杀之，亦意中事。故吾侪宁认《竹书》所记为较合于古代社会状况。《竹书》既有此等记载，适足证其不伪；而今本《竹书》削去之，则反证其伪也。又孟子因《武成》“流血漂杵”之文，乃叹“尽信书不如无书”，谓“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应如此。推孟子之意，则《逸周书》中《克殷》、《世俘》诸篇，盖为伪作无疑。其实孟子理想中的“仁义之师”，本为历史上不能发生之事实，而《逸周书》叙周武王残暴之状，或反为真相。吾侪所以信《逸周书》之不伪，乃正以此也。

（六）无极强之反证足以判定某书为伪者，吾侪只得暂认为真。例如《山海经》、《穆天子传》，以吾前所举十二例绳之，无一适用者。故其书虽诡异，不宜凭武断以吐弃之。或反为极可宝之史料，亦未可知也。

以上论鉴别伪书之方法竟，次当论鉴别伪事之方法。

伪事与伪书异，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有伪事也。事之伪者

与误者又异，误者无意失误，伪者有意虚构也，今请举伪事之种类：

(一) 其史迹本为作伪的性质，史家明知其伪而因仍以书之者。如汉、魏、六朝篡禅之际，种种作态，即其例也。史家记载，或仍其伪相，如陈寿；或揭其真相，如范曄。试列数则资比较：

《魏志·武帝纪》：	《后汉书·献帝纪》：
天子以公领冀州牧	曹操自领冀州牧
汉罢三公官置丞相	曹操自为丞相
以公为丞相	
天子使郗虑策命公	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为魏公加九锡	
汉帝以众望在魏乃	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
召群公卿士使张音	
奉玺绶禅位	

此等伪迹昭彰，虽仍之不甚足以误人，但以云史德，终不宜尔耳。

(二) 有虚构伪事而自著书以实之者，此类事在史中殊不多觐。其最著之一例，则隋末有妄人曰王通者，自比孔子，而将一时将相若贺若弼、李密、房玄龄、魏征、李勣等，皆攀认为其门弟子，乃自作或假手于其子弟以作所谓《文中子》者，历叙通与诸人问答语，一若实有其事。此种病狂之人，妖诬之书，实人类所罕见。而千年来所谓“河汾道统”者，竟深入大多数俗儒脑中，变为真史迹矣。呜呼！读者当知，古今妄人非仅一王通，世所传墓志、家传、行状之属，汗牛充栋，其有以异于《文中子》者，恐不过程度问题耳。

(三) 有事迹纯属虚构，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资

格，几令后人无从反证者。例如前清洪杨之役，有所谓贼中谋主洪大全者，据云当发难时，被广西疆吏擒杀。然吾侪乃甚疑此人为子虚乌有，恐是当时疆吏冒功，影射洪秀全之名以捏造耳。虽然，既已形诸章奏，登诸实录，吾侪欲求一完而强之反证，乃极不易得。兹事在今日，不已俨然成为史实耶？窃计史迹中类此者亦殊不少。治史者谓宜常以老吏断狱之态临之，对于所受理之案牍，断不能率尔轻信。若不能得确证以释所疑，宁付诸盖阙而已。

（四）有事虽非伪，而言之过当者。子贡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庄子云：“两善必多溢美之言，两恶必多溢恶之言。”王充云：“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愜于心。”是故无论何部分之史，恐“真迹放大”之弊，皆所不免。《论衡》中《语增》、《儒增》、《艺增》诸篇所举诸事，皆其例也。况著书者无论若何纯洁，终不免有主观的感情夹杂其间。例如王闳运之《湘军志》，在理宜认为第一等史料者也，试读郭嵩焘之《湘军志曾军篇书后》，则知其不实之处甚多。又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五）史文什九皆经后代编史者之润色，故往往多事后增饰之语。例如《左传·庄二十二年》记陈敬仲卜辞，所谓“有妣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等语，苟非田氏篡齐后所记，天下恐无此确中之预言。《襄二十九年》记吴季札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苟非三家分晋后所记，恐亦无此确中之预言也。乃至如诸葛

亮之《隆中对》，于后来三国鼎足之局若操券以待，虽曰远识之人，鉴往知来，非事理所不可能，然如此铢黍不忒，实足深怪。试思当时备、亮两人对谈，谁则知者？除非是两人中之一人有笔记，不然，则两人中一人事后与人谈及，世乃得知耳。事后之言，本质已不能无变，而再加以修史者之饰，故吾侪对于彼所记，非“打折头”不可也。

（六）有本意并不在述史，不过借古人以寄其理想，故书中所记，乃著者理想中人物之言论行事，并非历史上人物之言论行事。此种手段，先秦诸子多用之，一时成为风气。《孟子》言“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此语最得真相。先秦诸子，盖最喜以今人而为古人之言者也。前文述晁错引“神农之教”，非神农之教，殆许行之徒之教也。岂惟许行？诸子皆然。彼“言必称尧舜”之孟子，吾侪正可反唇以稽之曰，“有为尧舜之言者孟轲”也。此外如墨家之于大禹，道家、阴阳家之于黄帝，兵家之于太公，法家之于管仲，莫不皆然。愈推重其人，则愈举己所怀抱之理想以推奉之，而其人之真面目乃愈淆乱。《韩非子》云：“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谁将使定儒、墨之诚乎？”是故吾侪对于古代史料，一方面患其太少，一方面又患其太多。贪多而失真，不如安少而阙疑也已。

人类非机械，故史迹从未有用“印板文字”的方式，阅时而再现者。而中国著述家所记史迹，往往不然。例如尧有丹朱，舜必有商均；舜避尧之子于南河，禹必避舜之子于阳城。桀有妹喜，纣必有妲己；桀有酒池，纣必有肉林；桀有倾宫，纣必有琼室；桀有玉杯，纣必有象箸；桀杀龙逢，纣必杀比干；桀囚汤于夏台，纣必囚文王于羑里；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出奔商，商之将亡，内史向挚必出奔周。此类乃如骈体文之对偶，枝枝相对，叶叶相

当，天下安有此情理？然则所谓桀、纣如何如何者，毋乃仅著述家理想中帝王恶德之标准？所谓杀邓析、少正卯云云者，毋乃仅某时代之专制家所捏造以为口实？（邓析非子产所杀，《左传》已有反证）吾侪对于此类史料，最宜谨严鉴别，始不至以理想混事实也。

（七）有纯属文学的著述，其所述史迹，纯为寓言；彼固未尝自谓所说者为真事迹也，而愚者刻舟求剑，乃无端惹起史迹之纠纷。例如《庄子》言：“鲲化为鹏，其大几万里。”倘有人认为此为庄周所新发明之物理学，或因此而诋庄周之不解物理学，吾侪必将笑之。何也？周本未尝与吾侪谈物理也。周岂惟未尝与吾侪谈物理，亦未尝与吾侪谈历史；岂惟周末尝与吾侪谈历史，古今无数作者亦多未尝与吾侪谈历史。据《德充符》而信历史上确有兀者王骀曾与仲尼中分鲁国，人咸笑之；据《人间世》而信历史上确有列御寇其人者则比比然，而《列子》八篇，传诵且与老庄埒也。据《离骚》而信屈原尝与巫咸对话，尝令帝阖开关，人咸笑之；据《九歌》而信尧之二女为湘君、湘夫人者则比比然也。陶潜作《桃花源记》，以寄其乌托邦的理想；而桃源县竟以此得名，千年莫之改也。石崇作《王昭君辞》，谓其出塞时或当如乌孙公主之弹琵琶；而流俗相承，遂以琵琶为昭君掌故也。吾侪若循此习惯以评鹭史料，则汉孔融与曹操书，固尝言：“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吾侪其将信之也？清黄宗羲与叶方蔼书，固尝言：“首阳二老托孤于尚父，乃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吾侪其亦将信之也？而不幸现在众人共信之史迹，其性质类此者正复不少。夫岂惟关于个人的史迹为然耳？凡文士所描写之京邑、宫室、舆服，以及其他各方面之社会情状，恐多半应作如是观也。

以上七例，论伪事之由来，虽不能备，学者可以类推矣。至

于吾侪辨证伪事应采之态度，亦备可得言焉：

第一，辨证宜勿支离于问题以外。例如《孟子》：“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吾侪读至此，试掩一思，下一句当如何措词耶？嘻！乃大奇！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此如吾问“某甲是否杀某乙？”汝答曰：“否，人不应杀人。”人应否杀人，此为一问题，某甲曾否杀某乙，此又为一问题，汝所答非我所问也。万章续问曰：“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既主张天下非尧所与，则应别指出与舜之人，抑系舜自取。乃孟子答曰：“天与之。”宇宙间是否有天，天是否能以事物与人，非惟万章无征，即孟子亦无征也。两造皆无征，则辩论无所施矣。又如孟子否认百里奚自鬻于秦，然不能举出反证以抉其伪，乃从奚之智不智贤不贤，作一大段循环论理。诸如此类，皆支离于本问题以外，违反辨证公例，学者所首宜切戒也。

第二，正误与辨伪，皆贵举反证，吾既屡言之矣。反证以出于本身者最强有力，所谓以矛陷盾也。例如《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吾侪即从《汉书》本文，可以证此事之伪。其一，《景十三王传》云：“鲁共王余以孝景前二年立，……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景帝在位十六年，则共王应薨于武帝即位之第十三年，即元朔元年也。（《王子侯表》云：“元朔元年安王光嗣”，正合）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则末年安得有共王？其二，孔安国《汉书》无专传，《史记·孔子世家》云：“安国为今皇帝博士，早卒。”《汉书·兒宽传》云：“宽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补廷尉史，廷尉张汤荐之。”考《百官表》汤迁廷尉，在元朔三年；安国为博士，总应在此年以前。假令其年甫逾二十，则下距巫蛊祸作时，已过五十，安得云早卒？既已早卒，安得献书于巫蛊之年耶？

然则此事与本书中他篇之文，处处冲突。王充云：“不得二全，则必一非。”（《论衡·语增篇》）既无法以证明他篇之为伪，则《艺文志》所记此二事，必伪无疑也。

第三，伪事之反证，以能得“直接史料”为最上。例如，鱼豢《魏略》谓“诸葛亮先见刘备，备以其年少轻之。亮说以荆州人少，当令客户皆著籍以益众。备由此知亮。”陈寿《三国志》则云：“先主诣亮，凡三往乃见。”豢与寿时代略相当，二说果孰可信耶？吾侪今已得最有力之证据，则亮《出师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苟吾侪不能证明《出师表》之为伪作，又不能证明亮之好妄语，则可决言备先见亮，非亮先见备也。又如《唐书·玄奘传》称奘卒年五十七，《玄奘塔铭》则云六十九，此两说孰可信耶？吾侪亦得最有力之证据，则奘尝于显庆二年九月二十日上表，中有“六十之年飒焉已至”二语，则奘寿必在六十外既无疑。而显庆二年下距奘卒时之麟德元年尚九年，又足为《塔铭》不误之正证也。凡此皆以本人自身所留下之史料为证据，此绝对不可抗之权威也。又如《魏略》云：“刘备在小沛生子禅，后因曹公来伐出奔，禅时年数岁，随人入汉中，有刘括者养以为子。……”欲证此事之伪，则后主（禅）即位之明年，诸葛亮领益州牧，与主簿杜微书曰“朝廷今年十八”，知后主确以十七岁即位，若生于小沛，则时已三十余岁矣。此史料虽非禅亲自留下，然出于与彼关系极深之诸葛亮，其权威亦相等也。又如《论衡》辨淮南王安之非升仙，云“安坐反而死，天下共闻。”安与司马迁正同时，《史记》叙其反状死状，始末悉备，故所记述，其权威亦不可抗也。右所举四例，其第一第二两例，由当事人自举出反证，第三例由关系人举出反证，第四例由在旁知状之见证人举出反证，皆反证之最有力者也。

第四，能得此种强有力之反证，则真伪殆可一言而决。虽然，吾侪所见之史料，不能事事皆如此完备。例如《孟子》中，万章问孔子在卫是否主痲疽，孟子答以“于卫主颜雝由。……”此次答辩，极合论理，正吾所谓举反证之说也。虽然，孟子与万章皆不及见孔子，孟子据一传说，万章亦据一传说，孟子既未尝告吾侪以彼所据者出何经何典，万章亦然，吾侪无从判断孟子所据传说之价值是否能优于万章之所据。是故吾侪虽极不信“主痲疽”说，然对于“主颜雝由”说，在法律上亦无权以助孟子张目也。遇此类问题，则对于所举反证，有一番精密审查之必要。例如旧说皆云释迦牟尼以周穆王五十二年灭度，当西纪前九百五十年，独《佛祖通载》（卷九）有所谓“众圣点记”之一事，据称梁武帝时有僧伽跋陀罗传来之《善见律》，卷末有无数黑点，相传自佛灭度之年起，佛弟子优波离，在此书末作一点，以后师弟代代相传，每年一点，至齐永明六年，僧伽跋陀罗下最后之一点，共九百七十五点。循此上推，则佛灭度应在周敬王三十五年，当西纪前四百八十五年，与旧说相差至五百三十余年之多。是则旧说之伪误，明明得一强有力之反证矣。虽然，最要之关键，则在此“众圣点记”者是否可信。吾国人前此惟不敢轻信之，故虽姑存此异说，而旧说终不废；及近年来欧人据西藏文之《释迦传》以考定阿闍世王之年代，据印度石柱刻文以考定阿育王之年代，据巴利文之《锡兰岛史》以考定锡兰诸王之年代，复将此诸种资料中有言及佛灭年者，据之与各王年代比较推算，确定佛灭年为纪前四八五年（或云四百八十七年，所差仅两年耳）。于是众圣点记之价值顿增十倍。吾侪乃确知释迦略与孔子同时，旧说所云西周时人者，绝不可信；而其他书籍所言孔、老以前之佛迹，亦皆不可信矣。

第五，时代错迕则事必伪，此反证之最有力者也。例如《商君书·徠民篇》有“自魏襄以来”语，有“长平之胜”语；魏襄死在商君死后四十二年，长平战役在商君死后七十八年，今谓商君能语及此二事，不问而知其伪也。《史记·扁鹊传》，既称鹊为赵简子时人，而其医治之人，有魏太子，有齐桓侯等；先简子之立百三十九年而魏亡，田齐桓侯午之立，后简子死七十二年，错迕纠纷至此，则《鹊传》全部事迹，殆皆不敢置信矣。其与此相类者，例如《尚书·尧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此语盖甚可诧。夏为大禹有天下之号，因禹威德之盛，而中国民族始得“诸夏”之名，帝舜时安从有此语？假令孔子垂教，而称中国人为汉人，司马迁著书，而称中国人为唐人，有是理耶？此虽出圣人手定之经，吾侪终不能不致疑也。以上所举诸例，皆甚简单而易说明；亦有稍复杂的事项，必须将先决问题研究有绪，始能论断本问题者。例如《尧典》有“金作赎刑”一语，吾侪以为三代以前未有金属货币，此语恐出春秋以后人手笔。又如《孟子》称“舜封象于有庠，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赋。”吾侪以为封建乃周以后之制度，“使吏治其国”云云，又是战国后半期制度，皆非舜时代所宜有。虽然，此断案极不易下，必须将“三代前无金属货币”、“封建起自周代”之两先决问题，经种种归纳的研究立为铁案，然后彼两事之伪乃成信讞也。且此类考证，尤有极难措手之处：吾主张三代前无金属货币，人即可引《尧典》“金作赎刑”一语以为反证（近人研究古泉文者，有释为“乘正尚金当爰”之一种，即指为唐、虞赎刑所用，盖因此而附会及于古物矣）。吾主张封建起自周代，人即可引《孟子》“象封有庠”一事为反证；以此二书本有相当之权威也。是则对书信任与对事信任，又递相为君臣，在学者辛勤审勘之结果何如

耳。

第六，有其事虽近伪，然不能从正面得直接之反证者，只得从旁面间接推断之。若此者，吾名曰“比事的推论法”。例如，前所举万章“问孔子于卫主痈疽”事，同时又问“于齐主侍人瘠环”，孟子答案于卫虽举出反证，于齐则举不出反证，但别举“过宋主司城贞子”之一旁证。吾侪又据《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游齐主高昭子，二次三次游卫皆主蘧伯玉，因此可推定孔子所主皆正人君子，而痈疽、瘠环之说，盖伪也。又如鲁共王、孔安国与《古文尚书》之关系，既有确据以证其伪；河间献王等与《古文毛诗》之关系，张苍等与《古文左传》之关系，亦别有确据以证其伪；则当时与此三书同受刘歆推奖之《古文周官》、《古文逸礼》，虽反证未甚完备，亦可用“晚出古文经盖伪”之一假说略为推定矣。此种推论法，应用于自然科学界，颇极稳健；应用于历史时，或不免危险。因历史为人类所造，而人类之意志情感，常自由发动，不易执一以律其他也。例如孔子喜亲近正人君子，固有证据，然其通变达权，亦有证据。南子而肯见，佛肸、弗扰召而欲往，此皆见于《论语》者，若此三事不伪，又安见其绝对的不肯主痈疽与瘠环也？故用此种推论法，只能下“盖然”的结论，不宜轻下“必然”的结论。

第七，有不能得“事证”而可以“物证”或“理论”明其伪者。吾名之曰“推度的推论法”。例如，旧说有明建文帝逊国出亡之事，万斯同斥其伪，谓“紫禁城无水关，无可出之理。”（钱大昕著《万季野传》）此所谓物证也。又旧说有“颜渊与孔子在泰山望闾门白马，颜渊发白齿落”之事，王充斥其伪，谓“人目断不能见千里之外”；又言“用睛暂望，影响断不能及于发齿”。（《论衡·书虚篇》）此皆根据生理学上之定理以立言，虽文籍上别无他

种反证，然已得极有价值之结论。此所谓理论也。吾侪用此法以取历史上种种不近情理之事，自然可以廓清无限迷雾。但此法之应用，亦有限制，其确实之程度，盖当与科学智识并进。例如古代有指南车之一事，在数百年前之人，或且度理以断其伪，今日则正可度理以证其不伪也。然则史中记许多鬼神之事，吾侪指为不近情理者，安知他日不发明一种“鬼神心理学”，而此皆为极可宝之资料耶？虽然，吾侪今日治学，只能以今日之智识范围为界，“于其所不知盖阙如”，终是寡过之道也。

本节论正误辨伪两义，缕缕数万言，所引例或涉及极琐末的事项，吾非谓治史学者宜费全部精神于此等考证，尤非谓考证之功，必须遍及于此等琐事。但吾以为有一最要之观念为吾侪所一刻不可忘者，则吾前文所屡说之“求真”两字——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夫吾侪治史，本非徒欲知有此事而止；既知之后，尚须对于此事运吾思想，骋吾批评。虽然，思想批评必须建设于实事的基础之上，而非然者，其思想将为任用，其批评将为虚发。须知近百年来欧美史学之进步，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实其发轫也。而吾国宋明以降，学术之日流于诞渺，皆由其思想与批评，非根据于实事，故言愈辩而误学者亦愈甚也。韩非曰：“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又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取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则诬之弊，往往而有。吾侪今日宜筌路蓝缕以辟此途，务求得正确之史料以作自己思想批评之基础；且为后人作计，使踵吾业者，从此得节啬其精力于考证方面，而专用其精力于思想批评方面，斯则吾侪今日对于斯学之一大责任也。

注释

① 法显著《佛国记》，亦名《法显行传》。玄奘著《大唐西域记》，又奘弟子慧立著《慈恩三藏法师传》。义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及《西行求法高僧传》。

② 弃疾二书，见《学海类编》。阿计替者，当时金廷所派监视徽、钦二宗之人也。二书盖其日记原稿，弃疾全部采录也。

③ 此供状忘记在某部笔记中，十五年前吾曾在《新民丛报》录印一次。此供状惜尚有删节处，不能得其全相。

④ 关于此问题之研究，Gaubil氏谓在纪前二一五四年十月十一日，Largeteau氏及Chalmers氏谓在二一二七年十月十二日，Freret氏及D.Cassini氏谓在二一〇六年十月二十四日，Gumpach氏谓在二一五五年十月二十二日，Oppolzer氏谓在二一三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而有名之汉学大家Prof.G.Schlege及有名之天文学大家Dr.F.Kuhnert曾合著一书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之学士院出版，题曰《书经之日蚀》*Die Schu King Finsterniss* (Amsterdam J.Müller, 1889) 谓当在二一六五年五月七日，其言甚辩。其后汉学大家Dr.F.Eitel复著详论驳之，登在*China Review*第十八卷。

⑤ 明抄本《慎子》，缪荃荪所藏，最近上海涵芬楼所印《四部丛刊》采之，诧为惊人秘笈。缪氏号称目录学专家，乃宝此“燕石”，故知考古贵有通识也。

⑥ 古书中有许多经各时代无数人踵袭赓续而成者，如《本草》一书即其例。吾尝欲详考此书成立增长之次第，所搜资料颇多，惜未完备，不能成篇耳。

⑦ 看《晋书》束皙传、王接传及杜预《左传集解后序》。

⑧ 看今人王国维著《太史公系年考略》，崔适著《史记探原》。

⑨ 看今人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二十一、二十二页。

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

吾尝言之矣：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非史的范围。然则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著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此则论次之功也。

史迹有以数千年或数百年为起讫者。其迹每度之发生，恒在若有意识若无意识之间，并不见其有何等公共一贯之目的，及综若干年之波澜起伏而观之，则俨然若有所谓民族意力者在其背后。治史者遇此等事，宜将千百年间若断若续之迹，认为筋摇脉注之一全案，不容以枝枝节节求也。例如我族对于苗蛮族之史迹，自黄帝战蚩尤，尧、舜分背三苗以来，中间经楚庄跻之开夜郎，汉武帝通西南夷，马援、诸葛亮南征，唐之于六诏，宋之于侬智高……等事，直至清雍、乾间之“改土归流”，咸同间之再平苗讨杜文秀，前后凡五千年，此问题殆将完全解决。对于羌、回族之史迹，自成汤氏、羌来享，武王征师羌、鬃以来，中间经晋之五凉，宋之西夏……等等，直至清乾隆间荡平准、回，光绪间设新疆行省，置西陲各办事大臣，前后凡四千年，迄今尚似解决而未尽解决。对于匈奴之史迹，自黄帝伐獯鬻，殷高宗伐鬼方，周宣王伐玁狁以来，中间经春秋之晋，战国之秦、赵，力与相持，迄汉武帝、和帝两度之大膺惩，前后经三千年，兹事乃告一段落。对于东胡之史迹，自春秋时山戎病燕以来，中间经五胡之诸鲜卑，以

逮近世之契丹、女真、满珠前后亦三千年，直至辛亥革命清廷逊荒，此问题乃完全解决。至如朝鲜问题，自箕子受封以来，历汉、隋、唐屡起屡伏，亦经三千余年，至光绪甲午，解决失败，此问题乃暂时屏出我历史圈外，而他日劳吾子孙以解决者，且未有已也。如西藏问题，自唐吐蕃时代以迄明、清，始终在似解决未解决之间，千五百余年于兹矣。以上专就本族对他族关系言之，其实本族内部之事，性质类此者亦正多。例如封建制度，以成周一代八百年间为起讫；既讫之后，犹二千余年时时扬其死灰，若汉之七国，晋之八王，明之靖难，清之三藩，犹其倖影也。例如佛教思想，以两晋、六朝、隋、唐八百年间为起讫；而其先驱及其余烬，亦且数百年也。凡此之类，当以数百年或数千年间此部分之总史迹为一个体，而以各时代所发生此部分之分史迹为其细胞，将各细胞个个分离，行见其各为绝无意义之行动；综合观之，则所谓国民意力者乃跃如也。吾论旧史尊纪事本末体，夫纪事必如是，乃真与所谓本末者相副矣。

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鳞鳞相衔，如环无端也。其发动力有大小之分，则其荡激亦有远近之异。一个人方寸之动，而影响及于一国；一民族之举足左右，而影响及于世界者，比比然也。吾无暇毛举其细者，惟略述其大者。吾今标一史题于此，曰：“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闻者必疑其风马牛不相及，然吾征诸史迹而有以明其然也。寻其波澜起伏之路线，盖中国当李牧、蒙恬时，浪势壮阔，蹙匈奴于北，使彼“十余年不敢窥赵边”，（《史记·李牧传》文），“却之七百余里”，（贾谊《过秦论》文），使中国能保持此局，匈奴当不能有所扰于世界之全局。“秦末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

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汉兵与项羽相拒，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大破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史记·匈奴传》文）“月氏本居敦煌、析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史记·大宛传》文）盖中国拒胡之高潮，一度退落，匈奴乘反动之势南下，轩然蹴起一大波，以撼我甘肃边徼山谷之月氏；月氏为所荡激，复蹴起一大波，滔滔度葱岭，以压大夏。大夏者，西史所谓柏忒里亚(Bactria)，亚历山大大王之部将所建国也，实为希腊人东陆殖民地之枢都，我旧史字其人曰塞种。“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汉书·西域传》文。）罽宾者，今北印度之克什米尔（《大唐西域记》之迦湿弥罗），亚历山大曾征服而旋退出者也。至是希腊人（塞王）受月氏大波所荡激，又蹴一波以撼印度矣。然月氏之波，非仅此而止。“月氏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五部翎侯。后百余岁，贵霜翎侯邱就却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灭濮达罽宾。子阎膏珍复灭天竺。”（《后汉书·西域传》文）盖此波匍匐南驶，乃淘掠波斯（安息），阿富汗（濮达），而淹没印度；挫希腊之锋使西转，自尔亚陆无复欧人势力矣。然则假使李牧、蒙恬晚死数十年，或卫青、霍去病早出数十年，则此一大段史迹，或全然不能发生，未可知也。吾又标一史题于此，曰：“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闻者将益以为诞。然吾比观中西诸史，而知其因缘甚密切也。自汉武大兴膺惩之师，其后匈奴寢弱，裂为南北。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保塞称臣，其所部杂居内地者，渐同化于华族。北匈奴郅支单于，仍倔强，屡寇边，和帝时再大举攘之。“永元二年，连破北匈奴。”（《后汉书·和帝纪》文。）“三年，窦宪将兵击之于金微山，大破之，北单于逃走，不知所之。”（《后汉书·宪传》文。）

此西纪八十八年事也。其云“不知所之”者，盖当时汉史家实不知之；今吾侪则已从他书求得其踪迹。“彼为宪所逐，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建设悦般国，……地方数千里，众二十余万。”（《魏书·西域传》悦般条文）金微者，阿尔泰山；康居者，伊犁以西，迄于里海之一大地也。《后汉书·西域传》不复为康居立传，而于粟弋、奄蔡条下，皆云属康居，盖此康居即匈奴所新建之悦般，“属康居”云者，即役属于康居新主人之匈奴也。然则粟弋、奄蔡又何族耶？两者皆日耳曼民族中之一支派；粟弋疑即西史中之苏维（Suevi）人；奄蔡为前汉时旧名，至是“改名阿兰聊”（《后汉书·西域传》文），即西史中之阿兰（Alan）人。此二种者，实后此东峨特（East Goths）之主干民族也。吾国人亦统称其族为粟特。《魏书·西域传》：“粟特国，故名奄蔡，一名温那沙（疑即西史之Vandals，亦东峨特之一族也），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康居西北之大泽，决为黑海，已成学界定论；而第二三世纪时，环黑海东北部而居者，实东峨特，故知粟特即东峨特无可疑也。当此期间，欧洲史上有一大事，为稍有常识之人所同知者。即第三四世纪间，有所谓芬族（Huns or Fins）者，初居于窝瓦（Volga）河之东岸，役属东西峨特人已久。至三百七十四年（晋武帝宁康二年），芬族渡河西击东峨特人而夺其地。芬王曰阿提拉（Attila），其勇无敌；转战而西，入罗马，直至西班牙半岛，威震全欧。东峨特人为芬所逼，举族西迁，沿多瑙河下流而进，渡来因河，与西峨特人争地；西峨特亦举族西迁，其后分建东峨特、西峨特两王国。而西罗马遂亡。两峨特王国，即今德、法、英、意诸国之前身也。而芬族亦建设匈牙利、塞尔维亚、布加利亚诸国。是为千余年来欧洲国际形势所自始，史家名之曰“民族大移转时代”。此一桩大公案，其作俑之人，不问而知为芬族也。芬族者何？即

寔寔击逐西徙之匈奴余种也。《魏书·西域传》粟特条下云：“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己，三世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德（Hirth）考定忽倪己即西史之Hernae，实阿提拉之少子，继立为芬王者。（忽倪己以魏文成帝时来通好，文成在位当西四五二至四五六年，Hernae即位在西四五二年）因此吾侪可知三四世纪之交，所谓东峨役属芬族云者，其役属之峨特，即《后汉书》所指役属康居之粟弋、奄蔡；其役属之之芬族，则《后汉书》之康居，《魏书》之悦般，即见败于汉，度金微山而立国者也。芬王阿提拉与罗马大战于今法兰西境上，在西四五一年，当芬族渡窝瓦河击杀峨特王亥耳曼后之六十四年，故知《魏书》所谓“匈奴击杀粟特王而有其国”者所击杀之王即亥耳曼，所有之国即东峨特。而击杀之之匈奴王即阿提拉之父，而忽倪己之祖。其年为西纪三百七十四年，上距寔寔击逐时二百九十余年，而下距魏文成时通好之忽倪己，恰三世也。吾侪综合此种资料，乃知汉永元一役，实可谓全世界史最要之关键，其在中国结唐虞三代以来二千年獯鬻、狻狁之局，自此之后中国不复有匈奴寇边之祸。（刘渊等归化匈奴构乱于内地者不在此例）班固《封燕然山铭》所谓：“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非虚言也。然竟以此嫁祸欧洲，开彼中中古时代千年黑暗之局。直至今日，犹以匈奴遗种之两国（塞尔维亚与匈牙利）惹起全世界五年大战之惨剧。人类造业，其波澜之壮阔，与变态之瑰譎，其不可思议有如此。吾侪但据此两事，已可以证明人类动作，息息相通。如牵发而动全身，如铜山西崩而洛钟东应。以我中国与彼西方文化中枢地相隔如彼其远，而彼我相互之影响犹且如此之巨，则国内所起之事件，其首尾连属因果复杂之情形，益可推矣。又可见不独一国之历史为“整个的”。吾中国人前此认禹域为“天下”，固

属偏陋；欧洲人认环地中海而居之诸国为世界，其偏陋亦正与我同。实则世界历史者，合各部分文化国之人类所积共业而成也。吾侪诚能用此种眼光以观察史迹，则如乘飞机腾空至五千尺以上，周览山川形势，历历如指掌纹，真所谓“俯仰纵宇宙，不乐复何如”矣。然若何然后能提絜纲领，用极巧妙之笔法以公此乐于大多数人，则作史者之责也。

孟子尝标举“知人论世”之义，论世者何？以今语释之，则观察时代之背景是已。人类于横的方面为社会的生活，于纵的方面为时代的生活。苟离却社会与时代，而凭空以观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动作，则必多不可了解者。未了解而轻下批评，未有不错误也。故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读史如读画，最要注察背景。旧史中能写出背景者，则《史记·货殖列传》实其最好模范。此篇可分为四大段：篇首“老子曰至治之极”起，至“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止，为第一段，略论经济原则及其与道德之关系。自“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起，至“岂非以富耶”止，为第二段，纪汉以前货殖之人。自“汉兴海内为一”起，至“令后世得以观择焉”止，说明当时经济社会状况。自“蜀卓氏之先”起至篇末，纪当时货殖之人，即以文章结构论，已与其他列传截然不同。其全篇宗旨，盖认经济事项，在人类生活中含有绝大意义，一切政教，皆以此为基础。其见解颇有近于近世唯物史观之一派，在我国古代已为特别。其最要之处，尤在第三段，彼将全国分为若干个之经济区域，每区域寻出其地理上之特色，举示其特殊物产及特殊交通状况，以规定该区域经济上之物的基件。每区域述其历史上之经过，说明其住民特殊性习之由来，以规定该区域经济上之心的基件。吾侪读此，虽生当二千年后，而于当时之经济社会，已得有颇明了之印象。其妙处乃在以全力写背景，

而传中所列举之货殖家十数人，不过借作说明此背景之例证而已。此种叙述法，以旧史家眼光观之，可谓奇特。各史列传，更无一篇敢蹈袭此法；其表志之记事，虽间或类此，然求其能如本篇之描出活社会状况者，则竟无有也。吾侪今日治史，但能将本篇所用之方法，扩大之以应用于各方面，其殆庶几矣。

史迹复杂，苟不将其眉目理清，则叙述愈详博，而使读者愈不得要领。此当视作者头脑明晰之程度何如，与其文章技术之运用何如也。此类记述之最好模范，莫如《史记·西南夷列传》：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魑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牂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氏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此对于极复杂之西南民族，就当时所有之智识范围内，以极简洁之笔法，将其脉络提清，表示其位置所在，与夫社会组织之大别，及其形势之强弱。以下方杂叙各部落之叛服等事，故不复以凌乱为病。惜后世各史之记事，能如此者绝希。例如晋代之五胡十六国，唐代之藩镇，皆史迹中之最纠纷者，吾侪无论读正史读《通鉴》，皆苦其头绪不清。其实此类事，若用《西南夷列传》之叙述法，未尝不可使之一目了然；但旧史或用纪传体，或用编年体，以事隶人或以事隶年，其势不能于人与年之外而别有所提掣，是故使学者如堕烟雾也。

自《史记》创立十表，开著作家无量法门，郑樵《图谱略》益推阐其价值。《史记》惟表年代世次而已，后人乃渐以应用于各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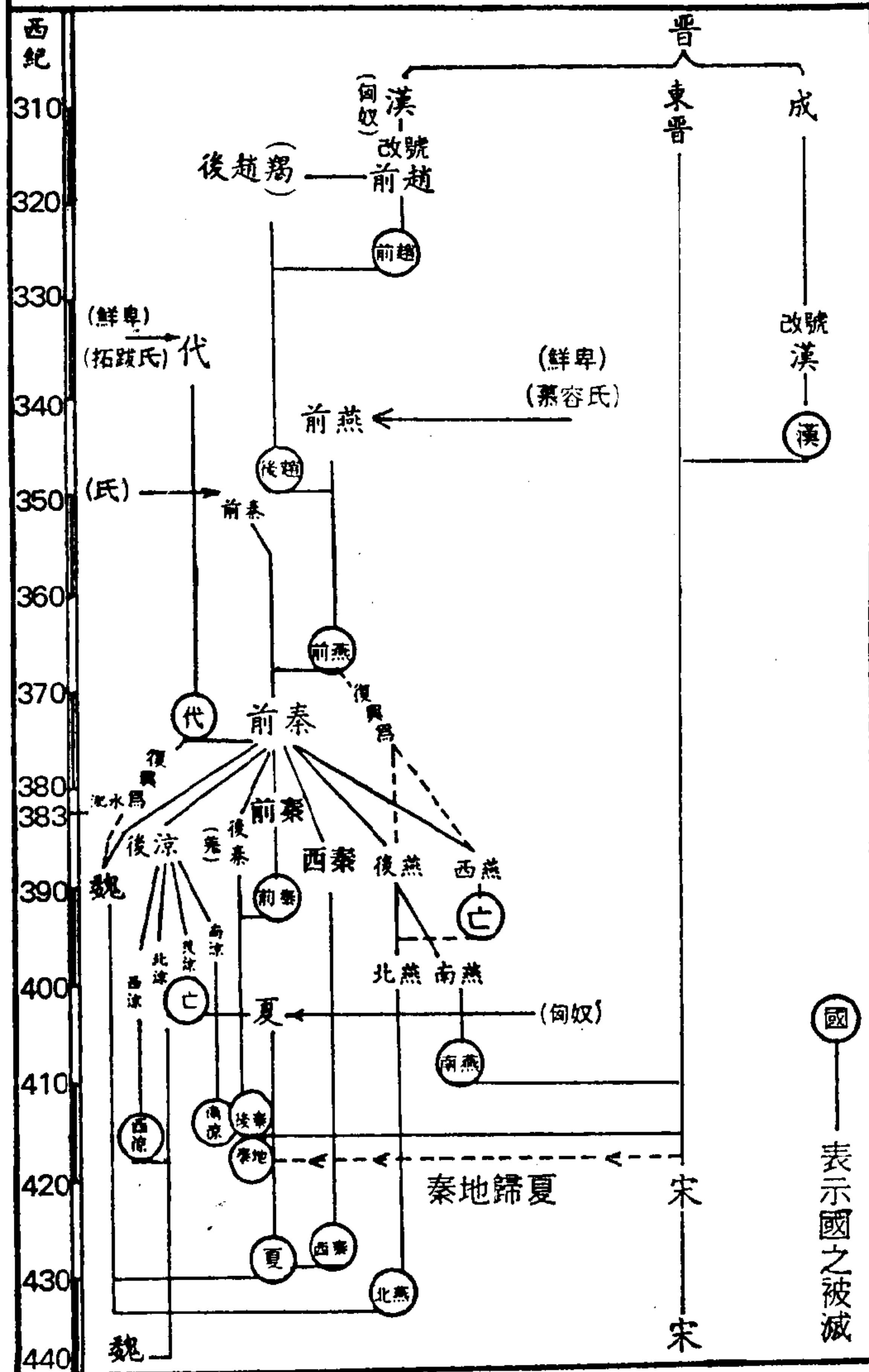
如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将全部《左传》事迹，重新组织一过，而悉以表体行之，其便于学者滋多矣。即如五胡十六国之事，试一读齐召南之《历代帝王年表》，已觉眉目略清；若更为下列之两表，则形势若指诸掌矣。今录举以为例：

五胡十六国兴亡表第一

种名	族名	国号	创业主	国都	年数	被灭
北狄种	匈奴	汉(前赵)	刘渊—刘聪 刘曜	初平阳(山西临汾) 迁长安(陕西省城)	一五	后赵
	羯	北凉 夏	沮渠蒙逊 赫连勃勃	张掖(甘肃张掖) 统万(陕西怀远)	四三 二五 三四	后魏 后魏 前燕
巴蛮		后赵(冉魔)	石勒—石虎 冉闵	初襄国(直隶邢台) 迁邺(直隶临漳)		
西羌种	巴蛮	成(汉)	李雄	成都(四川省城)	四四	东晋
	氐	前秦 后凉	苻健—苻坚 吕光	长安 姑臧(甘肃武威) 长安	四四 一八 三四	后秦 后秦 东晋
	羌	后秦	姚萇 姚兴			
东胡种	鲜卑	前燕	慕容皝 慕容俊	初龙城(内蒙古土默特右旗) 迁邺	三四	前秦
		后燕 燕 燕	慕容垂 慕容冲	中山(直隶定县) 中山	二六	北燕
		西南 燕 秦	慕容德 乞伏国仁	广固(山东益都) 宛川(甘肃靖远)	一三 四七	东晋 夏
		西南 凉 魏	秃发乌孤 拓跋珪	乐都(甘肃西宁)	一八	西秦
		前凉 凉 燕	张重华 李嵩 冯跋	姑臧 敦煌(甘肃敦煌) 龙城	二八 二八 二八	前秦 北凉 后魏

五胡十六國興亡表第二

三四
五
四三九



右第一表为东人所编中国史籍所通有，我不过略加增修而已；第二表则我所自造。吾生平读书最喜造表，顷著述中之《中国佛教史》，已造之表已二十余。我造表所用之劳费，恒倍蓰什伯于著书。窃谓凡遇复杂之史迹，以表驭之，什九皆可就范也。

天下古今，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读史者于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焉。此《春秋》之教所以贵“比事”也。同中观异者，例如周末之战国与唐末之藩镇，其四分五裂，日寻干戈也同；其仍戴一守府之天子，多历年所也同。然而有大不同者：战国蜕自封建，各有历史深厚之国家组织，其统治者确为当时之优秀阶级，各国各为充实的内部发展，其性质与近世欧洲列国近，故于历史上文化，贡献甚大；藩镇则蜕自蕃将降贼，统治者全属下流阶级，酷肖现代千夫所指之军阀，故对于文化，只有破坏，更无贡献。例如中世之五胡与近代之元、清，虽同为外族蹂躏中夏。然而五胡之酋，皆久已杂居内地，半同化于吾族。彼辈盖皆以一身或一家族——规模较大之家族，乘时倡乱，而裹胁中国多数莠民以张其势，其性质与陈涉、吴广辈相去无几。其中尤有受中国教育极深之人如刘渊、苻坚等，其佐命者或为中国杰出之才士如张方、王猛等，故虽云扰鼎沸，而于中国社会根本精神，不生大变动，其恶影响所及，不过等于累朝季叶之扰乱或稍加甚而已。元、清等不然，彼等本为中国以外的一部落，渐次扩大，南向与中国为敌国者多年，最后乃一举而灭之，其性质纯然为外来征服的，与五胡之内乱割据的绝异。且五胡时代，中原虽沦，而江南无恙，吾族文化嫡系，迄未中断。元、清不然，全中国隶彼统治之下百年或二三百年，彼熟知吾人耻愤之深，而力谋所以固位之术，故其摧残吾国民性也至阴险而狠毒；而吾族又更无与彼对立之统治机关，得以息肩而自庇，故元气所伤实多，而先民美

质，日就雕落。又元、清两代，其相同之点既如前述，然亦自有其相异之点。蒙古人始终不肯同化于中国人，又不愿利用中国人以统治中国，故元代政治之好坏，中国人几乎不能负责任。因此其控驭之术，不甚巧妙，其统治力不能持久；然因此之故，彼虽见摈出塞，犹能保持其特性，至今不灭。满洲人初时亦力求不同化，然而不能自持，其固有之民族性逐渐渐灭，至亡时殆一无复存。彼辈利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之政策，始终一贯，其操术较巧妙，故其享祚较长久，然政权一坠，种性随沦，今后世界上应更无复满洲人矣。异中观同者，例如北魏女真皆仅割据中原，满洲则统一全国，此其所异也；然皆入据后逐渐同化，驯至尽丧其民族以融入我族，此其所同也。而彼三族者皆同出东胡，吾侪因可以得一假说，谓东胡民族之被同化性，较他民族为多也。又如元代剧曲最发达，清代考证学最发达，两者之方向，可谓绝异，然其对于政治问题之冷淡则同，较诸汉、唐、宋、明四代之士风截然矣。吾侪因此可得一假说，谓在异族统治之下，人民必惮谈政治也。又如儒教、佛教，千余年间辗转不绝，其教理亦确多根本不同之处。然考其学发达之顺序，则儒家当汉初，专务抱残守缺，传经典之文句而已；后汉以降，经师成一家言者渐多；六朝、隋、唐则义疏解释讲授之风甚盛；入宋以后，便力求刊落糟粕，建设一种内观的新哲学。佛家亦然，输入初期，专务翻译，所译率皆短篇经典；六朝、隋、唐，则大部经论，陆续译成，佛徒多各专一经以名家（如毘昙宗、俱舍宗、成实宗、三论宗、法华宗、涅槃宗、地论宗、摄论宗等，皆专宗一经或一论），而注疏解释讲授之风亦极盛；其后则渐渐自创新宗（如天台、贤首、慈因诸宗）；入宋以后，则不立文字之禅宗独盛，而他宗殆皆废。两家学术之发展，并不相谋，然而所历方向，乃恰如两平行线，千余年间相与

骈进。吾侪必比而观之，然后所谓时代精神者乃得见。凡此皆异中观同之例也。

说明事实之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近世治斯学之人，多能言之。虽然，兹事未易言也。宇宙之因果律，往往为复的而非单的，为曲的而非直的，为隔的伏的而非连的显的，故得其真也甚难。自然界之现象且有然，而历史现象其尤甚也。严格论之，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则吾侪竟不谈因果可乎？曰：断断不可。不谈因果，而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故吾侪常须以炯眼观察因果关系，但其所适用之因果律，与自然科学之因果律不能同视耳。

请言自然科学与历史之别：

其一，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自然科学，常在必然的法则支配之下，纒演再纒演，同样条件，必产同样结果，且其性质皆属于可以還元。其研究对象之原子、分子或生殖质，皆属完成的决定的。历史不然。如吾前文所屡言，天下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凡史迹皆庄子所谓“新发于硎”，未有纒演乎其旧者也。不惟极活跃之西洋史，节节翻新；即极凝滞之中国史，前后亦未尝相袭。不宁惟是，每一段史迹，殆皆在前进之半途中作若行若止之态，常将其未竟之绪之一部分贻诸方来。欲求如自然科学之截然表示一已完成之

定形、定态以供人研究者，殆不可得。故自然科学可以有万人公认之纯客观的因果律，而历史盖难言之矣。

其二，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个性的——自然科学的事项，如二加二必为四，氢氧二合必为水。数学上无不同质之“二”；化学上无不同质之“氢”与“氧”。故二加二之法，得应用于一切之四；氢氧二合之法，得应用于一切之水。历史不然，历史由人类所造。人类只有一个孔子，更无第二个孔子；只有一个基督，更无第二个基督。拿破仑虽极力摹仿该撒，然拿破仑自是拿破仑，不是该撒。吾侪不妨以明太祖比汉高祖，然不能谓吾知汉祖，同时即已知明祖。盖历史纯为个性发挥之制造品，而个性直可谓之无一从同。又不惟个人为然耳，历史上只有一个文艺复兴时代，更无绝对与彼相同之第二个时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更无绝对与我相同之第二个民族。凡成为历史事实之一单位者，无一不各有其个别之特性。此种个性，不惟数量上复杂不可俛指，且性质上亦幻变不可方物。而最奇异者，则合无量数互相矛盾的个性，互相分歧或反对的愿望与努力，而在若有意若无意之间，乃各率其职从共赴一鹄，以组成此极大极复杂极致密之“史纲”，人类之不可思议，莫过是矣。史家之职责，则在此种极散漫极复杂的个性中，而覩见其实体，描出其总相，然后因果之推验乃可得施。此其所以为难也。

其三，自然科学的事项，为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反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二加二为四，氢氧二合为水，亿万年前如是，亿万年后亦有然，中国如是，他国他洲有然，乃至他星球亦有然。历史反是，某时代关系极重要之事项，移诸他时代或成为绝无意义；不宁惟是，同一事件，早一年发生与迟一年发生，乃至早一日一刻发生与迟一日一刻发生，其价值可以相

去悬绝。空间方面亦复如是，甲处所发生事件，假令以同型的——其无绝对同型的不俟论——移诸乙处，其所取得历史上之意义与价值，迥乎不相侔。质而言之，史迹之为物，必与“当时”、“此地”之两观念相结合，然后有评价之可言。故史学推论的方式，比诸自然科学，益复杂而难理也。

明乎此三异点，始可以语于史界之因果矣。

史界因果之劈头一大问题，则英雄造时势耶？时势造英雄耶？换言之，则所谓“历史为少数伟大人物之产儿”“英雄传即历史”者，其说然耶否耶？罗素曾言：“一部世界史，试将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将全变。”此论吾侪不能不认为确含一部分真理。试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其局面当何如？佛学界失一道安，失一智顓，失一玄奘，失一慧能，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陆九渊，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顾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当何如？其他政治界、文学界、艺术界，盖莫不有然。此等人得名之曰“历史的人格者”。何以谓之“历史的人格者”？则以当时此地所演生之一群史实，此等人实为主动——最少亦一部分的主动——而其人面影之扩大，几于掩覆其社会也。

文化愈低度，则“历史的人格者”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其在古代，政治之汗隆，系于一帝王，教学之兴废，系于一宗师，则常以一人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渐进，而重心移于少数阶级或宗派，则常以若干人之首领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益进，而重心益扩于社会之各方面，则常以大规模的团体之组织分子为“历史的人格者”。例如波斯、马基顿、罗马帝国、阿刺伯诸史之全舞台，几为各该时代二三英雄所独占；十九世纪欧洲诸国之历史，常以贵族或中等阶级各派之十数首领

为主体；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此其显证也。由此言之，历史的大势，可谓为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递趋于群众的“人格者”。愈演进，愈成为“凡庸化”，而英雄之权威愈减杀。故“历史即英雄传”之观念，愈古代则愈适用，愈近代则愈不适用也。

虽然，有两义当注意焉：其一，所谓“首出的人格者”，表面上虽若一切史迹纯为彼一人或数人活动之结果，然不能谓无多数人的意识在其背后。实则此一人或数人之个性，渐次侵入或镌入于全社会而易其形与质。社会多数人或为积极的同感，或为消极的盲从，而个人之特性，浸假遂变为当时此地之民众特性——亦得名之曰集团性或时代性。非有集团性或时代性之根柢而能表现出一史迹，未之前闻。例如，二千年来之中国，最少可谓为有一部分属于孔子个性之集团化。而战国之政治界，可谓为商鞅个性之时代化，晚明之思想界，可谓为王守仁个性之时代化也。如是，故谓“首出的人格者”能离群众而存在，殆不可。其二，所谓“群众的人格者”，论理上固为群中各分子各自个性发展之结果，固宜各自以平等的方式表显其个性。然实际上其所表显者，已另为一之集团性或时代性，而与各自之个性非同物，且尤必有所谓“领袖”者以指导其趋向执行其意思，然后此群众人格乃得实现。例如，吾侪既承认彼信奉共产主义之人人作为一个合成的“人格者”，则同时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之个人与此“人格者”之关系，又不能不承认列宁之个人与此“人格者”之关系。如是，故谓“群众的人格者”，能离首出者而存在，殆亦不可。

吾曷为何研究历史之人哓哓陈此义耶？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

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

欧美自近世以来，民众意识亢进，故社会心理之表现于史者甚鲜明，而史家之觑出之也较易。虽然，亦由彼中史学革新之结果，治史者能专注重此点，其间接促起民众意识之自觉力，抑非细也。中国过去之史，无论政治界、思想界，皆为独裁式，所谓积极的民众意识者甚缺乏，无庸讳言。治史者常以少数大人物为全史骨干，亦属不得已之事。但有一义须常目在之者：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大人物之言动，非以其个人的资格而有价值，乃以其为一阶级或一党派一民族之一员的资格而有价值耳。

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例如，曾国藩确能深入咸、同间士大夫社会之阃奥，而最适于与此辈心理起感应作用；袁世凯确能深入清季官僚武人社会之阃奥，而最适于与彼辈心理起感应作用。而其效果收获之丰啬，一方面视各该社会凭藉之根柢何如，一方面又视所谓大人物者心理亢进之程度何如。据事实所昭示，则曾国藩之收获，乃远不逮袁世凯。袁世凯能于革命之后，将其所属之腐恶垂死的旧社会，扩大之几于掩覆全国；曾国藩事业之范围愈大，而其所属之贤士大夫的社

会，其领土乃反日蹙也。此其故，故由近六十年间之中国，其环境宜于养育袁世凯的社会，不宜于养育曾国藩的社会，两者所凭藉之势，优劣悬殊；然而袁世凯执著力之强，始终以一贯精神，绝无反顾，效死以扶植其所属之恶社会，此种积极的心理，殆非曾国藩所能及也。然则岂惟如罗素言：“将历史上若干人物抽出，则局面将大变”而已，此若干人者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恐不惟独裁式的社会为然，即德谟克拉西式的社会亦未始不然也。

社会倘永为一种势力——一种心理之所支配，则将成为静的，僵的，而无复历史之可言。然而社会断非尔尔。其一，由人类心理之本身，有突变的可能性。心理之发动，极自由不可方物。无论若何固定之社会，殊不能预料或制限其中之任何时、任何人忽然起一奇异之感想，此感想一度爆发，视其人心力之强度如何，可以蔓延及于全社会。其二，由于环境之本质为蕃变的，而人类不能不求与之顺应。无论若何固定之社会，其内界之物质的基件，终不能不有所蜕变，变焉而影响遂必波及于心理。即内界不变，或所变甚微，不足以生影响，然而外来之寢迫或突袭，亦时所难免，有之，而内部之反应作用，遂不得不起。凡史迹所以日孳而日新，皆此之由。而社会组成分子较复杂，及传统的权威较脆弱者，则其突变的可能性较大；其社会内部物质的供给较艰啬，且与他社会接触之机缘较多者，则其环境之变迁较剧且繁。过去之中国史，不能如西洋史之嶮原层叠，波澜壮阔，其所积者不同，其所受者亦不同也。

史迹所以诡异而不易测断者，其一，人类心理，时或潜伏以待再现。凡众生所造业，一如物理学上物质不灭之原则，每有所造，辄留一不可拂拭之痕迹以诒诸后。但有时为他种势力所遮抑，

其迹全隐，浅见者谓为已灭，不知其乃在磅礴郁积中，一遇机缘，则勃发而不能复制。若明季排满之心理，潜伏二百余年而尽情发露，斯其显例也。其二，心的运动，其速率本非物的运动所能比拟。故人类之理想及欲望，常为自然界所制限。倘使心的经过之对于时间的关系，纯与物的经过同一，则人类征服自然，可纯依普通之力学法则以行之。惟其不能，故人类常感环境之变化，不能与己之性质相适应，对于环境之不满足，遂永无了期。历史长在此种心物交战的状态中，次第发展，而两力之消长，绝无必然的法则以为之支配。故历史上进步的事象，什九皆含有革命性，而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之史迹，皆最难律以常轨。结果与预定的计画相反者，往往而有，然不能因其相反，遂指为计画之失败。最近民国十年间之历史，即其切例也。其三，人事之关系既复杂，而人心之动发又极自由，故往往有动机极小而结果极大者，更有结果完全与动机分而别进展于一方向者。一奥储之被刺，乃引起全世界五年之大战争，并中国而亦牵率焉，谁能料者？中世方士之点金幻想，乃能引起近世极严密的化学之进步，谁能料者？瓦特发明蒸气，乃竟孕育现代贫富阶级之斗争，谁能料者？苻坚欲勤远略，遣吕光灭龟兹，光师未班而坚已亡；然而光以鸠摩罗什至长安，中国佛教思想之确立，自兹始也。明成祖疑建文逊于南荒，遣郑和入海求之，无所得而归；然而和率闽、粤子弟南征，中国人始知有南洋群岛，海外殖民，自兹始也。苻坚之动机，曷尝有丝毫为佛教？成祖之动机，曷尝有丝毫为殖民？动机极狭劣，顾乃产出与动机绝不相谋之伟大崇高的结果，可谓大奇。然而何奇之有？使六朝时之中国国民无传受佛教的可能性，明代中国国民无移殖海外的可能性，则决非一罗什一郑和所能强致。既有可能性，则随时可以发动，而引而致之必藉外缘。其可能性则史家

所能逆睹，其外缘则非史家所能逆睹也。

以上所述诸义，吾认为谈历史因果者，先当注意及之。吾甚惜本讲义时间匆促，不能尽吾言；且多为片段的思想，未经整理。吾所讲姑止于此。今当概括前旨，略加补苴，示治史者研究因果之态度及其程序。

第一，当画出一“史迹集团”以为研究范围——史迹集团之名，吾所自创，与一段之“纪事本末”，意义略相近。（“本末”仅函时间观念，“集团”兼函空间观念。但此名似仍未妥，容更订定）以严格论，史迹本为不可分的，不可断的，但有时非断之分之，则研究无所得施。故当如治天体学者画出某躔度某星座，如治地理学者画出某高原某平原某流域，凡以为研究之方便而已。例如，法国大革命，一集团也；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之世界大战，一集团也。范围广者，如全世界劳工阶级对资产阶级之斗争史，可以画为一集团；范围狭者，如爱尔兰区区小岛之独立史可以画为一集团。历时久者，如二千年前中华民族对匈奴交涉始末，可以画为一集团；历时暂者，如一年间洪宪盗国始末，可以画为一集团。集团之若何区画，治史者尽可自由。但有当注意者二事：其一，每集团之函量须较广较复，分观之，最少可以觑出一时代间社会一部分之动相。其二，各集团之总和须周遍，合观之，则各时代全社会之动相皆见也。

第二，集团分子之整理与集团实体之把握——所谓“集团分子”者，即组成此史迹集团之各种史料也。搜辑宜求备，鉴别宜求真，其方法则前章言之矣。既备且真，而或去或取，与夫叙述之详略轻重，又当注意焉，否则淆然杂陈，不能成一组织体也。所谓“集团实体”者，此一群史迹，合之成为一个生命——活的，整个的。治史者须将此“整个而活”的全体相，摄取于吾心目

中。然兹事至不易，除分析研究外，盖尚有待于直觉也。

第三，常注意集团外之关系——以不可分、不可断之史迹，为研究方便而强画为集团，原属不得已之事。此一群史迹不能与他群史迹脱离关系而独自存在，亦犹全社会中此一群人常与他群人相依为命也。故欲明一史迹集团之真相，不能不常运眼光于集团以外。所谓集团外者，有时间线之外，例如“五胡乱华”之一史迹集团，其时间自然当以晋代为制限；然非知有汉时之保塞匈奴，魏时之三辅徙羌，则全无由见其来历。此集团外之事也。有空间线之外，例如“辛亥革命”之一史迹集团，其空间自当以中国为制限；然非知欧、美、日本近数十年学说制度变迁之概略，及其所予中国人以刺激，则兹役之全相终不可得见。此又集团外之事也。其他各局部之事象，殆无不交光互影。例如政治与哲学，若甚缘远，然研究一时代之政治史，不容忘却当时此地之哲学思想；美术与经济，若甚缘远，然研究一时代之美术史，不容忘却当时此地之经济状况。此皆集团以外之事也。

第四，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之“人格者”——每一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为一人，或为数人，或为大多数人。例如法兰西帝国时代史，则拿破仑为唯一之“人格者”。普奥、普法战史，则俾斯麦等数人为其“人格者”。至如此次世界大战，则不能以“人格者”专属于某某数人，而各国之大多数国民实共为其“人格者”也。然亦自有分别：倘再将此世界战史之大集团析为若干小集团，则在德国发难史之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威廉第二为其“人格者”；在希腊参战史之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威尼柴罗为其“人格者”；在巴黎议和史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克里曼梭、劳特佐治、威尔逊为其“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史，以多数之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共为其“人格者”；民国十年来政治史，

则袁世凯殆可认为唯一之“人格者”也。凡史迹皆多数人共动之产物，固无待言，然其中要有主动被动之别，立于主动地位者，则该史迹之“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多数党人为主动，而黎元洪、袁世凯不过被动，故彼二人非“人格者”；十年来之民国，袁世凯及其游魂为主动，凡多数助袁、敌袁者皆被动，故袁实其“人格者”也。

第五，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曷为每一史迹必须认取其“人格者”耶？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未由见也。而每一史迹之构成心理，恒以彼之“人格者”为其聚光点，故研究彼“人格者”之素性及其临时之冲动断制，而全史迹之筋脉乃活现。此种研究法，若认定彼“人格者”为一人或数人，则宜深注意于其个人的特性。因彼之特性非惟影响于彼个人之私生活，而实影响于多数人之公生活。例如凡赛条约，论者或谓可以为将来世界再战之火种，而此条约之铸一大错，则克里曼梭、劳特佐治、威尔逊三人之性格及头脑，最少亦当为其原因之一部，故此三人特性之表现，其影响乃及于将来世界也。又如袁世凯，倘使其性格稍正直或稍庸懦，则十年来之民国局面或全异于今日，亦未可知，故袁世凯之特性，关系于其个人运命者犹小，关系于中国人运命者甚大也。史家研究此类心理，最要者为研究其吸射力之根源。其在圣贤豪杰，则观其德量之最大感化性，或其情热之最大摩荡性。其在元凶巨猾，则观其权术之最大控弄性，或观其魔恶之最大诱染性。从此处看得真切，则此一团史迹之把鼻，可以捉得矣。

其在“多数的人格者”之时，吾侪名之曰民族人格，或阶级人格，党派人格。吾侪宜将彼全民族、全阶级、全党派看作一个人，以观察其心理。此种“人格者”，以其意识之觉醒，觐其人格

之存在；以其组织之确立，观其人格之长成；以其运动之奋迅，观其人格之扩大；以其运动之衰息，组织之涣散，意识之沉睡，观其人格之萎病或死亡。爱尔兰人成一民族的人格，犹太人未能，犹太人民族建国的意识不一致也。欧美劳工，成一阶级的人格，中国未能，中国劳工并未有阶级意识也。中国十年来所谓政党，全不能发现其党派的人格，以其无组织，且无运动也。治西洋史者，常以研究此类集团人格的心理为第一义；其在中国，不过从半明半昧的意识中，偶睹其人格的胎影而已。研究史之心的基件，则正负两面，皆当注意。凡“人格者”，无论为个人为集团，其能演成史迹者，必其人格活动之扩大也。其所以能扩大之故，有正有负：所谓正者，活动力昂进，能使从前多数反对者或怀疑者之心理皆翕合于我心理。在欧美近代，无论政治上、宗教上、学艺上，随处皆见此力之弥满。其在中国，则六朝、唐之佛教运动，最其显列。次则韩、欧等之古文学运动，宋、明两代之理学运动，清代之朴学运动，及最近之新文化运动，皆合此意。惟政治上极阙如，清末曾国藩、胡林翼等略近之，然所成就殊少，现代所谓政党，其方向则全未循此以行也。所谓负者，利用多数人消极苟安的心理，以图自己之扩大。表面上极似全国心理翕聚于此一点，实则其心理在睡眠状态中耳。中国二千年政治界之伟物，大率活动于此种心理状态之上，此实国民心理之病征也。虽然，治史者不能不深注意焉，盖中国史迹之所以成立，大半由是也。

第六，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物的基件者，如吾前所言：“物的运动不能与心的运动同其速率。”倘史迹能离却物的制约而单独进行，则所谓“乌托邦”、“华藏世界”者，或当早已成立。然而在势不能尔尔。故心的进展，时或被物的势力所堵截而折回；或为所牵率而入于其所不豫期之歧路；直待渐达心物相应的境界，

然后此史迹乃成熟。物者何？谓与心对待的环境。详育之，则自然界之状况，以及累代遗传成为固形的之风俗、法律，与夫政治现象、经济现象、乃至他社会之物的心的抵抗力，皆是也。非攻、寝兵之理想，中外贤哲倡之数千年，曷为而始终不得实现？辛亥革命，本悬拟一“德谟克拉西”的政治以为鹄，曷为十年以来适得其反？欧洲之社会主义，本滥觞于百年以前，曷为直至欧战前后乃始骤盛？物的基件限之也。假使今日之日本移至百年以前，必能如其所欲，效满洲之入主中国；假使袁世凯生在千数百年前，必能如其所欲，效曹操、司马懿之有天下；然而皆不能者，物的基件限之也。吾前屡言矣：“凡史迹皆以‘当时’‘此地’之两观念而存在”，故同一之心的活动，易时易地而全异其价值，治史者不可不深察也。

第七，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史之开拓，不外人类自改变其环境。质言之，则心对于物之征服也。心之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物之被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通无穷的宇宙为一历史，则此极限可谓之无。若立于“当时”“此地”的观点上，则两者俱有极限明矣。在双极限之内，则以心的奋进程度与物的障碍程度强弱比较，判历史前途之歧向。例如今日中国政治，若从障碍力方面欲至于恢复帝制，此其不可能者也；若从奋进力方面欲立变为美国的“德谟克拉西”，亦其不可能者也。障碍力方面之极限，则可以使惰气日积，举国呻吟憔悴，历百数十年，甚者招外人之监督统治。奋进力方面之极限，则可以使社会少数优秀者觉醒，克服袁世凯之游魂，在“半保育的”政策之下，历若干年，成立多数政治。史家对于将来之豫测，可以在此两可能性之大极限中，推论其果报之极限，而予国民以一种暗示，唤醒其意识而使知所择，则良史之责也。

第八，观察所缘——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以世界大战之一史团而论，军国主义之猖獗，商场竞争之酷剧，外交上同盟协商之对抗……等等，皆使大战有可能性，所谓“因”也。奥储被刺，破坏比利时中立，潜艇无制限战略……等等，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以辛亥革命之一史团而论，国人种族观念之郁积，晚清政治之腐恶及威信之失坠，新思潮之输入……等等，皆使革命有可能性，所谓“因”也。铁路国有政策之高压，瑞澂之逃遁，袁世凯之起用，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因”为史家所能测知者，“缘”为史家所不能测知者。治史者万不容误“缘”为“因”，然无“缘”则史迹不能现，故以观所“缘”终焉。

因果之义，晰言之当云“因果果报”。一史迹之“因果果报”，恒复杂幻变至不可思议。非深察而密勘之，则推论鲜有不谬误者。今试取义和团事件为例，供研究者参考焉。

义和团事件之起，根于历史上遗传之两种心理：其一，则排外的心理。此种心理，出于国民之自大性及自卫性，原属人类所同然。惟中国则已成为畸形的发达，千年以来，科举策论家之尊王攘夷论，纯然为虚矫的，非逻辑的。故无意识且不彻底的排外，形成国民性之一部。其二，则迷信的心理。因科学思想缺乏之故，种种迷信，支配民心之势力甚大，而野心家常利用之以倡乱。自汉末之五斗米道，以迄明清间白莲教匪等，其根株蟠积于愚民社会间甚厚，乘间辄发。此两种心理，实使义和团有随时爆发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心的方面者也。

虽有此两种心理，其性质完全为潜伏的；苟环境不宜于彼之发育，彼亦终无由自遂。然而清季之环境，实有以滋酿之。其一，则外力之压迫。自鸦片战争以后，觐见既多，受侮不少。其中天

主教会在内地专横，尤予一般人民以莫大之积愤。其二，则政纲之废弛。自洪杨构乱以后，表面上虽大难削平，实际上仍伏莽遍地，至光绪间而老成凋谢，朝无重臣，国事既专决于一阴鸷之妇人，而更无人能匡救其失。在此两种环境之下，实使义和团有当时爆发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境的方面者也。

“因”虽夙具，然非众“缘”凑泊，则事实不能现。所谓“缘”者，有“亲缘”（直接缘），有“间缘”（间接缘）。义和团之“亲缘”有二：其一，则社会革新运动之失败。其二，则宫廷阴谋之反拨也。此二者又各有其复杂之“间缘”。社会革新运动，自有其心理上之可能性，兹不多述。其所以觉醒而督促之者，则尤在外交压迫之新形势。其一，为日本新著手之大陆政策；其二，为俄国积年传来之东侵政策；其三，为德国远东发展政策。（此政策复含两种意味：一，德国自己发展；二，德国诱助俄国东侵，冀促成日俄之战或英俄之战，以减杀俄法同盟势力，缓和欧洲形势。）以此三种外“缘”，故甲午战败，日本据辽，三国干涉还辽，而胶州、旅顺、威海之租借随之，瓜分之局，咄咄逼人。于是变法自强之论，骤兴于民间，而其动力遂及德宗，无端与清室宫廷问题发生联带关系。宫廷问题，其“间缘”亦至复杂。其一，清穆宗无子，德宗以支庶入继，且有为穆宗立后之约。其二，孝钦后临朝已二十余年，新归政于德宗，德宗既非所生，而思想复与彼不相容，母子之间，猜嫌日积。如是内外新故诸“缘”凑合，遂有戊戌政变之役，戊戌政变为义和团之“亲缘”，而上列诸种事实，则其“间缘”也。

“亲缘”之中，复有“主缘”，有“助缘”。戊戌政变为义和团唯一之“主缘”，固也。然政变之波澜，曷为一转再转以至于仇外耶？其一，因康有为、梁启超等亡命外国，清廷不解国际法上保

护政治犯之先例，误认维新派人以外国为后盾。其二，因政变而谋废立（立端王之子溥僊为大阿哥），外国公使纷起质问，志不得逞，积怒益深。其三，连年曹州、兖州、沂州、易州等教案，乡民与天主教徒构怨益剧。得此等“助缘”，而义和团遂起。

因缘和合，“果”斯生焉。此一群史迹之正果，可分数段。一，山东、直隶团匪之私自组织及蠢动；二，两省长官之纵容及奖励；三，北京王大臣之附和；四，甘军（董福祥）之加入；五，孝钦后以明谕为之主持，军匪混化对全世界宣战；六，前后戕杀教徒及外国人数千；七，戕杀德国公使及日本使馆馆员；八，毁京津铁路，围攻使馆。此一幕滑稽剧，在人类史全体中，不得不认为一种极奇特的病态，以易时易地之人观测之，几疑其现实之万不可能。然吾侪试从心境两面精密研究，则确能见其“因”“缘”所生，历历不爽。其在心的方面，苟非民族性有偏畸之点，则不能涵淹卵育此种怪思想，故对于民族性之总根柢，首当研究者一也。拳匪为发难之主体，而彼辈实为历史上之一种秘密社会，故对于此种特别社会，察其群众心理，考其何以能发生能扩大，此次当研究者二也。发难虽由拳匪，而附和之者实由当时所谓士大夫阶级。此阶级中，金壬虽多，而贤者亦非绝无，曷为能形成一种阶级心理，在此问题之下一致行动？此次当研究者三也。孝钦后为全剧之主人翁，非深察其人之特别性格，及其当时心理之特别动态，则事象之源泉不可得见，此次当研究者四也。其在境的方面，非专制政治之下，此种怪象未由发生，此数千年因袭之政体，次当研究者五也。有英明之君主或威重睿谔之大臣，则祸亦可以不起，此当时之政象，次当研究者六也。非有维新派之锐进，不能召此反动，维新派若能社会上确占势力，则反动亦不能起，此对面抵抗力之有无强弱，次当研究者七也。非国外周遭形势如

前文所云云，则亦不至煎迫以成此举，此世界政局之潮流，次当研究者八也。经过此八方面之研究，则义和团一段史迹，何故能于“当时”“此地”发生，可以大明。

有果必有报。义和团所得业报如下：一，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蒙尘。二，东南各督抚联约自保，宣告中立。三，俄军特别行动，占领东三省。四，缔结辛丑条约，赔款四百五十兆，且承认种种苛酷条件。五，德宗不废，但政权仍在孝钦。六，孝钦迎合潮流，举行当时所谓新政，如练兵兴学等事。此义和团直接业报之要点也。由直接业报复产出间接业报，以次演成今日之局。

就理论上言之，义和团所产业报有三种可能性。其一，各国瓜分中国或共同管理。其二，汉人自起革命，建设新政府。其三，清廷大觉悟，厉行改革。然事实上皆以种种条件之限制，不能办到。其第一种，以当时中国人抵抗力之缺乏，故有可能性；然各国力量不及，且意见不一致，故不可能。其第二种，以人民厌恶满洲既久，且列国渴望得一新政府与之交涉，故有可能性；然民间革命党，无组织，无势力，其有力之封疆大吏，又绝无此种心理，故不可能。其第三种，因前两种既不能办到，而经此创巨痛深之后，副人民望治之心，其势甚顺，故有可能性；然孝钦及清廷诸臣，皆非其人，皆不可能。治史者试先立一可能性之极限，而观其所以不能之由，则于推论之术，思过半矣。

因缘生果，果复为因，此事理当然之程序也。义和团直接业报，更间接产种种之果。就对外关系论，第一，八国联军虽撤退，而东三省之俄军迁延不撤，卒因此引起日俄战争，致朝鲜完全灭亡，而日本在南满取得今日之特殊地位。第二，当匪势正炽时，日本藉端与英国深相结纳，首由英提议劝日本就近出重兵，是为英日接近之第一步。其后我国为应付俄军起见，议结所谓中俄密

约者，虽卒未成立，然反因此促英日同盟之出现。而此英日同盟，遂被利用于此次欧洲大战，使日本国际地位昂进，而目前关系国命之山东问题，即从此起。第三，重要之中央财源，如海关税等，悉供偿债之用。因此各外国银行，攫得我国库权之一部分，遂启后此银行团操纵全国金融之端绪。此其荦荦大者也。就内政关系论，第一，排外的反动，一变而为媚外，将国民自尊、自重之元气，断丧殆尽，此为心理上所得最大之恶影响。第二，经此次剧烈的激刺，社会优秀分子，渐从守旧顽梦中得解放，以次努力，求取得“世界人”“现代人”的资格，此为心理上所得最大的良影响。此两种影响，乃从国民性根柢上加以摇动，此两歧路之发展的可能性皆极大，在今日殊未能测其变化之所届。第三，东南互保，为地方对中央独立开一先例。此后封疆权力愈重，尾大不掉，故辛亥革命，起于地方，而中央瓦解。此趋势直至今日，而愈演愈剧。第四，袁世凯即以东南互保中之一要人，渐取得封疆领袖的资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蓄养其势力，取清室而代之。第五，回銮后以媚外故，而行敷衍门面的新政。一方面自暴自弃其前此之愚迷及罪恶，增人轻蔑；一方面表示其无诚意的态度，令人绝望。第六，此种敷衍的新政，在清廷固无诚意，然国人观听已为之一变，就中留学生数目激增，尤为国民觉醒最有力之一媒介。海外学校，遂变为革命之策源地。第七，新政之最积极进行者为练兵，而所谓新军者，遂为革命派所利用，为袁世凯所利用，卒以覆清祚。第八，以大赔款及举办新政之故，财政日益竭蹶，专谋藉外债以为挹注。其后卒以铁路大借款为革命之直接导火线。右所举第三项至第八项，皆为义和团业报所演，同时即为辛亥革命之亲缘或间缘。于是而一“史迹集团”遂告终焉。

吾不惮繁重，详举此例，将借一最近之史迹其资料比较的丰

富且确实者，示吾侪运用思想，推求因果，所当遵之途径为何如。此区区一史迹，其活动时间，不过半年，其活动地域，不过数百里，而欲说明其因果报之关系，其广远复杂乃至如是。学者举一反三，则于鉴往知来之术，虽不中不远矣。

新史学

中国之旧史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虽然，我国兹学之盛如彼，而其现象如此，则又何也？今请举中国史学之派别，表示之，而略论之。

史 学	第一	正史	(甲) 官书 所谓二十四史是也。 (乙) 别史 如华峤《后汉书》、习凿齿《蜀汉春秋》、《十六国春秋》、《华阳国志》、《元秘史》等，其实皆正史体也。
	第二	编年	《资治通鉴》等是也。
	第三	纪事本末	(甲) 通体 如《通鉴纪事本末》、《绎史》等是也。
			(乙) 别体 如平定某某方略、《三案始末》等是也。
	第四	政书	(甲) 通体 如《通典》、《文献通考》等是也。
			(乙) 别体 如《唐开元礼》、《大清会典》、《大清通礼》等是也。
			(丙) 小纪 如《汉官仪》等是也。
第五	杂史	(甲) 综记 如《国语》、《战国策》等是也。	
		(乙) 琐记 如《世说新语》、《唐代丛书》、《明季稗史》等是也。	
第六	传记	(丙) 诏令奏议 四库另列一门，其实杂史耳。	
		(甲) 通体 如《满汉名臣传》、《国朝先正事略》等是也。	
		(乙) 别体 如某帝实录、某人年谱等是也。	
第七	地志	(甲) 通体 如各省通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是也。	

史	第八	学史	(乙) 别体	如纪行等书是也。
				如《明儒学案》、《国朝汉学师承记》等是也。
学	第九	史学	(甲) 理论	如《史通》、《文史通义》等是也。
			(乙) 事论	如《历代史论》、《读通鉴论》等是也。
	(丙) 杂论	如《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等是也。		
	第十	附庸	(甲) 外史	如《西域图考》、《职方外纪》等是也。
			(乙) 考据	如《禹贡图考》等是也。
			(丙) 注释	如裴松之《三国志注》等是也。

都为十种二十三类。

试一翻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邱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其论语无一非忠告君主者）。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其大蔽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于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有所谓鼎革前后之笔法。如欧阳之《新五代史》，朱子之《通鉴纲目》等。今日盗贼，明日圣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群蛆啄矢，争其甘苦；狙公赋茅，辨其四三。自欺欺人，莫此为甚！吾中国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

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虽然，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此为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又不惟正史而已，即各体莫不皆然。故温公《通鉴》，亦起战国而终五代。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则史不其中绝乎？使于日本之数千年一系，岂不并史之为物而无之乎？太史公作《史记》直至《今上本纪》，且其记述不少隐讳焉，史家之天职然也。后世专制政体，日以进步，民气学风，日以腐败。其末流遂极于今日。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无也？今日我辈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来之事实，竟无一书可凭藉。非官牍铺张循例之言，则口碑影响疑似之说耳。时或藉外国人之著述，窥其片鳞残甲，然甲国人论乙国之事，例固百不得一，况吾国之向闭关不与人通者耶！于

是乎吾辈乃穷。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夫陆沉我国民之罪，史家实尸之矣。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人身者，合四十余种原质而成者也。合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无一不备，若是者可谓之人乎？必不可。何则？无其精神也。史之精神为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

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英儒斯宾塞曰：“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然历史上之事迹，其类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读书观万物，则思过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也。泰西旧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国殆更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册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诏书也，满纸填塞，皆此等邻猫生子之事实，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就中如《通鉴》一书，属稿十九年，别择最称精善，然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觉其有用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通鉴》载奏议最多，盖此书专为格君而作也，吾辈今日读之实嫌其冗），其他更何

论焉。至如《新五代史》之类，以别裁自命，实则将大事皆删去，而惟存邻猫生子等语，其可厌不更甚耶！故今日欲治中国史学，真有无从下手之慨。二十四史也，九通也，《通鉴》、《续通鉴》也，《大清会典》、《大清通礼》也、《十朝实录》、《十朝圣训》也，此等书皆万不可不读。不读其一，则罅漏正多。然尽此数书而读之，日读十卷，已非三四十年不为功矣。况仅读此数书，而决不能足用，势不可不于前所列十种二十二类者一一涉猎之（杂史、传志、札记等所载，常有有用过于正史者，何则？彼等常载民间风俗，不似正史专为帝王作家谱也）。人寿几何？何以堪此！故吾中国史学知识之不能普及，皆由无一善别裁之良史故也。

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万事，皆取“述而不作”主义，而史学其一端也。细数二千年来史家，其稍有创作之才者惟六人：一曰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其书亦常有国民思想，如项羽而列诸《本纪》，孔子、陈涉而列诸《世家》，儒林、游侠、刺客、货殖而为之《列传》，皆有深意存焉。其为立传者，大率皆于时代极有关系之人也。而后世之效颦者，则胡为也。二曰杜君卿。《通典》之作，不纪事而纪制度。制度于国民全体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前此所无而杜创之，虽其完备不及《通考》，然创作之功，马可敢望杜耶？三曰郑渔仲。夹漈之史识，卓绝千古，而史才不足以称之。其《通志》二十略，以论断为主，以记述为辅，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也。惜其为太史公范围所困，以纪传十之七八，填塞全书，支床叠屋，为大体玷。四曰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五曰袁枢。今日西史，大率皆纪事本末之体也。而此体在中国，实为袁枢创之，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但其著《通鉴纪

事本末也，非有见于事与事之相联属，而欲求其原因结果也，不过为读《通鉴》之方便法门，著此以代抄录云尔。虽为创作，实则无意识之创作。故其书不过为《通鉴》之一附庸，不能使学者读之有特别之益也。六曰黄梨洲。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史家未曾有之盛业也。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梨洲乃创为学史之格，使后人能师其意，则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诸类此者，其数何限？梨洲既成《明儒学案》，复为《宋元学案》，未成而卒。使假以十年，或者有《汉唐学案》、《周秦学案》之宏著，未可料也。梨洲诚我国思想界之雄也。若夫此六君子以外（袁枢实不能在此列），则皆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史记》以后，而二十一部皆刻画《史记》；《通典》以后，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以其奴隶性至于此甚耶？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以故每一读辄惟恐卧，而思想所以不进也。

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浩如烟海，穷年莫殫，前既言之矣。二曰难别择。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不能别择某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三曰无感触。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然则吾中国史学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也，职此之由。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史学之界说

欲创新史学，不可不先明史学之界说。欲知史学之界说，不可不先明历史之范围。今请析其条理而论述之。

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现象者何，事物之变化也。宇宙间之现象有二种：一曰为循环之状者。二曰为进化之状者。何谓循环？其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如四时之变迁，天体之运行是也。何谓进化？其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如生物界及人间世之现象是也。循环者，去而复来者也。止而不进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天然学。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天下万事万物，皆在空间，又在时间（空间，时间，佛典译语，日本人沿用之。若依中国古义，则空间，宇也；时间，宙也。其语不尽通行，故用译语）。而天然界与历史界，实分占两者之范围。天然学者，研究空间之现象者也。历史学者，研究时间之现象者也。就天然界以观察宇宙，则见其一成不变，万古不易，故其体为完全，其象如一圆圈。就历史界以观察宇宙，则见其生长而不已，进步而不知所终，故其体为不完全，且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明此理者，可以知历史之真相矣。

由此观之，凡属于历史界之学（凡政治学、群学、平准学、宗教学等，皆近历史界之范围），其研究常较难。凡属于天然界之学（凡天文学、地理学、物质学、化学等，皆天然界之范围），其

研究常较易。何以故？自然界已完全者也，来复频繁，可以推算，状态一定，可以试验。历史学未完全者也，今犹日在生长发达之中，非逮宇宙之末劫，则历史不能终极，吾生有涯，而此学无涯。此所以天然诸科学起源甚古，今已斐然大成，而关于历史之各学，其出现甚后，而其完备难期也。

此界说既定，则知凡百事物，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者，则属于历史之范围。反是者，则不能属于历史之范围。又如于一定期中，虽有生长、发达，而及其期之极点则又反其始，斯仍不得不以循环目之。如动植物，如人类，虽依一定之次第，以生以成，然或一年，或十年，或百年，而盈其限焉，而反其初焉，一生一死，实循环之现象也。故物理学、生理学等，皆天然科学之范围，非历史学之范围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如是云尔。譬之江河东流以朝宗于海者，其大势也。乃或所见局于一部，偶见其有倒流处，有曲流处，因以为江河之行，一东一西，一北一南，是岂能知江河之性矣乎？（春秋家言，有三统，有三世。三统者，循环之象也，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是也。三世者，进化之象也，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进是也。三世则历史之情状也。三统则非历史之情状也。三世之义，既治者则不能复乱。藉曰有小乱而必非与前此之乱等也。苟其一治则复一乱，则所谓治者必非真治也。故言史学者当从孔子之义，不当从孟子之义）。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

也。

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进化之义既定矣，虽然，进化之大理，不独人类为然，即动植物乃至无机世界，亦常有进化者存，而通行历史所纪述常限于人类者，则何以故？此不徒吾人之自私其类而已。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故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虽然，历史之范围可限于人类，而人类之事实不能尽纳诸历史。夫人类亦不过一种之动物耳，其一生一死，固不免于循环，即其日用饮食，言论行事，亦不过大略相等，而无进化之可言。故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独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如以一人也，则今人必无以远过于古人。语其体魄，则四肢、五官，古犹今也。质点血轮，古犹今也。语其性灵，则古代周、孔、柏（柏拉图）、阿（阿里士多德）之智识能力，必不让于今人，举世所同认矣。然往往有周、孔、柏、阿所不能知之理，不能行之事，而今日乳臭小儿知之、能之者，何也？无他，食群之福，享群之利，藉群力之相接、相较、相争、相师、相摩、相荡、相维、相系、相传、相嬗，而智慧进焉，而才力进焉，而道德进焉。进也者，人格之群，非寻常之个人也。（人类天性之能力随文明进化之运而渐次增长与否，此问题颇难决定。试以文明国之一小儿不许受教育，不许蒙社会之感化、沐文明之恩泽，则其长成能有以异于野蛮国之小儿乎？恐不能也。盖由动物进而为人，已为生理上进化之极点，由小儿进为成人，已为生理上进化之极点，然则一个人殆无进化也。进化者，别超于个人之上之一人格而已，即人群是也）。然则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

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

畴昔史家，往往视历史如人物传者然。夫人物之关系于历史固也。然所以关系者，亦谓其于一群有影响云尔。所重者在一群，非在一人也。而中国作史者，全反于此目的，动辄以立佳传为其人之光宠，驯至连篇累牍列无关世运之人之言论行事，使读者欲卧欲呕，虽尽数千卷，犹不能于本群之大势有所知焉，由不知史之界说限于群故也。

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亦名所界、能界，能所二字，佛典译语，常用为名词）。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虽然，求史学之公理公例，固非易易。如彼自然科学者，其材料完全，其范围有涯，故其理例亦易得焉。如天文学，如物质学，如化学，所已求得之公理公例不可磨灭者，既已多端，而政治学、群学、宗教学等，则瞠乎其後，皆由现象之繁赜，而未到终点也。但其事虽难，而治此学者不可不勉。大抵前者史家不能有得于是者，其蔽二端：一曰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也。或局于一地，或局于一时代，如中国之史，其地位则仅叙本国耳，于吾国外之现象，非所知也（前者他国之史亦如是）。其时代则上至书契以来，下至胜朝之末止矣。前乎此，后乎此，非所闻也。

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凡民间之结集而成一人格之团体者，谓之法团，亦谓之法人。法人者，法律上视之与一个人无异也。一州之州会，一市之市会，乃至一学校、一会馆、一公司皆统名为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至穹古之石史（地质学家从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进化之迹，号曰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综是焉以求其公理公例，虽未克完备，而所得必已多矣。问畴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二曰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籍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问畴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明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中国前此之无真史家也，又何怪焉！而无真史家，亦即吾国进化迟缓之一原因也。吾愿与同胞国民筚路蓝缕以辟此途也。

以上说界说竟。作者初研究史学，见地极浅，自觉其界说尚有未尽未安者，视吾学他日之进化，乃补正之。著者识。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何以故？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实数千年世界历史经过之阶级，而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也。夫群与群之互有所排也，非大同太平之象也，而无如排于外者不剧，则结于内者不牢；结于内者不牢，则其群终不可得合，而不能占一名誉之位置于历史上。以故世界日益进步，而种族之论日益昌明。呜呼，后乎此者，其有种界尽破，万国大同之郅治乎？吾不敢知。若在今日，则虽谓人种问题为全世界独一无二之问题，非过言也。

有历史的人种，有非历史的人种。等是人种也，而历史的非历史的何以分焉？曰，能自结者，为历史的；不能自结者，为非历史的。何以故？能自结者，则排人；不能自结者，则排于人。排人者，则能扩张本种以侵蚀他种，駸駸焉垄断世界历史之舞台。排于人者，则本种日以陵夷衰微，非惟不能扩张于外，而且渐灭于内，寻至失其历史上本有之地位，而舞台为他人所占。故夫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

近世言人种学者，其论不一。或主张一元说，而以为世界只有一人种。或主张多元说，而区分为四种(康德)，为五种(布曼

伯),为六种(巴科安),为七种(韩特),为八种(亚加智),其多者乃至十一种,十五种,十六种,二十二种,六十种。其最多者分为六十三种(巴喀),甚者以言语之分而区为一千乃至二千余人种。然今所通行,则五种之说。所谓黄色种、白色种、棕色种、黑色种、红色种是也。或以南洋群岛太平洋群岛纽西仑诸土人,及中亚美利加之土人,合于黄种,以澳洲、南印度之土人合于黑种,而成为三大种。今勿具论。要之,缘附于此转转员與上之千五百兆生灵,其可以称为历史的人种者,不过黄白两族而已。今条其派别如下:(见下页)

同为历史的人种也,而有世界史的与非世界史的之分。何谓世界史的?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仅在本国之境域,不仅传本国之子孙,而扩之充之以及于外,使全世界之人类,受其影响,以助其发达进步,是名为世界史的人种。吾熟读世界史,察其彼此相互之关系,而求其足以当此名者,其后乎此者吾不敢知,其前乎此者,则吾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中之阿利安种。而于其中复分为两大时期,前期为阿利安种与哈密忒、沁密忒两种合力运动时代。后期为阿利安种独立运动时代。前期之中,复分为三小时期:一哈密忒全盛时代;二沁密忒全盛时代;三阿利安与哈沁融合时代。于后期之中,亦分为三小时期:一希腊罗马人时代;二条顿人时代;三斯拉夫人时代。(所谓各时代者,非此时代终而彼时代乃始也,其界限常不能甚分明,往往后时代中仍抱前时代之余波,前时代中已含后时代之种子,不过就其大势略区别之取便称呼耳,观下文自明)试略论之:夫以狭义言之,欧罗巴文明实为今日全世界一切文明之母,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欧罗巴文明何自起?其发明光大之者,为阿利安民族。其组织而导引之者,为哈密忒与沁密忒之两民族。若世界文明史而有正统也,

历史的人种

(一) 黄种

- 甲 { 中国人
日本人
朝鲜人
暹罗人
其它亚细亚东部之人
- 乙 { 蒙古人
鞑靼人
鲜卑人(即今西伯利亚人)
其它亚细亚北部中部之人

(二) 白种

Hamitic 哈人
Semitic 沁密忒人种

- 丙 { 土耳其人
匈牙利人
其它在欧洲之黄种人
- 哈密忒种人 { 埃及人
里比亚人
哥士人(居阿刺伯及埃及之南)
- 沁密忒人种 { 亚西里亚人
巴比伦人
腓尼西亚人
希伯来人(犹太及以色列)
亚刺伯人

Aryan 阿利安人种

- 亚细亚之部 { (一) 印度人
(二) 伊兰人 (Iranic) { 米底亚人
波斯人
- (一) 希腊人
罗马人 { 法兰西人
伊意大利人
西班牙葡萄牙人
- (二) 峨特忒人 (Celtic) { 郃卢人
白里敦人
苏格兰人
爱尔兰人
- 欧罗巴之部 { (三) 条顿人 (Teutonic) { 那威人
瑞典人
丁抹人
德意志人
荷兰人
英人
- (四) 斯拉夫人 (Slavonic) { 俄罗斯人
荷兰人
波希米亚人
塞尔维亚人 { 多居奥
其他 { 大利

则其统不得不托始于哈密忒人。代表哈密忒者，曰埃及。埃及文明之花，实现于距今四五千年以前，于金字塔观其工艺之伟大（金字塔者，埃及古王之坟陵也。其最大者，容积七千四百万立方英尺，底阔七百六十四英尺，侧袤四百八十英尺。世界最大之石碑也。其能运如许重大之石材上举放数百丈之高处，则其时工械力之大可想）。于木乃伊想其化学之发明（木乃伊者，埃及古王之尸体以药物浸裹之，使其不朽，至今犹有存者，则当时之人已明化学，可以概见）。尼罗河畔，实历史上最荣誉之纪念场哉。自摩西为埃及王女所收养，遍学其教术，吸取其智识，既乃率同族以开犹太（详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是沁密忒文明出于埃及之明证也（其余巴比伦、叙利亚文明亦得力于埃及，不少史家能言其详）。希腊古哲，如德黎Thales，如毕达哥拉Pythagoras，如梭伦Solon，如德谟吉来图Democritus，如柏拉图Plato皆尝受教于埃及僧侣，而德谟吉来图、柏拉图二氏，且躬自游历埃土，而遏狄加人（希腊四大族之一）之宗教，及其群治制度，多承埃及之遗迹，是阿利安文明出于埃及之明证也。故今日欧洲文明，以希腊为父，以沁密忒为祖，以哈密忒为祖之所自出。虽然，哈密忒人，能创造之以待人取法者也。沁密忒人，能创造之且能传播之者也。阿利安人，能创造之，能传播之，且最能取法于人者也。故三族之优劣胜败于此判焉矣。

哈密忒于世界文明，仅有间接之关系。至沁密忒而始有直接之关系。当希腊人文未发达之始，其政治学术宗教卓然有牢笼一世之概者，厥惟亚西里亚（或译作亚述）、巴比伦、腓尼西亚诸国。沁密忒人，实世界宗教之源泉也，犹太教起于是，基督教起于是，回回教起于是。希腊古代之神话，其神名及其祭礼，无一不自亚西里亚、腓尼西亚而来。新旧巴比伦之文学美术，影响于

后代，其尤著者也。腓尼西亚之政体，纯然共和政治，为希腊所取法。其商业及航海术亦然。且以贸易之力，传播其文明，直普及于意大利，作罗马民族之先驱。故腓尼西亚国虽小，而关系于世界史者最大。若希伯来人之有摩西、耶稣两教主，其势力浸润全欧人民之脑中者，更不待论矣。故世界史正统之第二段在沁密忒人。而亚西里亚、巴比伦、希伯来为其主脑，腓尼西亚为枢机。

其在第三段，为世界史之主人翁者，则希腊也。希腊代表阿利安种之一部。其民族则土著之“毕拉士治” Pelasgi 人与西迁阿利安人（阿利安分亚洲之部、欧洲之部两者，已详前表。希腊之阿利安则自伊兰高原西来者也）混合而成者也。阿利安族之所长，在贵自由，重考验，务进步。惟贵自由，故其于政治也，不甘压制而倡言平等。惟重考验，故其于学问也，不徇现象而探求原理。惟务进步，故其于社会一切事物也，不泥旧例而日事革新。阿利安族所以亘数千年至今常执全世界之牛耳者，皆此之由，而希腊人其最初之登场者也。希腊之代表，惟雅典与斯巴达。雅典右文，斯巴达尚武。两者虽不调和，而皆足以发挥阿利安族之特性，故史家或以今世欧罗巴为古代希腊之放影，以古代希腊为今世欧罗巴之缩图，非过言也。然其民族之团结力，只能建设市府政治，不能成就国家政治，故虽握霸权于历史上者七百年，卒服属于他国以致灭亡。

其在第四段，为世界之主人翁者，则罗马也。罗马位于古代史与近代史之过渡时代，而为其津梁。其武力既能挥斥八极，建设波斯以来梦想不及之绝大帝国，而其立法的智识，权利的思想，实为古代文明国所莫能及。集无量异种之民族，置之中央集权制度之下，为一定之法律以部勒之，故自罗马建国以后，而前此之

旧民族，皆同化于罗马，如蝾螈之与螟蛉。自罗马解纽以后，而后此之新民族皆赋形于罗马，如大河之播九派。今日欧洲大陆诸国，其言语、文学、宗教、风俗，各不相远，皆由其曾合并于罗马一统之下，浸润于同种之泽使然也。故希腊能吸集哈密忒、沁密忒两族之文明，纳诸阿利安族中，以成一特色。而罗马则承希腊正统，举其所吸集者、所结构者，以兵力而播之于世界。虽谓罗马为希腊之一亢宗子可也。虽然，罗马文明，其传袭希腊者固多，其独自结构者亦不少。如法律之制定，宗教之传播，其尤著也。

自希腊罗马以后，世界史之主位，既全为阿利安人所占。及于罗马末路，而阿利安族中之新支派，纷纷出现。除拉丁民族（即罗马族）外，则峨特民族、条顿民族、斯拉夫民族其最著者也。峨特民族在阿利安中，以战胜攻取闻。其人为印度阿利安之一派，自西历纪元前二世纪，即已侵入欧洲，发轫于小亚细亚，越今之瑞典、德意志、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诸地，直至爱尔兰之西岸，苏格兰之高原，皆有足迹焉。后乃至中部欧罗巴，蹂躏希腊、马基顿，蔓延全陆，所至竞争斗恣杀掠，使人战栗。故峨特人在世界史上，其影响所及亦不鲜。虽然，其人能冒险而不能忍耐，故战胜之结果无一可表见，而其血气之勇，终不足以敌罗马节制之师，卒被征服。及罗马亡后，遂服属于条顿人之轭下。今之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及法兰西人之一部，实峨特民族性质之代表也。

条顿民族之移住欧洲也，在拉丁、峨特两族之后，而其权力之影响于历史则过之。自中世以后，欧罗巴历史之中心点，实条顿人也。其民族移动之原因及其年代，虽不可确考，要之，自西历纪元二、三世纪，始出现于欧罗巴东部，而其中有势力于历史上者，复分四派：其在东欧者，曰高特族Goth，其在西欧者，曰福伦喀族Frank，其在北欧者曰撒逊族Saxon，亦称日耳曼族，其

在南欧者，曰阿里曼族 Alemanni。兹将千余年前条顿民族之位置列表如下：

条顿民族之位置沿革表

	高特族之位置	福伦喀族之位置	撒逊族之位置	阿里曼族之位置
西历纪元三世纪		居来因河之下流。	自埃士河入埃尔比河，宅居于今荷斯顿及丁抹诸地。	居多恼、麻因两河间，即日耳曼中部也。势力颇强，屡挫罗马军。
四世纪	本世纪中叶西高特族始见于多恼河之下流。其末叶东高特族自多恼河下流入布加里亚。	本世纪中叶入于加利亚，建设多数之小王国。		
五世纪	西高特族建设王国。东高特族转入意大利建国焉。	本世纪末叶大败罗马军，使法兰西（指今地）境内不留罗马只骑，复胜高特、阿里曼诸族。	本世纪中叶撒逊人分为两派：一派越海与盎格鲁人共征服英国大部，别成所谓盎格鲁撒逊民族大陆诸邦。	本世纪之末为福伦喀族所阻遏其进路。
六世纪以后	本世纪末叶为东罗马帝国所灭。其支派占有北日耳曼之地。	建设查里曼大帝国，成今日欧洲群雄树立之势。	六世纪以来屡与福伦喀族争斗，至九世纪福伦喀王国建立，撒逊人亦全占有北日耳曼之全部。十一世纪盎格鲁撒逊人全征服英国。	

由是观之，世界文明史之第五段，实惟阿利安族中罗马人与条顿人争长时代，而罗马人达于全盛，为日中将昃之形。条顿人气象方新，有火然泉达之观。峨特人虽奋血气之勇，偶耸动一世耳目，

而其内力不足以敌此两族，昙花一现，遂为天演所淘汰，归于劣败之数。自六世纪以后，而全欧文明之霸权，渐全归条顿人矣。

蹶条顿人之迹而有大力于历史上者，斯拉夫人也。以冒险之精神，道义之观念论之，条顿人迥非斯拉夫人所能及。若夫坚实耐久，立于千苦万难之中，毅然终始不失其特性者，则斯拉夫人殆冠宇内而无两也。彼等好战之心不如条顿人之盛，若一旦不得已而跃马执剑，则无论如何之大敌，决不足以慑其前。彼等个人自由之观念，视条顿人虽大有所缺乏，至其注意公益，服从于一定主权之下，听其指麾，全部一致，其为国民的运动，又远非条顿人所能几也。故识者谓世界史之正统，其代条顿人以兴者，将在斯拉夫人，非虚言也。

条顿民族既兴以后，而罗马民族之力尚未衰。中世史之末叶，意大利自由市府勃兴，实为今世国家之嚆矢。而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人，当十四五世纪，国势且蒸蒸日上，西辟美洲，东略印度，南开南洋，阿利安人之势力范围，始磅礴于欧洲以外。其主动者皆罗马人也。虽然，以物竞天择之公例，罗马人之老大，终不敌条顿人之少年。未几而荷兰人起，与之竞争。未几而英吉利人起，一举而代之。近则德意志人，复駸駸然凌厉中原矣。故观罗马条顿两族之盛衰，但于其殖民历史之沿革焉足矣。北阿美利加也（初为法人、班人所开，今全属盎格鲁撒逊族矣），南阿美利加也（本为班人、葡人所开，今为德意志势力范围），印度也（初为法人所经营，后卒全归英辖），南洋群岛也（初亦班、葡人航海所觅，今全为英、荷属），皆告我辈以两民族消长之明效也。今日全地球之土地主权，其百分中之九十分属于白种人。而所谓白种人者，则阿利安人而已。所谓阿利安人者，则条顿人而已。条顿人实今世史上独一无二之主人翁也。

论 正 统

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统。统之云者，殆谓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千余年来，陋儒断断于此事，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衍，不可穷诘，一言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是不可以不辩。

统字之名词何自起乎？殆滥觞于《春秋》。《春秋公羊传》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即后儒论正统者所援为依据也。庸讵知《春秋》所谓大一统者，对于三统而言。《春秋》之大义非一，而通三统实为其要端。通三统者，正以明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姓之所得私有。与后儒所谓统者，其本义既适相反对矣。故夫统之云者，始于霸者之私天下，而又惧民之不吾认也，乃为是说以钳制之曰：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吾生而有特别之权利，非他人所能几也。因文其说曰：“亶聪明，作父母。”曰：“辨上下，定民志。”统之既立，然后任其作威作福，恣睢蛮野，而不得谓之不义，而人民之稍强立不挠者，乃得坐之以不忠、不敬、大逆、无道诸恶名，以锄之、摧之。此统之名所由立也。《记》曰：“得乎丘名而为天子。”若是乎，无统则已，苟其有统，则创垂之而继续之者，舍斯民而奚属哉？故泰西之良史，皆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也。藉曰君而有统也，则不过一家之谱牒，一

人之传记，而非可以冒全史之名，而安劳史家之哓哓争论也。然则以国之统而属诸君，则固以举全国之人民视同无物，而国民之资格所以永坠九渊而不克自拔，皆此一义之为误也。故不扫君统之谬见，而欲以作史，史虽充栋，徒为生民毒耳。

统之义已谬，而正与不正，更何足云。虽然，亦既有是说矣，其说且深中于人心矣，则辞而辟之，固非得已。正统之辨，昉于晋而盛于宋。朱子《通鉴纲目》所推定者，则秦也，汉也，东汉也，蜀汉也，晋也，东晋也，宋、齐、梁、陈也，隋也，唐也，后梁、后唐、后汉、后晋、后周也。本朝乾隆间《御批通鉴》从而续之，则宋也，南宋也，元也，明也，清也。所谓正统者，如是如是，而其所据为理论，以衡量夫正不正者、约有六事：

一曰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其正不正也。凡混一宇内者，无论其为何等人，而皆奉之以正，如晋、元等是。

二曰以据位之久暂，而定其正不正也。虽混一宇内，而享之不久者，皆位之不正，如项羽、王莽等是。

三曰以前代之血胤为正，而其余皆为伪也，如蜀汉、东晋、南宋等是。

四曰以前代之旧都所在为正，而其余皆为伪也。如因汉而正魏，因唐而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是。

五曰以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为正，而其余为伪也。如因唐而正隋，因宋而正周等是。

六曰以中国种族为正，而其余为伪也。如宋、齐、梁、陈等是。

此六者，互相矛盾，通于此则窒于彼，通于彼则窒于此，而据朱子《纲目》及《通鉴辑览》等所定，则前后互歧，进退失据，无一而可焉。请穷诘之。夫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则混一者固莫与争

矣。其不能混一者，自当以最多者为最正，则苻秦盛时，南至邛夔，东抵淮泗，西极西域，北尽大碛，视司马氏版图过之数倍。而宋金交争时代，金之幅员，亦有天下三分之二，而果谁为正而谁为伪也？如以据位之久暂而定，则如汉唐等之数百年，不必论矣。若夫拓跋氏之祚，迥轶于宋齐梁陈。钱鏐、刘隐之系，远过于梁、唐、晋、汉、周。而西夏李氏，乃始唐乾符，终宋宝庆，凡三百五十余年。几与汉、唐埒，地亦广袤万里，又谁为正而谁为伪也？如以前代之血胤而定，则杞宋当二日并出，而周不可不退处于篡僭。而明李燾以宇文氏所臣属之萧岿为篡贼，萧衍延苟全之性命而使之统陈；以沙陀夷族之朱邪存勳、不知所出之徐知诰冒李唐之宗，而使之统分据之天下者，将为特识矣。而顺治十八年间，故明弘光、隆武、永历，尚存正朔，而视同闰位，何也？而果谁为正而谁为伪也？如以前代旧都所在而定，则刘、石、慕容、苻、姚、赫连、拓跋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故宅也。女真所抚之众，皆汉唐之遗民也，而又谁为正谁为伪也？如以后代所承所自出者为正，则晋既止矣，而晋所自出之魏，何以不正？前既正蜀，而后复正晋，晋自篡魏，岂承汉而兴邪？唐既正矣，且因唐而正隋矣，而隋所自出之宇文，宇文所自出之拓跋，何以不正？前正陈而后正隋，隋岂因灭陈而始有帝号邪？又乌知夫谁为正而谁为伪也！若夫以中国之种族而定，则诚爱国之公理，民族之精神，虽迷于统之义，而犹不悖于正之名也。而惜乎数千年未有持此以为鹄者也。李存勳、石敬瑭、刘智远，以沙陀三小族，窃一掌之地，而醜然奉为共主。自宋至明百年间，黄帝子孙，无尺寸土，而史家所谓正统者，仍不绝如故也。而果谁为正而谁为伪也？于是乎而持正统论者，果无说以自完矣。

大抵正统之说之所以起者，有二原因：其一，则当代君臣，

自私本国也。温公所谓“宋魏以降，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穷新（原注：唐庄宗自以为继唐，比朱梁于有穷篡夏，新室篡汉），运历年纪，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资治通鉴》卷六十九）诚知言矣。自古正统之争，莫多于蜀魏问题。主都邑者以魏为真人，主血胤者以蜀为宗子，而其议论之变迁，恒缘当时之境遇。陈寿主魏，习凿齿主蜀。寿生西晋，而凿齿东晋也。西晋踞旧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说，则晋为僭矣，故寿之正魏，凡以正晋也。凿齿时，则晋既南渡，苟不主血胤说，而仍沿都邑，则刘、石、苻、姚正，而晋则僭矣。凿齿之正蜀，凡亦以正晋也。其后温公主魏，而朱子主蜀。温公生北宋，而朱子南宋也。宋之篡周宅汴，与晋之篡魏宅许者同源。温公之主都邑说也，正魏也，凡以正宋也。南渡之宋与江东之晋同病。朱子之主血胤说也，正蜀也，凡亦以正宋也。盖未有非为时君计者也。至如五代之亦醜然目为正统也，更宋人之僭言也。彼五代抑何足以称代？朱温盗也，李存勖、石敬瑭、刘智远沙陀犬羊之长也。温可代唐，则侯景、李全可代宋也。沙陀三族可代中华之主，则刘聪、石虎可代晋也。郭威非夷非盗，差近正矣，而以黥卒乍起，功业无闻，乘人孤寡，夺其穴以篡立，以视陈霸先之能平寇乱，犹奴隶耳。而况彼五人者，所掠之地，不及禹域二十分之一；所享之祚，合计仅五十二年。而顾可以圣仁、神武、某祖、某皇帝之名奉之乎？其奉之也，则自宋人始也。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为所自受，因而溯之，许朱温以代唐，而五代之名立焉（以上采王船山说）。其正五代也，凡亦以正宋也。至于本朝，以异域龙兴，入主中夏，与辽、金、元前事相类，故顺治二年三月，议历代帝王祀典，礼部上言，谓辽则宋曾纳贡，金则宋尝称

侄，帝王庙祀，似不得遗。駸駸乎欲伪宋而正辽、金矣。后虽憚於清议，未敢悍然。然卒增祀辽太祖、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金太祖、太宗、世宗、章宗、宣宗、哀宗。其后复曾祀元魏道武帝、明帝、孝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岂所谓兔死狐悲，恶伤其类者耶？由此言之，凡数千年来哓哓於正不正伪不伪之辩者，皆当时之霸者与夫霸者之奴隶，缘饰附会，以保其一姓私产之谋耳。而时过境迁之后，作史者犹慷他人之慨，断断焉辩得失於鸡虫，吾不知其何为也。其二，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也。陋儒之说，以为帝王者神圣也，陋儒之意，以为一国之大，不可以一时而无一圣神焉者。又不可以同时而有两圣神焉者。当其无圣神也，则无论为乱臣、为贼子、为大盗、为狗偷、为仇雠、为夷狄，而必取一人一姓焉，偶像而尸祝之曰：此圣神也！此圣神也！当其多圣神也，则于群圣、群神之中，而探阉焉，而置碁焉，择取其一人一姓而膜拜之曰：此乃真圣神也！而其余皆乱臣、贼子、大盗、狗偷、仇雠、夷狄也。不宁惟是，同一人也，甲书称之为乱贼、偷盗、仇雠、夷狄，而乙书则称之为神圣焉。甚者同一人也，同一书也，而今日称之为乱贼、偷盗、仇雠、夷狄，明日则称之为神圣焉。夫圣神自圣神，乱贼自乱贼，偷盗自偷盗，夷狄自夷狄，其人格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一望而知，无能相混者也，亦断未有一人之身而能兼两途者也。异哉！此至显、至浅、至通行、至平正之方人术，而独不可以施诸帝王也！谚曰：“成即为王，败即为寇。”此真持正统论之史家所奉为月旦法门者也。夫众所归往谓之王，窃夺殃民谓之寇。既王矣，无论如何变相，而必不能堕而为寇。既寇矣，无论如何变相，而必不能升而为王，未有能相印焉者也。如美人之抗英而独立也，王也，非寇也。此其成者也。即不成焉，如菲律宾

之抗美，波亚之抗英，未闻有能目之为寇者也。元人之侵日本，寇也，非王也。此其败者也。即不败焉，如蒙古蹂躏俄罗斯，握其主权者数百年，未闻有肯认之为王者也。中国不然，兀术也，完颜亮也，在宋史则谓之为贼、为虏、为仇，在金史则某祖某皇帝矣，而两皆成于中国人之手，同列正史也。而“诸葛亮入寇”、“丞相出师”等之差异，更无论也。朱温也，燕王棣也，始而曰叛，曰盗，忽然而某祖某皇帝矣。而曹丕、司马炎之由名而公，由公而王，由王而帝，更无论也。准此以谈，吾不能不为匈奴冒顿、突厥颉利之徒悲也。吾不能不为汉吴楚七国、淮南王安、晋八王、明宸濠之徒悲也。吾不能不为上官桀、董卓、桓温、苏峻、侯景、安禄山、朱泚、吴三桂之徒悲也。吾不得不为陈涉、吴广、新市、平林、铜马、赤眉、黄巾、窦建德、王世充、黄巢、张士诚、陈友谅、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之徒悲也，彼其与圣神相去不能以寸耳，使其稍有天幸，能于百尺竿头，进此一步，何患乎千百年后贍才、博学、正言、说论、倡天经、明地义之史家，不奉以“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钦明文思、睿哲显武、端毅弘文、宽裕中和、大成定业、太祖高皇帝”之徽号！而有腹诽者，则曰大不敬。有指斥者，则曰逆不道也。此非吾过激之言也。试思朱元璋之德，何如窦建德？萧衍之才，何如王莽？赵匡胤之功，何如项羽？李存勖之强，何如冒顿？杨坚传国之久，何如李元昊？朱温略地之广，何如洪秀全？而皆於数千年历史上巍巍然圣矣神矣。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幸不幸而已。若是乎，史也者，赌博耳！儿戏耳！鬼蜮之府耳！势利之林耳！以是为史，安得不率天下而禽兽也？而陋儒犹嚶嚶然曰：此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伦也！国之本也！民之坊也！吾不得不深恶痛绝夫陋儒之毒天下如是其甚者也。

然则不论正统则亦已耳，苟论正统，吾敢翻千年之案而昌言曰：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也。第一，夷狄不可以为统，则胡元及沙陀三小族，在所必摈。而后魏、北齐、北周、契丹、女真，更无论矣。第二，篡夺不可以为统，则魏、晋、宋、齐、梁、陈、北齐、北周、隋、后周、宋，在所必摈。而唐亦不能免矣。第三，盗贼不可以为统，则后梁与明在所必摈。而汉亦如唯之与阿矣。然则正统当于何求之？曰：统也者，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必不获已者，则如英、德、日本等立宪君主之国，以宪法而定君位继承之律。其即位也，以敬守宪法之语誓于大众，而民亦公认之。若是者，其犹不谬於得邱民为天子之义，而于正统庶乎近矣。虽然，吾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何处有此？然犹断断于百步五十步之间，而曰统不统正不正，吾不得不怜其愚，恶其妄也。后有良史乎，盍於我国民系统盛衰、强弱、主奴之间，三致意焉尔。

论 书 法

新史氏曰：吾壹不解夫中国之史家，何以以书法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也。吾壹不解夫中国之史家，何以以书法为独一无二之能事也。吾壹不解夫中国之史家，果据何主义以衡量天下古今事物，而敢噤噤然以书法自鸣也。史家之言曰：书法者，本《春秋》之义，所以明正邪，别善恶，操斧钺权，褒贬百代者也。书法善，则为良史。反是，则为秽史。嘻，此誓言也！《春秋》之书法，非所以褒贬也。夫古人往矣，其人与骨皆已朽矣，孔子岂其不惮烦，而一一取而褒贬之？《春秋》之作，孔子所以改制而自发表其政见也。生于言论不自由时代，政见不可以直接发表，故为之符号标识焉以代之。书尹氏卒，非贬尹氏也，借尹氏以讥世卿也。书仲孙忌帅师围运，非贬仲孙忌也，借仲孙忌以讥二名也。此等符号标识，后世谓之书法。惟《春秋》可以有书法。《春秋》经也，非史也。明义也，非记事也。使《春秋》而史也，而记事也，则天下不完全无条理之史，孰有过於《春秋》者乎？后人初不解《春秋》之为何物，胸中曾无一主义，摭拾一二断烂朝报，而规规然学《春秋》，天下之不自量，孰此甚也！吾敢断言曰：有《春秋》之志者，可以言书法。无《春秋》之志者，不可以言书法。

问者曰：书法以明功罪，别君子小人，亦使后人有所鉴焉。子何绝之甚？曰：是固然也。虽然，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一述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故善为史者，必无暇断断焉褒贬一二人，亦决不肯断断焉褒

贬一二人。何也？褒贬一二人，是专科功罪於此一二人，而为众人卸其责任也。上之启梟雄私天下之心，下之堕齐民尊人格之念。非史家所宜出也。吾以为一民族之进化堕落，其原因决不在一二人。以为可褒则宜俱褒，以为可贬则宜俱贬。而中国史家，只知有一私人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而不知有一团体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以此牖民，此群治所以终不进也。吾非谓书法褒贬之必可厌，吾特厌夫作史者以为舍书法褒贬外，无天职无能事也。

今之谈国事者，辄曰恨某枢臣病国，恨某疆臣殃民。推其意，若以为但能屏逐此一二人，而吾国之治即可与欧美最文明国相等者然。此实为旧史家谬说所迷也。吾见夫今日举国之官吏士民，其见识与彼一二人者相伯仲也，其意气相伯仲也，其道德相伯仲也，其才能相伯仲也。先有无量数病国殃民之人物，而彼一二人乃乘时而出焉，偶为其同类之代表而已。一二人之代表去，而百千万亿之代表者，方且比肩而立，接踵而来，不植其本，不清其源，而惟视进退于一二人，其有济乎？其无济乎？乃举国之人，莫或自讥自贬，而惟讥贬此一二人，吾不能不为一二人呼冤也。史也者，求有益于群治也。以此为天职为能事，问能于群治有丝毫之影响焉否也？

且旧史家所谓功罪善恶，亦何足以为功罪善恶？彼其所纪载，不外君主与其臣妾交涉之事。大率一切行谊，有利于时君者则谓之功，谓之善，反是者则谓之罪，谓之恶。其最所表彰者，则死节之臣也。其最所痛绝者，叛逆及事二姓者也。夫君子何尝不贵死节？虽然，古人亦有言，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苟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亲昵，谁敢任之？若是乎，死节之所以可贵者在死国，非在死君也。试观二十四史所谓忠臣，其能

合此资格者几何人也。事二姓者，一奴隶之不足，而再奴隶焉，其无廉耻不待论也。虽然，亦有辩焉：使其有救天下之志，而欲凭藉以行其道也，则佛肸召而子欲往矣，公山召而子欲往矣。伊尹且五就汤而五就桀矣，未见其足以为圣人病也。苟不尔者，则持禄保位富贵骄人以终身于一姓之朝，安用此斗量车载之忠臣为也！《纲目》书“莽大夫扬雄死”，后世言书法者所最津津乐道也。吾以为扬雄之为人，自无足取耳，若其人格之价值，固不得以事莽不事莽为优劣也。新莽之治与季汉之治，则何择焉？等是民贼也，而必大为鸿沟以划之曰：事此贼者忠义也；事彼贼者奸佞也。吾不知其何据也！雄之在汉，未尝得政，未尝立朝，即以旧史家之论理律之，其视魏征之事唐，罪固可未减焉矣。而雄独蒙此大不韪之名，岂有他哉？李世民幸而王莽不幸，故魏征幸而扬雄不幸而已。吾非欲为儆薄卑靡之扬雄讼冤，顾吾见夫操斧钺权之最有名者，其衡量人物之论据，不过如是，吾有以见史家之与人群渺不相涉也。至于叛逆云者，吾不知泗上之亭长，何以异于渔阳之戍卒。晋阳之唐公，何以异于宸濠之亲藩。陈桥之检点，何以异于离石之校尉。乃一则夷三族而复被愍之名，一则履九五而遂享神圣之号。天下岂有正义哉！惟权力是视而已！其间稍有公论者，则犯颜死谏之臣时或表彰之是已。虽然，然所谓敢谏者，亦大率为一姓私事十之九，而为国民公义者十之一。即有一二，而史家之表彰之者，亦必不能如其力也。嘻！吾知其故矣。霸者之所最欲者，则臣妾之为之死节也！其次则匡正其子孙之失德而保其祚也。所最恶者，臣妾之背之而事他人也。其尤甚者，则发难而与己为敌也。故其一赏一罚，皆以此为衡。汉高岂有德于雍齿而封之？岂有憾于丁公而杀之？所谓为人妇则欲其和我，为我妇则欲其为我晋人耳。而彼等又知夫人类有尚名誉之性质，仅以及身

之赏罚而不足以惩劝也，于是鼎革之后，辄命其臣妾修前代之史，持此衡准以赏罚前代之人，因以示彼群臣群妾曰：尔其效此；尔其毋效彼。此霸者最险最黠之术也。当崇祯、顺治之交，使无一洪承畴，则本朝何以有今日？使多一史可法，则本朝又何以有今日？而洪则为国史贰臣传之首，史则为明史忠烈传之魁矣。夫以此两途判别洪、史之人格，夫谁曰不宜？顾吾独不许夫霸者之利用此以自固而愚民也。问二千年来史家之书法，其有一字非为霸者效死力乎？无有也。霸者固有所为而为之，吾无责焉。独不解乎以名山大业自期者，果何德于彼，而必以全力为之拥护也！故使克林威尔生于中国，吾知其必与赵高、董卓同诟；使梅特涅生于中国，吾知其必与武乡、汾阳齐名。何也？中国史家书法之性质则然也。

吾非谓史之可以废书法，顾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布尔特奇之《英雄传》，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而必不可妄学《春秋》，侈衮钺于一字二字之间，使后之读者，加注释数千言，犹不能识其命意之所在。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吉朋之《罗马史》，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若者为优，若者为劣，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获强盛，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后起之民族读焉，而因以自鉴曰：吾侪宜尔，吾侪宜毋尔。而必不可专奖励一姓之家奴走狗，与夫一二矫情畸行，陷后人于狭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无复发扬蹈厉之气。君不读龙门《史记》乎，史公虽非作史之极轨，至其为中国史家之鼻祖，尽人所同认矣。《史记》之书法也，岂尝有如庐陵之《新五代史》，晦庵之《通鉴纲目》，咬文嚼字，矜愚饰智，断断于繇小功之察，而问无齿决者哉！

论 纪 年

或问新史氏曰：子之驳正统论，辩矣。虽然，昔之史家说正统者，其意非必皆如吾子所云云也。盖凡史必有纪年，而纪年必藉王者之年号，因不得不以一为主，而以余为闰也。司马温公尝自言之矣（《资治通鉴》卷六十九）。新史氏曰：审如是也，则吾将更与子论纪年。

纪年者何义也？时也者，过而不留者也。立乎今日以指往日，谓之去年，谓之前年，谓之前三年，前十年，再推而上之，则词穷矣。言者既凌乱而难为之名，听者亦瞶然而莫知所指矣。然人生在世，则已阅数十寒暑，其此年与彼年交涉比较之事，不一而足。而人之愈文明者，其脑筋所容之事物愈多，恒喜取数百年数千年以前之事，而记诵之，讨论之。然而年也者，过而不留者也。至无定而无可指者也。无定而无可指，则其所欲记之事，皆无所附丽。故不得不为之立一代数之记号，化无定为有定，然后得以从而指名之，于是乎有纪年。凡天地间事物之名号，其根原莫不出于指代，而纪年亦其一端也。

凡设记号者，皆将使人脑筋省力也。故记号恒欲其简，不欲其繁。当各国之未相通也，各自纪年，盖记号必不能暗同，无可如何也。及诸国既已相通，交涉之事日多，而所指之年，其代数记号，各参差不相符，则于人之脑筋甚劳，而于事甚不便。故孔子作《春秋》，首据其义曰：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然后改元。所以齐万而为一，去繁而就简，有精意存焉也。（孔子前皆各国各自纪元，详

见《纪年公理》)。

既明纪年之性质及其公例矣，然则一地之中，而并时有数种纪年，固为不便，百年之内，而纪年之号屡易，其不便亦相等明矣。何也？一则横繁；一则竖繁也。是故欲去繁而就简者，必不可不合横竖而皆一之。今吾国史家之必以帝王纪年也，岂不以帝王为一国之最巨物乎哉！然而帝王在位之久，无过六十年者（康熙六十一年，在中国数千年中实独一无二也）。其短者，或五年，或三年，或二年、一年乃至半年。加以古代一帝之祚，改元十数，瞽乱繁杂，不可穷诘。故以齐氏纪元编所在年号，合正统僭伪计之，不下千余。即专以史家所谓正统者论，计自汉孝武建元（以前无年号），以迄今光绪，二千年间，而为年号者，三百十有六。今试于此三百十六之中，任举其一以质诸学者，虽极淹博者，吾知其不能具对也。于是乎强记纪元，遂为读史学者一重要之学科，其糜脑筋于无用亦甚矣。试读西史，观其言几千几百年，或言第几世纪，吾一望而知其距今若干年矣，或有译本以中国符号易之，而曰唐某号某年，宋某号某年，则棼然不知其何指矢（译西书而易以中国年号，最为无理。非惟淆乱难记，亦乖名从主人之义。若言中国事而用西历，其谬更不待辩矣）。夫中国人与中国符号相习，宜过于习他国矣，然难若天渊焉者何也？一极简，一极繁也。苟通此义，则帝王纪年之法，其必不可以久行于今日文明繁备之世，复何待言！

西人之用耶稣纪元，亦自千四百年以来耳。古代之巴比伦人，以拿玻纳莎王为纪元（在今西历纪元前七百四十七年）。希腊人初时，以执政官或大祭司在位之年纪之，其后改以和灵之大祭为纪元（当纪元前七百六十七年）。罗马人以罗马府初建之年为纪元（当纪元前七百五十三年）。回教国民以教祖摩哈麦德避难之年为

纪元（当纪元前六百二十二年）。犹太人以《旧约·创世纪》所言世界开辟为纪元（当纪元前三千七百六十一年）。自耶稣立教以后，教会以耶稣流血之年为纪元。至第六世纪，罗马一教士，倡议改用耶稣降生为纪元，至今世界用之者过半。此泰西纪年之符号逐渐改良，由繁杂而趋于简便之大略也。要之，苟非在极野蛮时代。断无以一帝一号为纪年者。有之，其惟亚洲中之中国、朝鲜、日本诸国而已（日本近亦以神武天皇开国为纪元）。

曰：然则中国当以何纪？曰：昔上海强学会之初开也，大书孔子卒后二千四百七十三年。当时会中一二俗士，闻之舌舛汗下色变。曰：是不奉今王正朔也。是学耶稣也。而不知此实太史之例也。《史记》于《老子列传》大书孔子卒后二百七十五年，而其余各国世家，皆书孔子卒，此史公开万世纪元之定法也。近经学者讨论，谓当法其生不法其死。以孔子卒纪，不如以孔子生纪，至今各报馆用之者既数家，达人著书，亦往往采用。此号殆将易天下矣。用此为纪，厥有四善：符号简，记忆易，一也。不必依附民贼，纷争正闰，二也。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油然而生，三也。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孔子以后，故用之甚便；其在孔子前者，则用西历纪元前之例，逆而数之，其事不多，不足为病，四也。有此四者，则孔子纪元，殆可以俟诸百世而不惑矣。或以黄族鼻祖之故，欲以黄帝纪；或以孔子大同托始故，欲以帝尧纪；或以中国开辟于夏后故，欲以大禹纪；或以中国一统一于秦故，欲以秦纪。要皆以事理有所窒，于公义无所取，故皆不足置辩；然则以孔子生纪元，殆后之作史者所宜同认矣。

纪元之必当变也，非以正统闰统之辩而始然也。然纪元既不以帝号，则史家之争正统者，其更无说以自文矣。不然，以新莽之

昏虐，武后之淫暴，而作史者势不能不以其始建国，天凤、地皇、光宅、垂拱、永昌、天授、长寿、延载、天册、登封、神功、圣历、久视、长安等年号，厕之于建元之下，光绪之上，其为我国史污点也，不亦甚乎！况污点国史者，又岂直新莽、武后乎哉！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